



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

BEIJING GAODENG JIAOYU JINGPIN JIAOCAI

21世纪社会学系列教材

Textbooks of Sociology in 21st Century

# 社会性别研究导论

——两性不平等的社会机制分析

Introduction to the Gender Studies  
Analyses to Dynamics of Gender Inequalities



佟新 著



# 社会性别研究导论

——两性不平等的社会机制分析

Introduction to the Gender Studies  
Analyses to Dynamics of Gender Inequalities



佟新◎著

ISBN 978-7-301-02587-2 C·0349

北京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202号 100871

http://www.bjpp.cn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性别研究导论:两性不平等的社会机制分析/佟新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7

ISBN 978-7-301-09267-5

I. 社… II. 佟… III. 社会-性别-研究-高等学校-教材  
IV. C913.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5976 号

**书 名:** 社会性别研究导论——两性不平等的社会机制分析

**著作责任者:** 佟 新 著

**责任编辑:** 陈 宏 张盈盈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09267-5/C·034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ss@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世界知识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3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6.75 印张 287 千字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定 价:** 26.0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	1
引 子 .....	1
第一节 性别与社会性别 .....	2
第二节 社会性别研究的基本内容和发展状况 .....	6
小 结 .....	16
关键概念 .....	16
思考题 .....	16
进一步阅读文献 .....	16

## 第一编 反思男性气质和女性 气质的文化建构

第二章 性征与两性气质的心理建构 .....	19
引 子 .....	19
第一节 性征 .....	21
第二节 性别气质的心理建构 .....	27
小 结 .....	33
关键概念 .....	34
思考题 .....	34
进一步阅读文献 .....	35
第三章 性别气质的历史文化建构 .....	36
引 子 .....	36
第一节 西方历史文化中的性别气质 .....	38
第二节 中国历史文化中的性别气质 .....	43
小 结 .....	49
关键概念 .....	49



思考题 .....	49
进一步阅读文献 .....	49
<b>第四章 性别社会化 .....</b>	<b>50</b>
引子 .....	50
第一节 人的社会化 .....	52
第二节 性别形成的理论与两性道德发展 .....	59
小结 .....	64
关键概念 .....	65
思考题 .....	65
进一步阅读文献 .....	65
<b>第五章 话语建构的性别气质 .....</b>	<b>66</b>
引子 .....	66
第一节 话语和大众传媒 .....	68
第二节 对中国大众传媒的性别分析 .....	75
小结 .....	83
关键概念 .....	84
思考题 .....	84
进一步阅读文献 .....	84

## 第二编 身体的政治

<b>第六章 性关系中的性别秩序 .....</b>	<b>87</b>
引子 .....	87
第一节 性关系 .....	89
第二节 性关系与性别秩序 .....	94
小结 .....	101
关键概念 .....	102
思考题 .....	102
进一步阅读文献 .....	102
<b>第七章 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 .....</b>	<b>103</b>
引子 .....	103

第一节·针对妇女的暴力 .....	104
第二节 中国反对针对妇女暴力的行动 .....	114
小 结 .....	121
关键概念 .....	122
思考题 .....	122
进一步阅读文献 .....	122
<b>第八章 婚姻制度下的性别关系 .....</b>	<b>123</b>
引 子 .....	123
第一节 婚姻制度与性别关系 .....	124
第二节 中国的婚姻制度 .....	131
小 结 .....	139
关键概念 .....	139
思考题 .....	139
进一步阅读文献 .....	139

### 第三编 劳动分工、经济发展和性别

<b>第九章 劳动性别分工 .....</b>	<b>143</b>
引 子 .....	143
第一节 劳动和劳动性别分工 .....	144
第二节 当代中国劳动性别分工 .....	156
小 结 .....	162
关键概念 .....	163
思考题 .....	163
进一步阅读文献 .....	163
<b>第十章 两性职业发展 .....</b>	<b>164</b>
引 子 .....	164
第一节 职业发展与性别 .....	165
第二节 中国的两性职业发展 .....	179
小 结 .....	182
关键概念 .....	183
思考题 .....	183



进一步阅读文献 .....	183
<b>第十一章 消费社会与性别 .....</b>	<b>184</b>
引子 .....	184
第一节 符号消费与性别气质 .....	184
第二节 性别商品化 .....	190
小结 .....	198
关键概念 .....	198
思考题 .....	198
进一步阅读文献 .....	198
<b>第十二章 社会发展与性别 .....</b>	<b>200</b>
引子 .....	200
第一节 经济增长与性别 .....	201
第二节 发展项目与性别 .....	208
小结 .....	217
关键概念 .....	217
思考题 .....	217
进一步阅读文献 .....	217
<b>第四编 挑战传统知识</b>	
<b>第十三章 社会性别研究的基本理论 .....</b>	<b>221</b>
第一节 女权运动和女权主义理论的互动发展 .....	221
第二节 社会性别研究:超越二元论 .....	232
小结 .....	239
关键概念 .....	239
思考题 .....	239
进一步阅读文献 .....	239
<b>第十四章 社会性别研究的认识论 .....</b>	<b>241</b>
引子 .....	241
第一节 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 .....	244
第二节 社会性别研究的方法 .....	250



---

小 结 .....	254
关键概念 .....	255
思考题 .....	255
进一步阅读文献 .....	255



## 第一章

# 导 论

## 引 子

当代中国作家贾平凹先生在他的小说《怀念狼》中表达了他对现代生活中男性阳刚之气削减的悲哀和忧虑。小说的开头这样写道：

清晨对着镜子梳理，一张苍白松弛的脸，下巴上稀稀的几根胡须，照照，我就讨厌了我自己！遗传研究所的报告中讲，在城市里生活了三代以上的男人，将再不长出胡须。看着坐在床上已经是三个小时一声不吭玩着积木的儿子，想像着他将来便是个向来被我讥笑的那种奶油小生，心里顿时生出些许悲哀。<sup>①</sup>

作者的悲哀源于他对男性形象的日益衰败的想像以及由这种想像引发的对生活在城市中的自己和儿子的阳刚之气丧失的不满。任何人都有对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想像和要求，问题是我们的想像为什么总是将男性气质与阳刚之美相联系，将女性气质与阴柔之美相对应。人们有关性别的想像是怎样形成的呢？是什么使人们的想像如此匮乏地固定在这些特定的模式上？这些固定化了的想像对个人和社会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sup>①</sup> 贾平凹：《怀念狼》，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丁玲女士作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女作家,她坎坷的一生反映了她生活的年代中国政治的复杂与多变。1942年,她在延安整风运动之前写下了《三八节有感》一文。这篇文章成为她政治生涯中的重要事件。

我是最以一个女人自己不进步而还要拖住她的丈夫为可耻的,可是让我们看一看她们是如何落后的。她们在没有结婚前抱着凌云的志向,和刻苦的斗争生活,她们在生理的要求和“彼此帮助”的蜜语之下结婚了,于是她们被逼着做了操劳的回到家庭的娜拉。她们也唯恐有“落后”的危险,她们四方奔走,厚颜地要求托儿所收留她们的孩子,要求刮子宫,宁肯受一切处分而不得不冒着生命的危险悄悄地去吃堕胎的药。而她们听着这样的回答:“带孩子不是工作吗?你们只贪图舒服,好高骛远,你们到底做过一些什么了不起的政治工作!既然这样怕生孩子,生了又不肯负责,谁叫你们结婚呢?”于是她们不能免除“落后”的命运。<sup>①</sup>

丁玲先生在文章中把女性的“落后”和“不求上进”直接指向了婚姻以及女人的进步与婚姻、生育、抚育之间的冲突。在这段话中并没有出现那些掌握着话语权和命名权的“丈夫”们,但我们却可以通过字里行间感受到“落后”女人们的委屈,她们虽然追求进步,但却在生理要求和甜言蜜语的诱惑下走向了婚姻,由此,女人们因为生育、抚育等一连串的责任而被定义为“落后”。女人的这种命运,使我们有机会思考:日常生活中的两性关系如何复杂地与政治及权力关系搅和在一起?由女性承担的生育及抚育的劳动分工如何被政治化成为日常生活中看不见的潜规则?

两位文学家的寥寥数笔为我们勾画出日常生活中人们对于性别问题的关心,以及性别问题如何在我们的生活中变得“可见”或“不可见”。本章主要分析与性别相关的问题,并将这些问题理论化,以廓清社会性别研究的一些基本概念。

## 第一节 性别与社会性别

### 一、性别的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

为了更好地说清楚性别问题,首先要分清两个基本概念,一是性别(sex),一是社会性别(gender)。当填写各种表格的“性别”一栏时,我们会不假思索地写

<sup>①</sup> 郁元宝、孙洁:《三八节有感——关于丁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上“男”或“女”。而当我们看到街头一位留着长发,身着花衬衫却高大的青年时,心中会疑惑“这人男不男、女不女的”。这时,我们认定某个人的性别是以他/她的穿着、行为举止和言谈等社会性特征为主的,当我们认为一位穿花衬衫的男人像女人时,是有关男人应当英武而非文弱的“社会印象”在起作用,这时人们对于男人和女人的看法就是“社会性别”了。社会性别概念的提出主要是强调人是社会动物,当人在与他人交往时,人的社会性就会起作用,因此,人类社会中的两性不可能是单纯生物学意义的男人和女人,一定是社会意义上的男人和女人。人类的性别具有双重属性,既有生物属性也有社会属性。

### (一) 性别的生物属性

在日常生活经验中,人们常会将某人的某些特性归于遗传基因的作用,人们普遍相信某些与生俱来的东西会对人的个性以及社会行为产生影响。

性别(sex)常常是指解剖学意义上的男女。作为生命体的两性有共性也有差异,共性甚至比差异大得多。两性差异主要表现在染色体、性腺、性激素、解剖构造、生理机能、身体形态、运动机能等方面。20世纪70年代之前,生物学上的两性差异主要以解剖来判别;此后,染色体测量成为判定性别的主要方法。

正常的人类个体具有23对、46条染色体,最后一对即第23对染色体与人的性别有关,称为性染色体。男性的性染色体由一条x型染色体和像翻转的y型染色体组成。女性的性染色体则由两条x型染色体组成。从卵子受精的那一刻起,不同的染色体构成就决定了性器官、性腺等一系列生理性征的形成。染色体是决定人类生物性别的要素。1972年,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决定,运动员必须通过染色体检验证明其“性别”。染色体不是绝对二元的,存在某种模棱两可的、异常的性染色体构成,是科学上难以精确地鉴别性别的极端状况。

### (二) 性别的社会属性

除了生物学概念的性别差异外,日常生活中我们对某人性别的确定主要是文化概念,因为作为有文化的人不是赤身裸体的,人们是通过各种与性别相关的符号,如衣服、装饰品、化妆品来确定某人的性别的。这种对性别的确定是一种文化,这时的性别就是“社会性别”(gender,本书有时为了简便也称为性别),文化意义下的性别常常会使人们将那些易装者误认为是与其生物学意义上不同性别的人。

社会性别是以文化为基础、以符号为特征判断的性别,它表达了由语言、交流、符号和教育等文化因素构成的判断一个人性别的社会标准。社会性别概念强调性别文化特性,是社会与文化赋予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种种意义,例如,人们把“男儿有泪不轻弹”视为一种男性美德,并非是生物因素决定了男人



只能是“流血不流泪”，而是社会界定了男性“适当”的行为就是“泪往肚里流”。对“奶油小生”的嘲讽不仅是嘲讽一个男人是否有胡须这样的生物特征，而是因其背离了一整套与“男子汉”相对应的社会想像。社会对“奶油小生”的贬低表明，人们对男子汉形象的想像决定了他们不能接受和容忍男性的女性化行为。

## 二、社会性别体制

### (一) 定义社会性别体制

社会性别并非简单的人们通过某些文化象征来识别男女的事情，而是一整套确定两性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的社会制度，它通过文化、政治和经济的作用，使女性处于社会中的从属地位，这一整套制度称为社会性别体制。

1975年，美国人类学家鲁宾以“交换女人”为题，首次提出“社会性别体制”(sex/gender system)的概念。她提出的问题是：

一个顺从的女人是个什么人？她是人类雌性中的一员。可这个解释就跟没解释一样。一个女人就是一个女人。她只有在某些关系中才变成仆人、妻子、奴婢、色情女招待、妓女或打字秘书。脱离了这些关系，她就不是男人的助手，就像金子本身并不是钱……等等。那么这些使一个女性变成一个受压迫的女人的关系是什么呢？<sup>①</sup>

在对西方三大理论派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和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反思与批判的基础上，鲁宾提出“社会性别体制”的概念，认为这一体制不是隶属于经济制度，而是与经济政治制度密切相关的、有自身运作机制的一种人类社会制度，这套制度使女性从属于男性。她指出“一个社会的‘社会性别制度’，是该社会将生物的性转化为人类活动的产品的一整套组织安排，这些转变的性需求在这套组织安排中得到满足。”<sup>②</sup>

时至今日，社会性别研究的理论体系还很不成熟，并存在各种争议，但这一概念的提出具有标志性意义，它表现了两性之间的生物差异可以转化为社会差异，并以此维持一整套不平等的社会制度，这种社会制度曾经在人类历史上非常有效地存在过，并依然存在。

本书的工作是沿着鲁宾提出的“社会性别体制”概念，从文化、政治和亲密关系的角度思考两性不平等制度的产生、发展、维持和改变。

<sup>①</sup> 盖尔·鲁宾：《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载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3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24页。

## (二) 生物性别与社会性别的相互嵌入

在鲁宾之后,不少的学者展开了社会性别研究,但存在各种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两性差异是生物本性的差异还是社会本性差异,本书认为,性别表现出的社会性建立在人的生物性别和社会性别不可分割的基础上,性别与社会性别是相互嵌入、相互关联和互相作用的。因此使用社会性别概念有利于突出两者之间的联系。性别和社会性别只是有利于进行分析的两个概念,而不是在现实生活中可以分辨的两种性别状况,对这两个概念的使用有助于更有效地分析两性不平等关系和不平等状况。使用社会性别概念不是为了分解生物性别的作用,而是利用社会性别体制的概念揭示掩盖在生物性别之下不平等的社会制度。

## (三) 复杂的社会性别体制

如何分析社会性别体制呢?本书认为,社会性别体制既是一种历史现象又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体制。

第一,作为历史现象的社会性别体制延续着一整套父权制度。父权制(patriarchy)是男人凭借他们的性别及与他人的血缘关系确立的男性统治,是以男尊女卑的意识形态确立和保护男性普遍优先权的性别关系秩序。现代社会,父权制也被用来泛指一切不平等的社会制度。父权制是一种以男性为主导的统治,它并不意味着作为个体的男性是一个“统治者”,个体的女性是被动的“被统治者”,作为一种制度形式,女性像男性一样参与到这种男性统治中,男性也像女性一样受到这种统治的限制。这种统治的逻辑在于,所有的参与者不断加入到对统治制度的建设中,推进对其自身的统治,并自觉或不自觉地促使统治延续下去。

第二,社会性别体制与社会中的文化、政治经济以及个人的亲密关系等因素作用在一起。

第三,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的社会性别体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具有可变性。进入现代社会,当公民权的概念在社会上不断普及的时候,父权制的整个理念受到质疑,各种女权运动推动了性别关系的变革。并由此形成了近五十年来女性学科的发展。在女权运动、女权主义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推动下,社会性别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出现了,它视父权制为不公正的社会制度,要求通过政治努力、学术反思和实际行动进行改变,以实现两性平等(gender equality)。

两性平等是指建立在性别平等意识的前提下,实现实际生活中的两性机会平等,实现理想层面的结果平等。两性机会平等包括两性在法律、政治、经济等机会上的平等;两性在工作报酬上的平等和在获得人力资本和其他生产资源上

的机会平等;还包括两性在“发声”上的平等,因为两性平等的发声机会可以展示两性影响决策的能力和贡献的大小。结果平等是指在承认基本差异之上的事实平等。追求两性机会平等的社会制度是实现两性结果平等的基础。

社会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的核心是揭示社会性别体制的状况,分析导致其产生和再生产的社会机制,以最终实现两性平等。

## 第二节 社会性别研究的基本 内容和发展状况

### 一、社会性别研究的基本内容

#### (一) 揭示两性不平等的现状

社会性别研究的基本内容之一是揭示日常生活中存在性别不平等状况以及这种状况对于两性的压迫。当谈到两性不平等时,常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中国妇女解放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女性与男性一样接受了尽可能多的教育;她们广泛参与社会劳动;具有婚姻的自主权,妇女地位已经很高了。也有人以家庭中存在的“气管炎”(妻管严)现象,女性在职场上的成就,男人在职场上的压力以及承担起家庭责任的“模范丈夫”为例,说明男人已经没有什么优势地位可言,也不存在男性对女性的压迫。

毫无疑问,社会是向更加平等的方向发展的,传统男尊女卑的父权制生活状况已经有了非常显著的改观。我们再也看不见裹小脚的女人,但我们却随处可见穿细高跟鞋的女人;就像我们再也看不见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的皇帝生活,但却常常听说腐败高官们奢华的生活一样。两性不平等的状况和它对我们生活的压迫变得更为隐蔽,这更需要以批判的眼光揭示那些显性的和隐性的性别不平等状况。

显性的性别不平等是指那些可以通过统计数字表达出来的不平等,如两性在出生性别比、受教育程度、收入状况和职业发展上的差距,这些可以通过可比较的统计资料得以说明。目前联合国强调要加强性别统计,因为性别统计是一种有效的工具,对检查、监督男女平等发展目标具有重要作用,能够较为客观地反映现实问题。从两性的出生权利看,时至今日的中国,两性并不具有相同的出生权。在受精卵结合的瞬间决定的性别,也同样决定了这一胚胎出生的权利和未来的命运。有些胚胎因为被鉴定出来是女婴就可能遭受人为的流产。

上述现象如果是一种相对普遍的现象,就可能产生人口学上被称为出生性

别比失调的结果。所谓出生性别比也叫出生婴儿性别比,是指某一时期内每100名出生女婴所对应的出生男婴数,其计算公式为:

$$\text{出生性别比} = \frac{\text{该年该地出生的男婴数}}{\text{该年该地出生的女婴数}} \times 100\%$$

出生性别比决定着未来一定时间内的分年龄性别比以及总人口性别比。长期观察的结果表明,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出生婴儿性别比相对稳定,十分近似地波动于101—107:100之间。这说明:第一,出生的男婴数量略大于出生的女婴数量。第二,出生男婴数量和女婴数量之比差别不会很高。而2000年进行的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表明,此年全国出生婴儿性别比达116.86/100。这个数字远高于标准出生性别比的上限,同时这种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的状况更多地出现在农村,另外也出现在那些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如日本、韩国等,这种状况被称为“儒家文化圈”中的“男婴偏好”。有研究认为,如果目前中国产院的出生婴儿性别比达到109/100的水平,则选择性流引产可以解释统计的出生性别比高于107/100的2个百分点,即使是这样的数字也意味着每年相应减少21万女婴的出生<sup>①</sup>。是男婴还是女婴的事实可能决定了一个人生前和生后的种种命运。

隐性的性别不平等是更加复杂的、看不见的社会性别不平等现象。它很难通过性别统计表现出来,但又确实实地存在,例如,在两性成长过程中,人们对男生和女生的不同期待导致了两性职业发展目标上的差异,并影响了两性的职业发展。揭示种种隐性的性别不平等是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 (二) 分析性别不平等产生和再生产的社会机制

社会性别研究并不简单地停留在提示性别不平等的现状上,要进一步分析性别不平等关系产生的原因,分析其与文化、经济、心理、社会制度与政治结构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种种不平等状况得以延续的社会基础。

美国社会历史学家琼·W.斯科特最早系统地论述“社会性别”的概念,她认为,首先,社会性别是区分社会地位和组织社会关系的基础。其次,社会性别是区分权力关系的基本方式。对性别制度的分析要关注四个方面。第一,文化象征的种种表现,如为什么夏娃和玛丽亚象征污浊与纯洁?这些文化象征是在什么条件下产生的?以何种方式产生?第二,有关男人气质和女人气质的含义是什么?为什么不同的性别气质是相互排斥的?第三,要应用政治学的概念,要

<sup>①</sup> 查瑞传、曾毅、郭志刚主编:《中国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分析》(上),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12页。

将社会组织、经济制度等纳入对性别与权力关系的分析中。第四,分析主观身份的建构,既分析性别关系是如何再生产出来的。<sup>①</sup>

英国社会学家沃尔比再次启用父权制的概念,揭示两性不平等再生产的社会机制。她认为,父权制是一种男人支配、压迫和剥削女人的社会结构和实践体系。她认为父权制的运作由六种既独立又相互作用的结构组成。这些结构是:第一,家庭内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表现为女性承担家务劳动和生育儿女,而丈夫无偿占有这些劳动。第二,有酬工作。女性被排斥在某些类型的有酬劳动之外,只能停留在收入较低、低熟练程度的工作中。第三,父权制国家。国家在其政策和优先权上对父权利益有系统化的偏爱。第四,男性暴力。男性暴力是一种模式化和系统化的行为,女性在日常生活中遭受男性暴力,但国家却以不干涉的方法宽恕了这种暴力。第五,性行为中的父权关系,这种关系在强迫异性恋和性的双重标准中表现出来。第六,父权的文化制度。媒体、宗教和教育等制度和实践制造出在父权凝视下的女性,这影响到女性的认同和行为。沃尔比区分了两种父权制,一是私人父权制,它是发生在男性家长控制的家庭内的对女性的压迫。这是一种排外性的策略,它将女性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二是公共父权制,是一种集体形式的父权制,女性虽然可以涉足公共领域,如参加有酬劳动,但仍然被隔离在财富、权力和地位之外。现代社会,父权制正从私人父权制走向公共父权制。<sup>②</sup>

借鉴斯科特和沃尔比的分析,本书的目的在于分析以父权制为核心的性别不平等是如何被再生产出来的。本书的分析模式是强调三大社会机制对性别不平等的作用,一是父权制的文化及实践,二是性关系中的父权制与性双重标准的实践,三是以劳动性别分工为基础的有酬劳动、国家、法律机制对性别发展的作用。首先,以父权制意识形态为中心的文化和实践通过建构两性气质在社会心理层面划分了两性差异,并通过社会化过程、大众传媒再生产出刻板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社会性别研究认为,父权制意识形态及相关的文化符号、仪式具有褒扬男性价值、贬低女性价值的倾向,文化通过社会化过程将不平等的性别意识形态合理化、合法化,并形成代际传递。无论是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都存在两种密不可分的制度,一是经济制度,二是婚姻家庭制度。经济制度提供了人类自身生存的保障,婚姻家庭制度提供了人类再生产的保障,两种

<sup>①</sup> 琼·斯科特:《性别,历史分析中一个有效范畴》,载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57—158页。

<sup>②</sup> Sylvia A. Walby, *Theorizing Patriarchy* (Oxford: Blackwell, 1990).



制度是人类社会得以延续的重要保障。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既需要经济制度也需要婚姻家庭制度,两种制度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于人类生活和两性关系,两者密切相关,不可截然分开。

本书共分四编。前三编将系统地分析社会性别体制是如何通过文化、政治、经济和两性间的亲密关系实现父权制统治的。第一编讨论社会如何通过社会心理、社会化过程、以家文化为基础的历史过程、话语以及消费文化共同建构固定的性别气质。即父权制的意识形态建立的文化规定了男性和女性的行为方式和情感表达方式,塑造了两性不同的性别气质,并通过社会化过程不断延续不平等的性别规范。第二编分析社会如何通过对人身体的控制建立不平等的性关系秩序,分析对女性暴力的原因,以及性的双重标准对两性身体的控制。性关系不仅是两性私密的个人活动,也是具有社会功能的特定关系,它可以成为性别压迫的工具。性关系和亲密关系是日常生活中隐蔽的场所,性关系是作用于两性关系秩序的重要社会机制,即分析两性的亲密关系中,父权制以更为隐蔽的方式实施统治。借助这种方式,一方面男性统治的经验可以不断丰富;另一方面,它又隐藏了女性被统治的经历,使不平等的性别关系成为“看不见”的黑洞。第三编分析劳动性别分工作为生产和再生产性别不平等关系的重要机制,分析政治、法律和经济因素如何利用父权制意识形态产生等级化的劳动性别分工。等级化的劳动性别分工不仅掩盖了人类生存和发展中的两性合作劳动的历史过程,还以公私领域分化的意识形态继续生产和再生产等级化的劳动性别分工。分析两性职业发展的空间,以及在消费社会和全球化发展的条件下性别不平等如何通过社会发展得以重构。导致性别不平等的社会机制并不是单一存在的,它是有系统、有秩序地作用于社会关系,具有各种各样的反馈循环,环境、人口、技术、经济、政治变量与劳动性别分工,意识形态和家庭结构有紧密的联系。总之,社会性别体制正是在与其他社会制度的复杂互动中得以延续,一方面,父权制与其他的社会制度交织在一起作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性别关系秩序也作用于种种社会制度。

第四编将系统介绍社会性别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

### (三) 寻找和实践人之解放的理想

揭示和分析不平等的性别关系的目的是为了建立起平等的两性关系,本书以寻找和实践男女平等和人的解放的理想状态为重要目标。有学者明确指出,“现代性的矛盾冲突并不在于爱与金钱,也不在于社会性别身份的定义之竞争,

而在于为真正平等的公共权利而进行的持续的斗争。”<sup>①</sup> 这表明了一种事实：两性平等的真正挑战来自于政治领域。近代历史上，女性争取权利的斗争一直在与根深蒂固的父权制权力模式相抗争。

1949年以来中国进行的男女平等的社会实践已经明显地影响了人们的观念和社会制度，女性更多地拥有了和男性相同的权利水平。《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年)》指出：“贯彻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推动妇女充分参与经济和社会发展，使男女平等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领域进一步得到实现。保障妇女获得平等的就业机会和分享经济资源的权利，提高妇女的经济地位；保障妇女的各项政治权利，提高妇女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及决策的水平；保障妇女获得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普遍提高妇女受教育程度和终身教育水平；保障妇女享有基本的卫生保健服务，提高妇女的健康水平和预期寿命；保障妇女获得平等的法律保护，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优化妇女发展的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提高妇女生活质量，促进妇女事业的持续发展。”

从《中国妇女发展纲要》看，妇女依然是被解放的客体；而我们寻找和实践男女平等的理想，并不是简单地追求男女相同的权利水平，而是寻求解放之路，即两性同样的享有人的基本权利和身心的发展。

本书贯穿的基本思想是强调性别是社会建构的结果，绝大多数的性别行为和角色是人际的、社会的和文化期望的结果，而不是生物学上的本能要求。性别的刻板建构损害和破坏了人的发展潜能。在生物学基础上的社会建构规定了两性可能的发展方向，它阻碍了我们独特才能和兴趣的发展，我们的目标是要使社会性别的建构具有更大的弹性，这种弹性意味着个体能够在职业选择、性关系、亲子关系、政治发展等诸多方面具有更广阔的空间。

## 二、社会性别研究的发展状况

社会性别研究是一门新兴的、跨学科的研究范畴，其发展还很不成熟，既面临巨大挑战，也含有发展潜力。它脱胎于女权运动、女权主义理论和妇女研究。但与妇女研究不同，它不仅研究妇女本身，还把两性和两性关系纳入研究视野。

目前，妇女研究和社会性别研究的学术边界并不清晰，研究内容有一定重叠。20世纪80年代后，妇女研究(Women Studies, 有译“女性学”或“妇女学”)常常是指由妇女们做的、研究妇女问题的学科。今天，在许多国家的大学教育中妇女研究都获得了一定的学术地位。许多著名大学建立了妇女研究系或妇

<sup>①</sup> [英]约翰·麦克因斯：《男性的终结》(黄茜、周丽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

女研究中心,取得了学科建设和研究的成果。因为妇女研究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范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教授和学生进入到这一领域。到20世纪90年代,这一领域的研究者们越来越多地注意到仅仅以妇女为研究对象将面临很多困境:第一,妇女的生活状况绝不简单是她们个人的事情,男女两性的社会生活是不可分割的。第二,父权制所导致的压迫,不仅是对女性的压迫,它同样也是对男性的压迫。第三,妇女解放并不是指妇女个人的解放,而是人的解放,即男女共同的解放。因此,社会性别研究得以发展,一些妇女研究系或研究所更名为社会性别研究系或中心。社会性别研究将两性都纳入研究的视野,它不再简单地关注女性的经验,而是关注和致力于分析导致两性不平等的社会机制。

### (一) 国际社会性别研究的发展状况

从国际上看,社会性别研究在大学学科建设、学术研究、国际交流和组织发展方面都有一定的成绩。

从学科建设看,20世纪70年代妇女研究在大学得到开创,但在学术界处于边缘地位。20世纪80年代后,妇女研究在发达国家的大学中获得了一定的学科地位。到20世纪90年代,社会性别研究的概念出现,学科发展更加完善。

以美国为例,20世纪60年代,关于妇女和性别的专题大约有16个课程。1970年圣地亚哥州立大学(University of Santiago)获得了第一个妇女研究的项目,建立了妇女研究系,它是第一个以系的方式运作妇女研究的大学。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和爱莫瑞大学(Emory University)的妇女研究具有较大的影响。妇女研究的专业人员最初是由传统系科内一大批对女权主义议题和社会性别分析感兴趣的妇女组成的。妇女研究组织的形式更像是一个“中心”(program)而不像“系”(department)。1990年全美妇女研究联合会董事会(NWSA Directory)列出了621个妇女研究中心,其中425个能够提供妇女研究的辅修科目和妇女研究文凭,其中的187个设置妇女研究专业,能够提供妇女研究的研究生课程的学院从1988年的55所增长到1990年的102所,10年间增长了近一倍,其中至少有8所院校有妇女研究专业的硕士点,有6所学校能授予女性学博士学位。到2000年,全美已有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所250家,1000多所大学有700个女性学系,每年开设3万多门与性别有关的课程。<sup>①</sup>从美国的情况看,妇女研究和社会性别研究的发

<sup>①</sup> 王政:《妇女学的内容与目标》,《思想战线》2002年第1期。

展比较稳定,妇女研究和社会性别研究逐渐学科化。在大学当中的组织形式主要有三种:一种是直接建立妇女研究系,如美国的圣地亚哥大学的模式,它把学者们集中在一起,建立妇女研究学系。第二种是建立妇女研究中心或社会性别研究中心,这些中心具有跨学科的特点,中心的研究人员隶属于不同的系科,在中心从事2—3年或更长时间的研究工作,虽然研究队伍不太固定,但吸引了更多的学者进入研究领域。如马里兰大学自1976年开设了妇女研究课程,学者们来自各个系。目前她们建立了多学科的教学项目,有10个教授和70多位来自其他系的教师提供相关课程,成为一种跨学科的系与中心。第三种是系与中心兼有,在大学中有固定的职位,也有流动的项目。到1995年,在各个学科中以写妇女和社会性别专题论文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达10278人<sup>①</sup>。到1995年,欧洲有150所大学开设600门妇女学课程,有9个国家授予妇女学学士学位,10个国家有硕士学位,其中9个兼有博士学位<sup>②</sup>。在亚洲,韩国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妇女研究课程建设的历史,并授予硕士和博士学位。2000年韩国召开了亚洲地区妇女研究教学发展的会议,以推动亚洲学者就相关议题展开讨论。

社会性别研究已经成为国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一个重要的分析范畴,研究从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y)向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ity,也译为“交叉学科”)发展。多学科意味着各学科的混合,各学科之间没有相互作用和变化,方法上也没有很好的整合;跨学科的社会性别研究意味着在各个学科的边界和交汇处进行性别研究,它意味着学者们在研究一个性别问题时,将其他学科的新知识应用于该研究。欧洲社会性别研究具有很强的挑战性。特别以法国女权主义的声音最强。法国女权主义者的有关精神分析理论、后结构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具有广泛的学术影响。从欧洲的学术传统看,女权主义者不相信制度化的研究力量,而是以个体的形式进行独立的学术研究。学术研究的成果多体现在各种国际学术会议上。有关社会性别研究的国际大会有规律地在世界范围内举行。如墨西哥城(1975)、哥本哈根(1980)、内罗毕(1990)召开的“联合国妇女十年”大会。国际跨学科妇女研究和社会性别研究大会每三年召开一次。1993年,第五届国际跨学科妇女大会在圣何塞(San Jose)的哥斯达黎加大学召开。1997年,第六届国际跨学科女性学和性别研究大会在挪威举行,2005年将在韩国举行。

<sup>①</sup> 王政:《浅议社会性别学在中国的发展》,载杜芳琴、王向贤主编:《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在中国(1987—2003)》,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sup>②</sup> 闵冬潮:《欧共体各国妇女研究学科化的几个问题》,载李小江等主编:《批判与重建》,三联书店2000年版。

在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的同时,各种研究组织也在发展,这些组织主要是以非政府组织(NGO)的形式,特别是以推动性别平等的社会行动为主。例如,挪威的一个称为 KULU 的妇女组织是在哥本哈根第二届世界妇女大会之后成立的,其目的是推动发展中国家妇女地位的提高,此外还有 SEDO、DOWN 等组织。

联合国的各种文件多次提倡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决策的主流,推动社会政策中的性别意识发展。特别是在联合国的各种统计中,社会性别统计成为重要的统计指标。什么是“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呢?一种观点认为,“社会性别意识就是性别平等”,因此,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意味着是决策中要考虑性别平等的问题。第二种观点认为,性别意识就是在承认男女不平等的前提下,积极地消除男女不平等。第三种观点认为,加强性别意识就是注意性别问题,减少“性别盲点”,减少视而不见的对女性的政策歧视。第四种观点认为,一是要具有性别敏感和性别自觉,善于从性别角度观察社会和现实,审视两性的特点和角色定位;二是从性别角度观察,目标是促进男女两性的协调发展。第四种观点是一个较为全面的“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的看法。

## (二) 中国社会性别研究的发展状况

中国妇女研究和社会性别研究的发展直接受惠于 1995 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的召开。这次国际会议既推动了相关政府部门对妇女研究的重视,也使国内学者有机会广泛和全面地接触到国际学术界的前沿理论与新的概念。自 1975 年以来联合国已经举办了四次世界妇女大会。1995 年在北京举行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大约有 5 万人参加,其中超过三分之二的人是妇女。来自 181 个国家的代表与来自数千个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一同出席了会议,其目标是“保证妇女平等地获得经济资源,包括土地、信贷、科学技术、职业培训、信息、交流和市场”,与会者在 10 天内听取了关于世界各地妇女状况的发言,并最终形成行动宣言,呼吁各国政府解决以下问题:妇女承受的持久和不断增加的贫穷重负;针对妇女的暴力、武装或其他形式的冲突对妇女的影响;在权力共享和决策方面的男女不平等;对妇女的刻板印象;在自然资源管理方面的性别不平等;长期歧视和侵害女童的权利。

第一,为了迎接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的召开,一些研究组织在研究单位和大学中应运而生,改变了以往妇女研究学者分散于各科研机构的现象。1987 年,郑州大学成立了第一个妇女研究中心。1990 年,全国妇女联合会成立了妇女研究所。1990 年,北京大学成立了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此外,各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的研究机构中也开始有专人从事妇女问题的研究。这些研究机构

为今后妇女研究和社会性别研究的组织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与国际接轨。为了能够办好“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政府部门和国际社会举办了一系列的培训,这些培训使中国学者有机会接触到西方妇女研究的理论,此时,社会性别研究的概念开始进入中国。这表明中国社会性别研究的学术发展一直受到国际社会的影响,一些国际妇女组织大力支持中国社会性别研究,从资金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等有专门的资助中国妇女研究和社会性别研究的项目。在研究工作中,国际交流得以顺利展开。各种国际性学术研讨会不断举行。中国的妇女问题研究专家、学者开始到国外学习、交流,一方面学习国外关于妇女研究的最新成果,另一方面向国外学者介绍中国妇女研究的现状及动态发展。大量关于妇女问题的研究成果和专著被介绍到中国,近10年来,出版了大量有关妇女研究和性别研究的书籍。

本书为了学生们方便查找和阅读,主要将国内的出版物列为进一步参考阅读书目,而省略了外文版书刊。所列参考书目不一定完全,但尽可能地包括了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包括了近年来翻译的国外学者的著作,阅读这些著作将能够开阔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视野。

第三,本土化研究的努力。目前从事妇女研究和社会性别研究的学者分布在各种领域,如社会学、人口学、教育学、史学、文学批评、法律、政治学、性学、心理学等等。对于中国学者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分析中国的社会性别现象,如何将跨学科的研究视角运用于中国社会的分析,如何与西方国家的女权主义理论对话等等。目前,已经有一批学术成果和系统研究出现<sup>①</sup>。自1990年开始,中国进行每十年一次的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以展示和分析中国妇女地位的状况。1998年,国家教育部批准北京大学将女性学作为三级学科纳入国家研究生专业目录,由此北京大学在社会学系建立了第一个女性学方向的硕士点。女性学教育已正式地进入国家的教育体制,成为高等院校以及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中正式的教学和研究领域。

香港、台湾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在社会性别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较多的成果。以台湾为例,1985年,台湾大学成立了妇女研究室。以女性意识的成长为分类标准的话,有学者认为,台湾的妇女研究经历了无知期、寻觅期、萌芽期、妇

<sup>①</sup> 参见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编:《中国妇女研究年鉴(1996—2000)》,中国妇女出版社2004年版;孟宪范主编:《转型社会中的中国妇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杜芳琴、王向贤主编:《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在中国(1987—2003)》,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女研究中心期、挑战/冲突期、两性合作期。两性合作期以性别研究为主,它不仅研究女性经验,也关照性别关系,以及围绕着“性”与“性别”而衍生的种种议题。例如,1995年台大建筑与城乡研究所成立了性别与空间研究室。在台湾,学者多将社会性别研究称为“性/别研究”,既强调了性别的生物性,也强调了其社会性。以往受父权制意识形态压抑的各种现象皆成为今日性别研究的新议题。<sup>①</sup>

社会性别研究在知识界代表了一种新的声音和新的方法论,其教学目的是以启发学生对性别问题的敏感性和反思性为主的。因此,本书在方法论上强调:第一,尽量使用生动的性别问题的案例,注重每个人的生活经验,学习理论和思考相关的性别问题将有助于我们对自身生活的理解。对性别问题的敏感性主要源于对自身生活经验的反思。在谋求两性平等的前提下,性别研究不仅强调女性经验,还把男性经验纳入研究视野,因为压迫女性的性别制度同样也会压迫男性,两方面的经验可以成为一个全面的比较系统,也可以成为解放自身的力量,实现对性别压迫机制和权力关系的全面认识。第二,力求把性别不平等现象从日常生活经验上升到理论,加强对社会运作方式的理解。通过对中国性别关系、性别秩序和性别不平等研究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社会结构、文化和社会制度。第三,研究知识建构问题。本书并不能为改变性别不平等的现状提供一个万能和统一的答案,而是强调能够对司空见惯的社会现实问题,以性别的视角提出质疑,用创新的方式对日常生活中理所当然的“性别知识”进行理解和反思。第四,在反思知识建构和理解不平等导致的社会恶果的基础上,积极寻求社会变革的可能性和个人行动的能力。挑战传统的性别意识形态并非轻而易举的事,它需要每个人在向自己发问的同时,采取积极的变革行动。因此,希望每个人都有机会思考和回答下面几个问题:1. 我是怎样成长为今天“这个样子”的女性或男性? 2. 使我们成长为某种类型的女性或男性的社会力量和社会机制是什么? 3. 这些社会力量和社会机制发挥作用的本质是什么? 它是否是有问题的? 4. 如果这些社会机制确实存在问题,是否有可行的改变方法? 我能够为社会变革做些什么?

<sup>①</sup> 张珏、吴燕秋:《台湾各大学妇女研究与两性平等教育》,《应用心理研究》(台湾)第13期,2002年春,第73—107页。

## 小 结

性别具有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社会性别是指人们由语言、交流、符号和教育等文化因素构成的判断性别的社会标准,一整套有关男人该怎样行为和女人该怎样行为的观念和规范。社会性别体制是一套以父权制为特点的、具有自身运作机制的人类社会制度,它与经济、政治、文化及个人的性生活相关联,使女性从属于男性。社会性别研究就是要揭示两性不平等的现状、分析其产生和延续的社会机制并寻求和实践男女平等和人之解放的道路。随着妇女研究的发展,社会性别研究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重要的学术地位。在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中,社会性别研究也得以出现和发展。

### ✧关键概念

性别 社会性别 社会性别体制 父权制 两性平等(男女平等)  
显性的性别不平等 隐性的性别不平等 妇女研究 社会性别研究  
跨学科的社会性别研究 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

### ✧思考题

1. 论述社会性别体制的基本特点。
2. 简论斯科特“社会性别”的概念。
3. 简述社会性别研究的基本内容。

### ✧进一步阅读文献

- 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三联书店 1998 年版。
- 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三联书店 1997 年版。
- 杜芳琴、王向贤主编:《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在中国(1987—2003)》,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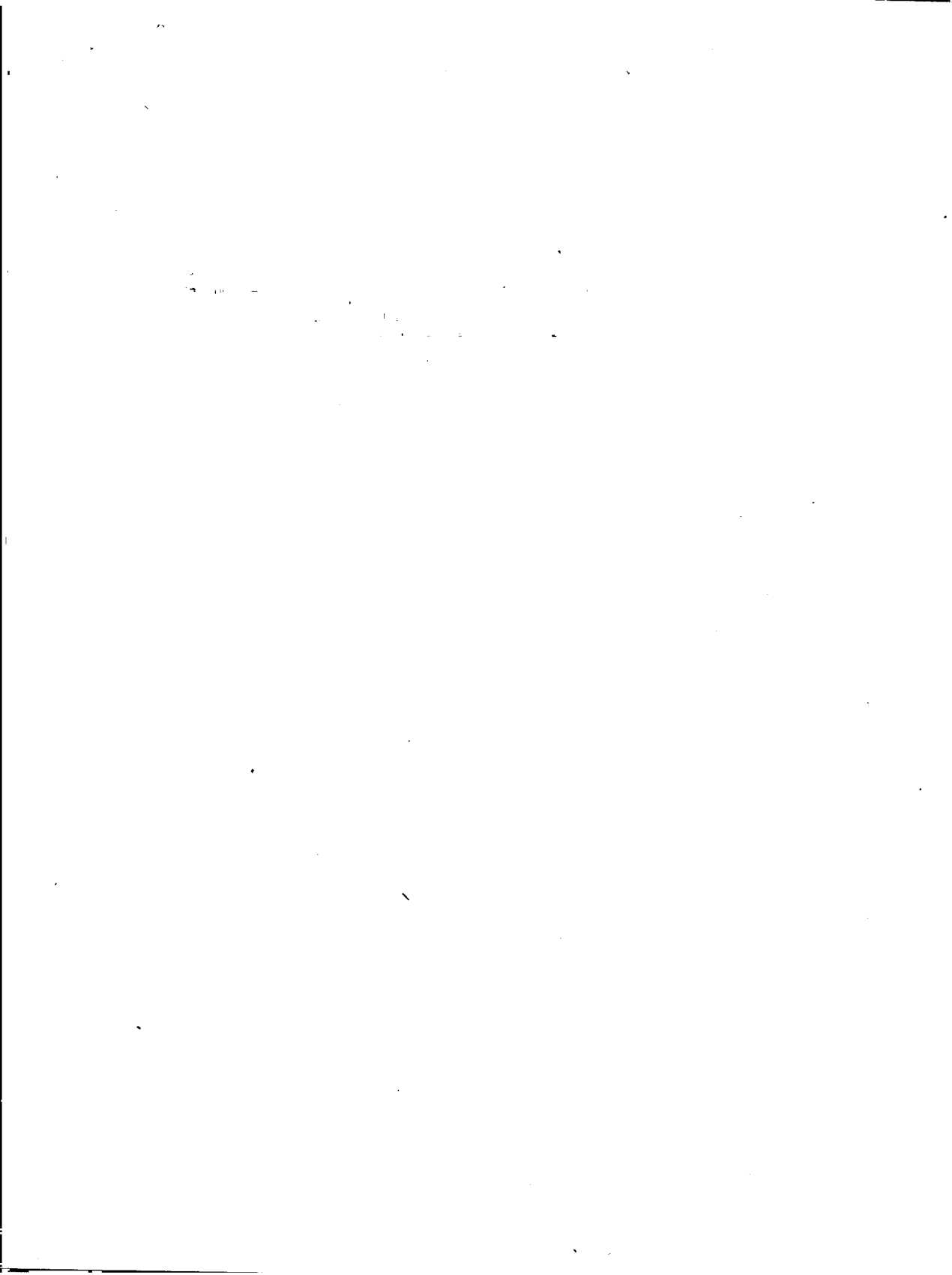


## 第一编

# 反思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文化建构

本编从文化的角度出发强调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建构是作用于两性不平等的重要社会机制。以父权制意识形态为中心的文化和实践通过建构两性气质在社会心理层面划分了两性差异,并通过社会化过程、大众传媒再生产出刻板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社会性别研究认为,父权制意识形态及相关的文化符号、仪式具有褒扬男性价值、贬低女性价值的倾向,文化通过社会化过程将不平等的性别意识形态合理化、合法化,并形成代际传递。

第二章分析两性气质的心理建构,强调性别认同是人们对于自身作为某一性别存在的确认,社会通过有关性别认同的“心理疾病”建构了两性对性别气质的想像和行为。介绍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拉康的精神分析及波伏娃、米切尔、乔多萝、布迪厄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对性别气质心理建构的理论。第三章通过分析在历史和文化的沉淀与积累过程中形成和变化的性别气质,讨论了宗教、哲学、资本主义的发展、现代教育的出现和中国儒家文化对两性对立的性别气质形成和再生产的作用。第四章从性别社会化过程的概念出发,分析了家庭、学校、同辈群体、各种媒体以及其他组织使人们学习到性别规范和与之相关的行为符号意义。人们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经历不同的性别社会化,并深入讨论了两性道德发展的不同理论。第五章通过对话语和传媒的分析,指出在父权制文化中,女性是一个无声的或者沉默的群体,已有的语言系统很少包括且不能叙说女性的生活经验。分析了大众传媒的叙述参与了社会对理想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建构。



## 第二章

# 性征与两性气质的心理建构

### 引 子

我们首先做个练习：写出你在恋爱时，对未来配偶的希望，希望他或她应当具备的最重要的三种品格，按顺序排列。

根据以往学生在课堂上的回答来看，女生对未来配偶的品格要求是：责任感、幽默感、善良；而男生对未来配偶的品格要求是：温柔、善良、责任感。可以看出，人们对两性品格特征的理想要求有诸多共性，但也有一些质的差别，这种差别是从重要性的排列顺序上表现出来的。女性选择男性朋友时，占第一位的重要品质是与社会有着紧密联系的“责任感”；男性选择女性朋友时，占第一位的重要品质是与个人情感有紧密联系的“温柔”。

一项对年轻人的两性人格特征的调查表明，男性对自身人格特征所使用的前五位词汇是：创造力、幽默感、自立、乐观、精干；女性对自身人格特征所使用的前五位词汇是：自立、善良、贤淑、温柔、文雅。分性别地看，女性对男性的评价和男性对自己的评价几乎完全一致；而男性对女性的评价则与女性对自己的评价有很大出入，被测男性认为女性应该是贤淑、温柔、善良、纯真、文雅的，而

女性对自己的期望则是自立的、善良的、乐观的、洁身自好的、开朗的。<sup>①</sup> 这种将两性分化的性别气质对我们的生活有深刻的影响,就如我们相信男性的创造力会使他们更适合于科学研究,而女性则可能不适合科学研究。我们可以问自己,我们是否也这样认为呢?下面这个故事能够令我们反思:

2005年1月22日,新华社报道了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的一封致歉信,他承认自己关于男女在科研能力方面存在生物学差异的说法欠妥。

2005年1月14日,劳伦斯·萨默斯在美国全国经济研究局会议上提出,男性、女性在科研能力上的不同可能是因为两性生物学上的差异引起的。这次为期两天的美国全国经济研究局会议,邀请了美国国内50位经济学家参加,就女性在科学和工程学上为数甚少的原因进行讨论。据《波士顿环球报》报道,在会上,这位哈佛大学的校长说,“我可能要提及男女先天不同的因素。……尽管人们更愿意相信男女表现上的不同取决于社会因素,但是,我觉得这点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萨默斯以自己女儿的例子证明他的观点。他说:“自己努力把年幼的女儿当成中性进行培养,送给她两辆玩具卡车。然而女儿却把它们当成娃娃一样摆弄,称其为‘卡车爸爸’和‘卡车宝宝’。”

劳伦斯·萨默斯的言论当场就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反对。当时在观众席上的生物学家南希·霍普金斯听到萨默斯的演讲后,气愤得中途就离开了会场。“真是可悲。(哈佛)所有聪明的年轻女性是被一个这样歧视她们的男性所领导!”霍普金斯后来说,“这就是他的演讲!这里满屋子坐的都是国内在此问题上最有建树的学者,而他却在不停地重复我们早在第一天就批驳过的观点。”华盛顿大学工程学院院长丹尼斯·登顿甚至与萨默斯当面发生争执,“我们需要吸收所有人的智慧和才能,”在接受电话采访时,他说,“而一半的人口(女性)可能无法接受的观点,即使是在会场之外,也不能不受人关注,尤其是当它出自美国著名大学校长之口。”

也有为萨默斯鸣不平的。弗里曼和其他几名与会者认为,人们如此评价萨默斯是不公平的,萨默斯只是对科学领域从事尖端工作的女性人数没有男性多的可能原因进行了大概的陈述,并无轻视之意。

但无论如何,劳伦斯·萨默斯的这番表述都是不够妥当的。一时间,人

<sup>①</sup> 秦启文、余华:《性别角色刻板印象的调查》,《心理科学》2001年第24卷第5期。该调查在2000年4月至2000年11月间进行。调查的对象是清华大学、武汉大学、湖北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重庆大学、重庆邮电学院、西南师范大学等校958名大学生(文科416名,理科442名,涵盖1—4年级),以及深圳、重庆、四川等省市的从业人员298名(管理干部74名,普通职员184名),要求被调查者按照从重要到次要的秩序分别选择描述两性人格特征的形容词。接受调查的1156人中,男性592人,女性564人。

们对哈佛校园议论纷纷,萨默斯也接到了一连串愤怒的电话和电子邮件。争议出现后,萨默斯一再为自己澄清“罪过”,并做出了恳切的道歉。哈佛网站于19日晚些时候公布了萨默斯的一封致歉信,信中说:“我深深地为我的言论造成的影响感到懊悔,为我没有仔细考虑(后果)而道歉。”此前,萨默斯连续发表了三份致歉声明,坚持说自己的言论被曲解。他表示,并非认可和赞成这一观点,只是想声明有研究显示这样的差异可能存在。但他还是说:“我错误地用那样的方式说话,无意地发出了错误信号,致使有才能的女性受挫。”

但是这一事件还使人们更多地注意到,美国大学生中女性占多数,然而能够在大学从事高级科研工作的女性却很少。今年,仅有少数女性科学家进入哈佛任职,由此哈佛也再次掀起了关于性别歧视问题的争论热潮。本周早些时候,哈佛教职工委员会告诉萨默斯,他的言论可能已经影响了学校一直以来为吸引更多的高级女学者进入哈佛工作所作的努力。事实上,早在这次会议之前,萨默斯就被指责轻视女性。自他担任哈佛校长三年以来,女性从事学校高级工作的数量每年都在减少。

对哈佛校长萨默斯的言论,虽然众说纷纭,但终以他的道歉收场。对此,一方面可以看出,在今天的西方国家,性别话题是一个极为敏感的政治议题。另一方面,以性别为由认为女性不适合数学等科学研究的想法已经从习以为常到学者都可随意地发表议论。在我的课堂上,曾经有位学数学的女生和我谈起她的困惑,她热爱数学,但她周围的朋友,特别是她的男朋友总是鼓励她转行,告诉她女生不适合做数学,因为女人毕竟要生儿育女,与其现在努力学数学,还不如尽快改行,学个管理什么的。她的困惑是,如果作为一个女生喜欢数学的话,是否真的没有前途?本章讨论的问题并不是要从生物学的角度去证明女性是适合学数学还是语言,而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那些认为女性不适合从事科学研究的议题是如何与要求女性温柔、感性的性别气质联系在一起的,分析我们对男人和女人不同期望背后的评判标准是什么,它如何通过社会心理起作用,又可能导致什么样的社会后果。

## 第一节 性 征

### 一、性征的基本类型

性征是指男女两性的性别特征,综合生物学意义和社会学意义的性别特

征,可以将两性的性别特征分为第一性征、第二性征、第三性征和第四性征。

### (一) 第一性征

第一性征是指男女生殖器官可以分辨出的外形和构造的差异,它是构成两性身份的生理特征。这是与生俱来的性别特征,可以把人分成男性或女性。第一性征确立了人们要经历的性别社会化过程,是建立社会性别的基础。

### (二) 第二性征

第二性征是指男性和女性到青春期时出现的一系列生物特征。具体表现为:男性身材开始变得高大,肌肉结实,喉结突出,声音变得低沉粗犷,长出胡须,汗毛加重,出现遗精。女性皮肤变得细嫩,嗓音尖细,乳房隆起,肌肉柔韧,脂肪增加,月经来潮。第二性征的出现取决于第一性征。虽然同一性征的个体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多属于正常发育范围。随着生理变化,人们的社会性别意识开始觉醒,社会诸因素对个人的影响也更为明显。

### (三) 第三性征

第三性征是指男性和女性在性格和心理方面的特征,出现了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分化。第三性征也被称为性别气质、性别程度或性度(degree of sex difference)。性别气质是以两性的第一性征和第二性征为基础,强调一整套稳定的、固化的和两性对立的行为举止及其行为的社会意义。

**男性气质**(masculine/masculinity)是指男性应当具有成就取向,对完成任务的关注或行动取向的一系列性格和心理特点。男性气质固化和稳定的内容至少包括三个成分:地位、坚强和非女性化。地位代表功成名就和受人尊重,是社会成就取向。坚强是力量和自信的表现。非女性化则是指避免女性类型的活动,以女性特质反衬男性特质,如男性不能依赖、软弱、温柔等。在性活动上,男性是主动的、活跃的。男子气总是与雄心勃勃、大胆、争强好斗、具有竞争力和性活动的积极主动联系在一起。

**女性气质**(feminine/femininity)是指女性应当具有同情心,令人感到亲切,对他人关心等亲和和取向的一系列性格和心理特点。虽然女性气质的内涵不断变化,但固有的内容包括三个成分:与家庭或关系相关的一切,温柔,爱整洁,依赖男性,以及与一切与男性气质相对立的特征。因此,女人味儿总是与羞涩、腼腆、胆小、多愁善感、温柔,以及在性活动中被动联系在一起。

这种稳定的、固化的和两性对立的性别气质被称作**性别气质的刻板印象**(gender stereotypes)。人们倾向于将亲和性特质与女性联系在一起,将行动性特质与男性联系在一起,并倾向于期望女性和男性与此相一致的社会角色和行为。例如,尽管女性高比例地参与就业,但人们一直期望女性主要负责照顾老

人和孩子,而男人是供养者。

#### (四) 第四性征

第四性征也被称为“去性征化”或“双性化”,是指男性和女性气质没有明显的分化,男性和女性取长补短,兼具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心理特征。女性不乏热情、泼辣、豪爽、刚烈、精明、强干;男性同样温柔、感情丰富、体贴细腻。具有双性化特点的男女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性别角色的限制,能够更加灵活、有效地应对各种情境,独立性强,自信心高。

1974年,Spence & Helmreich 编制了贝姆(Bem)性别基模测量表,以此了解人们的性征。

贝姆性别基模测量表

1. 自立的	21. 可信赖的	41. 热情的
2. 顺从的	22. 分析能力强的	42. 严肃的
3. 愿意助人的	23. 易共鸣的	43. 有立场的
4. 信念坚定	24. 嫉妒的	44. 温柔的
5. 可爱的	25. 有领导能力的	45. 友善的
6. 喜怒无常的	26. 敏感的	46. 进取的
7. 独立的	27. 诚实的	47. 容易受骗的
8. 害羞的	28. 富于冒险的	48. 没有效率的
9. 负责的	29. 善解人意的	49. 举止像领导的
10. 运动型的	30. 隐秘的	50. 孩子气的
11. 有感情的	31. 果断的	51. 有弹性的
12. 夸张的	32. 富有同情心	52. 我行我素的
13. 坚持的	33. 诚恳的	53. 不说脏话的
14. 受人赞赏的	34. 自足的	54. 没有条理的
15. 快乐的	35. 乐于抚慰受伤害的情感	55. 有竞争心的
16. 个性强的	36. 自负的	56. 爱小孩的
17. 忠诚的	37. 支配的	57. 机智的
18. 不可预测的	38. 说话轻柔的	58. 有雄心的
19. 有力的	39. 可爱的	59. 温和的
20. 有女人味儿的	40. 有男人味儿的	60. 保守的

1. 这是一个7点分的量表。1表示“从不”或“差不多”、“从不这样”,7表示“总是”或“差不多总是这样”,从1到7程度不断增加。

2. 将1、4、7、10、13、16、19、22、25、28、31、34、37、40、43、46、49、52、55、58项的分数相加,除以20,得到男性化分数。

3. 将2、5、8、11、14、17、20、23、26、29、32、35、38、41、44、47、50、53、56、59项

的分数相加,除以 20,得到女性化的分数。

4. 男/女性化分数都大于 4.9 时,则属于双性化型。

第四性征也被称为“雌雄同体理论”,它最重要的意义是打破了男女两性对立的性别气质,使男女在决定自己的性别角色定位的时候有更大的选择余地,能够展示他/她们认为与他/她们自身环境相适应的性格特征。用这一量表对美国得克萨斯州大学的 75 名大学生的调查表明,第三性征的性别气质模式正在改变,多呈现双性化人格及其积极的效果。对中国的相关研究也表明了类似的结论,即双性化的人具有更高的心理健康和自尊,自我评价更为积极,并可获得更高成就。<sup>①②</sup>

把性别气质与其社会角色相关联的研究发现,双性化人格是最佳的人格模式,男性气质次之,女性气质再次之。为什么男性气质比女性气质强呢?对此有不同的解释。一种解释认为,男性气质在多数文化中被视为积极的,而女性气质常常是消极的,它鼓励了男性的积极进取,也使女性在事业上处于消极被动的状态。另一种解释认为,这可能是过高评价男性气质、过低评价女性气质的结果。

事实上,性别之间不是一成不变地对立,而是相互交融的。性征有生物学基础,但也是社会建构。人们常常按照社会期望的“模子”被他人和自我塑造,相关的理论被称为性别基模理论(gender schema theory,第三章将进一步分析)。对第四性征的理论讨论尚未摆脱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二元分割的理论假定,社会性别研究的议题是分析两性气质产生的原因,展示变化中的性别气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 二、反思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类型

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之分将性别范畴化(categorization),即将个体划分为男女两个范畴,每一范畴对应相应的规则、权利和义务,由此简化人们的社会知觉。可以被社会范畴化的因素很多,如民族、年龄、性别等。性别气质的范畴化只是社会化之一,这意味着男人和女人实际上在做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社会制度坚持把男人和女人的所作所为“规定”出不同的范畴,产生对两性行为的不同期望和评价,并使这两个范畴相互排斥。一个人要么是男性气质,要么是

① 李方强、郑寒方:《双性化人格理论及其对学校教育的启示》,《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总第198期。

② 李少梅:《大学生双性化性别特质与人格特征的相关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7卷第4期,1998年12月(该调查以319名大学生为调查对象)。



女性气质,呈现出坚强与温顺、进取与依赖等二元对立。社会在确立和划分男性气质边界的同时就划分了女性气质的边界,一个人男性气质强则意味着他的女性气质必然弱,女性气质强的话则男性气质必然弱。跨文化研究表明,性别气质的刻板印象在不同文化中有不同表现,但相似之处远多于差异。其共性是:男性气质总是与工具性行为 and 体能性的能力相关,女性气质总是与表达性行为 and 亲和能力相关,工具性行为 and 与体能相关的能力总是显得更为重要,拥有这一气质的人在社会中享有较高的地位和权力,即性别气质的差异产生了权力之分。

人类发展面临的问题之一是行为的确定性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人类通过建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刻板印象能够较为有效地实现社会管理,并将劳动性别分工合法化,实现一套社会性别关系秩序。性别认同与性别角色(gender roles)紧密相关,性别角色是指社会依照人们的生理性别将某些社会责任和权利交付给男性和女性,形成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如家庭制度中的两性劳动分工,母亲角色与父亲角色具有不同的社会责任和权利。性别认同与“性别角色期望”相关,两性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不同角色的同时也产生了人们对男女的不同期望。性别角色理论认为,人类依从性别角色进行分工是社会有序化的重要方面。而女权主义学者看到,性别角色、性别角色期望与性别认同共同导致了两性间权力的不平等。性别期望是有关“好男人”和“好女人”的看法,虽然社会性别期望千差万别,但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几乎所有的社会都有对“伟大母爱”的期望,通过对“母爱”的塑造,不仅将照顾婴儿的责任赋予了妇女,而且还使女性自觉地认同其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角色。

女性的社会角色是与她们的性别气质相吻合的操持家务,照料老人、孩子;男性的社会角色是与他们的性别气质相吻合的从事生产,勇于竞争,是家庭生存的供养者。两性气质与社会任务相关联,使统治秩序合法化。等级化的性别关系秩序和制度需要建立分化的性别角色,固化的性别气质模式是使性别角色分工正当化与合法化的工具。从劳动分工的角度看,为了实现要求女性对照料孩子负主要责任的社会建构,人们赋予女性亲切的、温柔的、能够体谅他人的“人格气质”;通过强调男性气质中的富有冒险精神、勇敢、独立性和攻击性,把猎人的角色赋予男性。事实上,男性对待妻子和子女有其温柔亲切的一面,女性对待生活也有其勇敢和独立的一面,但分化的性别气质先于人们的经验而存在。

反思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建构并不是要说明气质的优劣,也不是批评或指责男性阳刚或女性温柔的性格特点,而是要反思这种两性气质的想像如何作

用于性别不平等:为什么男性被赋予进取、智慧、强有力和高效率的形象,使之理所当然地处于社会权力的中心位置?为什么女性的温顺和贞洁的美德就被视为效率低下和应当服从?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刻板印象的气质类型化建构也可以说明种族关系、阶级关系,社会上层的人们总是视较低阶层的人为没有教养的人,是不爱整洁和秩序的人,这种刻板印象正是社会统治的策略。性别气质的建构是一种父权制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它通过社会化过程得以延续和再生产。刻板化的性别气质内含性别歧视和偏见,这种偏见既可以指向女性,也可以指向男性,女性相对于男性处于更不利的社会地位。如,“女性是被动的,不要让她们参与竞争性的社会活动”的说法,事业成功的女性往往被描述成“女强人”或“没有女人味儿的人”。如果女性固守传统的性别规范,以男性的期望为自己的需求,两性不平等的分工格局和地位将永远存在。从这一意义上看,性别气质的刻板印象具有重要的政治功能,其结果是产生与维护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和女性对男性的服从关系。

美国激进女权主义的代表人物米利特在《性的政治》一书中揭示了由男人实践着的“性的政治”。她认为,塑造典型的性别气质是使两性朝着有助于父权制方向发展的社会化过程。她指出:

我们可以将地位称为政治的方面,将角色称为社会学的方面,将气质称为心理学的方面,它们相互依存的关系是再明白不过的。被赋予了较高地位的人趋向于充当主人的角色,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首先被鼓励去建立起符合支配职能的气质。自然这一切也符合阶级和阶层关系。<sup>①</sup>

从心理的角度看,社会通过性别认同完成了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心理建构。所谓性别认同(gender identity)也称为性别身份或性别同一性。传统的性别认同理论强调性别气质与第一性征的一致性状况,是个人对所属性别群体相对稳定的理解和认知,是人们对于自身作为某一性别存在的确认。传统心理学认为,那些无法与自己第一性征认同的人是“有问题”的人,这样的理论强迫人们接受自己的性别和一系列固化的性别气质。性别研究认为,性别认同不是深藏于个人内心的东西,而是表现在人们的社会交往中,因此在社会交往中,人们往往是以表演的形式展示与其性别气质相一致的行为,这种表演具有重要的符号互动的性质,即人们要表演出性别以证明自己是某一性别的人,因此性别气质以一系列的社会心理建构为基础。

① [美]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钟良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0页。

## 第二节 性别气质的心理建构

现实生活中存在多种有关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常识和心理学知识。传统心理学传播的知识是,一个人的性别气质应当与其生理性别相一致。当一个人的性别气质与其生理性别类型相符时,他/她就能够获得较好的心理适应,否则便会出问题。因此,具有男性气质的男人和具有女性气质的女人被视为心理健康的人;具有男性气质的女人和具有女性气质的男人则被视为有心理问题的人,是需要治疗的人。这种心理学或性格常识在日常生活中对性别气质建构具有重要作用。

### 一、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是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对学术界有重要影响。弗洛伊德在20世纪初开创的精神分析学对两性气质的阐述作了积极的努力。值得注意的是,弗氏的理论来源于医学实践,其理论需要在治疗中得到检验。弗洛伊德的最伟大之处在于,他抛弃了正统的学术观点,向欧洲文化中有关性别的一切理所当然的东西提出了质疑。其理论对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建构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弗氏反对性别气质是天然形成的,在他看来,人们的性别认同主要取决于人们对阉割的恐惧。弗洛伊德提出有关“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即男孩的“恋母情结”和女孩的“恋父情结”,这种情感纠葛是性和性别发展中的重要阶段。对于男孩来说,与父亲的对抗和对阉割的恐惧加深了他们“恋母情结”的危机感,这种对母亲的依恋使男孩渴望自己与父亲的身份相一致。一方面,他对父亲的攻击性在发展;另一方面,他内化了父亲所代表的权威和相关规范,责备自己的乱伦倾向,形成超我。在道德规范的指引下,男孩的成长表现为:原有的“恋母情结”越明显,受到的压制越强烈,形成的超我就越有力,两者成正比。由此成为男性气质研究的最初成果。此时,弗洛伊德以完全对应的方式理解女孩的成长经历,提出“恋父情结”。他认为,女孩最初对母亲有爱恋,认为自己同父亲是一致的。但是到五岁左右她发现了两性生殖器的差别,她因为没有男性生殖器而做出消极反应,产生了“阉割情结”,认为自己的身体是不健全的,并为此感到痛苦。于是,女孩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男性化要求,转而认同母亲的身份,并设法引诱父亲,形成“恋父情结”。在“阉割情结”与“恋父情结”的共同作用下,女孩的受挫感越来越强烈:一方面她爱着自己的父亲,另

一方面又徒劳地想和他一样。在超我的发展过程中,乱伦倾向受到压抑,但由于社会对“恋父情结”的规定不如对“恋母情结”的规定那么严格,因此女性的超我力量不强,她们出于“阴茎嫉妒”(penis envy)而接受了自身的次等地位。

第二,人格结构理论。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结构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部分组成。本我是一种自然我,受到性欲和攻击性等原始欲望的支配;自我是指现实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可见的我;超我是受道德约束的我,是由社会化力量形成的自我。超我对本我进行监督,类似于人的良知,它是人在把父母的要求、社会规范和“自我理想”等外在的东西内化于自身后形成的两者相互斗争和妥协,最终通过不违背社会规范的言行表现在自我上。弗氏认识到超我具有性别特征,孩子与父亲的关系显得特别明显,超我是文化控制个人欲望,特别是攻击性倾向的手段。

第三,本能压抑与本能升华理论。弗洛伊德认为,人具有性本能和攻击本能——潜意识,本能绝对不可能被消灭,本能只能被“压抑”,被打入潜意识,将本能封闭在潜意识中的是“超我”,超我内化了群体要求和压力,因此,自我永远被悬置在两种力量之间:一种力量是本能,它被压抑,并充满活力;另一种力量是超我,它强迫自我把冲动保持在潜意识中。这两种相反的力量相互作用于个体,使个体常常处于两难境地。社会不可能满足本我的无约束要求,个体只有通过压抑本能的需求,或用道德规范的力量将本能转化为有意义的社会活动,进行升华。

弗洛伊德理论奠定了他在精神分析学上的学术地位,在性别研究方面,他强调文化对男性气质的作用,对于男性气质,他认为它从不存在于一种单纯的状态之中,而是多层情感共存并相互矛盾。每一人格都是充满差异的复杂建构,他确信性别的经验复杂性和男人性格中永远存在的女性气质。结果,当更为保守的精神分析家们放弃了雌雄同体理论时,弗洛伊德对潜在的性别气质的重要洞察被彻底抛弃了。<sup>①</sup>

## 二、拉康的精神分析学

法国心理学大师拉康(Jacques Lacan)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进行了重新阐释,建立了拉康派精神分析学。拉康认为,“父亲的法则”构成了文化和交往的可能性。因此性别气质不是一个经验事实,也不是一种永远的类型,而是处于符号关系和社会关系之中。“俄狄浦斯”的压抑产生了一个符号秩序系统,阴

<sup>①</sup> 参见[美]康奈尔:《男性气质》(柳莉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5页。

茎只是一种象征,并非任何真实的阴茎,其象征的意义在于它的拥有者处于中心地位。当把性别视为符号关系系统时,它呈现的就不是人的固定的现实,而是承认男人的地位,否定这一地位是可能的,但其后果是严重的。拉康的理论对女权主义心理学理论有重要影响,特别是对英国的朱丽叶·米切尔、法国的卢斯·伊莉嘉瑞、美国的南希·乔多萝等。

拉康认为,人类的性行为(sexuality)包括人的性别身份、性别差异和性关系。他同样强调“恋母情结”,拉康从三界——想像界、符号界和真实界的角度说明他的思想。在对弗洛伊德理论的解释上主要是从“恋母情结”及人的性行为方面加以批评和发展。依拉康之见,成人或儿童的性冲动的转换过程并非自然的,而是“他人”干预、否定和要求的结果,是一个由父权制文化编码的程序化过程。“对阉割的恐惧贯穿于这一发展中的所有阶段。它主导着阉割实际发生之前的所有关系——如在断奶和用厕所训练过程中”。拉康认为,男女的生理差异并不决定儿童的性心理发展,无论对男孩还是女孩,母亲都是其欲望的对象,而父亲都是其竞争对手,都会有“恋母情结”,人们恐惧的是对符号化阴茎的阉割,即对父亲地位的恐惧。

他认为,男人和女人都接受了符号界,但两者在符号界中的境遇却不同。男人的本质在符号界中被赋予普遍的文化意义,是与“父亲之名”和“父亲的法则”相联系的;此外,阴茎在被符号化的同时,符号也被阴茎化了:“阴茎”是符号界的第一能指,也是符号界中惟一与性有关的能指,这就使符号界成了以阴茎为中心的世界。这种状况也决定了女性在符号界的状况,因为以阴茎为中心的符号界不可能赋予“女人”以任何文化意义——女人在符号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女人惟有认同于符号界的秩序才能最终解决其“恋母情结”危机,也惟有接受符号化的男性统治才能为符号界所认可。

拉康特别关注语言的作用,强调语言的象征性。他明确指出,“真理是随着语言的出现而形成的”,真理不仅是被说出的,而且是被语言建构的。他认为,性别认同与个人的其他认同同时发生,是不稳定的过程。这一过程中,婴儿通过被谈论、倾听、学着说话等方式在其使用语言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解语言了。因此,早在性别差异有直接意义之前,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就通过语言,通过下意识使人们了解了性别文化象征的意义,并被强加于婴儿内心。拉康认为,从开始发展社会意识的最初一刻起,女孩就进入到了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中。女性要在文化生活中占有一个正面的地位,必须从一开始就进行一场反对不平等

的斗争。<sup>①</sup>

### 三、女权主义对传统主流心理学的反思和批判

由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产生的巨大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产生的各种有关性别认同的研究总是与弗洛伊德的理论相联系,各种理论在继承与批判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得到发展。

女权主义心理学批判了主流心理学的种种问题。第一,女权主义心理学批评了传统心理学根植于父权制文化,体现了男性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学术取向,指出以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为基础的、所谓价值中立的客观科学,实际上是一种情境剥离(context-stripped),忽视了作为内在偏见的社会情境及个体间的结构和权力关系的影响,由此强化了女性屈从地位。第二,强调传统心理学约束和限制了对女性经验的理解,使女性经验被无形化、边缘化和病态化。第三,女权主义心理学强调多元文化,相信两性气质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并希望能够理解不同社会地位中女性受压迫的问题。

#### (一) 波伏娃——“女性是被造成的”

法国哲学家波伏娃在其名著《第二性》中把存在主义精神分析用于性别。她指出:“弗洛伊德的理论依据的是男性模式,他假定了女人自认为是一个身体不健全的人。这种身体不健全的想法意味着比较和评价,有些精神分析学家认为,少女对没有阴茎可能会感到遗憾,不过她并不会认为阴茎是从她身上割下来的;事实上,连这种遗憾也并不是普遍存在的。……小女孩的渴望即使存在,也是过高评价男性气质的结果。”<sup>②</sup>也就是说,有关女性认为自己在身体构造上是不完备的说法只是男性的想像,是依据男性模式建立的。没有证据表明女性对没有男性性器官普遍感到“受到伤害”,即使女性真的认为自己比男性缺少一样器官,也没有证据表明她们会为此普遍感到自己处境低下。因此,弗洛伊德认为女性注定在超我上不如男性、人格是不健全的说法是完全没有事实依据的。

波伏娃分析了一系列有关不同类型的女性气质,同时将女性的欲望赋予积极向上的意义。她超越了传统心理学静态的视角,强调性别是在与环境和社会结构不断地互动中形成的,在这一意义上,性别气质并非是固定的性格类型,而

<sup>①</sup> 有关拉康的理论参见夏光:《后结构主义思潮与后现代社会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146页。

<sup>②</sup>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5页。

是不同的生活方式。

### (二) 米切尔——“象征意义”的学习

米切尔(Mitchell, J.)批判性地发展了弗洛伊德的理论。她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的确具有“心胸狭窄、妒忌心强、缺乏理性、多愁善感、喜怒无常、依赖性强、自私自利、吝啬小气、消极被动、目光短浅、因循守旧”的气质,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社会的约束。她认同弗洛伊德强调形成女性气质的关键是“俄狄浦斯”阶段(Oedipal stage),但强调在这个阶段作用于两性的因素是不同的。因为对父亲阴茎的恐惧,男孩必须停止对母亲的依恋,转而学习父亲的行为和规范,如果要继续竞争下去,就会遭受被父亲阉割的危险。女孩则不会面对这样的危险,可以像母亲一样继续爱慕父亲,这样她将来就能变成“第二个母亲”,充满母性。这是一整套象征意义的学习,这种象征意义要求女孩待在家庭或者男人的保护之下,这样就建构了女性特定的性别气质。<sup>①</sup>

### (三) 乔多萝的母亲与性别气质

乔多萝(Chodorow)的《女权主义和精神分析学理论》一书批判地继承了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理论,提出去男性化(demasculinize)的概念,强调婴幼儿期的经验和母亲的作用对形成性别气质的意义。

第一,在“前俄狄浦斯”阶段,两性经历不同。两性都经历了自我与母亲的分离,男孩似乎比女孩适应得快。这主要是由母亲的行为造成的,母亲往往是一方面将儿子推开,同时又对他们充满爱的举动。女儿则有所不同,母亲把女儿当作她们自己的延伸。这大约发生在孩子3岁以前,到孩子3岁左右的时候出现了两种社会性别的明确观念。男孩确定男性身份和性别气质时会出现问题。这些问题是:一是要否定对母亲的依恋和依赖;二是要抑制在前俄狄浦斯阶段学到的女性气质;三是必须认同只是间歇性在场的男性角色模式。女孩不会面临上述问题,她们能够直接认同“前俄狄浦斯”阶段的爱恋对象,母亲一直是在场的,可亲可近。与弗洛伊德不同,乔多萝认为,女孩之所以依恋父亲并不是出于“阴茎嫉妒”,而是希望以此摆脱对母亲的依恋和被母亲支配。

第二,孩子“前俄狄浦斯”阶段和“俄狄浦斯”阶段的发展是无意识的,但随着成长,前期经验会成为他/她们有意识的学习性别角色和性别气质的基础。

<sup>①</sup> 参见[澳]马尔科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杨善华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89—290页;米切尔:《妇女:最漫长的革命》,载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45页。

女孩很早就开始帮助母亲操持家务,女孩的社会化强调的是养育和助人的责任;而男孩的社会化强调的是成就和自立。成人性别气质的形成反映了无意识过程和有意意识过程的综合,由此形成男性倾向于个体主义、客观性和关系疏离;而女性则倾向于集体主义、主观性和亲密关系。乔多萝指出:

女性的生活相对于男性生活而言的特点就在于,她们的生活嵌入在社会互动和个人关系中。……她们的角色往往是依据特殊主义原则的,所涉及的也多是弥散性的关系和责任,而不是专门性的关系和责任。在绝大多数社会中,人们都是从关系的角度来界定女性。与女性不同,男人之间的联系更可能超越亲属关系的基本单位。他们的角色被限定在一代人之间,根据普遍主义的原则,所涉及的关系多与他们的专门性限定的关系和责任相关。<sup>①</sup>

乔多萝的理论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把性别气质形成的心理过程看作人类无意和有意建构的结果,并通过社会关系被制度化地再生产出来。

#### 四、“男人解放运动”和对男性统治的反思

在西方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男人解放运动”,它基本上是模仿女性解放运动,并带有同性恋解放运动的色彩。出现了一些自我管理的“男性意识提高小组”,这些小组经常在会议或运动中讨论一些特殊的议题。这一运动具有反权威性并富有创造性,他们批判男性气质。此后,学术界出版了一系列有关反思男性气质的论文和著作,渴望出现两性联盟的政治以促进历史变迁。从发展的角度看,对男性气质的反思是走向社会公平政治的重要步骤。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也有译为“布尔迪厄”)在《男性统治》一书中对性别气质的建构进行了批判,他不仅看到建构出来的性别气质对女性的压迫,也意识到它对男性的压迫。性别气质与其社会压迫的机制在于对两性气质对立的强化。女性在服从于贬低和否定她们的社会化过程中,学会了克制、顺从和沉默的消极道德,男性也是性别气质的隐性受害者。与那些旨在服从的社会配置一样,男性气质并非存在于一种天性之中,而是社会化长期作用的结果。男性特权是一个陷阱,它对应的永远是压力和紧张,它要求男性在一切场合有展示其男子气概的义务,这种情况有时会发展到荒谬的地步。布迪

<sup>①</sup> N. Chodorow, *Feminism and Psychoanalytic The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57.



厄指出：

男子气概既被理解为生殖的、性欲的和社会的权力；也被理解为斗争或施暴的才能；但男子气概首先是一种责任。男人与女人相反，女人的荣誉基本上是消极的，只能得到维护或推动，女人的道德依次是贞洁和忠实。而“真正具有男子气概”的男人会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扩大自己的荣誉，在公共领域内赢得光荣和尊敬。对男性价值的颂扬，其黑暗的对立面是女性特征引起的恐惧和焦虑。

……男子气概是一个相当具有关系意义的概念，这个概念是面向和针对其他男人并反对女性特征，在对女性且首先是在对自身的一种恐惧中形成的。<sup>①</sup>

布迪厄提出了解放之路，他认为：“只有一种真正考虑到所有统治作用的政治行为，才会在长时期内借助不同的机制或相关的制度所固有的冲突，促进男性统治的逐渐消亡。因为所有统治作用都是通过被归并的结构和大制度的结合实现的，不仅男性秩序，甚至一切社会秩序都是在这些大制度中完成和再生的。从国家开始，国家以它的男人的‘右手’和女人的‘左手’之间的对立为中心构成，学校负责一切基本观念和区分的有效再生产，它本身也是围绕相应的对立组成的。”<sup>②</sup> 在布迪厄看来，对性别气质建构的批判应当被引入到对制度与结构秩序的反思上，要改变性别气质相互对立的思维。

## 小 结

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四种性别特征，第一、第二性征由生物因素决定，是与生俱来的，第三、第四性征是社会化的结果，是后天塑造的，具有很大的可变性。第三性征的单维两极统一模式将男女的气质摆到了对立位置，对男性气质或者女性气质的强调束缚了两性发展空间。性别认同是人们对于自身作为某一性别存在的确认，社会通过有关性别认同的“心理疾病”建构了两性对性别气质的想像和行为。依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两性的生理和心理差异产生了性别气质。此后，对弗洛伊德理论的继承与批判对性别气质的心理建构有了更多的理论认识。波伏娃、米切尔、乔多萝和布迪厄等学者对性别气质的社会心理

①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男性统治》（刘晖译），海天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7—72 页。

② 同上书，第 160 页。

建构有重要的理论贡献。

### ❖ 关键概念

性征 女性气质 男性气质 性别认同 性别期望 性别角色  
性别气质的刻板印象

### ❖ 思考题

1. 简述性征的基本类型。
2. 简述乔多萝有关两性气质形成的理论。
3. 下列哪些特征反映了你对典型的成年女性和男性的看法？在你认为与女性相关的特征后写“女”，在与男性相关的特征后写“男”。如果你认为这些特征对男女都有代表性，就在后边写明“女和男”。<sup>①</sup>

相关特征	你的看法	相关特征	你的看法
成就取向的		情绪性的	
积极主动的		文雅的	
冒险的		独立的	
关怀和挚爱的		好心的	
雄心勃勃的		人际关系取向的	
自负的		令人愉快的	
妖媚的		理性的	
大胆的		心软的	
支配的		有同情心的	
攻击的		温暖的	

以美国及其他 28 个国家的大学生为样本的报告结果是，典型的女性特征有：关怀的、挚爱的、妖媚的、情绪性的、文雅的、好心的、人际关系取向的、心软的、有同情心的和温暖的；而典型的男性特征有：成就取向的、积极主动的、冒险的、雄心勃勃的、自负的、大胆的、独立的和理性的、积极的。

请回答如下问题：

- (1) 如果你选择的典型的女性和男性特征与这些大学生样本描述的结果不

<sup>①</sup> 参见[美]埃托奥·布里奇斯著：《女性心理学》(苏彦捷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2 页。

同,给出可能的原因。

(2) 你认为有可能存在国别或种族之间性别特征的差异吗?为什么?

(3) 你认为是否可能存在阶级或阶层的性别特征的差异?如富裕的女性和贫困的女性会有共同的性别特征吗?为什么?

### ❖ 进一步阅读文献

[美]埃托奥·布里奇斯著:《女性心理学》(苏彦捷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章。

[美]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钟良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男性统治》(刘晖译),海天出版社2002年版。

[美]康奈尔:《男性气质》(柳莉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 性别气质的历史文化建构

### 引 子

我们有关性别气质的知识并非简单地是心理的,而且也是历史的。我们今天离中国女人被要求缠足、被期望“好女不嫁二夫”的历史并不遥远。在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块土地上,曾经积累了几千年的封建文明,它的烙印深深地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2000年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中的一项数字展示了人们在有关女性继承权认知上的混乱。

能够正确回答男女共同享有继承权这一问题的男性比女性高出近五个百分点,但总体上只有四分之一的人了解女性(无论其是否出嫁)是和男性一样共同享有家庭财产继承权的。

从历史的角度看,女儿在1929—1930年出台的民国时期的《民法》中第一次获得了和儿子一样的继承权。当时这一法律的出台并不容易,一方面是先进人士对妇女解放的呼吁,另一方面是保守人士的坚决反对。1926年1月,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们提出了“妇女运动决议案”,号召妇女更积极地投身到国民革命中,同时也承认妇女要获得权利,包括“反对多妻制”、“离婚结婚绝对自由”、“反对司法机关对于男女不平等的判决”、“女子应有财产权和继承权”等等。1926年10月,国民政府司法行政委员会发布了一道

命令,要求在国民党控制的省份(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立即实施女子继承权的原则。使女儿拥有和儿子一样的继承权,立法者的理想是,只有采纳西方的财产逻辑,性别平等才可能实现。但是决议案并没有很容易地实施,因为最高法院利用“女子”一词解释说,这里说的“女子”是未出嫁的女儿,未婚女子有继承权,而那些已婚女性是无法享有和她们兄弟相同的继承权的。在实施的过程中,未婚女子也因各种各样的理由无法享受到继承财产的权利。直到1930年《民法》出台后,才陆续在上海等大城市出现了个别的女儿争取继承财产权的案例。基本上在实践层面,女儿并没有完全获得《民法》规定的平等权利。<sup>①</sup>

事实上,我们离女性没有继承权的日子并不遥远,因此对表3-1情形的理解有必要让我们回到历史中,反思几千年来儒家文化强调的男女有别、长幼有序的性别气质是如何嵌入到历史发展过程中的。

表3-1 出嫁女应如何继承家庭财产(%)<sup>②</sup>

项目	合计		城镇		农村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与兄弟平分	23.6	28.1	40.5	47.3	18.1	22.2
比兄弟少些	8.1	10.6	6.8	8.1	8.6	11.3
比兄弟多些	0.5	0.4	0.5	0.6	0.4	0.4
不要	15.1	12.3	10.5	6.5	16.6	14.1
不该要	31.7	26.8	12.3	8.1	38.1	32.5
无所谓	17.1	17.5	26.3	25.1	14.1	15.1
说不清	3.9	4.3	3.1	4.2	4.1	4.3

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认为:“历史同时是对过去和对现时的认识,是对‘已经发生’的和‘正在进行’的演变认识,因而在每段历史‘时间’内(无论是昨天或今天),都要区别持续存在的因素和转瞬即逝的因素。”<sup>③</sup> 在过去和现时之间没有完全意义上的断裂。当我们面对今天气象万千的社会现象时,总会找到历史的蛛丝马迹。本章我们将讨论由历史累积下来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它们产生的历史和文化条件,特别关注那些持续存在的因素,以了解性别文化是如何在历史延续中得以复制和重现的,即展示性别气质被建构的历史是如何

① 参见白凯:《中国的妇女与财产:1960—1949年》,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112—148页。

②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编:《中国社会中的女人和男人——事实和数据(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版,第108页。

③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顾良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0页。

再生产的。

## 第一节 西方历史文化中的性别气质：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指出：“自从有男人和女人以来，男性统治就固定不变了，男性秩序通过男性统治世代代延续下去。”<sup>①</sup>对这一历史的审视应当分析使这一状况永久存在的因素和制度的历史，这些因素和制度包括教会、国家和学校等，它们被客观地组织起来，共同作用于无意识的结构。因此，本节重点分析西方的宗教、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国家和教育等如何历史性地延续了父权制，分析不断强化男性气质的内在逻辑是什么。

### 一、宗教对性别气质的建构

在东西方文明中，宗教是社会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性别观念和性别秩序是东方的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和西方的基督教等教义中重要的内容。有学者认为，同社会生活中的其他领域一样，在教会、宗派和宗教组织这些等级系统中，女性基本上被排除在权力之外。这是主要的宗教中都具有的特征，但在基督教中表现得更为明显。<sup>②</sup>

基督教通过对生命起源的解释建立起性别关系秩序和两性气质。女人是用男人的肋骨做成的，这成为解释两性关系的经典之说。由此女人要处处小心谨慎，因为女人从属于男人。基督教传播“没有一个男人是为女人创造的，但创造女人却是为了男人”。从基督教的“原罪说”看，它首先将女人定义为“有罪的人”。上帝创造了亚当，趁亚当熟睡的时候取下他的一根肋骨造成夏娃，亚当与夏娃快乐地生活在伊甸园里，直到有一天夏娃经受不住蛇的诱惑，偷吃了禁果，而与亚当共享性的快乐。上帝知道后大怒，为了惩罚他们，上帝让亚当以及他的男性子孙永远承受繁重的劳动，让夏娃以及他的女性子孙永远承受生育的痛苦并受丈夫的管制。在原罪说中，女人是具有极大诱惑力的“魔鬼”。教父们的说教中充满了对女人的咒骂：“女人是地狱之门，人类罪恶之本。”作为亚当的一根肋骨，并犯下原罪的夏娃们，理应受生育之苦。这种原罪说旨在强调女人不是完整的人，要从属于男人。“她只要想到她是一个女人，她就应当感到有愧，她应在不断忏悔中生活，因为她给这个世界带来了灾祸，她应为她的服饰而羞

①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男性统治》，第115页。

② [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第四版）（赵旭东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90页。

愧,因为这是她堕落的象征,她尤其应当为她的美貌而内疚,因为这是魔鬼最有威力的武器。”<sup>①</sup>原罪说为维护父权制提供了重要的“男优女劣”的历史文化基础。日常生活中,原罪的文化传统使女性处于第二性的地位,那些顺从、柔弱的女性气质在历史过程中不断被肯定。

英国哲学家罗素在《婚姻革命》一书中,分析了基督教的道德观。他指出:

基督教的道德由于注重性的纯洁性,所以极大地降低了妇女的地位。由于那些道德家都是男人,所以女人都成了妖妇;如果道德家都是女人,那么男人也就取代了女人的位置。既然女人都是妖妇,所以我们应当减少她们引诱男人的机会。结果,那些有地位的女人越发受到约束,而那些没有地位的女人则被视为是罪恶的,受到极大的鄙视。<sup>②</sup>

## 二、西方哲学思想史中的性别建构

西方哲学思想史充满了有关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论述。西方哲学如同西方宗教一样,引导了西方文化的发展,是塑造民族气质、性别气质的强大力量。西方哲学对两性气质问题进行了持续几千年的大讨论,其中心基调就是建构“男性是第一性,女性是第二性”的文化,男强女弱、男贵女贱的性别气质标签就在这一基调上根深蒂固地发展下来。

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很多哲学家热衷于宣扬关于女性天生低能、缺乏理性的论点。生于公元前384年的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一书中讲得很清楚:由于斯巴达人给了女人以世袭权和继承权,还有过多的自由,对女人唯唯诺诺,才日渐增长出众多不利因素,而这种不利因素正是斯巴达衰亡的原因之一。

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用一种美化女性内在品性的方式强化了女性顺从的特质,并对所谓的女性本质和美德大加赞赏。他主张的女性美德是她们在婚姻内表现出对男性的依附和顺从,那些独立的、追求家庭幸福之外生活的女性就丢掉了可贵的美德。他倡导的男性美德是自主的、坚强的和独立的。生于18世纪末期的叔本华专门有一篇论女人的文章,他认为,女性最适宜的职业是看护和教育儿童,因为她们本身实际上就很幼稚、轻浮、目光短浅,她们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儿童——是儿童与严格意义上的成人的中间体。在女性身上,勉强可称作理智的东西几乎没有。女性的秉性中毫无正义感,她们缺乏判断力和

<sup>①</sup> 莱基:《欧洲道德史》第二卷,第357—358页,转引自〔英〕罗素:《婚姻革命》(新建国译),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43页。

<sup>②</sup> 〔英〕罗素:《婚姻革命》,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42页。

思考力,自然之神令她们孱弱。女性一旦结婚,就要依附于某个男人,受他的支配,为他所统治。从这个角度看,女性的天性就是服从,女性就是要求被主宰。

生于19世纪中期的尼采借查拉斯图拉之口如是说:男人应该被教养作战,妇人应当被教养为战士之消遣;妇人应当服从,她的灵魂是表面的,男子的灵魂是深邃的。他说,你到妇人那边去吗?别忘了带鞭子。<sup>①</sup>

法兰克福学派著名的精神分析著作——弗罗姆的《对自由的恐惧》(1942年)和集体作品《权威人格》(1950年)对男性气质的产生条件做了某种历史分析的阐述。弗罗姆提出了几个世纪以来性别类型的历史连续性。“权威主义者”的类型是一种与维护父权制特别相关的男性气质,它的特征就是憎恨同性恋,藐视女性,对上司的服从以及对下级的苛责。

20世纪初,德国思想家、社会学家西美尔(也译为齐美尔)对女性文化及女性气质提出了具有张力的认识,他指出:“人类文化并不是没有性别的东西,绝对不存在超越男人和女人的纯粹客观性的文化。……由于我们的文化是从男人的精神和劳动中产生,确实也适合于评价男人式的成功。……女人经常反对法律规范和判决,绝对不总是意味着女人对法律的疏远,而只是意味着对男性权利的疏远。”<sup>②</sup>

时至今日,刻板的性别气质形象还常常出现在文学作品、绘画作品以及各种大众传媒中,女性常常被描述成非理性的、依赖的、柔弱的、主观的、缺乏抽象思维能力的;而男性则相反,是精干的、理性的、勇猛的、独立的、客观的、擅长抽象思维的。

### 三、现代男性气质的产生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社会渐渐向着世俗化社会发展,宗教作为影响性别气质的权威力量也慢慢崩溃,所谓的世俗化和理性化的资本主义也延续了父权制的性别差异,并主要通过学校、职业和大众传媒的作用强化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在这一过程中,男性气质越来越倾向于理性和技术。

美国学者康奈尔在《男性气质》一书中论述了现代性别秩序的形成过程中男性气质的产生。他认为,大约在公元1450年—1650年间,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在以北大西洋为核心的地带形成,而现代性别秩序也在这一地区开始成形,有四项发展对现代“男性气质”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文明形

① [德]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尹溟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62—65页。

② [德]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顾仁明译),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142页。



成的过程中也形成了现代男性气质,这种男性气质被界定为与女性气质相对立,并被经济和政治制度化,以贵族男性气质为主。

第一,文化变迁导致了欧洲大城市对性和人格的新理解。当宗教随着文艺复兴和新教改革而陷入混乱时,宗教有关个人生活的权威观念也面临困境。禁欲制度崩溃了,控制理性世界和规范生活的宗教力量开始衰落。这种变迁强化了配偶家庭的文化,强制性的异性行为和异性婚姻成为权威文化。同时,新教强调的个人与上帝的直接联系导致了个人主义和自主的自我。上述文化变迁是形成现代男性气质的文化先决条件,男性气质被想像为体现理性的一种性别结构,是蒙昧世界的启蒙者,由此形成了父权制的合法性与新教的合法性之间的文化关联。

第二,殖民的历史产生的男性职业是产生男性气质的重要因素。在大西洋沿岸国家的葡萄牙和西班牙、荷兰、法国和英国,以及后来的俄国、美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都建立了跨洋帝国,从军和从事贸易活动成为帝国男人的重要职业,统治新帝国的人皆是男人,他们制定的国策依赖于男性身体的力量或暴力,男人成为“征服者”。这些征服者有别于传统社会关系中的性别形象,他们经常在掠夺土地、黄金和财产时使用暴力。由此产生了对征服的伦理道德的需要。征服者的暴行成为男性气质的一部分,而前往殖民地的欧洲女性基本上都是受到男性控制的、家庭内的妻子和佣人。

第三,作为商业资本主义中心的城市的成长创造了日常生活的新环境,与乡村形成鲜明的对比,城市生活以更富有条理,却缺少个性而著称。这种日常生活的变化产生了更加彻底的个人主义。商业信用、工厂制度、企业家文化将男性气质制度化,并将性别化的劳动和权利合法化。同时,出现了针对身体的二分法,两性气质相互排斥,那些女人气的男人被视为异常现象。

第四,一系列的欧洲内战建立起强大的中央政权,父权制秩序被巩固,男性力量被大规模地制度化。好战成为男性气质和民族主义的特征。

在上述四种因素的影响下,到18世纪,现代男性气质的基本模式已经在欧洲大陆形成。<sup>①</sup>

在资本主义产生的过程中,国家对于性别气质的建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布迪厄指出,国家通过一个公共父权制度规定、认可和加强私人父权制度。公共父权制度存在于所有负责管理和调节家庭单位的日常生活机制中,道德秩序以男人对女人、成人对孩子的优先权为基础,将道德等同于力量、勇气和对身体

<sup>①</sup> [美]康奈尔:《男性气质》,第260—268页。

的支配上。现代国家将男性中心观念的基本原则纳入家庭制度中,尤其是纳入确定公民身份的规定中。<sup>①</sup>

从这种分析中可以看出,性别气质是历史存在,只是它对应于特定的历史条件而强调不同的气质内容。由此可以看出,历史可见的和不可见的改变以及令人吃惊的某些不变的本质特征。

#### 四、现代教育塑造的两性气质

西方国家大约从18世纪末开始,随着教育与国家利益的关系的建立,渐渐出现了群众性学校教育。到19世纪末,学校教育更为普及,成为民主和工业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群众性的学校教育是现代的产物,是一种历史现象。

以群众性学校教育为基础的现代教育对性别气质建构的重要作用在于其教育功能的演变。群众性学校教育发展最早的国家是普鲁士和瑞典这样一些政治上专制的国家,在这些国家,学校教育的目的与维护国家权威、宗教正统和建立一支既具有专业技术知识又能服从命令的现代军队有关。因此,早期群众性学校教育是男人的事。大约在19世纪,对女孩的教育被纳入制度建立中,女子受教育的目的很简单,因为这些女孩最终将成为母亲,承担起未来战士和选民的早期培养的责任。这样的教育显示出一种矛盾的状况:一方面,学校教育延续了传统性别角色和性别气质的知识,有关母性的各种倡导充斥教育之中;另一方面,使女性受教育也被视为现代化和进步的标志。

有意思的是,19世纪欧洲国家的统治者似乎意识到群众性学校教育可能相当昂贵,因此寻求到一种达到目标的手段:一方面,将孩子受学校教育的责任交给父母,另一方面,将女性作为最廉价的劳动力,教会学校几乎将小学教育的责任完全交给了无需报酬的修女们。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马萨诸塞州的女性中,每五个人里面就有一个在一生的某个时期当过老师。<sup>②</sup>随着高等教育的出现,教育职位出现了明显的性别分化。但是由女性从事的教育并不意味着其目标的差异,传统性别气质,特别是早期脱胎于教会的初级教育,主要传播的依然是父权制思想。

布迪厄在论述学校对男性统治再生产时指出:“在学校之间、在专业之间、在存在方式和看待事物、看待自身的方式之间、在表现才能和倾向的方式之间、

<sup>①</sup>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男性统治》,第121页。

<sup>②</sup> [美]梅里·威斯纳-汉克斯:《历史中的性别》(何开松译),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第243页。

一切的东西，‘全都具有性别的含义’。被学校制度传输的文化，无论是哲学、文学、医学、法学，直到最近还一直不停地输送陈旧的思想方法和模式，如使男人成为积极成分、使女人成为消极因素的亚里士多德传统。在法学家、医生和伦理学家都随声附和的一种对第二性的正式说法，这种说法旨在限制妻子的自主性，尤其在工作方面的自主性，理由是她们天性幼稚、愚蠢。”<sup>①</sup>

## 第二节 中国历史文化中的性别气质

### 一、儒家文化中的关系秩序与性别气质

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依靠的是一整套儒家文化的思想体系。由孔子、孟子等宣扬的儒家思想，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逐渐系统化，并与皇权统治达成了互为因果、相得益彰的发展。公元前136年，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把其儒家思想系统化，变成了国家学说。他在自然法规与人类关系之间建立了一种紧密的隐形关系。他解释了儒家思想中三个基本的人伦关系，即与阴阳、天地相对应的君臣、父子、夫妻关系。君王、父亲、丈夫是阳和天，臣子、儿子和妻子是阴和被天覆盖的地，这种关系充满等级秩序和敬意。这三个由一个隐喻统一起来的人伦关系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结果，三个道德原则——忠诚、孝顺和忠贞原则（依次属于臣民、儿子和妻子），成为维护君王绝对权力的必备原则。董仲舒进一步发展出“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宋代以后，皇帝手中的权力集中度迅速加强，愈加强调臣民对皇帝的绝对忠诚，因此臣子忠诚、儿子孝顺、妻子忠贞成为统治者要求的重要的气质类型。

对此，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的儒家文化如此具有延续力或再生产能力呢？对此有不同的解释。台湾人类学家乔健先生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儒家文化思想和制度从松散到严厉再到残酷执行的过程，是一个观念和制度不断“内衍”的过程，是模式持续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必然导致制度不断加剧的复杂状态和结果，并演化出技术上的精确和不断重复的技巧。这种“内衍”的力量是什么呢？依照摩尔根对文化和历史的解释，父系继嗣是导致父权制和对女性的束缚的主要原因。乔健先生则进一步认为，“内衍”的力量来自“权力集中的程度和政治一体化”<sup>②</sup>。因此，封建制度越完美就越需要将文化

<sup>①</sup>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男性统治》，第199—120页。

<sup>②</sup> 乔健：《性别不平等的内衍和革命：中国的经验》，载马建剑等主编：《华南婚姻制度与妇女地位》，广西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

变为严厉的制度加以推行。

按照儒家思想,维系这种皇权绝对统治的核心是社会主要角色的行为规则在逻辑上的一致,天地、君臣、父子与夫妻的关系秩序中的任何部分都是完整的封建统治秩序的一部分,它不仅在官僚体系中显示封建权力关系,更渗透在日常生活中。女性服从于丈夫的顺从气质是维护社会权力关系的重要基础,因此儒家文化建立了一套要求女性顺从气质的规范。在日常生活中,女性应当遵守“三从四德”的规则。“三从”出自《礼记·郊特牲》:“出乎大门而先男率女,女从男,夫妇之义由此始也。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从父”表现为由父亲决定女儿的婚嫁事宜,女儿没有选择终身伴侣的自由。“从夫”是通过婚姻使女性从父亲的控制转移到丈夫的控制中。“从子”则反映女性的另外一种悲哀,性别秩序先于严格的长幼辈分的规则。“四德”出自《周礼·天官·九嫔》,指“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妇德”就是守节操,“从一而终”。“妇言”要求女性语言得体,讲话有分寸,绝对不说粗话。“妇容”对女性的容貌提出要求,“女为悦己者容”,要求女性以端庄娴雅的容貌举止取悦丈夫。“妇功”是指劳动,如纺纱、织布、缝纫、刺绣等,女性必须并且也只能在这些方面显示自己的心灵手巧。“三从四德”的礼教规范,对女性的言谈、举止、服饰、容貌和思想观念进行了全面和严格的规范,既把女性作为整体置于男性统治之下,又通过繁琐的规范使男性统治合法化。后来,班昭在《女诫》中对两性气质作了明确的说明:“阴阳殊性,男女异行。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阳、刚、强是男性气质的基本内容;阴、柔、弱是女性气质的基本内容。

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思想的“阴阳”之说,强调“阴阳”间的“天地有纲、相生相克、互变互补”的思想,但儒家文化思想一直占据主流,是统治者和民间精英们倡导的思想和行为规范。因此,历史留下来的多是儒家文化要求的贞洁烈女式的女性典范。

## 二、家国同构中的男性家长气质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家庭被视为社会的最基本单位,家国同构是儒家文化的核心观点。在家庭内部,男性家长权力是最高的统治权力,因此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形成了中国男性的一种两面气质:一方面,在皇权统治下要服从于官僚体系,失去个性;另一方面,在家庭内部,男性家长又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充满权威。男性在公共领域当中的服从进一步加剧了其作为家长对家庭内部权力的恶性膨胀,家长权力与其威严在家庭内部显得更为突出,表现为家庭中的男性长者以独断的权力支配家庭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其成员的生活。这种

家长气质成为中国男性气质建构中的重要内容。

在公共领域,社会鼓励男性求取功名、封妻荫子,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角色;而女性则是相夫教子,做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贤妻良母”。在家庭内部,男性家长权威无处不在,丈夫拥有离婚的自由,而女性则没有自主婚姻的权利。《大戴礼记·本命》中载有“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盗窃去”。这就是所谓的“七出”,即女性只要犯一项错误,丈夫就有权利休妻。这种对两性森严的等级安排和行为规定塑造了男女完全不同的性别气质。巴金的小说《家》中的老太爷的形象和其家庭成员的命运,为我们展示了一个鲜活、生动的家长制大家庭的例子,也展示了年轻一代对传统家长制的反叛。

### 三、历史文化的实践:对女性身体的控制

中国儒家文化对女性气质的塑造最终演变为直接对女性身体的控制,具体表现为“缠足”文化的兴起和对“烈女”的歌颂,从文化的角度看,这些对女性身体的控制具有重要的符号作用。

#### (一) 缠足

缠足是中国历史上独有的现象,与西方社会的女性束胸习俗一起成为男权文化控制、摧残女性身体的明证。但缠足因其审美之怪僻被视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观。

有关缠足的起源有各种说法。有人认为缠足最早起始于商代,《古今事物考》说:“妲己狐精也,犹未变足,以帛裹之,宫中效焉。”据文献分析,在春秋、战国、汉朝、唐朝、五代等各个朝代都有关于裹足的记载。学术界比较认同裹足之风起于隋唐时代的说法,因为隋唐以前没有缠足的确证,而到唐初才有了实据。<sup>①</sup>

缠足这种对身体进行摧残的形式有着兴起、兴盛及死亡的历史。有研究认为,缠足先在宫廷和上层妇女中流行,至北宋中后期,缠足之风渐盛,至南宋时,缠足之风由北方向南方流行,明朝缠足之风已极盛。到了清代,虽然康熙、乾隆两朝多次降旨不准裹脚缠足,但汉族妇女仍然缠足。19世纪末期,康有为、梁启超等一批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率先倡导“天足运动”,并建立了天足会和不缠足同盟。这些努力受到多方面力量的冲击,甚至遭到女性的反对。直到新中国建立,缠足恶习才逐渐彻底禁绝。

<sup>①</sup> 高洪兴、徐锦钧、张强编:《妇女风俗考》,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95—114页。

关于缠足的原因,人们的解释通常有以下几种:一是为了确定男女有别。儒家伦理重尊卑,因此男女之别是一定要加以明确区分的。对女性的服饰、言行、体态的严格规定是为了保证两性间的区别。二是为了迎合男性的审美标准。中国古代士大夫普遍把女性的纤纤玉步、弱柳扶风之态当作美,以此满足男性变态的审美需求。三是为了约束女性。《女儿经》上说,“(裹足)不是好看如弓曲,恐她轻走出房门,千缠万裹来拘束”。四是为了维护贞操。因为在男性看来,让女性举步维艰、整日闭门守房可以帮助她们守节。当缠足被发明并且普及时,年幼女性的命运便是“小脚一双,眼泪一缸”了。缠足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展示了在中国封建社会,男权文化通过对女性身体的控制塑造女性柔弱、顺从与依附的气质,并以此衬托男性强壮、自主与能干的气质。

在西方文明中同样存在对女性身体的压迫。西方社会对女性的胸部异常敏感。中世纪时西方社会盛行束胸,当女孩到了社交年龄就开始被要求穿戴用钢条支撑的紧身围腰,或者是倾家荡产穿戴鲸骨紧身胸衣。在影片《泰坦尼克号》里有这样一个镜头:露西的母亲咬着牙替女儿系紧背后的胸衣带子,而露西露出痛苦的表情,但为了参加社交活动,认识上流社会的青年,她不得不忍痛接受对自己的束缚。20世纪初期,西方社会还流行束胸的习俗。束胸不仅让人感到不舒服,更主要的是不利于女性身体健康。束胸对心肺和心血管造成巨大压迫,影响身体内脏器官的正常发育;束胸妨碍呼吸,影响全身氧气的供应;束胸压迫乳房,容易导致乳房发育不良,影响未来的哺乳。对女性如此有害的事一直流行的主要原因是,束胸使女性性征突出,腰部纤细婀娜。

无论是缠足还是束胸,对女性身体何种部位进行束缚并不是件重要的事,重要的是它是一种象征,它象征着女性的身体要被重新塑造,而重新塑造女性身体的过程就是对女性的规制过程,它让女性了解并屈从于一个外在于她们的社会力量,并将这种压迫转化成她们自觉的行为。

### (二) 烈女

“好女不嫁二夫”,这是封建社会评价一个女人好与坏的重要标准,那些突出的“好女人”可以获得的最高奖励是树立贞节坊。女人一旦失贞,就要以死来表明自己的清白,殉节而死的女性被归入“烈女”之列,成为民众赞美的对象;否则将为人所不齿。西汉的刘向首次把汉代以前100个有名的女性作了专题记载,书中记录了15名有不良行为的女性,其余的女性则因为品德优秀而被传颂。刘向称这些有品德的女性为“列女”,并按6个标准将女性的美德(气质)归类:(1)母仪;(2)贤明;(3)仁智;(4)贞顺;(5)节烈;(6)变通。此时,贞节只是烈女品行条件中的一项。在刘向之后的历代王朝里,官方史学家都留有一章

或更多的篇幅专门记载品行优等的女性,称为《烈女传》。

表 3-2 官方史书《烈女传》记载的妇女情况<sup>①</sup>

条目	东汉	晋	隋	唐	宋	元	明
所载妇女人数	17	34	15	31	52	166	257
严守贞节的妇女(%)	24	15	33	35	62	90	79
发生的人次数	4	5	5	11	32	149	204
因贞节行为得到超自然的帮助	0	1	0	0	10	5	32

从上表可以看出,被誉为“贞节烈女”的人在隋唐时期还不多,到了宋元时代,由于人们对贞节观极尽歌颂,“贞节烈女”的人数也增加了。在宋代,儒家思想得到进一步巩固。程颐(1033—1107年)在谈论寡妇在贫困无助时是否可以改嫁的问题时,说了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此话后来成为名言。由此,贞节不仅成为烈女必备的重要品质,对贞节的要求也更具体、更严格并更具强制性。明朝第一位皇帝明太祖在1388年颁布法令,“凡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志,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限于其丈夫家庭)”。朝廷表彰和经济上鼓励守贞节的妇女,使寡妇守节不再是其个人的选择行为,而是关系亡夫家庭以及整个家族荣誉和经济利益的事情。节烈一事绝不只是女性的事情,她要“顺从”和服务于丈夫家的利益。

鲁迅这样描述节烈问题:

夫死了,决不可能再嫁,也不私奔,丈夫死得愈早,家里愈穷,她便节得愈好。烈可是有两种:一种是无论已嫁未嫁,只要丈夫死了,她也跟着自尽;一种是有强暴来污辱她的时候,设法自戕,或者抗拒被杀,都无不可。这也是死得愈惨愈苦,她便烈得愈好。

对贞节烈女的讴歌塑造了女性的牺牲气质,这种气质意味着女性的生命根本就不是她自己的,而是一个可能成为她丈夫的男人的。女人牺牲自己的利益越大,她就越显得“节烈”,也越可能获得社会的好评。

#### 四、“男性偏好”的生育文化

在我国很多地区沿袭着一种“撒帐”的婚嫁礼俗,就是在男女结婚当天向婚

<sup>①</sup> 乔健:《性别不平等的内衍和革命:中国的经验》,载马建钊等主编:《华南婚姻制度与妇女地位》,第246页。

床上撒各种干果以示祝福,这些干果包括:(1)红枣,俗称枣子,取早生儿子之意;(2)花生,俗称生子,取生儿子之意;(3)榛,俗称榛子,取增加儿子之意;(4)瓜子,俗称多子,取多子之意;(5)桂圆,俗称龙子,取生子富贵之意。凡此种种,都是对结婚生子的美好祝福,生子成为婚姻中的大事。我们把这种对结婚生子(儿子)的重视称为生育文化中的“男性偏好”。

首先,这种“男性偏好”的生育文化强化了女性的生育功能。女性在丈夫家里除了战战兢兢地照顾公婆、操持家务外,生儿育女是她最重要的职责。一个妻子如果没有生育儿子,不仅会处处受气,甚至可能被丈夫休掉。因此,在封建社会常常会出现有钱人家的太太因为不能生育儿子,而亲自为丈夫招妾生育的怪事。这对女性气质的塑造有重要作用,女性为了做一个“好妻子”就要努力生育男孩。其次,出生的婴儿因为性别不同受到迥然不同的待遇,“重男轻女”成为家庭内部分配资源的潜在规则,这使女性气质中呈现出天然“第二性”的状况。

“男性偏好”的生育文化源远流长,父系继嗣制度和过于成熟的农业生产制度是影响这一文化的重要原因。以继嗣制度为例可以看到生育儿子的重要性。一项对中国妇女从1960—1949年的财产继承制度的研究表明,女性的各种角色在分家和承祧关系中有不同的财产继承。对于男性来说,有无亲生儿子在财产继承时至关重要;对于女性来说,重要的是男性在场还是缺席。自宋代以来,女性在分家过程中的权利没有什么变化,她们仅有的权利是一笔嫁妆和抚养费。但是她们在承祧中的权利则有重大变化。大约有三种承祧制度:一是在宋代,女性可以因为男性的缺席而继承财产。二是在明初,由于强制实行侄子继嗣制,女性的财产权利发生了急剧的收缩。女儿不再能因为没有兄弟而继承财产,她必须让位给四世以内的所有叔伯兄弟。同样,寡妇也不再能因为无子而继承丈夫的财产,她只能充当财产监护人,为应继(与亡夫关系最近的侄子)保管财产,她在法律上有义务过继他。三是在清代中叶,新的法律允许寡妇在族侄中自由择继,寡妇的财产监护权扩大了。<sup>①</sup>这样一来,继承强化了人们生育中的性别偏好。

历史发展到今天,国家法律明确规定了男女享有平等的家产继承权,但人们在观念形态上依然是传统的男性继承的思想。这种将女性视为“第二性”的社会历史文化共同作用于今天中国人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

<sup>①</sup> 白凯:《中国的妇女与财产:1960—1949年》,第181页。



## 小 结

性别气质和性别关系是在历史和文化的沉淀与积累中慢慢形成与变化的。无论是宗教、哲学、资本主义的发展、现代教育的出现,还是中国儒家文化的根深蒂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父权制出于维护男性统治的需要不断生产和再生产两性相互对立的性别气质。

### ❖ 关键概念

现代男性气质 儒家文化的关系秩序 男性家长气质  
“男性偏好”的生育文化

### ❖ 思考题

1. 论述从历史角度理解性别气质形成的意义。
2. 试分析资本主义的产生如何塑造了现代男性气质。
3. 论述缠足对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塑造的意义。

### ❖ 进一步阅读文献

- 罗苏文:《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 高洪兴、徐锦钧、张强编:《妇女风俗考》,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 [美]梅里·威斯纳—汉克斯:《历史中的性别》(何开松译),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
- 白凯:《中国的妇女与财产:1960—1949年》,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
-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男性统治》(刘晖译),海天出版社2002年版。
- [美]康奈尔:《男性气质》(柳莉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 [美]伊沛霞:《内闾——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胡志宏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 第四章

# 性别社会化

### 引子

人的成长是发生在特定历史文化条件下的,具有个人无法选择性。但是,人又具有自主能力,在人一生的社会化过程中,人总是在成长。记得在一次作业中,讨论是什么因素促成我们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男生和女生,一位女同学以《我是女生》为题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这些话提出了社会化过程中个人面临的困境:

我是女生,一个直到去年都拒绝承认这一事实的女生。

我已不记得自己是何时意识到男女是有别的……但是我却清楚地记得从心理上拒绝、排斥自己女性性别的开端。小学三四年级时读到一篇学生优秀作文,是一篇自我小传,通篇用极其自豪的语气表达了一个意思:我是“假小子”,我为此而骄傲!这篇文章对我震动极大,它向我传递了一个暗示:女不如男,因为女生可以以“假小子”为荣,则表明“小子”的地位要高于“丫头”。从此以后,我对男女地位问题就十分敏感。很不幸,诸如“娘娘腔”、“妇人之仁”、“女人是祸水”等等都或明或暗地表达了世俗的观点:女子不如男……

一次又一次,反复的自我暗示,有时简直就是神经过敏,强化了“女子不如男”的观念,而这一观念在我心中所激起的叛逆精神,使我走向极端。我要“坚强”、“勇敢”,故意做各种女生甚至连男生都不敢做的事情;我为被

自己鄙视的“懦弱”女生出头,跟欺负她们的男生打架;我和男生玩,跟他们比跑步、跳远,不屑与女生为伍;我拒绝文静,拒绝饰物,拒绝裙子……总之,我拒绝一切“女人味儿”,追求与男生绝对地平起平坐,但又因为自己毕竟是女生,“心虚”导致行为往往比男生更男生——这一疯狂而盲目的状态一直持续到初中毕业,这一阶段是由社会对某些女性特质的否定评价导致我全盘排斥女性特质的阶段。

进入高中后,尽管内心仍秉承对“女子不如男”的反叛,但行为有所改变。开始接纳被社会普遍赞同的女性特质,如开始变得沉稳、温柔、文静。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转变是我开始承认女生在体格上确实不如男生,这让我气馁又无奈,但我转而找到了“补偿”办法,在智力上证明超过他们,起码不能再输给他们。于是,我将目光投向了物理,因为在一般人看来,物理是女生的禁区,是证明男生比女生“聪明”的最没有争议的领域。入学时我立誓:“别的科目可以不管,但一定要把物理学好!”说到做到的我全身心地投入物理学习,考试取得全年级惟一的满分。我用我的成绩反驳了人们关于女生在高中时成绩会下降的论断,并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上北大。

但是正是从高中开始,越是到后来,我越是觉得孤独,觉得疲惫,觉得不堪重负,觉得迷茫。一方面,我偏离了女生走的航道,离女生这一群体越来越远;另一方面,男生这一群体也并不接纳我。在双方的眼中,我都不是他们的同类,是异类。我只有女生的痛苦,没有“小女生”的快乐;只有男生拼杀的痛苦,没有“大丈夫”的快乐。我想要挣脱这张痛苦的网,但是骑虎难下,越挣扎,缠得越紧……

高考后,我买了第一条裙子,原先以随时与男生决一雌雄为己任的我如今偃旗息鼓……我决定回归女生群体。对于这一转变,我不清楚是对是错。男女平等以什么来衡量?……

这位女生自由地选择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做得比男孩子还要有成就;但是内心却是迷茫的,不知道怎样做自己,在男生和女生的自我选择中,她最终还是回归“女生群体”。这样的困惑可能是许多女孩子的经历。那么,男孩子能够想像这样的经验吗?英国社会学家鲍曼把人们“同时处在自由和不自由的状态看作是人们经验中最为常见的一种现象,也是最令人困惑的一种现象”,他用“社会化”的概念解释这些现象。<sup>①</sup> 社会化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社会学习的过

① [英] 齐尔格特·鲍曼:《通过社会学去思考》(高华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

程,性别社会化通过把性别规范内化实现社会的性别秩序。

## 第一节 人的社会化

### 一、社会化的含义和内容

#### (一) 社会化的含义

社会化(socialization)是指使人们获得个性,并学习其所在社会生活方式的个人与社会相互作用的过程,它是联系个人和社会的必要环节,是一个过程,因此常常被称作社会化过程。微观上,社会化过程是指生物体的个人成长发育为社会成员、独立地参与社会生活的过程;宏观上,社会化是指社会群体为了使该群体发展延续下去,按照一定的方式、方法培养下一代的过程。

社会化研究的重要性在于它在社会文化和个体行为之间建立起了由社会角色、社会规范为核心的纽带,使文化得以延续;使个体既有规矩可寻,又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同时,社会化也使文化、制度等得以再生产,成为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一旦人们把现存的社会角色规范内化,就会控制自己的行为,并以此要求他人。从个体意义上,社会化是终身的过程;从社会意义上,社会化是文化世代相传的主要渠道。通过社会化过程,人们学会基本的生活技能、社会规范、生活目标和基本的社会角色。一个人自我角色和其他社会角色的学习、领悟与实践是社会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学会与社会角色相一致的态度、动机和行为。简言之,人们内化了社会规范,自我要求上进并努力掌握各种技能,按照社会要求的方式举手投足,自己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样的人是一个有能力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也是一个被社会化了的人。

#### (二) 社会化机制

社会化过程作为人的终身过程,个体可以是社会化的对象,也可以成为社会化的实施者。社会化的实施者有很多,包括家庭、同辈群体、学校、工作单位和书籍、报纸、电视、电影等各类大众传播媒介。社会化的实施者与社会化对象之间的关系构成社会化的各种机制,这些社会化机制包括教化、学习和互动。<sup>①</sup>

教化是指社会化的实施者向社会化对象实施教育的过程。对于社会化的对象来说,其社会性不是内生的,而是外部灌输的。这主要是在人的未成年阶段,其家庭、亲人和学校是重要的社会化机构,家庭成员和教师们承担着向未成

<sup>①</sup> 参见王思斌主编:《社会学教程》(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三章。

年人传授知识的任务,他们的言传身教在社会化过程中格外重要。

学习论强调社会化对象主动学习的过程,人是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社会学习的过程中的。家庭、学校、同辈群体、工作单位和各类传媒都是人们参与社会学习的重要途径。学习论强调人的行为和行为意义都是“习得”的,社会学习包括学习行为为规范和行为的意义与价值。人们学习来的各种社会规范使社会享有一系列对行为进行解释的共同原则,这些原则体现了行为的可认知性和行为意义。

互动论认为社会化的实施者与社会化对象之间是相互作用、共同参与的互动关系。在社会化的实施者进行教化的过程中,社会化对象的积极或消极反馈会改变社会化的方向,这说明社会化的方向具有弹性。

一般来说,教化之下的学习具有正式社会化的特点,是特指那些由各种社会组织机构,如家庭、学校、传媒、工作组织等进行的社会化,是经由组织机构传递的社会规范。个人主动的学习和互动具有非正式社会化的特点,因为它与个人经验紧密相关,在家庭、学校、同辈群体以及工作场所等重要的组织结构中,通过人际互动人们学习到日常生活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一定是正式社会化要求的,甚至可能是违反社会规范的。因为个人既是社会化的客体也是其主体,人类并非只是接受指导和安排的被动对象。社会化过程与个体的行为经验、对行为后果的预期以及对他人行为的观察联系在一起,个体具有自我认知的主动性,个体与他人和社会环境的不断互动反映了个体生命经验中过去和未来的有机联系。

在人一生的社会化过程中,早期社会化具有相对重要性。早期社会化或初级社会化(primary socialization)是指0—12岁左右的社会化,在这一阶段,孩子们习得了语言和基本的行为模式,为以后的学习打下了基础。早期社会化的重要性在于,早期社会化的经验常常在个体未来的人生经验中再现,并影响人们对社会角色的深入领悟,成为次级社会化(secondary socialization)的基础。次级社会化从青年期开始并持续到成年期,人们在社会环境中互动,学习和使用价值观、规范和信仰。继续社会化是指人生不间断的学习,它同样会受到早期社会化的影响,当人们的社会地位改变时,在学习关于各类社会角色必须具备的专门的知识 and 责任时,也常常依赖早期社会化的路径。

重新社会化对人有重要的改变。重新社会化是指人们学习用一整套不同的规范和价值取代先前已经内化的、公认的那些规范和价值。这种状况主要出现在特定的条件下,如人们到异文化中生活,如对罪犯的改造。

## 二、性别社会化

本章引子中《我是女生》的独白,告诉我们一位女生在成长过程中的性别困

惑,这就是她的性别社会化过程,充满看不见的社会强制和自我选择的自由。性别社会化(sex/gender socialization)是社会性别角色的社会化,是学习如何做个男人或女人的过程,它反映了多重因素对男人和女人的共同作用,从人一出生就开始了。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说:“在每天无数的小活动中,我们社会化地再生产着——亦即制造和再制造着——性别。”<sup>①</sup> 两性的社会角色在社会化过程中被学习、领悟和效仿;同时,两性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也在社会化过程中被生产和再生产。

### (一) 性别社会化的定义

性别社会化的内容涉及性别期望、性别角色和性别认同。社会通过各种手段教化个体有关性别规范和相关的象征意义,个体同样加入到这一过程中,学习和使用性别规范及其象征。就像《我是女生》中所说,“高考后,我买了第一条裙子”。裙子不再简单地是一个服装,它对于这位女生来说,意味着对社会性别期望的屈服和自己不甘心的性别认同,终于认同了“我是女生”。

认同指人们对他/她是谁、什么是有意义的等问题的理解。性别、民族、阶级以及民族、国籍等都是人们认同的基本来源。性别认同可以分为社会的性别认同和自我的性别认同。

社会的性别认同是社会赋予性别的属性,表明一个人是男人还是女人的标志。性别认同将个人与具有相同属性的其他人联系起来,并发生关系,组织其生活中的意义和经验。因此,性别认同表明社会以性别来组织一个集体的维度,定义女人或男人是如何的相同以及两者之间的差异。使两性行为具有类型化特征是性别社会化的主要目标。行动者通过将两性行为类型化,使行动具有了可重复性和规律性。当行动的类型被第三方感知时,这种行动的类型就达到了现实状态。社会对两性行为进行类型化的另一重要意义就是使其行为具有符号意义。

自我的性别认同,是自我发展的过程,它将人们分为不同的个体。如《我是女生》中的那个女生,她在自身的成长过程中,获得了有关自我性别的独特感觉和符号意义,获得在物理这一学科上的好成绩对她而言具有重要的性别符号意义,她力求证明女性的智力不比男性差,显示出个体的能动性。正是个体与外部世界的沟通和互动才创造和改变他/她的自我性别意识。自我与社会之间的互动过程有助于个体把个人世界与公共世界联系起来。

教化论在性别社会化过程中主要表现为家长、教师和其他长者通过奖励或

<sup>①</sup> [英]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第四版),第133页。

惩罚引导青少年学习两性不同的行为。男孩勇敢的行为得到鼓励,爱哭的男孩受到嘲笑和指责;温柔和顺从的女孩得到成人的赞美,“疯丫头”受到指责,种种正面或负面的社会强化帮助青少年学习和遵守社会期望的性别角色规范。如果一个人形成的性别角色与其生物性别不符或背离,常常被视为性别社会化不充分。

日常生活中的互动关系在传递性别期望和性别规范中具有重要作用。有学者注意到,男人和女人对语言和非语言的交流有不同的感知和表达,例如,作为特殊互动形式的目光接触——凝视——说明了一种非言语交流形式具有的“意义”。一个男人凝视一个女人被视为“自然的”或“清白”的行为,如果这个女人感到不舒服,她可以转过头或中断互动以避免被凝视。反之,如果一个女人凝视一个男人,则常常被视为是挑逗或色情的行为。虽然孤立地看这种情况是无关紧要的,但综合起来看,它有助于强化性别支配模式。<sup>①</sup>

性别社会化的力量是强大的,但也随着社会从传统到现代而变化。主导性别认同的固定模式正在变化,性别平等意识亦在普及,父母对待男孩和女孩也更加一视同仁。但是在孩子接触到的玩具、教科书、图书、电影和各种电视剧中,依然包含了对性别的传统态度,它们不断地传递男孩和女孩应当具有的角色、目标和理想。在多数电视节目中,男性倾向于扮演更积极、更具冒险性的角色,而女性则被描述为被动的、被期待的和家庭取向的。<sup>②</sup>

## (二) 生命周期中的性别社会化

生命周期(life course/life-cycle)也叫生命历程,是指一个人由出生到死亡的全程,是人们在不同年龄阶段展现的生活道路。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人们经历某些相似的、重要的生命事件(life events),这些重要的生命事件是多数人都要经历的,包括出生、就学、就业、结婚、生育孩子、离婚或丧偶、孩子成长至结婚、退休等等。这些重要的生命事件构成了人一生中重要的转折点,使人从一种生活状态和社会角色向另一种生活状态和社会角色转变。每个转折点都可以被视为生命历程中的道路标识,都是社会化的继续。生命周期的概念为理解个体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有效工具。

重要的生命事件存在着性别差异,这些差异又将对性别角色、期望和规范的形成产生影响。男性经历的生命事件多与社会性活动相联系,以就学、就业、

① [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第四版),第104—105页。

② June Statham, *Daughters and Sons: Experience of Nonsexist Childraising* (Oxford: Blackwell, 1986).

晋升等为主要线索。男性的社会化过程充满奋斗,社会性别认同与自我性别认同都较为明确地指向社会地位和自我成就,较少地遇到社会性别认同与自我性别认同之间的危机。女性经历的生命事件多以家庭活动为主要线索,婚姻、生育等事件比就学、就业显得更重要,这使女性在社会性别认同与自我性别认同方面出现矛盾,就如前面《我是女生》中所表现出来的,自我性别认同指向社会地位和自我成就,但是社会性别认同则指向与女性身份相关的顺从,这既体现了女性社会化更多地与他人相联系,她们要在社会关系结构中认同自我并获得成就感;也表明女性在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容易遇到自我性别认同的危机。男女在性别社会化方面的分化说明社会制度与社会结构因素通过生命转折点对两性具有不同方向的作用,其中,学校、工作组织、社区、同辈群体和大众传媒等因素都参与并积极作用于两性的社会化过程。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艾瑞克逊(Erik Erikson)认为,在人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存在着一套社会心理阶段(psychosocial stages),绝大多数的人都需要经历八个发展阶段,在每个发展阶段,个体都会遇到不同的发展危机(developmental crisis)。心理发展的过程就是克服危机的过程,不同阶段存在特定的问题与困难;困难未解决之前,发展危机将持续存在;困难得到解决意味着心理的顺利发展。因此后一时期身心发展的顺利程度都与前一时期的心理发展有关,前一时期的顺利发展为其未来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有助于其未来发展。艾瑞克逊将一生的心理发展分为以下八个阶段:

艾瑞克逊的八个社会心理阶段

阶段	年龄(岁)	发展危机	发展顺利	发展障碍
第一阶段	0—1.5	基本信赖—不信赖	信赖,有安全感	交往焦虑与不安
第二阶段	1—3	自主、主动—羞愧、怀疑	自我控制,有信心	自我怀疑,行动畏首畏尾
第三阶段	3—6	主动、自发—退缩、内疚	有目的方向,能独立进取	畏惧退缩,无自我价值感
第四阶段	6—12	勤奋进取—自卑	具有求学、做事、待人的基本能力	缺乏基本生活能力,充满失败感
第五阶段	12—20	自我认同—角色混乱	自我观念明确,追寻方向明确	生活缺乏目标,有迷失的感觉
第六阶段	20—40	亲密—孤独、疏离	成功的感情生活,奠定事业基础	孤独寂寞,无法与人亲密相处
第七阶段	40—65	精力旺盛—颓废	热爱家庭,抚育后代	自我放纵,不顾未来
第八阶段	65+	自我整合—悲观绝望	随心所欲,安享晚年	悔恨旧事



### 1. 婴儿和儿童期的性别社会化

每个孩子的降生都饱含父母的期望,并被大量与性别相关的提示所包围,“取名字”、新衣服都具有明显的性别烙印。有研究表明,儿童在2—3岁之间发展出性别认同,并能够准确地说出自己的性别,当儿童逐渐意识到他们是某一性别群体的成员时,他们就会逐渐领会该性别应当具有的行为规范。最初的学习过程是通过模仿完成的。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在个体的生命过程中,幼儿期具有特殊的决定性作用,心灵时间不成比例地大于生物时间。男女孩童大约在3岁左右较稳定地确立起性别认同。儿童通过模仿开始最早的社会学习,他们通常喜欢做出与他们亲近的成年人相似的行为,对儿童模仿行为的正面鼓励强化了其行为的稳定性。父母和爷爷奶奶们是婴幼儿期孩子“重要的他人”。孩子特别喜欢照顾他的人,因此,那些直接或间接满足孩子需求,并经常与孩子有正面的、令人愉快的交往的母亲对孩子具有重要意义。在早期社会化过程中,男孩和女孩都可能模仿母亲的行为,但是处于父权社会中的父母总是鼓励女孩模仿母亲的行为,并限制男孩模仿母亲的行为,这种状况是社会心理学关注的问题,甚至会影响到两性道德的发展(见本章第二节)。

### 2. 青春期

青春期是生命周期中非常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社会化除了家庭、学校因素外,又加入了大众传媒和同辈群体的影响。青春期的性别社会化是建立在人的生理变化基础上的。女性的月经初潮和男性的遗精成为其生命历程中具有标志性的现象。

月经的到来表明女孩已经具备了生育的能力,确定了生物性的女性化标志,这成为女孩重要的生命事件。它增加了女性性别认同的自觉,使她们进入具有文化符号意义的性别认同中。首先是存在有关女性月经的种种禁忌。在文化象征意义上,月经总是与肮脏、不洁相关。月经期禁忌五花八门,如月经期的女性不能为男性做饭,不能参加宗教活动,甚至不能与男性待在同一个房间里。现代社会,虽然月经禁忌已不存在,但是“不洁”的概念仍然根深蒂固。这些文化使女孩的性别认同充满自卑感,许多女孩借此找到自己学习成绩不如男孩的理由——“女孩一来月经就不如男孩聪明了”,暗示了女人天生不如男人。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女性性别认同不仅是压抑的,而且说明女性性别认同必然经由对身体的反思来完成。其次,月经事件可能刺激父母和社会进一步强化对女孩社会角色的教育与行为监控,由此出现对女性的双重标准。所谓双重标准是指,一方面,女孩要接受社会的普遍规则,确立青年人普遍具有的理想,要努力读书,掌握生活技能,为将来的职业发展作准备;另一方面,社会又要求女孩要

有“女人味儿”，也就是说，要温柔，要增加对异性的吸引力，学会勤俭持家，做贤妻良母。对于一个进入青春期的女孩来说，社会已经为她指明了未来的社会角色——妻子、母亲，由此，男性文化的价值通过社会化成为女性自觉的行动。

### 3. 成人期

成人期经历一系列与职场、生育有关的性别社会化，男女两性接受了差异更加明显的社会期望和要求。男性获得了与职业成就相关联的一系列社会角色期望；女性获得了与生育、养育、母亲身份相关的社会角色期望。双重标准在婚姻、生育与职业选择等方面左右两性的生活。这些内容将在家庭、工作等章节中讨论。

### 4. 老年期

老年期是一个常常被人忽视的时期。事实上，两性老年人口的生活状态更能显示出两性在社会价值和社会地位上的差异。社会对女性和男性的老龄化有着不同的反应。人们普遍相信，女性的生命从40岁就开始走下坡路。对老年的恐惧和社会刻板印象常常会使女性产生自我厌恶感，媒体也在强化着老年人的“丑陋”形象。根深蒂固的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使得女性更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在外表上，也更容易感受到老年对人生的打击。老年女性被社会视为不再具有性吸引力的、满是皱纹的、爱唠唠叨叨的老太婆。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对老年男性的描述，老年男性似乎变得更和善了，他们的工作经历不仅使他们在社会上具有地位，而且还使他们具有吸引力。当老年女性被人轻视和拒绝的时候，老年男性则受到了社会的重视。

在老年女性的生活建构中，“更年期”是一个重要的生命事件。所谓更年期一般从停经开始，多发生在50岁左右的女性身上，是指连续12个月没有月经，伴有潮红、多汗或胸闷等现象。从科学的角度看，至今没有对更年期的一致结论，人们普遍相信，更年期是由雌性激素不足造成的。从社会的角度看，许多人相信更年期的女性是病态的，是缺乏处理问题能力的。并非每个女性都会经历更年期，但社会常常给此年龄段的女性贴上“更年期综合症”的标签，这种具有符号意义的命名直接贬低老年女性的生命价值。在消费社会中，为了推销商品的目的，女性的更年期被不断提前。

西蒙娜·波伏娃曾经在《老年》一书中说，老年人受压迫的根本原因，是别人期望老人有“尊严”。女性也有相同的处境，人们假借“尊严”的名义，想制止女性表达激情或反抗之情。实质上，就人的尊严而言，它不仅有着性别的双重标准，而且还有年龄的双重标准。在传统社会中，尊严属于社会中的成年人，属于男性。与此同时，波伏娃又强调老年女性的生活要比男性来得顺畅，因为男性一

向充满了自信,他们自以为拥有权力和责任,当他们年老的时候,他们的一切都破灭了,他们无法面对25岁的儿子超过自己的事实。相形之下,女性仍然拥有她们可扮演的角色,保有她们在家庭中的功能。波伏娃论述道:“我不赞同妇女们把家当作活动的中心,老是在煮饭和照顾她们的孙子们——这些事情的范围太狭窄了,终其一生她所做的也无非就是这些事。但无论如何,这总是一项使她们活得较好的实际状况和心理资源。”<sup>①</sup>

## 第二节 性别形成的理论与两性道德发展

本节我们讨论一些主要的理论,试图解释与个人的性别相关联的行为和角色的获得,这一过程称为性别形成(gender typing)。除了上一章分析过的心理分析理论外,社会化的各种理论皆认为,性别气质、行为和角色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是儿童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发展出来的,只是各种理论强调的性别学习的过程不同而已。

### 一、社会学习理论

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 theory)与弗洛伊德等心理学派强调儿童成功受到其先天欲望驱动的理论不同,它强调儿童发展受社会环境的影响。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人们通过模仿、奖励或惩罚的经验以及自我认知来进行学习。

第一,模仿与观察学习。模仿行为就是观察学习,是儿童通过观察模仿对象的行为学习到社会行为,是人们形成社会行为的基本方式。在观察学习的过程中,自我规范和自我强化是两个重要因素。前者是学习者据以观察他人行为的标准,后者是根据标准对自己行为的肯定。比如,专家学者们反对电视节目中出现暴力镜头的理论依据就是认为,儿童可以通过观察暴力行为学习到不良的习惯和行为方式。观察学习可以超越通过赏罚控制的直接学习的限制,也可以超越事先设计学习情境的限制,它是人们随时随地的学习。观察学习的结果并不一定是立竿见影的,潜移默化的学习会在应急的情况下产生效果。

第二,奖励与惩罚。以性别社会化为例,儿童除了模仿同一性别的行为,还会对异性行为进行观察和模仿,他们遭遇的奖励与惩罚会强化某类性别气质。这一理论假设是:个人的某类性别气质的形成与其行为后果相关,当某一行为

<sup>①</sup> 参见〔联邦德国〕爱丽丝·史瓦兹:《拒绝做第二性的女人——西蒙娜·波伏娃访问录》,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79—80页。

得到奖励时,人们就可能再次重复这种行为;而当这一行为受到惩罚时,人们就可能减少这种行为。当女孩像男孩一样与人打架时,会受到比其兄弟更严格的惩罚,这些惩罚会减少女孩的打斗行为。社会学习理论特别强调父母与子女的互动关系。有研究表明,父母趋向于通过儿童玩具强化性别差异。父母在鼓励子女的独立性、成就感、互动能力、实践活动等方面对男孩和女孩的态度是一致的。<sup>①</sup>

第三,认知。社会认知理论认为,观察学习以及对行为的奖惩都不能简单地说明性别的形成,人们自身的认知能力也起重要作用。随着儿童的成长,他们不仅从他人那里接受奖惩,而且开始内化稳定的性别气质。儿童从适宜的性别气质中获得了期望的奖励,并逐渐将这些经验转化为自己行为的标准,激励其从事与性别相宜的活动,使自我得到满足。

总之,社会学习理论强调两性儿童在家庭、学校及亲朋中受到的区别对待,不同行为受到差异性的奖惩,从而发展出两性有别的行为。

## 二、认知发展理论

在任何社会中,社会总会期望在某一年龄段的人在行为能力上达到某一程度,这是个体的个人发展任务(development task),它强调年龄与心智成熟的配合关系。认知发展理论强调认知的发展在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认知发展理论认为,认知的发展是分阶段的,认知发展的阶段建立在道德发展阶段上,在社会化过程中,个体随年龄的增加逐渐学到是非标准以及按该标准从事有道德的行为。第一阶段是“知”的道德,是指获得对是非善恶的判断。第二阶段是“行”的道德,是指获得对道德理念的具体实践。

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经过多年的观察研究指出,人的智能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失衡(disequilibrium),人们因失衡而求恢复再平衡的过程产生了适应(adaptation);适应能力的发展促进了智能的不断发展。皮亚杰认为,人的道德发展可分为两个时期,一是他律期(heteronomous stage),此时期大约出现在5—8岁之间,以学龄前儿童居多。此时期,儿童对道德的看法是遵守规范,服从权威,对行为对错的判断依赖于行为的后果,不考虑行为意义。二是自律期(autonomous stage),自律道德始自八九岁以后。此时的儿童不再盲目服从权威,开始考虑当事人的动机,具有了道德感。

<sup>①</sup> Lytton & Romney, "Parents' Differential Socialization of Boys and Girls: A Meta-analysis," 1991, *Psychological Bulletin*, pp. 109, 267—296.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柯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 1927—1987)使用连续测量的方法,用10年的时间记录了72个10—16岁男性青少年的道德判断,并到世界各国去推论验证其研究成果。1969年,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他提出了“三期六段”的道德发展理论。第一期为道德前期(preconventional lever),年龄大约在幼儿园至小学低年级,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避免惩罚力求服从取向(punishment and obedience orientation)阶段,这时的儿童缺乏是非善恶观念,只因恐惧惩罚而服从规范;第二阶段是相对工具主义取向(instrumental relativist orientation)阶段,这时,儿童的行为好坏取决于他可能获得的结果,为了求得奖励而遵守规范。第二期为道德循规期(conventional lever),年龄大约为自小学高年级到青春期左右,分为两个阶段:第三阶段是寻求认可取向(good-boy-nice-girl orientation)阶段,遵守符合“好孩子”的各种规范。第四阶段是顺从权威取向(law and order orientation)阶段,服从团体规范,行使法律权威,开始使用法制观念来判断是非。第三期为道德自律期(postconventional lever),年龄大约为青年末期到人格成熟,分为两个阶段:第五阶段是法制观念取向(social contract legalistic orientation)阶段,这一时期的青年开始尊重法制,相信法律是为大众利益而制定的。第六阶段是价值观念取向(universal ethical principle orientation)阶段,相信道德法则的普遍价值,认识到人性的尊严,凭自己的良知进行是非判断。以柯尔伯格的观点看,每个道德发展阶段都是有等级的,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依次达到最高的道德阶段,有些人甚至只停留在第三阶段或第四阶段。

### 三、性别基模理论

性别基模理论(gender schema theory)是力求通过性别基模的概念消解社会学习理论和性别认知理论中与实证研究结果不相符的概念,强调性别基模是建立在性别规范、性别期待和社会实践基础上的。这一理论沿用皮亚杰及柯尔伯格对儿童认知发展机制的基本看法,认为儿童具有主动搜集资料进行学习的能力,以此达到维持内在认知与外显现象间的平衡;同时,儿童发展出一整套相互关联的关于性别的想法和模式,以此引导其有关性别的知觉和行动。与柯尔伯格不同,这一理论认为性别认知的过程并不是自然过程,而是人们加工社会信息的结果。儿童自柯尔伯格理论中的“基本性别认同阶段”起,就会主动学习与其性别相符的行为、价值观等。随着认知能力的发展与对性别相符行为学习的积累,儿童渐渐产生了自己的“性别基模”,这一性别基模的功能是帮助他整理外在信息并将其有组织地储存于记忆中。性别基模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不知不觉地将与基模不相符的信息也扭曲为与基模相符的信息以便储存。此时,

儿童不只是以自己的基模所规范自我性别形象来行事,他能够记住与其性别基模相符的行为,忘记或扭曲性别基模较难直接储存的经验。个体对性别基模感觉的程度导致了人们在使用性别基模评价他人行为与指导自身行为的差异。

#### 四、两性道德发展

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理论发表之后受到各方面的关注,但是他的两性道德差异的理论在研究方法和结果推论上都受到了各方面的批评。这种批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样本缺陷。他的研究成果是建立在对72个10—16岁男生的调查基础上,这一研究并没有反映女生们的经验,它只能代表男生成长的经验,因此它无法解释和推论一般儿童的道德发展趋势。第二是他有关道德发展程度的性别解释是错误的,研究显示,在道德发展的程度上存在着男高女低的情况,这种解释是有问题的,这种解释的错误与其引入的资料及没有根据的解释有关。柯尔伯格在研究道德发展时,采用了给儿童讲故事的方法,他编造了一些故事,这些故事均是令人左右为难的道德判断问题。在故事讲完后,他要求受试者凭自己的判断,指出故事中当事人应如何处理这些两难问题。依照柯尔伯格的研究,在两难问题的道德判断上,同一年龄的道德发展程度显示出男高女低的状况。以下是柯尔伯格使用过的三个故事,我们可以由此讨论两性的道德发展是否呈现出男高女低的状况。

##### 1. 丈夫偷药救妻

海太太患上了一种特殊的疾病,生命危在旦夕。经医生诊断,只有一种药物可以治疗该病,而该药物只能在镇上一家药房买到。因为是独家生意,药房老板就把原价为200美元的药价提高了10倍,索价2000美元。海先生因为太太久病已用尽所有积蓄,他四处求亲告友,也只能凑到一半的钱。海先生恳求老板仁慈为怀,让他先付1000美元药款先取得药物,余款留下字据,以后补足。老板不为所动,坚持一次付清。海先生绝望离去。在第二天夜里,他破窗潜入药房,偷走了药物,及时挽救了妻子的生命。海先生的做法对不对呢?

##### 2. 警官的矛盾

与海先生同住一个镇子的警官布朗先生,在夜间完成值班任务后回家,在回家的途中,他正好看见海先生击破窗子进入药房,而且他也听说过海先生缺钱买药的困境。布朗觉得虽然值班时间已过,但维持镇子的治安仍然是职责所在。在迟疑之间,海先生已经偷得药物离去。布朗应不应该进一步追查海先生破窗偷药的案件呢?

### 3. 童子军的困境

乔,14岁,是学校童子军的小队长,一直希望参加半年后举办的童子军露营。于是,他不但领来了申请表,报名参加,还省下零用钱,准备参加时自己支付一切费用。就在乔准备启程去露营的前两天,他父亲突然跟他商量,要乔把积蓄的200美元借给他使用,因为父亲与友人相约去海边钓鱼,临时发现自己的钱不够了。乔应当怎么做才好呢?

面对上述这些故事,受试者要回答两个问题:一是他认为当事人应当怎么做;二是说明当事人这样做的理由。研究者按照预先设定的标准分别将受试者列出等级,归属于道德发展的“三期六段”之内,评定受试者的道德认知发展达到的程度。研究发现男生更多地倾向遵守法规,而女生则更多地具有人情味儿。因此,通过回答上述问题得出结论:在同年龄的道德发展程度上,男性道德发展程度高于女性。

美国心理学和教育学家吉利根(Gilligan)在《不同的声音》(1982)一书中对柯尔伯格的理论提出质疑,并发展了女性道德关怀的理论。她指出,男女在道德判断上有根本性差异,这种差异是方向性差别,而不是水平高低之差。第一,男女在道德发展上存在差别,男性重是非,讲法制,多从“理”的观点看问题;而女性则重善恶,讲人道,多从“情”的观点看问题。她对11岁男女儿童重复柯尔伯格的研究后发现,男生的回答的确多达到第四阶段,而女生多停留在第三阶段。但是这种差别不是高低的差别,而是类别的差异。第三阶段注重的是人际和谐和感情关系;第四阶段注重的是法制权威和理性。第二,男女在道德发展上的差异是社会化的结果,社会学习过程鼓励了两性的品质向不同的方向发展。第三,两性道德发展上的差异不是高低之差,而是发展方向上的差异,即重感情与重理性的差异不是道德等级的差异,而是方向的差异。第四,通过对两性道德发展特点的理解可以更好地解释两性在公共生活和个人生活上的思考方式。以往人们对自我和关系的界定是以男性为主体的,把男性有关自我和关系的经验当成整个人类的自我和关系的经验。如果加入对女性经验的理解,将超越传统认识论的局限。第五,政治秩序和男女心理的活动是联系在一起的,女性的声音对维持或改变父权制社会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女性注重关系,具有强烈的关怀伦理。但在父权制的统治下,“许多妇女通过限制自己的声音,有意和无意地使男人声音的文明永久化,使一种基于同妇女分离的生活秩序永久

化”<sup>①</sup>。

吉利根的《不同的声音》发表后引起强烈的反响,最直接的批评就是两性之间是否存在本质差异。对此的不同解释构成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男女两性的生理差异是一种本质存在,这种差异跨文化和跨历史地存在着,并导致了两性的不平等,因此性别不平等是不可能改变的,这种认识论被简称为性别本质主义或性别本质论(essentialism)或生物决定论。另一种观点认为,两性生理上的差异不是造成性别不平等的原因,是社会有目的地建构了两性差异的社会价值,由此导致了性别不平等,这种认识论被简称为社会建构主义或社会建构论(constructionalism)。虽然吉利根强调了两性道德发展方向上的差异是一种社会化的结果,但依然有些学者指责《不同的声音》强调了性别本质主义。对此,吉利根在该书的序言中说:“我发现性别差异是生物学决定还是社会建构的问题是最令人头痛的问题。这种提问题的方式暗示着人们(无论男女)都是或是由遗传因素决定的,或是社会化的产物——这意味着没有人发出声音——在没有人发出声音的情况下,就意味着没有进行抵抗和创造的可能性,或者来源于心理方面的一种变化可能性。”<sup>②</sup> 这表明,吉利根力求对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二元理论的超越。在研究妇女的道德发展过程时,她“倾听妇女,听出某种新的、不同的讲话方式,而又听出这种不同如何迅速地消解在陈旧的思维范畴里,以至于失去它的新奇性和寓意”。她常常被这样的问题所困扰:这种声音是自然的还是被教化的?是女性优于男性的,还是反之?在她看来,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我知道我自己已经失去了声音”。

总之,在我们对性别社会化这一关键的社会机制进行理解时,加入吉利根的研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她努力关注男性体验如何代表了整个人类的体验,关注有关妇女生活如何黯然失色以及是什么使她们保持沉默的理论,这一理论取向为我们研究性别社会化提供了一条积极可行的研究方法,倾听、揭示与发展女性的道德关怀亦是理解性别社会化的重要方面。

## 小 结

性别社会化是社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贯穿人的一生。人们通过家庭、

<sup>①</sup> [美]吉利根:《不同的声音——心理学理论与妇女发展》(肖巍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22—23页。



学校、同辈群体、各种媒体以及其他组织经历早期社会化、继续社会化和重新社会化等等。性别社会化的主要内容是学习性别规范和与之相关的行为符号意义。人们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经历不同的性别社会化,这些社会化深入地影响两性的行为。性别社会化的理论强调教化、互动学习与自身的认知能力共同作用于两性的发展。

### ❖ 关键概念

社会化 继续社会化 重新社会化 性别社会化 生命周期  
道德发展的阶段理论 女性的道德关怀 本质主义/建构主义


### ❖ 思考题

1. 描述一件自己印象深刻的性别社会化事件,并谈谈自己对性别社会化的认识,说明性别社会化的作用与意义。
2. 读《不同的声音》,简述其主要观点。

### ❖ 进一步阅读文献

[美]吉利根:《不同的声音——心理学理论与妇女发展》(肖巍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9 年版。

[美]埃托奥、布里奇斯著:《女性心理学》(苏彦捷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 第五章

# 话语建构的性别气质

### 引 子

这一章将进入日常生活层面,以话语为例,了解社会互动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建构出两性气质。人们说出来、写出来的语言被称为话语,这包括人们说什么、如何说以及说话时的关系、场景及其社会后果,话语构成了人与人之间互动的基础。现代社会,大众传媒形成了公共话语空间,并深深影响人们的性别社会化和性别关系。大众传媒以各种生动的形式展示社会对理想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期望,建构当今男女的生活。讲什么样的故事、如何讲故事都会潜移默化地参与到建构性别气质的生产活动中。我们用“白蛇传”这一历史故事,看看故事是如何在历史中被叙述和再表现出来的,在故事不断被叙述的过程中,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理想类型亦被加入新的内容。

“白蛇传”的故事最早出现在何时似乎已无法考证,但它始于民间传说。明代作家冯梦龙将这一民间流传的故事编入了《警世通言》,取名为“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这一故事的“警世”作用主要是对海淫海盗的警告,它告诫年轻的读书男子要以考取功名为首要使命,但是在求取功名的路上会遇到各种诱惑,特别是要警惕美丽女性的诱惑。因为美丽的女人很可能是蛇蝎所变,会使男人沉迷于色情,并最终让男人伤痕累累。同时,它也告诫女人不要轻信爱情,男人是关心女人出身的,一旦真相大白,男人多是负心人。

到了清朝,陈遇乾将这一故事收入了《义妖传》,这时的青、白二蛇开始成为“义妖”,她们为民看病,解救受苦的人。这表达了世人渴望善良义妖来解救人们的疾苦。

1956年,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人们曾经热烈地讨论《白蛇传》,并再一次将其改写。作家赵清阁改编的《白蛇传》其主题发生了更大的变化,故事由受到诱惑的年轻人屈服于封建势力,渐渐演变成他们反抗封建压迫的主题。赵清阁在“前言”中说明了白蛇演变的过程。主人公白素贞由一个可怕的妖怪,渐渐演变成一个富有人性的、坚强勇敢的、可爱的女性;许仙也由一个薄情负义的男子,渐渐演变成一个忠诚善良的好人;而法海却由一个慈悲的和尚,渐渐演变成一个阴险残酷的封建卫道士。更重要的是,它的主题从写男子负心的爱情悲剧故事演变成由封建势力破坏的爱情悲剧故事。主题的变化反映了当时中国政治的需要,刚刚解放了的中国要对传统进行革命,需要宣传人民反对封建势力、争取个人自由幸福的大众文学作品。

到了20世纪末,香港女作家李碧华在《青蛇》一书中重述“白蛇传”的故事。她以青蛇的口吻表达了对种种已有叙述的不满,指出各种叙述要么是隐瞒真相,要么是过分美化。青蛇说:“他日有机会,我要自己动手才是正经。谁都写不好别人的故事,即便是中国,中国流传下来的一切记载,都不是当事人的真相。”李碧华对传统文本进行了颠覆,并把欲望摆在重要的位置上,在她(青蛇)看来,白娘子对许仙的爱情“一半因为人,一半因为色”。因为她是“妖精”,“妖精要的是缠绵。她要他把一生的精血都双手奉上。她控制了他的神魂身心。”<sup>①</sup>这一写作表达了一个现代女性的心声,而不再是男性对女性的诠释与期待。

一个传统文本改编的各种写作在文学批评中被称为**文本互涉**(intertextuality),这说明叙述故事并非是一个独立事件,而是彼此互动的,前一个文本构成批评以及颠覆的可能,反映了时代氛围和时代叙述者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从早期白娘子的美丽、顺从、富有牺牲精神,到现代的女妖精对于情欲的释放。本章我们关心的是现代性别气质的建构问题,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视角看,大众传媒成为建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重要工具。大众传媒包括电视、报纸、电影、杂志、广告、录像、光盘和各类电子网站等等,之所以称之为“大众”,是因为它面对的是没有边界的人群。我们的问题是:是谁在说,在说什么,即主流话语表达了怎样的性别声音和性别利益,它又是如何塑造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

<sup>①</sup> 李碧华:《青蛇》,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版。转引自陈岸峰:《李碧华〈青蛇〉中的“文本互涉”》,《二十一世纪》2001年6月号,总第65期。

的。本章我们将考察日常生活中的话语互动,分析大众传媒在性别社会化中的作用,并对中国大众传媒是如何建构两性气质的状况进行初步分析。

## 第一节 话语和大众传媒

### 一、社会互动、话语和性别

社会互动是人们在交往过程中对周围的人采取行动和做出反应的过程。人是群体性和意义性动物,人们总会社会互动中注入意义。因此,人际互动是作为行动者的个人之间有意识、有目的的相互作用的过程。符号互动理论将话语赋予了重要意义。布鲁默总结了三个贯穿米德社会心理学思想的基本假设:第一,人类是在给事物界定意义的基础上行动的,这些事物被称为社会客体。第二,社会客体的意义源于社会交互作用,它并不存在于客体本身。第三,这些意义通过解释过程而得到调节。<sup>①</sup>个人从对意义的理解到采取行动的过程是一个完整的诠释过程,人们在行动过程中不断对意义进行重组、检验和修改。符号互动论强调社会是由代表心理过程的姿态和语言符号的交换构成的,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是在语言沟通的各种模式中确立起来的。沟通是社会借以进入每个行动者内心的中介,由此,各种理解得以共享,社会得以建立。

话语是人类互动的一种方式。人们说出来、写出来的语言被称为话语(course),这包括人们说(叙述)什么、如何说(叙述)以及所说的话(叙述)带来的社会后果。话语成为社会互动的形式之一。“话语”一词是外来语,也被译成“文体”、“文本”等,多用在文学批评中。传统语言研究将语言视为沟通的工具,人们借助语言彼此传达信息、思想、情感。文化是通过语言来反映社会现实的,语言是传播文化的关键性传媒,也是文化的要素之一。现代社会理论强调,语言不仅是沟通工具,也是社会生活的本质,使用语言是一种社会行为。话语是在互动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具有社会性。社会性的话语具有行动性、历史性,并且是权力关系的表演场。社会性别研究重视话语,是因为话语具有超出文字的功能,是性别意识形态的实践。这是因为:

第一,话语不仅表达意义,话语本身也是社会互动的一部分。具有共享意义的语言符号为人们的互动提供了可能,话语为人们提供了去情境化(decontextualized)的场景。在家庭里,如果我们听到这样的对话:

<sup>①</sup> H. Blumer,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New York: Prentice-Hall, 1969).

丈夫：我肚子饿了。

妻子：那我先做饭，今晚早点吃。

丈夫说肚子饿时，并不只是表达饥饿的状态，而是询问什么时候可以吃饭了，因此这句话具有行动力，它促成妻子的行动。

第二，话语是历史的产物，也是人际互动的结果。以中国的文字为例。中国的象形文字是一种象征意义符号，每个文字的组成都有意义，特别是与日常生活相关的文字表达了人们对性别气质和性别关系的想像和定义。我们从“男、女、妇、嫁”等词源上看，日常生活中的性别关系都隐含在其中了。“男”字是由“田”和“力”组成，“力”指一种古代农具“耒”，“男”是指在田间耕作、使用农业器具的人。“女”字是一个跪着的人，双手温顺地放在胸前，这意味着跪着并听话的人是“女人”。“妇”字是指一个跪着扫地的女性形象，妇女的职责被形象地固定在操持家务的领域。“嫁”字的原意是“回家”，女子出嫁意味着回家，即女性注定是丈夫家的人，她为夫家出生。在早期中国社会，女孩出生后没有名字，统称为“氏”，她们像是暂时被寄养在娘家的人，她们的身份和地位取决于夫家的身份和地位。“媳妇”一词的原意是生育后代，这意味着妇女的角色和作用就是服从丈夫，操持家务，生儿育女。

“妇人之见”是过去常常说的一句话，不论说话人是否是女人，都表示他/她所发表的意见是见识短浅，会因小失大。这种意思最早在出现在《尚书·牧誓》中，周武王宣告商纣王的首要罪恶是“牝鸡无晨，牝鸡司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牝鸡司晨，惟家之索”的古训意味着女性不仅做事行为要低眉顺眼，还不能参与任何与权力相关的事务，否则就要有灾祸。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女性有色或女性用权都可能致“祸”，“女祸说”普遍存在于宫廷和日常生活中。“女祸”两字原见《新唐书·玄宗本纪》，形容唐朝早期诸帝“再罹女祸”，迄玄宗李隆基又“败以女子”。《新五代史·梁家人传叙》又有类似的陈述，称“女祸”足以“亡身、亡家、亡天下”。这两处所指的女祸包括了后妃“色惑”与“弄权”两方面的行为。

时至今日，这些词汇的词源学意义似乎已经消失了，但这些词源显示出语言象征意义的历史渊源。在英文里“man”(男人)可以指所有的人，而“woman”只是指女人。一名女性想说明自己时，她常常会说“我是个女人”，而男性不会这样做。历史沉淀下来的话语和言说方式体现了固定的性别关系。英文中的“history”(历史)意味着“his story”(男人的故事)。

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话语会发生变迁。社会中的某些用词，特别是某些

专有名词并不是固定的,即使是同一个词,在不同的场合或不同文化中都会有不同的“意义”。如现在人们常常说的“小姐”一词,在古代汉语中是指对未婚女性的称呼,常常是下人对主人家中未出嫁女性的称呼,如《西厢记》中红娘对张生说的“我家小姐”。在20世纪30年代,“小姐”也可以用于对出来工作的未婚新女性的称呼——“张小姐”、“李小姐”;而今天的小说、杂志或人们口头上说的“叫小姐”,则意味着男性用金钱购买性需要的满足。这些用词实际的社会功能是划分性别身份的边界,通过用词的褒贬来塑造性别气质。“好女人”的用词背后意味着有“坏女人”,一个人如果不能成为“好女人”或“好男人”,意味着他/她就是失败的,不被社会认可的。

第三,话语表达社会位置和社会距离。通过话语的应用,人们可以感知彼此共享的生活经验、习惯、社会背景以及愿意共同分享彼此情感、想法和感受的程度。在一个公共讨论中,有些人会说:“我不是专家,只有一点个人意见。”如果会场上有专家,这表明,他/她在与专家划清界限,保持距离。话语代表社会关系和权力关系,展示了社会互动关系中的权力运作,因为使用语言的目的之一就是产生影响或支配他人行为。语言有直接表达和间接表达之分,前面例子中丈夫说的“肚子饿”实际上是一种支配关系的间接表达,间接表达一般多用于有权力的一方面;处于弱势一方的人的表达可能被强势一方误读。

法国著名学者利奥塔尔曾说,话语游戏有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说话就是斗争,语言行为属于一种普遍的竞技。第二个原则是:可观察的社会关系是由语言的“招数”构成的。微不足道的“自我”或“个体”处在各种复杂多变的社会网络中,人们“处在不同性质的陈述经过的一些位置上。即使是最倒霉的人,他也从没有丧失有关这些陈述的权利,这些陈述一边穿越他,一边确定他的位置,他或者是发话者,或者是受话者,或者是指谓。……或者更简单地说:社会关系的问题,作为问题,是一种语言游戏,它是提问的语言游戏。它立即确定提出问题的人、接收问题的人和问题的指谓:因此这个问题已经是社会关系了”<sup>①</sup>。这就是说,话语或叙述本身就表达了一种社会关系以及社会关系的秩序。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了“语言与符号暴力”的理论,阐述了语言中的权力关系。他认为,语言不仅是沟通手段,而且也是权力关系的一种工具或传媒。语言关系总是符号权力关系。通过这种关系,言说者各自所属的集团间的力量关系以变相的方式体现出来。因为任何语言总是涉及被授予特定社会权威的言说者与在不同程度上认可这一权威的受众之间结构复杂、枝节蔓生的历史性权力关

<sup>①</sup> [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车槿山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2—33页。

系网。因此,语言的生产关系结构取决于言说者之间的符号权力关系。<sup>①</sup>

沃伦·法雷尔(Warren Farrell)发现,当一组高智商男性和一组高智商女性在一起的时候,这些女性几乎完全沉默。这种沉默有几种意味:首先,它可能意味着女性把男性看得比自己内行;其次,它可能意味着女性在为男性“加油”,对男性的行为做出鼓励;再次,它可能意味着女性的习惯行为或经验使然,因为女性的发言常常会被男性忽视或打断,因此她们习惯了沉默。对此,韦斯特和齐默尔曼(West & Zimmerman)进行了一个有关男女两性混杂谈话模式的系统研究。(1)他们假设中断谈话和“较慢地做出反应”都是人们控制谈话的手段。(2)将男人和女人之间的谈话与两个男人之间的谈话进行比较,两性间的谈话更经常地被打断,其情形几乎都是男性打断了女性的谈话。同一性别组的谈话会达到较好的平衡。少数同一性别组中人们谈话的中断,是由于谈话内容被分成了两部分,而不是某一个人或另外一个人所持的近乎专横的行为。对少数男人们打断谈话的研究结果表明,一名男性打断一群女性谈话的行为并非是对礼貌的无知。(3)这一发现与他们更早些时候对父母与孩子谈话的研究得出的结果非常相似。就像父母打断孩子们的谈话多于孩子们打断父母的谈话一样,男性比女性更经常地打断对方的谈话。<sup>②</sup>

第四,父权制的特征之一是男性拥有话语权,因此在现有话语中缺少女性表达事物的词汇,已有的话语很少能够包含两性的生活经验。中国一些地方曾出现过《女书》,即由女性创造出来的、表达生活经验的特殊方法,这或许是女性力争表达自己经验的一种尝试。

卡梅伦和她的学生们做了一项有趣的小练习。她要求她的学生们按照生理性别分成两组,分别列出表示男性生殖器的词。女性可以写出50个词,而男性可以举出144个词。而要是让他/她们回想或写出表示女性生殖器的词会有多少呢?只有在女同性恋文化而非异性恋文化中,才能找出那种对女性生殖器恣意纵情、挥霍用词的文化欣赏。在法国女权主义学者伊利格瑞(Irigaray)的眼中,“这种匮乏,不可避免地只能提供给女性少之又少的形象、图景或表现,可以用来表现自身。并不是因为她缺少某种‘主导能指’或者说并不是因为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能指强加在她身上……她确实借来了能指,但却不能在这些能指上

① 李猛:《布迪厄》,载杨善华主编:《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7—312页。

② (美)达维逊和果敦:《性别社会学》(程志民等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92—194页。

留下自身的标记,或者对它们重新进行标记”<sup>①</sup>。

有研究表明,女性在言谈中比男性更注意措辞和使用修饰性的词汇。作者在对女工做口述史访谈时发现,女性在叙述自己的生活或生活感受时,常常会用“好像”、“也许”这样的词,特别是当她们在叙述某种不满时,她们常常会说“好像我与别人不一样似的”,“好像这样不太公平”。而男性很少用这些模棱两可的词。为什么会这样?女性为什么会为自己的陈述设置障碍,要通过修饰词把陈述变得含糊呢?有研究认为,这是因为女性在语言方面有弱点,她们怕羞,并缺少自信。这里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她们为什么会在说话中表现出不自信呢?这是否意味着女性对那种要求女性表现出顺从、无知的习俗压力的一种反应,是一种积习的结果?

第五,被语言命名的性差异和性别秩序。后现代的法国哲学家露西·伊利格瑞对语言与性差异的理论分析在后现代的理论中造成广泛影响。她认为性差异不能被减缩成一个纯粹自然的和超语言的事实,它切入语言,也被语言所切入。她通过对法语的语法分析指出,性差异决定着由代词、所有格形容词、名词的性及它们在语法范畴中的分布所构成的系统。这样,性差异是处在自然与文化之间的。但是性秩序并没有随着社会进步而变化。在她看来,男人在有意或无意间给性别赋予了意义,他将自己的姓氏给予妻子、孩子,他将自己的性别给予了上帝。不仅如此,男人还在中立的面具下,将它给予宇宙法则,给予社会秩序,而男人从不质疑这一分配的谱系学。对于两性平等的目标而言,她认为,只要女性的类属、个性、差异不能被如其本身地界定出来,她们就可能仍然被排斥在语言之外,就不会创造出自己的身份。对女性言语个性的要求与说明,本质上是对女性公民权的要求。<sup>②</sup> 总之,从符号互动和后现代的理论出发,女性受到的压迫是一种以男性为中心的语言压迫。男人对语言的支配使女性陷入了男性“真理”中,她们被强行灌输了父权制意识形态。在这一意义上,男女平等是女性与男性共享话语权的努力,而不是简单地发展女性语言的问题。

## 二、现代大众传媒

现代社会,大众传媒成为话语表达的最基本的工具,并越来越普及,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例如,互联网的出现,使大众传媒成为人们社会互动的一种

<sup>①</sup> [英]布赖恩·特纳编:《社会理论指南》(李康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05—406页。

<sup>②</sup> [斯洛文尼亚]艾塞莫维茨:《露西·伊利格瑞:性差异的女性哲学》,《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第201—207页。



新形式。大众传媒具有话语的所有特点,特别是表现在权力关系的运作上。一方面,印刷、电视和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将报纸、杂志、电视、电影、网络等大众媒体演进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信息的发展使我们处在一个相互联系的时代,国际范围的信息往来使同步了解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成为可能。现代先进的传媒技术将视听融为一体,并且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大众传媒时时刻刻、无处不在地向人们传递信息,通过传媒,人们可以以最快的速度获取最新的资讯,可以身临其境般地感受异域风情,经历历史事件。对美国“9·11”事件、奥斯卡颁奖会的现场转播,使每个人都成为全球化的一部分,可以说,一个真正的大众传媒时代已经到来。

首先,大众传媒成为建构人们生活的重要因素,人们习惯了接受传媒发送的信息,离开传媒意味着与世隔绝。这决定了传媒对公众的强大影响力。大众传媒宣传的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建构人们日常生活方式的重要力量,作品与其受众之间构成默契的互动和感知,成为支配和反抗的场所。大众传媒,尤其是像电视这样的大众化传媒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生活的最基本的性质。电视不单单是把世界“展现”在我们面前,还日益界定我们实际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

其次,现代大众传媒成为人际互动的一种新形式。我们的生活既有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互动,在这种互动中,每个人利用很多线索去理解别人在说什么;同时,我们也会利用纸张信件、电子邮件、互联网等技术为中介来进行互动,这种互动的特点是跨越时空,超越了面对面式的互动范围。此外,大众传媒还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准互动的形式,这是一种“独白式”的互动方式,如电视节目等单向与人交流的方式,电视节目虽然是人拍摄的,并影响我们,但我们无法与其进行直接的交流。现实生活中,这三种互动方式共同存在。

再次,大众传媒作为一种准社会互动方式,涉及一系列的关系,如:是谁在说话,在说什么,受众的反应及其社会后果,这些都是社会性别分析要关注的基本问题。

大众传媒中是谁在说话呢?这是有关传媒工作者的研究,强调分析传媒工作者的性别构成和声音的表达。联合国对70个国家的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国家的传播学专业学生中,女性占50%以上,但是却没有一个国家的女性占传媒职位的50%以上,而是在30%以下。中国从事新闻工作的女性比例约为33%,进入高级决策层的女性为4.4%。<sup>①</sup>从声音的表达看,女性作为传媒工作者并不意味着她们可能和能够代表妇女的利益和声音,在男权社会中,传媒的

<sup>①</sup> 卜卫:《媒介与性别》,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主要内容依然是男权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主流话语一直是以男性声音为主,塑造了女性第二性的社会声音。

大众传媒的内容五花八门,但性别的叙述是其不可或缺的内容。以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电视连续剧《渴望》为例,该剧在全国上映时曾达到万人空巷的程度,收视率为97%。《渴望》产生如此轰动效应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该剧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平民女性——刘慧芳的形象,她的贤惠、忍让、自我牺牲与传统文化中的理想女性形象一致,符合当时社会的人们对女性气质回归的要求。从性别的角度看,大众传媒通常从父权制文化的角度对两性气质进行概括和归类,女性容易被定型为从属于男性的依附者、装饰品或性对象,男性则通常是社会上具有创造性的行动者,并在两性关系中处于主体地位。<sup>①</sup> 有女权主义学者认为,在男性文化霸权的社会里,整个传媒话语是男性中心话语,女性注定要遭到象征符号上的消解,并以被责难、被琐碎化或根本消失的方式呈现出来。妇女形象的理论(images-of-women approach)认为,传媒能够也应当影响现实,而不是强化有害的刻板印象。“妇女形象”的刻板印象是导致对女性控制的核心。因此,要对大众传媒中女性的负面形象进行反思,改进和加强大众传媒中女性的正面形象有助于推动社会变迁。

受众研究(audience studies)是分析大众传媒的接受者对传媒的需求以及对传媒的使用。传统受众研究主要分析受众的结构特征,如性别、年龄、阶层和种族等。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受众研究从结构主义转向文化意识形态的分析,力求解释文化与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现代受众研究认为,精英们通过文化来建构差异,意识形态并不是对现实进行不正确的相互联系,而是意识形态经由传媒在人们的现实经验与他们对经验的解释之间建立关联,由此人们接受了自身的命运。如阶级、性别的不平等被传媒解释为先天的差异,并使受众接受这些解释。

媒体与受众之间的关系是不均衡的关系,媒体掌握着支配文化象征符号的运作权力。几乎所有的传媒都是经济型组织,它们以盈利为最终目的,大众对完整、真实、及时、先进的信息的渴求并不能成为左右媒体决策的首要因素。对信息的控制权再加上盈利性质使得媒体所发送的信息变得很可疑。为了自身利益,媒体将充分利用手中的权力:一方面,人为地培育、创造新的意识和行为规范;另一方面,则迎合大众偏好再现甚至夸大某种传统的意识和行为规范。“传媒炒文化的负效应,使人们跟着影视的诱导和广告的诱惑去确立自身的行

<sup>①</sup> 卜卫:《媒介与性别》,第8页。

为方式,传媒的全能性介入中断了人的独处内省和人我之间的交谈。”<sup>①</sup> 调查显示,男性受众对于新闻类传播内容的接触和兴趣往往强于女性受众;女性受众对于文艺类传播内容(戏曲除外)的接触和兴趣强于男性受众。<sup>②</sup> 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种可能是新闻节目与妇女的生活经验关系甚微。有研究表明,在中国,新闻联播节目中与女性人物和女性题材有关的内容不足5%。

大众传媒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受众,是大众传媒效果研究的主要内容。社会性别研究关注大众传媒中的性别关系模式和性别气质模式是如何影响现实生活中的两性关系,关注色情和暴力文化产品的社会影响。对淫秽物品的研究表明,淫秽物品充斥着被扭曲的两性关系,女性经常被描述为屈从于男性性欲望的被动者,男性是性活动主动者,甚至把女性描述为是喜欢性暴力的,以至于导致两性性关系期望上的错位。20世纪80年代贾尼丝·拉德维(Janice Radway)对爱情小说的女性受众进行分析,考察了爱情小说可能具有的效果。她认为,女性在小说阅读中的收获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小说的内容多是对日常性别关系的再描述,并鼓励女性理解男性的热情、暴力和对爱情的失望;另一方面,对女性来说,阅读本身具有逃避现实的功能。爱情小说同样无法避免服务于不平等性别关系的需要,阅读无法使深陷于日常生活中的女性理解受压迫的状况,也根本不可能由此采取集体行动,其结果是女性更加关注男性。这样,爱情读物具有了政治意义。<sup>③</sup>

## 第二节 对中国大众传媒的性别分析

### 一、被叙述的性别气质:革命性话语与现代性话语

近现代社会,大众传媒越来越普及,大众传媒树立了许多著名的男性形象和女性形象。早在1935年阮玲玉自杀后,新闻媒体给予了广泛的报道,新女性的形象通过舆论被讨论和叙述。此后,中国的舆论塑造过各种类型的女性形象,如20世纪60年代的“铁姑娘”形象,80年代的“刘慧芳”形象等等。事实上,在对两性气质的叙述上,话语在潜移默化之下发生了本质改变。

1949年以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妇女的身份发生了巨大变化,那么妇

<sup>①</sup> 王岳川:《消费社会中的精神生态困境——博德里亚后现代消费社会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7月,第39卷,第4期。

<sup>②</sup> 宋小卫:《谈谈我国受众传媒接触与使用中的性别差异》,《新闻与传播研究》1995年第2期。

<sup>③</sup> Janice Radway, *Reading the Romance: Women, Patriarchy and Popular Literature*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4).

女的身份到底是什么呢？是为家庭做出重要贡献的主妇？还是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的生力军和“半边天”？这种身份一直被国家主流话语界定，可以称为“被叙述的性别身份”。回顾五十多年来社会主义中国的妇女身份有两次重要的转变。第一次是从传统父权制下的“受压迫”妇女身份向社会主义“劳动者”的身份转变，经由话语的作用，妇女从受压迫的边缘状况被推向社会主流。第二次是从社会主义劳动者的身份向多元化的身份转变，妇女社会角色开始多样化。但从叙述的逻辑看，是从革命性话语向现代性话语转变。女性身份在被国家叙述的同时，其性别气质也被塑造。与此同时，在界定女性气质的同时，男性气质也被叙述。

### （一）革命性话语

父权制下的“受压迫妇女”形象是把妇女叙述为在家中相夫教子，依从于男性家长权威的性别。1919年五四运动首先从思想领域对父权制的性别身份进行挑战，开始了新的性别身份的叙述，由此构成了将妇女解放与革命联系在一起的叙述，它强调革命的内容之一就是解放妇女。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民主改革，其中包括提倡男女平等，允许女子参政，废除封建陋习等等。1919年的五四运动，更是把“妇女走出家门”与妇女解放直接联系起来，并导致了一批知识女性的革命实践。

自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成功后，共产党广泛地控制大众传媒，从领导到各类检查制度，大众传媒传播着党的声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被奉为圭臬。马克思、恩格斯所强调的“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成为重要的口号。新女性被叙述为社会劳动者和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这种叙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把妇女受到过的压迫和剥削归属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压迫中国人民的一部分，由此妇女参加公共领域的劳动上升为摆脱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革命。第二，把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劳动叙述为“劳动人民翻身解放”的一部分，“劳动”是社会主义公民最基本的美德，因此妇女解放就是“女性”作为“劳动者”被引入社会经济领域。第三，以宣传相关法律、法规及各种制度规定强制性地推行国家意识。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颁布的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就郑重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此后是宣传《新婚姻法》，以生动的事例展示新婚姻法是如何把妇女从封建的、男权的婚姻关系中解放出来。1954年、1975年、1978年和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均载明，妇女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拥有同男

子一样的权利,后两部宪法还规定了男女同工同酬。第四,妇女就业知识建构最重要的技术性策略在于各类媒体对于“被束缚的”、“封建的”或“资产阶级妇女的生活方式”的批判,在“革命”与“落后”之间划分了界线。通过树立“反面教材”,各类传媒策略性地且有效地对妇女进行了革命动员。正如邓颖超所说,“对于阻碍妇女参加生产、政治、文化和各项社会活动的封建思想传统习俗的残余束缚有意识地继续消除之”。这种革命与不革命的边界划分和其声势浩大的宣传攻势,通过界定身份进行社会动员,其效率极大。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表态性的革命行动达到顶端。通过界定与标签,妇女自主地选择参与社会生产劳动。这种选择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明确表明要与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划清界限,要成为一个自立的劳动者。可以说,人们将妇女就业建构为与革命等同的同时,也想像了资产阶级太太们的生活方式,这种正反面形象的树立成为技术性操作的经典。第五,社会主义妇女劳动者的形象不断地在媒体上被符号化和公式化。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下,各种报纸、画报上的妇女形象是英姿飒爽的女战士、女纺织工、女劳模、女工会委员、女炼钢工人和女电工等,它直接提升了妇女就业的社会价值。

反映城市两性生活的电影《女理发师》广受欢迎,它塑造了一位企图控制妻子、阻止妻子参加工作的丈夫,这一形象代表了传统都市男人对“革命话语”的抵制,虽然这位丈夫是革命干部,但他依然希望妻子留在家里,尤其是不能从事服务于他人的工作。最后,影片以现代妻子成功地走出家门,成为一名为人民服务的理发师而结束。反映农村两性生活的电影《李双双》更是流传广泛,电影中的男主角代表了乡村男性对“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秩序的心理需求;同时,李双双这位新型的妇女队长,用一种独立的女性形象向传统家庭主妇们告别。这些银幕形象一方面展现新一代妇女独立和自强的形象;另一方面也通过树立和批判反面教材,重塑男性形象,鼓励男性平等地对待女性。这样一批新型的妇女形象陪伴了那一时代女性的成长,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一代女性“不愿做温室里的花朵”,更向往成为“风雨中的海燕”。

## (二) 现代性话语

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社会发展的逻辑也从追求革命转向追求现代化的富国强民之路。这一社会转型导致了社会利益群体的重组,两性的社会身份也被重新叙述,这种叙述充斥着现代性的话语。所谓的现代性叙述强调话语的参照系是“现代化”的各种理想,与现代性对应的概念不是革命与落后,而是传统性。现代性话语总是与工业化相关联,强调与工业发展相关的制度模式。现代性话语包括了一系列有关身份与契约、神圣与

世俗、社区与社会、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集体取向与个人取向等相应的概念。

妇女身份的现代性叙述总是围绕着“妇女是否应当回家”的主题展开，“提高效率”和“理性选择”的现代性叙述为这一讨论提供了合法化基础，个人主义替代了集体主义，理性替代了理想。

第一，妇女身份的现代性叙述漠视传统的革命性话语。1983年，在《上海经济》杂志上有人提出“妇女退居家庭”，因为妇女回家可以腾出名额安排一批身强力壮的待业人员，有利于企业提高经济效益。1983年12月27日，四川省妇女联合会在《四川日报》上撰文，发表了《妇女参加社会劳动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的文章，叙述妇女参与社会劳动的历史意义。1984年，上海《社会》杂志展开“二保一”的讨论，话题从妇女参加社会劳动转换到了“家庭内部分工”，公共领域的问题变成了私人领域的问题，妇女解放的话题转变成为“夫妻之间独立的人格关系”的话题。紧接着的是对“妇女阶段性就业”的讨论，立足点是家庭和睦与经由对育龄妇女的劳动置换安排更多的人就业。到2000年前后，针对一些部委有意将“阶段性就业”写进“十五规划”，全国妇女联合会动员了各种力量反对这一旨在迫使妇女回家的说辞。

第二，进入20世纪90年代，城市改革提上日程，妇女身份的现代性叙述被全面展示出来。减少妇女就业数量的知识叙述被清楚地建构在“现代化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之中，把“妇女的就业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相联系”。历史的进程被描绘成“在工业化的阶段，一般都是妇女走回家庭；到了后工业社会的阶段，家务劳动实现了社会化，妇女又开始普遍走出家庭。我国目前所处的是典型的工业化的阶段，一方面家务劳动还没有实现社会化，另一方面，又要求男人全心全意地在外工作，而不能像农耕时代那样劳动时间有很大的弹性。在这种情况下，妇女的普遍就业实际上是打乱了社会中的角色分工，结果是造成社会功能的紊乱以及其他的种种问题。因此，即使是从这个角度说，减少妇女就业的数量，使大部分妇女重新走回家庭，也是势在必行的”<sup>①</sup>。在追求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经济和提高效率的前提下，现代性话语获得了合法性。富国、强国的现代化出路只有不断提高经济效率，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则只能带来低效的逻辑关系合情合理地建构出来，而建构的主体是男性学术精英。由此，现代性话语成为社会主流。

第三，在现代性话语的效率主流中是否有女性的声音呢？比较而言，女性的声音是微弱的，但妇女就业知识的叙述同样向现代性逻辑转变。现代性的叙

<sup>①</sup> 孙立平：《重建性别角色关系》，《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6期。

述逻辑是以“个人主义”倾向替代革命性话语中的“集体主义”或“他人主义”倾向。这一现代性的知识叙述是建立在对革命性话语的批判基础上的。它批判了妇女就业等同于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革命性叙述的国家利益和国家霸权,强调了现代性框架下的妇女人权,即现代性对个体权利的尊重。妇女身份被叙述为“女人回家不回家(或说就业不就业)应当由她们自己决定,这是女性的基本人权之一”<sup>①</sup>。妇女作为选择主体的概念被提了出来。“部分妇女自愿选择回家”被叙述为“社会有了更多的选择空间,是对过去无可选择模式的突破”。妇女是选择的主体,而不是被选择的客体<sup>②</sup>。妇女回家与否变成了个人价值和生活方式的自主选择问题。与此同时,这一“个人权利与个人选择”的现代性叙述成为对抗主流效率话语的微弱武器。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现代性叙述在 90 年代中后期被广泛用于大众传媒,在对“全职太太”或“好女人”的塑造中,“个人的自主选择”成为堂而皇之的理由,获得了叙述的合法性。

第四,大众传媒积极地加入到新型妇女身份的建构中。配合现代性的效率话语,大众传媒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寻找好母亲”、“寻找好女人”、“寻找好妻子”的声音,体现了在效率理念下对性别分工的理想女性角色的追求。这一系列的“好”可以与革命性话语下塑造的“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形象有异曲同工的作用。在“个人主义”的现代性话语框架下,女人理想的生活方式更接近于人们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生活场景的想像。白领丽人成为大众媒体经久不衰的表现主题——她们年轻美丽,她们经济独立、敢作敢为,她们已不再是《人到中年》中不堪重负、没有自我生活的职业女性,她们有了选择的主动权。

第五,总结现代性话语中的效率与个人选择的种种叙述展现了大众媒体在叙述层面上的矛盾现象,使中国的传媒更早地体现了“后现代”特征。利奥塔尔在《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中指出,对元叙事的怀疑就是一种“后现代”,表现为在知识的建构中,一些最佳逻辑性叙述之间存在着种种矛盾,例如,典型的社会经济领域的矛盾就是:它既希望劳动更少,以便降低生产成本;又希望劳动更多,以便减轻社会对无业人口的负担。<sup>③</sup> 这样的矛盾叙述在当下层出不穷,知识精英与无名百姓们一样,在立场上矛盾百出、捉襟见肘。

无论是在革命性话语的时代还是现代性话语的时代,被叙述者——女性,并不是一个没有主体意识的被动群体。事实上,革命性话语为女性发展提供了

① 李银河:《“女人回家”问题之我见》,《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6期。

② 潭深:《谁是选择的主体》,《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6期。

③ [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第2—4页。

空间,妇女们利用这一机会获得了受教育和工作的权利,并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这些女性历史性地进入到现代性话语充斥的阶段,虽然她们的权力和声音还很微弱,但她们已经不可能再受人摆布,中国的女性已经历史性地属于社会建设中重要的力量。两种对妇女社会地位的叙述方式的差异在于建构知识的主体发生了变化,从国家意识形态向利益集团的意识形态变化;从单一的声音向多元的声音变化。如果说革命性话语代表了自上而下的来自国家力量对于女性身份和气质的塑造;那么“自主选择”的发言主体又是谁呢?它包括了自下而上的女性声音,也包括来自社会精英们的父权制意识形态的声音。

## 二、男性写作与女性写作

无论男女,都是叙述的主体与客体,他们叙述着并被叙述着。现代大众传媒使两性作者都有机会加入到性别气质的建构中。由此,两性作家的话语风格和叙述内容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话题。那么,男性或女性是如何书写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呢?他/她们的写作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呢?对此,文学批评界有广泛的讨论,表现为两种倾向:一方面,人们反思长期占据主流话语权的男性写作体现了怎样的意识形态以及对两性关系及女性气质的想像;另一方面,相对女性声音的长期沉默,女性写作被赋予了重要的社会意义。

有学者指出,中国男性写作存在两种情形:一是与儒家伦理观相关的“恋母神话”,二是将女性客体化,视女人为邪恶、危险的“厌女情结”<sup>①</sup>。在“恋母神话”当中,一方面,女性被叙述为“忘我”、“无我”地、整体地献身于男人。另一方面,男性也渴望从女性处拯救自我,向往从女人的性感中唤醒男人疲惫不堪的生命力。1969年,美国女权主义作家米利特的《性的政治》一书,对西方当代文学中有关“强权与支配”的意识进行了分析,批判了劳伦斯、米勒、梅勒等男作家的阳具崇拜心理,成为具有广泛影响的著作。

事实上,人类有文字的历史留下来的文字主要是男性的。所以稍许有两三位女性作家就会引起广泛的评论。如中国历史上的女词人李清照,就有许多学者对其进行分析。对女性写作的广泛关注,在西方主要源于女权主义运动,并与现代性叙述中对自我解放的关注相关联。对中国女性写作的广泛关注,主要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体现了现代性叙述对自我的关注。女作家残雪曾经明确指出:“我更愿意接受西方理论家和作家笔下的自

<sup>①</sup> 盛英:《女性批判:中国男作家的男权话语》,载荒林主编:《两性视野》,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8页。



我，他们把自我当成通向人类精神王国的通道。每一个人都以独特的自我通向精神世界。我认为，一个没有自我的平面人，是动物性的人。对自我挖掘越深，通道就越宽，世界才越大。”此时，残雪的自我并非简单的女性自我，而是对人性、自我精神的一种追问，是要“反思自己的世俗生活和肉体”<sup>①</sup>。有研究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女性写作发生了一次飞越，出现了多元文化的格局，女性的私人生活和个性化写作，挑战了传统的男权文明，展示了女性更大的心灵自由空间。依照女权主义的观点，要给女性的写作实践下定义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女性写作的实践永远不可能被理论化、被规范化，它力求超越男性中心的话语体系，它是从哲学理论统治之外的领域中产生的。有多少个女性，就会有多少种关于女性写作的自我解说和实际创作。所谓的女性写作就是由女性书写的，怀有自觉或自在的女性意识，反映了女性实际生存状况的作品<sup>②</sup>。

有学者指出，对女性写作的理解应从实践意义和文化立场来认识。所谓的实践意义在于，女性写作包含了多种可能性，具有无限的空间，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尝试。它把长期以来没有机会得到表达的女性的经验、视点、对生活的观察书写出来；它包含了某些传统男性写作不能达到的空间。而文化意义在于，女性写作是以女性的独特体验、独特视角去反观男权主义。它希冀在一系列对男性话语的颠覆、反抗过程中，赢得女性在历史中言说的权利，建立起平等的男女文化关系，进而建构女性主义自己的诗学规范。<sup>③</sup>

### 三、互联网时代的社会互动

互联网的出现正在改变我们生活的秩序和生活的图示。互联网用户生活在“网络空间”里，这是一个由全球计算机网络形成的互动空间。在这样的网络空间里，我们不再是“人”，而是出现在另一个人的电脑屏幕上的信息，人们可以虚拟地建立自己的身份。人们通过互联网以匿名的方式出现，人们无从知晓他/她是男人还是女人，他/她生活在世界的哪个角落。

我们正处于信息时代的开端，对互联网的认识还不充分。乐观的态度认为，互联网对人类互动有积极作用，它扩大和丰富了人们的社会网络关系，互联网的匿名性使人们更加平等。悲观的态度则认为，如果人们把越来越多的时间

<sup>①</sup> 荒林：《谁是我们的自我——残雪访谈》，载荒林主编：《两性视野》，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13页。

<sup>②</sup> 徐坤：《转型期的女性写作：理论与实践》，载孟宪范等主编：《转型社会中的中国妇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5页。

<sup>③</sup> 戴锦华：《女性主义是什么》，《北京青年报》1996年1月16日。

用于网络上的交流或处理日常工作,有可能会减少在现实世界里与他人交往的时间,它可能会产生社会隔离,损害人际关系。大量网站的出现为人类提供了更多的信息以及获得信息的便捷,但是这些网站的内容又是怎样的呢?我们常常看到,在那些专门的男人和女人的网站上,传统性别角色大行其道,传统观念借助现代工具得到了更细致的传播。

有学者从“情境中的社会性别”视角出发,讨论互联网中的两性。所谓“情境中的社会性别”包括两方面:第一,是指以他人或社会再现的那些不断复制和强化的社会性别的制度以及与之相应的性别信念系统;第二,是指特殊的行为发生的具体情境。在情境中,人们一方面被社会性别信念限制,另一方面又参与这些信念的保存和重新建构。如此一来,网络就是一个特殊的“情境”。这意味着作为与普通媒体一样的、承载着社会性别价值信念系统的网络与作为行为发生的具体情境或平台的网络是相互纠缠在一起的,在这个平台上,两性气质和两性关系不断被再造。由于网络具有的虚拟性、超越时空性和高选择性,使这一特殊情境中的社会互动具有了新的活力,它可以强化传统性别角色,也可以颠覆传统。

2004年1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调查显示,中国的互联网用户已达7950万人。其中,男性网民占60.4%,女性网民占39.6%。女性网民所占比例有快速增长,基本稳定在40%左右。男性网民占我国男性总人口的7.3%,女性网民占女性总人口的5.0%。<sup>①</sup>虽然比例还是较低的,但网络已经影响了两性生活。我们可以从人们的网络需求、网络评价和网络建构性别意义的角度对互联网进行性别分析。

从人们的网络需求看,有研究表明,上网满足了人们六种心理需求,依次为:一是实用需求;二是情趣需求;三是虚拟需求,即通过虚拟身份摆脱现实束缚;四是合群需求,即通过网络参与社会事务;五是展示需求;六是代偿需求,由网络来弥补现实生活中所受的压抑。这一研究表明,除了展示需求外,网民的性别与其上网需求没有什么关联,即男性比女性更看重在互联网上展示自我。<sup>②</sup>或者说,男性更需要在网上表达自我,结交朋友,发布个人观点和真心交流。

在网络上,性别固有的社会文化意义被网络用户进行了重新选择,这种选择表现为网上用户的性别角色互换,人们扮演虚拟的性别角色。深度访谈表

①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www.cnnic.net.cn,2004年。

② 杨宜音、王甘、陈午晴等:《性别认同与建构的心理空间:性别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的互联网》,载孟宪范等主编:《转型社会中的中国妇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1—162页。

明,在上网初期,两性网民都有以异性性别身份出现在网络社会交往场合的现象。其动机有几类:一类是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特别是女性,往往担心在网上的交往中受到攻击。另一类是为了体验突破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规定性,获得在性别社会文化意义之间出入自如的感受。还有一类是为了体验进行性别化装后的社会交往的新异性,以及捉弄他人、搞恶作剧的快感。<sup>①</sup>

对网络塑造性别气质的状况还有待进一步分析,但有几方面的内容特别值得关注。一是女性网站大量充斥的是美容瘦身、购物消费、家居育儿、情感时尚等内容。对女性的定位基本上是时尚的消费者和家庭的料理者,体现了社会对女性传统性别角色的期望。二是互联网能够虚拟到什么程度的问题。事实上,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方向是建立计算机与真实生活中的活动与人际关系越来越紧密的联系,性别、职业身份、阶级差异等真实世界中的身份依然存在于互联网中,人们可能依然会利用互联网发展其身份认同,并把这种身份带到各种社会关系之中。三是网络中的性别身份问题。无论它是真实还是虚拟,人们在网络中可以见到有关性的介绍,包括人们的自我描述,都显得比真实生活更单调、更理想化,更“高性别化”。原以为网络空间会使人们更少受到性别身份的限制,但它出现的可能会使性别身份更为单调,而不是更多元化。总之,网络作为一个高度开放的、动态的结构,为两性身份意义的拓展提供了可能,但其改变的程度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和分析。

## 小 结

人们所说的、所写的语言符号就是话语,话语是人们在互动中进行沟通的工具,用来呈现事实、表达意图,其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行动,表现出特定的社会关系和权力关系。在父权制文化中,女性是一个无声的或者沉默的群体,已有的语言系统很少包括且不能叙述女性的生活经验。对话语的分析,特别是对大众传媒叙述形式的分析,可以揭示出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是如何被叙述的,它参与社会对理想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期望。通过对中国1949年以来对女性社会位置的叙述分析,可以看到话语发生的变化,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女性的命运被叙述为是与中国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由此塑造了一代追求经济独立和社会地位的现代女性。在改革开放时期,现代性的话语塑造的是理性、效

<sup>①</sup> 杨宜音、陈午晴、徐冰:《中国网民的社会心理分析》,《Internet 网络世界》2000年第4期,第4—11页。

率和自强,个人选择空间被纳入市场体制中,女性群体迅速分化,一部分人成为经不起市场经济打击的社会弱势群体,另一部分人则在市场大潮中追求自我的成功与社会地位。同时出现了一批女性作家,她们使用现代性的话语直面自我,并对父权制的文化进行反思。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两性互动具有了新的形式,互联网的叙述方式和交往方式如何作用于性别气质将特别引人关注。

### ❖ 关键概念

社会互动 话语 文本互涉 大众传媒 象征互动理论  
情境中的社会性别 女性写作

### ❖ 思考题

1. 举出日常生活中的一组对话,并分析话语背后隐含的性别意义和反映出来的社会关系。
2. 简述话语的社会功能。
3. 用社会性别的观点对某个网站进行内容分析。

### ❖ 进一步阅读文献

卜卫:《媒介与性别》,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杨宜音、王甘、陈午晴等:《性别认同与建构的心理空间:性别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的互联网》,载孟宪范等主编:《转型社会中的中国妇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李玲:《中国现代文学的性别意识》,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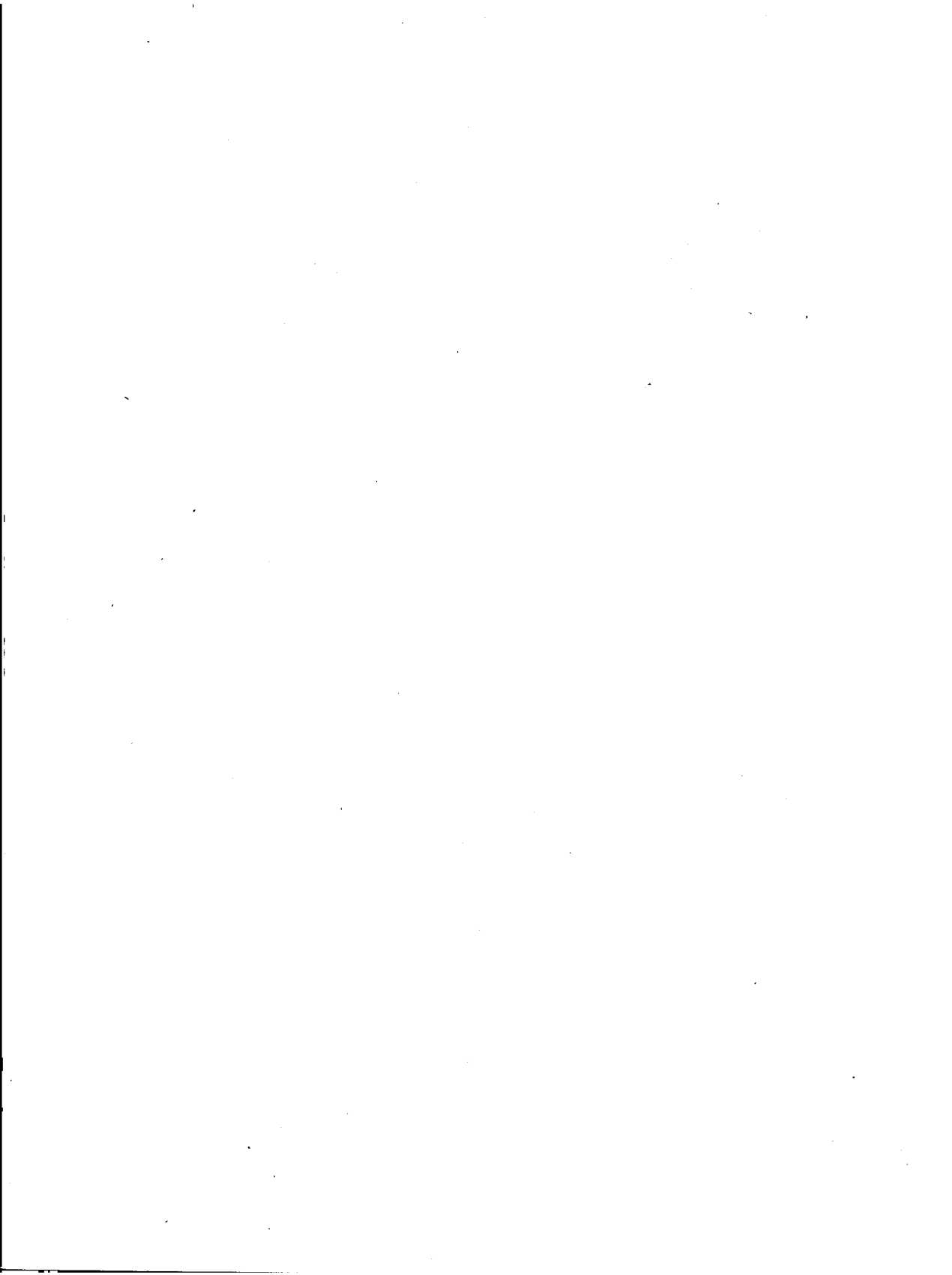
盛英:《女性批判:中国男作家的男权话语》,载荒林主编:《两性视野》,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

## 第二编

# 身体的政治

第二编重点讨论作用于两性不平等关系的重要机制之一——性和性关系。性对于性别研究来说,其重要性就像生产关系之于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本编将性关系视为作用于两性不平等关系的重要社会机制进行讨论,指出性关系并非是一个可以超脱历史文化和现实社会结构与制度的个人存在,它是在诸多的社会关系中个人实现的性权利。正是在性关系这样隐秘的私人关系中隐藏着男性统治女性的逻辑,表现为家庭暴力、熟人强奸和性骚扰等诸多问题,它揭示出在平静的日常生活之下,在各种亲密的关系中,权力无所不在。与此同时,社会经由婚姻和家庭,将社会宏观结构因素与个体的能动性相联结,经由家庭中妻子们的自觉选择,不断复制出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中的男性优先原则。

第六章分析作为社会化了的性关系如何通过社会制定的性行为的双重标准建立起不平等的性别秩序。第七章针对在私人领域发生的对妇女的各种暴力,如家庭暴力、熟人强奸和性骚扰问题,揭示在私人领域中的隐私并非是独立的个人事件,它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男性对女性身体的控制是人类社会最隐秘和最深刻的权力关系。第八章通过对婚姻家庭制度的讨论,分析家庭作为社会最基本的单位,如何使两性利益成为一个整体,并促成女性对男性优先原则的认可,达成了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中男性占据统治地位的不平等两性关系的再生产。





## 性关系中的性别秩序

### 引 子

米兰·昆德拉的小说《在路上》，不到一万字的篇幅讲述了两个情投意合的年轻人，在休息日一起上路，渴望通过一次浪漫的出游建立爱情关系。然而，从一上路起，各自怀有梦想的两个人就彼此猜想，并开始依照想像扮演起自以为对方会喜欢的角色。一个害羞的女孩，一心以为自己喜欢的人是个热爱风流女郎的男人，因此大着胆子扮演起一个路边的搭车女郎。这使男孩迷惑，他开始猜想这个自己一直以为是纯洁的女孩到底是个怎样的女人，她是不是真的十分风骚。在对对方的猜测与角色扮演中，展示了男女主人翁对异性角色、欲望和性想像上的错位和误读。身体语言的误读最终导致了男孩对女孩的粗暴占有。迷醉之后，双方都落入迷失了自我的悲惨境地。

她和他认识了一年，非常快乐，也许就是因为他绝不把她灵肉分离，她才能托付终生。这段日子确实相处得挺美满，但是姑娘也觉察到背后的隐忧。例如，她常常想到其他女人，那些女人更具魅力，风情万种，而小伙子公开承认他认识这类女人，没准哪天他会为了其中的一个弃她而去。（事实上，年轻人一再宣称他已经对那些女人讨厌透了，但她清楚他还远没有他自认为的那么成熟。）她想完全拥有他，而自己也完全委身于他，但她总

觉得,她越是要把一切奉献给他,就越是剥夺他一些东西,特别是逢场作戏或浅尝即止的爱情滋味。这使她烦恼,她不能把严肃认真和轻松愉快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

小伙子越来越对姑娘充当荡妇角色的出色表演感到恶心。他想,如果她扮荡妇这么出神入化,就意味着她可能本来即是这种货色。从言行举止上看来,根本不像是鬼魂附身。现在她的做派恰恰是她本来面目;也许是压抑太久,现在露出原形。也可能是借着游戏的机会自我否定。还有没有其他可能性呢?是不是她藉演戏来找回自我?是不是通过演戏才能自我释放呢?不。他否定了自己的推测,他的女朋友并没有鬼魂附身。她还是老样子,他的女朋友,不是其他人。他审视着她,越来越觉得恶心。

无论如何,已经不仅仅是厌恶了。姑娘越在心理方面离他而去,他越在生理方面对她渴望。那灵魂和肉体分离的姑娘判若两人。眼前这女人已经看不清往日那种爱心温顺、体贴,更谈不上感情。其实何止是看不清,简直无影无踪。(是的,似乎她已经完全消失了!)小伙子认为他今天才第一次看到女朋友的真实面目。

.....

这是一场难以理喻的游戏。其稀奇古怪有例为证,事实上,尽管小伙子正在极为出色地扮演着一个陌生的驾驶员,但他却无时无刻不在紧盯着作为搭车女郎的自己的女朋友。这可真够呛。他亲眼看着女朋友和陌生人打情骂俏,更切近地看到她正欺骗他时(在她已经欺骗他时,在她打算欺骗他时)的所言所行。

.....

现在他真的把她当成窑姐儿。可小伙子其实并未去嫖过,他仅有的关于窑姐儿的常识都是来自文学作品和道听途说。因此他转过这些念头,首先想到的就是一个女人穿着黑色紧身衣(和黑色长统袜)在光鉴照人的钢琴上跳舞的样子。在这寒酸旅馆的房间里没有钢琴,只有一张盖着直纹布的小桌子依墙而立。他命令姑娘爬上去。.....

上面几段文字,只是《在路上》这一小说里的一些情节。角色扮演式的游戏把人们带到不知何为真实的地步,并最终沿着人们刻板的性别印象演变成一场男性对女性的暴力。这使我们要思考:在个人的私生活领域,那些大众观念、意识形态和学习来的性想像是如何起作用的?是否真的存在公私领域的分割?



那些似乎难以在公众场合讨论的性话题,事实上却是极具吸引力、想像力和永恒的生活主题。现实生活中,两性之间对身体语言的误读实际上是一种性别不平等的方式,在本章,我们将思考与各种性关系相互联系的理念、规范、想像与文化如何作用于两性不平等社会地位。透过那些持久存在的两性交往规则,思考性关系所表达出来的社会结构、社会系统和社会制度,将社会行动者的微观行动与社会宏观诸因素联系起来。同时,思考改变不平等性关系的可能性与可能的方向。

## 第一节 性 关 系

### 一、身体的意识形态

有关身体的意识形态是说人们是如何看待身体的,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观念。在西方基督教传统和西方哲学传统中,身体与精神是相对立的。在二元思维的框架下,人们习惯于将自然/身体/欲望当作一极,把理性/技术/思想当作一极,两者相互对立,强调精神生活的重要性,将人的价值赋予理性与思想,而欲望/快感/身体是不可言说的。人类的思想历史就成为寻找理性光芒的历史,是为了社会稳定和秩序不断创造规范,将身体屈从于理性的历史。

18世纪末,有些学者开始关注与理性相对立的身体,在学术界,身体问题开始逐渐处于社会理论的重要位置。特别是福柯开始把身体置于政治的位置上。在哲学意义上,个体的完整意义指的是人在身体、意识、连续性、倾向和责任感上的存在。在社会学意义上,一方面,身体是生命有机体,是一种社会存在,是人们的日常认识和认同的关键,它屈从于出生、发育、衰弱和死亡的全过程;另一方面,身体是一个符号,是社会阐释的结果,它是实践世界“有意义的”物件。我们的身体是被话语建构出来的身体,它总是被叙述、被规定。但就社会文化的发展而言,我们经历着对身体的压抑,如减肥、禁欲,这些活动都表明人类力求通过意志控制身体的努力。

在二元对立思维下,人类的性行为常常被视为身体的范畴,要通过各种社会制度和规范来定义,由此,人类的性关系就不再是一件个人的事情。正是在此意义上,身体的政治概念被提出来,它强调的是人们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利是基本的人权。由于历史文化的作用;人的性权利最容易遭受非人道的对待。在许多文化中,自慰、同性恋等都被视为“兽行”,因此不配享受人道化的待遇。而在现代的人权概念下,人们拥有了对自己的身体和性的支配权利,这是一种政

治性的权利。

## 二、社会化了的性关系

**性关系**(sexuality),也有学者称其为性存在,并视之为社会构成而非单纯的生物现象来研究的分支学科。<sup>①</sup>本章将狭义的性交行为称为性行为;而将性关系定义为以性行为为基本指向的包括情感、性想像、性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内容。我们主要讨论的内容是广义的性关系,在这样的定义上,性关系就是一种社会互动的形式。任何社会都有一整套关于什么是好的性行为和不好的性行为的**标准**。这些标准主要有两类:一是与性目的相关联的,二是与性别相关联的。前者强调婚姻内的、以生殖为目的的性活动是合法的、好的性活动,而其他形式的性活动都是不健康的。后者是在第一规则下发生的,这一指向生殖的性活动更是约束女性的。对男性来说,许多社会默许了男性以愉悦为目的性活动,但对女性却是严格控制的。女性的性活动带有更为深重的罪恶感。

中国的孔子说,“食色,性也”,强调性行为和满足人的性需要是人类得以持续的必要条件。两性有不同的解剖学构造,人类的性行为具有生物学基础。生物学意义上的性行为是指向生殖的。生殖行为是动物的本能,生物学家对此有自己的一套看法。比如,为什么男人比女人乐于乱交?一种生物进化论的观点认为,生殖的本能使男性倾向于使尽可能多的女人怀孕,由此使其基因得到更多的机会繁衍。而女性倾向于有稳定的性伴侣,是因为她们承受着养育后代的要求,因此稳定的关系有利于保护下一代获得成长。这种观点通过对动物性活动的研究得到了证实,研究认为,在同类物种中,雄性一般都比雌性乐于乱交。但新近的研究对其最初的问题提出了质疑,即雄性真的比雌性乐于乱交吗?或雌性真的会保持稳定的性伴侣吗?对动物性活动的研究表明,动物界雌性的不忠行为相当普遍,雌性动物的性活动比人们设想的要复杂得多。人们一度相信,雌性总是与最可能为其提供优良遗传特征的雄性结成伴侣。但对雌鸟的一项新近研究驳斥了这个论点。研究发现,雌鸟另有一个不以遗传为目的配偶,但却可能是一个比较负责的家长,可以为抚养后代提供一块较好的家庭领地。<sup>②</sup>这些研究只是些尝试,对动物性活动的研究还很不够。更有批评认为,生物学研究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人类是有文化的,人类的性活动无法与其他动物进行比较。文化使人类的性行为具有了社会意义。

① 潘绥铭:《性社会学基本命题的实证》,《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6期。

② [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第四版),第157页。

人类性关系的功能在文化意义上获得了拓展,使性关系具有多种社会功能。第一,性活动是人类生殖和再生产所必需的活动。第二,性活动具有感官愉悦和心理愉悦。第三,人是感情动物,在性关系中赋予了丰富的情感意义。在现代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人们相信性活动是与浪漫爱情联系在一起的。但这些功能并不是独立的或分层次存在的,它们共同存在于人们的性关系中。

法国社会学家福柯区分了性行为(sex)和性关系的差别。他认为,性行为是身体行为,也是一个家庭事件,通过性行为,人类得以繁衍,因此,它是构成亲戚和姻亲关系的网络;这个关系网被用来传递家庭财产和家族的价值观念,在其中,我们呈现为特定主体——拥有名字和历史的主体。而性关系是一个个人事件,涉及我们的私人欲望、幻想和愉悦;同时,它也与话语及统治技术有关,针对性关系,人们制定并维护一些规则 and 标准;也是通过它,我们开始理解自己的性状态与社会规则之间的关系。性行为与性关系都是“真实”的,性行为对肉体产生作用,性关系对社会体系产生作用。两者都是文化的,因为性行为的表现方式由主流话语确立,而性关系是在特定的社会和历史环境中建构的。古今对比,性行为涉及的身体部位和动作的意义与规则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我们怎样进行性行为,在什么地方和谁发生性行为,人们怎么谈论它,都成为一种历史的现象。总之,性行为 and 性关系一起构成了一系列实践、行为、规则 and 知识体系,人们把自己制造成或被制造成伦理上的、社会意义上的 and 司法意义上的“有洞察力的主体”<sup>①</sup>。

可以说,人类社会化了的性关系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性是一种存在。性是人类本质的必要组成部分。无论我们是否从事性行为或进行性幻想,甚至那些因伤残丧失了性感受的人,同时也会经历性的存在与表达。人类对性行为和性关系的需要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也是人类得以延续的需要。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把人类的生物需求与社会需求结合在一起。他认为,人的需求可分为五个等级:一是生理需求;二是安全需求;三是归属和爱的需求;四是自尊的需求;五是自我实现的需求。不同层次的需求同时并存;不同的时期内,各种需求对行为的支配力量是不同的,支配力量最大的那种需求为优势需求。需求的层次越高就越具有可塑性。事实上,人的本能需求与社会需求常常混杂在一起,各种需求之间没有界限分明的区别。

第二,性关系是一种历史和文化的存在。在性关系中,人们以多种方式实

<sup>①</sup> [澳]丹纳赫、斯奇拉托、韦伯:《理解福柯》(刘瑾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55—157页。

现和表达他们的性,构成了人类性活动的符号化特色,这使性关系成为一种社会建构。这种文化符号的意义在于,人们力求通过性行为和性关系来知道我们是谁,以及我们正在体验的感情。因此,不能简单地通过动物的性活动特征来理解和解释人类的性活动,只有通过人类性活动的社会意义的理解才能了解发生在特定社会条件和历史条件下的人类性关系。作为一种历史存在的性关系,有关什么是正当的性行为、性唤起的模式,在不同的历史和文化中是不同的。例如,在许多文化中,女人的乳房是性器官,它的暴露程度直接与男性的性欲相关。可是在某些原始部落中,女人们一直裸露上身,裸露的乳房从来没有让部落中的男性有性冲动。

作为文化,性关系涉及身体怎么行动或应该怎么行动的各类知识,体现在各种社会关系之中。首先,性关系与欲望相关,包括什么使我们兴奋,这是一系列的性观念。其次,性关系与知识形态相关,包括人们应当怎么“从事”性行为、性行为的意义等,它与价值体系相关联。再次,性关系也与人类的恐惧相关,即个人以某种方式进行的性行为会冒什么样的风险。

第三,性关系是一种关系的存在。性关系并非简单地存在于一对一的个人情境中,它体现在人们行为的许多无意识方面,体现在我们对陌生人的行为做出的反应上。例如,男人注目于美丽的女人,人们可能觉得无可厚非。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男女的身体可以离得很近,但是在朋友聚会的场合,两性身体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些看起来似乎毫无意义的行动构成了日常生活中两性关系的基本状态。加德纳写的《路过:性别和当众骚扰》一书,列举了日常生活中一个走在街上的女人如何习以为常地受到一群男人的语言骚扰,这是一个很平常的、微观的两性互动的场景,这种研究似乎意义不大,但是研究者把这类互动延伸到社会性别等级秩序的社会大背景中,由此将微观描述与宏观分析结合起来。加德纳认为,男性对女性的骚扰与更大的社会性别不平等体系相关联,男性在公共场所的特权、女性在身体上的弱点以及潜在的强奸威胁都是构成男性当众骚扰女性的因素。这就使我们摆脱了对日常生活中互动规则的狭隘理解。<sup>①</sup>

第四,性关系是一种制度的存在。人类为了满足其繁衍的需要发展出一系列与人类性行为相关的制度安排。性规范可能是自有人类社会以来最为悠久的规范,它总是支持某些性行为并谴责另外一些性行为,规定出“好的性行为”

<sup>①</sup> Carol Brooks Gardner, *Passing By: Gender and Public Harassmen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与“坏的性行为”。如有关乱伦禁忌的规范。几乎所有社会都建立了婚姻和家庭制度,保护一夫一妻制的现代婚姻制度成为民法和婚姻法的主要内容。任何社会都有关于性行为的规范,规定哪些性行为是可取的,哪些行为是应当被惩罚的,它涉及一系列有关性活动的方式、规范、想像和价值等。社会成员通过社会化学习性规范。

第五,人类技术的进步也会从根本上改变人的性关系。现代避孕技术的产生历史性地改变了人类性活动的初衷,使性行为有可能与生殖活动毫无关系。

有学者用中国的调查数据说明了性是一个社会的存在,列举了五个基本命题。第一,个人的性欲强弱主要受到社会因素的作用;第二,性欲的实现也主要受到社会因素的作用;第三,性行为方式同样主要受到社会影响;第四,性高潮仍然主要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第五,性功能障碍其实主要是社会意义上的困难。<sup>①</sup> 总之,性行为 and 性关系绝不仅仅是生殖行为或体验快感的一种方式。相反,它与意义及权力紧密相关,它是一种知识形态,也是一种身体行为。它涉及个人与自己的关系,也涉及个人与他人的关系。

### 三、性活动状况

我们对性、对人类的性活动到底了解多少?这是个问题。人类性行为的方式是怎样的?性行为的活跃程度如何?这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是一片空白,没有明确的记录和研究。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美国学者金西(Alfred Kinsey)首先开始了他的人类性活动研究,这是人类首次对实际性活动进行量化研究。在面临宗教组织的谴责、报纸和国会的指责等压力下,金西坚持记录了18000个人(以美国白种人口为样本)的性生活史。由此对私人的、缺少文本记录的性活动进行了全面的统计调查。金西用实证主义的方法把各种不同的性行为为分门别类,列表说明,这种研究性活动的模式被称为“分类列表式”的金西模式。

金西报告令多数人感到震惊,其研究结果显示,当时流行的公众对性行为的期望与实际性行为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他发现,几乎70%的男人找过妓女,84%的男人有过婚前性经验。但有40%的男人期望他们的妻子在结婚时是处女。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时代,看来性自由时代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此后又有一些类似的研究。

1994年,一个研究小组发表了《性的社会组织:美国的性实践》一书,调查结果同样令人吃惊,调查结果表明,美国人的实际性活动是保守的。对配偶保持

<sup>①</sup> 潘绥铭:《性社会学基本命题的实证》,《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6期。

忠贞的现象相当普遍,仅有 10% 的女人和不到 25% 的男人承认有过一次婚外性经历。事实上,对性行为进行调查存在重重困难,很难说明上述资料具有多大可信度。可能是对艾滋病的恐惧导致了美国人约束自己的性活动,也可能是人们更倾向于隐藏自己的性活动。

在中国,古代的“性”与现代的“性”虽然是同一汉字,但却有一定的差别。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现代西方的性学概念进入中国,当时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危机时刻,许多学者将性行为和个人与民族的责任、义务、命运联系起来,强国保种、提高民族的健康水平成为人们讨论性教育及相关问题的基础。此时,有关性问题的讨论并没有将其与个人权利联系起来。1949 年以后,社会主义建设和意识形态将人权及性问题统统视为“资产阶级”的产物,使对性问题的讨论成为社会禁忌,并将与人权概念相关的性权利概念与资产阶级的性放纵混淆为“性自由”。改革开放后,随着西方自由与权利概念的进入,性研究领域内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有学者在 1997 年对全国所有正规高等院校的本科生进行了一次邮寄调查,调查显示,在大学生中有异性好友的占 74.6%,有过约会的占 59.8%,有恋人的占 47.1%,有过接吻的占 41.4%,有过性爱抚的占 26.7%,有过性交的占 10.1%。大学生跟所有的人一样,是循序渐进地开展异性交往的,交往的程度越深,能够达到的人也就越少。这不仅仅是因为我国的高等院校一般都禁止大学生发生性行为;也不仅仅是因为大学生们都很能自律;还因为男女大学生们虽然看起来像是朝夕相处,但是实际上能够找到意中人的并不那么多。但这也说明在大学生里,“谈性色变”的时代正在过去。<sup>①</sup>

本章并非要分析人们的性活动状况,而是要分析通过性关系呈现的性别秩序。

## 第二节 性关系与性别秩序

### 一、人类对性关系的认识

在人类历史上,性行为曾经是一件讳莫如深、不可言说的事情。20 世纪后,对于性行为和性关系的研究开始较为普遍地出现。特别是在性生物学实验、性心理分析与治疗、医学等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随着大规模的人类性行为调

<sup>①</sup> 潘绥铭、曾静:《中国当代大学生的性观念与性行为》,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第 112—113 页。

查,引发了社会对人类性行为的关注,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民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性解放运动以及对同性恋的关注共同推动人们对性关系理论的发展。社会性别研究不仅关注人类性活动本身,更关注两性的性驱力、两性的性压抑以及由于性活动而建立起来并不断延续的性活动中的性别关系秩序。回顾近百年来人们对性关系的认识,有以下几种不同的观点。

一是性的自然学说。这一观念认为,人类的性活动是自然力量,它先于社会生活而存在。因此,与性相关的事情都是个人领域的事,由人的荷尔蒙分泌的程度决定,它与历史和社会因素无关。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人类的性活动被视为生理功能。在这样一种观念下,人们定义与生殖相关的性行为是“自然的”,而与生殖无关的,特别是指向愉悦的性活动是“非自然的”,那些从事“非自然”性活动的人是有问题的人,应当予以治疗。

二是性禁欲学说。这一观念与宗教有紧密的联系,它强调性行为与生殖的紧密关系,一切非婚的、非生殖目的的性活动都是罪恶的,以愉悦为目的的性活动是危险的、具有破坏力的。因此,人们要限制性欲,精神的力量可以战胜肉体的欲望。在基督教文化中,性被视为肮脏的、见不得人的活动,公开谈论性被看作是下流的,只有为了生殖的性活动才被认为是可取的。

三是性压抑学说。这一观点受到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认为性驱力是人类一切行为的潜在动力源,“性”与“社会”不仅是分离的也是对立的。“性力”(力比多)是一种个人能量,植根于个人的生理结构中,社会通过各种秩序限制人们直接的性表达。人们只能将性力升华在工作中,没有很好地将性力转移的人可能会导致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

四是性的权力学说。这一学说的代表人物是法国社会理论家福柯,他通过性活动深入地理解权力关系。他的学术立场是从臣服者的角度观察权力,指出国家、法律、政策等经由性活动深入地控制个人的生活。其一,权力不仅存在于人们与国家的关系中,而且存在于所有的社会关系中,权力在整个社会中无处不在。权力不仅仅是精英型的、阶级结构型的、统治类型的,而是在其运作过程中各种力量之间的关系。因此,权力与社会关系类型是一致的。每个团体、每个人既行使权力又服从于权力。比如,在他看来,政治变化并不是某些内在理性的产物,而是各种力量在权力关系中对特殊问题分别做出反应,导致各种力量的冲突、平衡和合力。其二,权力自始至终都是某些人有目的地施加给他人的,并且绝大多数人都会在某个时间、某个背景下去这么做。个人是权力的载体,权力始终借助主体的行动或行动的能力,通过一套行动施加于另一些行动。其三,权力不是集中的,而是分散的或“毛细血管状的”。它们不是被宏观

控制的,而是由“微观物理”构成的。权力与知识的产物——人文科学和话语紧密联系。从启蒙运动至今,人文科学所进行的努力同时也创造出新的、更精致的和更有效的权力。福柯在《规则与惩罚》和《性史》等书中,分析了权力如何通过对他人的身体的控制,借助规则、规章和惩罚,从时间和空间来限定人们的行动。他认为,我们需要重新定义权力以及它的运作,权力不仅是通过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正式统治,而且还包括更加“微妙”或“柔和”的、更有控制力的、更深入和普遍的权力形式——通过复杂的知识使人具有权力关系。

福柯首先批判了性压抑说:他认为,性并不是以人们一向认为的方式受到压抑。其问题是,不是我们受到了压抑,而是为什么我们会认为我们受到了压抑,而且带有强烈的情绪,愤怒地诉说我们受到的压抑。在权力的概念下,他认为,性与权力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为言说本身就成为反抗压抑的行为,谈论性成为反抗压抑的英雄行为。由此构成了革命和快乐两个概念的结合,即通过以身体、快乐和技巧来反对权力的控制。福柯重视历史过程。在《性史》一书中,福柯描述了权力从否定变为肯定、从二元对立变为多样化的过程。性活动受到消极压抑的同时也有积极的刺激作用,权力对性有排斥的也有肯定的干预。压抑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绝不仅是禁止说、限制做这一种形式,还有鼓励言说的形式,以为获得了自由和解放的时候,正是被权力更牢固地控制起来、受到更深压抑的时候。他讨论了国家的作用,“在国家和个人之间,性成为一个话题,一个社会话题:它被话语的整个网络,被知识、分析和告诫的崭新形态所笼罩”。他还论述了性与真理和性话语等方面。

五是性的建构学说。这一观点认为,人类的性活动深受社会影响,人们的性取向、性行为的方式和性态度等都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在建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学者的眼中,性具有重要的政治学模式。一方面,性行为与其他社会行为一样,被组织在权力体系之中,这个体系奖赏和鼓励某些人和某些性行为,惩罚和压制另外某些人和某些性行为。另一方面,在两性关系中同样存在权力关系。由于性活动与生育密切相关,性活动成为政治控制中最简单、最直接、最容易的手段,控制了人的性活动就是控制了人的基本生活。

六是酷儿理论(queer theory)。目前,还很难界定酷儿理论的准确概念。这一理论第一个向异性恋和同性恋的二分法提出挑战,向社会所谓性活动的“常态”挑战,挑战异性恋制度和异性恋霸权。这一理论把批判的靶子指向婚内的异性恋关系,批评了以生殖为目的才是正常的、符合规范的性活动的说法。酷儿理论主张,对同性恋的研究不应当是对少数群体,如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和双性恋主体形成的研究,而应当是对那些知识和社会实践的研究,那些知识通过



对异性恋或同性恋的性化来组织整个社会,其中包括身体、欲望、行为、社会关系、知识、文化和社会制度。它强调身份的多重性具有的解放意义。

## 二、性别化的性关系

在人类对身体的控制过程中,人们不仅赋予身体以意义,而且赋予两性身体不同的意义,因此人们经验的性关系是性别化了的。文学作品中常常有这样的句子,“女孩子脸上的一抹羞红”。这句话是在说:女性的美与害羞联系在一起,它具有某种性联想,甚至可以引起男性的性冲动。而这样的句子很少用于对男性的描写。

女权主义的建构学说认为,性活动并不是一个自然活动,它建立在两性关系秩序的基础上。传统性观念使人们相信男性在性方面是活跃的,具有掠夺性的;女性是被动的、顺从的。这建构了性活动中的性别压迫模式,这种模式表现为男性话语定义了性行为的形式,在性活动中的女性不仅是被动的,而且被呈现为男人想要拥有的形象。当现代文明将性关系与浪漫爱情和家庭关系结合起来的时候,它就建构了两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等级位置。

与西方不同,中国传统文化中,性活动并非严格地被视为与精神相对立的活动,它强调天与地、阴与阳、夫与妻之间的自然秩序,在这种等级秩序中,严格规范女性的贞操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因为女性的性活动对阴阳相合的社会制度具有重要作用。性关系中的性别秩序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男女外生殖器的差异常常会在文化意义上转变成为一种政治秩序。布尔迪厄指出:“性器官的社会构造通过将男性生殖器勃起与一切自然生殖过程中固有的膨胀活力相联系,以象征形式记录和认可了某些不可辩驳的自然属性;因此,这种构造与其他机制一道有助于将社会规范的随意性转换为自然的必要性。……因此,性器官的社会定义远非直接付诸认识的自然属性的简单记录,而是以一系列定向选择为代价,或更确切地说,通过强调某些差异或盲目夸大某些相似性而得以确立的构造之产物。阴道作为倒挂的男性生殖器的形状是玛丽—普沙勒在中世纪的一个外科医生那里发现的,这种形状同样遵循肯定与否定、正面与反面之间的基本对立,自从男性原则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被提出之时,这些对立就通行了。”<sup>①</sup>因此,男女被视为相同生理状况的两个高低有别的变种,并由此可以有证据来分配给女性较低的社会地位。

第二,社会对两性的性活动采用了一套双重标准,性的意识形态在于强调

<sup>①</sup>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男性统治》,海天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5页。

欲望是男人的领域,贞操属于女人。更多地允许男性从事某些性活动,却严格限制女性从事这类性活动,例如婚外性活动。几乎所有社会都容忍了男性的婚外性活动,但却严格限制女性的婚外性活动,有违反者会被处以极刑。更有甚者,对于男性发生的婚外性活动,人们多以其花心、品行不太检点、经不住“她”的诱惑为由得到原谅;而当女性发生婚外性活动时,人们会异口同声地指责其道德品质低下、失了贞操。越是封建的社会越是把女性的性活动严格地限定在婚姻和生育范围内。

在双重标准基础上,社会发展出一整套特殊的价值标准和符号来要求女性的性行为。传统社会将女性品质分为两类:一是贞节,二是放纵。“贞节”是指一个女性对性诱惑有拒绝能力,“节女烈妇”是指女性的社会声誉取决于她们抵制性诱惑的能力。这种规范受到各种制度的保护。放纵的女人是放荡的、不道德的,将被抛向社会边缘。男性则不同,男性的社会声誉取决于他们所能达到的性征服的能力。因此,男人的性被允许是多样的,人们接受男性在婚前的性行为和婚后的性放纵,把它看作是无伤家庭制度的。

表 6-1 性行为在“传统”汉文化和“传统”基督教社会文化里的意义比较

文化意义 行为	功能	西方自然/ 文化二元说	婚姻 关系	社会 性别	道德属性	
					汉文化	基督教文化
性	人自身再生产	自然	婚内	男	道德	道德
				女	道德	
			婚外	男	并存	不道德
				女	不道德	
	愉悦	文化	婚内	男	并存	不道德
				女	并存	
婚外			男	并存	不道德	
			女	不道德		

从上表可以看出,基督教文化对性行为存在禁欲式限制,除了婚姻存续期间的以人的再生产为目的的性行为之外,其他任何性行为都不符合道德规范。相比之下,汉文化对性行为本身的规定稍微松一点,但是却有明显的性别差异和双重标准。男性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发生性行为都可能是无关道德的,而女性只要发生婚外性行为就会被看作是不道德的。

第三,人类的性活动是社会学习的结果,人们在对性角色、性行为方式学习的同时也学会了两性之间的相互影响方式和权力关系。男女在性别社会化方

面最基本的区别是：他们具有不同的学习本角色的生理与社交模式。社会化过程强化和再生产性活动的双重标准。在传统教育中，女性被教育成对性知识一无所知的人，鼓励女性克制、顺从、沉默、贞洁和忠实；而男性要表现男子气、力量和荣誉。一般来说，在两性成长过程中，两性的教育发展过程是相反的：在结婚之前，女孩在交际方面发展，男孩则在性行为的知识方面发展。事实上，这两种知识是两性都应当掌握的。女性角色很强调婚姻的重要性。用适当的方法拒绝性要求，是现实生活中女性的社交技能之一。在处女和贞洁被视为妻子的最高美德的传统社会时期，性知识对于未婚女性来说是无用的。对于性，女性最好保持无知、无欲、无为的状态——这是历史赋予女性在性关系中的形象。

1970年，美国女权主义学者凯特·米利特发表了一部重要的著作——《性的政治》(*Sexual Politics*)。她指出，尽管西方社会民主已经有所发展，但妇女仍然受到性别模式的系统压迫。在支配和服从的不平等关系中，社会性别的互动关系便是性政治。米利特从文学方面对性政治进行分析。她指出，第一，文学价值和文学常规已经由男人决定，因此妇女很可能以不适宜的形式表达她们关心的问题，例如，对于爱情的描写，性行动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第二，男性作家心目中的读者似乎永远是男人。她揭露了男性小说中那些令人难以忍受的性描写，在这些描写中，男性统治无处不在。

### 三、变化的性关系

在性关系领域，随着技术和观念的改变，两性关系正在发生变化。

首先，避孕方法和技术的发展以及人工流产的合法化，使性活动与生育分离。以愉悦为指向的性活动成为人生的重要部分。回顾人类历史，在安全的避孕药具产生以前，人类尝试过各种避孕的方法，但无论怎样都是以牺牲女性的健康为代价的。在缺乏避孕手段的条件下，女性沦为生育机器。回顾女性的生育史，女性不仅忍受着非自愿的生育，还冒着比率极高的死亡威胁，怀孕、生产以及产褥期的妇女死亡率在传统社会都非常高。现代社会具有历史意义的进步之一就是避孕药具的发明。国际人口会议指出，女性对自己生育能力的控制是她们享受其权利的重要基础。发达国家的妇女大多享有了基本的生育自由，能够获得避孕知识和工具，相对自主地决定生孩子的数量和时间间隔。而发展中国家的妇女常常由于贫穷而无法获得低廉的避孕药具，在决定生育时间和数量方面仍然缺少自主性。虽然避孕药具的普遍使用和人工流产的合法化增进了女性的自主性，但广大女性对于避孕药具和人工流产的使用主要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她们很少自觉地将这一行为与妇女解放联系在一起。

避孕药具的使用减少了女性非自愿生育的数量,但是非自愿的怀孕仍然是令广大妇女恐惧的事情。流产的合法化虽然进一步加大了女性自主生育的可能性,但流产导致的身体伤害却是难以估量的。当节育、避孕和人工流产为女性提供了更为有效的生育控制手段时,选择的困境构成了她们生活的核心。当社会可以公开地确定女性有自己的选择权时,选择权的实现导致了女性自身与习俗的冲突,被传统所赞美的女性的那种“自我牺牲”,使避孕是女性的责任这一观念不断在她们的意识中被强化。对是否接受人工流产的决定迫使女性在充满血腥和生死的黑暗中做出最艰难的选择。说到底,与生育相关的问题仍然是女性的问题,如果女性怀上了自己并不想要的孩子,男性会说那是你没有准备好;如果使用人工流产,不仅使女性受到身体上的损害,还要她们直接承担对另一个生命的抉择。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大大降低了妇女的生育率,从而使她们的生活方式和生命周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影响主要通过两方面得以实现,一是妇女生育数量减少,20世纪50年代,妇女总和生育率为5.84,60年代为5.68,70年代下降为4.01,到1990年人口普查时,平均每个妇女活产子女数为2.10,总和生育率为2.31。二是妇女平均生育年龄的逐渐下降,1970年,妇女平均生育年龄为39岁,1981年下降到34岁,即中国妇女在34岁就结束了生育旺盛期。<sup>①</sup>但应当看到,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女性付出了巨大代价,许多女性默默忍受着生育女孩带来的歧视,忍受着人工流产导致的身体伤害。

其次,有关性行为的双重标准正在变化,虽然性别气质仍起作用,但性权利概念成为建立两性平等性关系的重要思想基础。

性权利不仅意味着作为的权利,同时也意味着不作为的权利;既可以是接受的权利,也可以是拒绝的权利。只要是出于自觉自愿、自主自由的选择原则,拒绝某种性关系或享有某种性关系都属于性权利的范畴。1999年8月,在香港召开的第14届世界性学会(World Association for Sexuality)通过了《性权宣言》(Declaration of Sexual Rights),庄严宣称:“性权乃基本、普世之人权。……性,是每个人人格之不可分割的部分。”关于性权利包含的内容,目前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世界性学会的《性权宣言》列举了11项性权利:性自由权、性自治、性完整与性身体安全权、性隐私、性公平权、性表达权、性快乐权、性自由结合权、自由负责之生育选择权、以科学调查为基础的性信息权、全面性教育权、性保健权。性自由既包括个人表达其全部性潜力之可能性的自由,也包括排除生活中

<sup>①</sup> 朱楚珠等:《中国女性人口的社会经济概况》,《人口学刊》1985年第3期,第1—7页。

所有形式之性强迫、性剥削与性虐待的自由。

在性权利的概念下,女人们已经开始有获得性愉悦的要求和追求。这一变化对两性都具有重要意义。女性在性活动上的解放令许多男性难以接受,男性开始担心自己“做不好”。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指出:“在现代社会中,男人在大多数领域内继续处于支配地位,而且他们一般对女性都比女性对男性更具暴力性质。这类暴力多是将目标集中于控制女人和保持其从属地位上。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男性气质就像多数奖赏一样成了一种负担。许多男子的性行为都是冲动性的,目的并不是满足对方。如果男人打算停止利用性作为控制手段的话,那么不仅是女人就是男人自己也将获得这种满足感。”

再次,出现了许多具有挑战性的新热点,包括变性(transsexual)、易装(transvestism)和同性恋现象。

在20世纪80年代,变性手术是医学上的创举,但是它很快引起社会学家的极大兴趣。那些渴望做变性手术的人,在心理和生理上都认同于异性的性别,这直接挑战了生物性别的可能边界。易装多是指男性倾向于穿女性服装,但他们并不是同性恋或有变性渴望的人,19世纪末期,西方社会将这类人视为“有问题”、需要“治疗”的人。性别研究开创了从性别建构的角度对男易女装的反思。<sup>①</sup>艺术领域中出现的各类性别反串为性别研究提供了空间。同性恋对于社会变迁的意义还有待研究,但重要的是,同性恋打破了欲望与性别之间的必然联系。

## 小 结

本章分析了作为社会化了的性关系如何通过社会制定的性行为的双重标准建立起不平等的性别秩序。人类社会不存在纯粹意义上的生物性性行为,因为人类的任何行为和实践都被赋予了意义。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性行为本身,虽然有生理的原始欲望作为动力基础,但是它始终与对性关系的理解、性关系规则和性文化联系在一起,性关系的道德规范是性别化了的,对两性采取双重标准,如性道德对女性施加的压力远大于对男性的压力。社会要么贬低女性的性要求,要么将女性性关系置于强制的道德规范下;同时,社会却鼓励男性的性能力,对其在性行为上的越轨要宽容得多,性关系上的性别双重标准强化了不平等的性别秩序。性别社会化将女性教化成被动的、压抑的、服从

<sup>①</sup> D. Feinbloom, *Transvestites and Transsexuals*, 1975.

的弱者角色;将男性教化为主动的、进攻的、占有的强者角色。社会发展到现在,以前讳莫如深的性欲望、性快乐已经广为人们所接受,但性规范的双重标准依然存在。

### ❖ 关键概念

性关系 性权力 身体的政治 性观念 酷儿理论 性的双重标准

### ❖ 思考题

1. 试述福柯有关性行为和性关系的相互区别和联系。
2. 论述人类社会化了的性关系有哪些特点。
3. 简述有关性行为的主要观念。
4. 论述性关系中的性别秩序。

### ❖ 进一步阅读文献

- [英]布莱恩·特纳:《身体与社会》(马海良、赵国新译),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 [美]葛尔·罗宾等著:《酷儿理论——西方90年代性思潮》(李银河译),时事出版社2000年版。
- [美]托马斯·拉克尔:《身体与性属》(赵万鹏译),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男性统治》(刘晖译),海天出版社2002年版。

## 第七章

# 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

### 引 子

1997年11月25日,普通的打工女孩唐胜利(24岁,职业学校毕业)被不法之徒骗进“娱乐场所”,逼迫其充当“三陪小姐”,她与同伴试图越窗逃跑时,不慎从二楼失足跌落,严重摔伤导致终身残疾。事情发生后有多家报纸对此进行报道,成为当时一个重大的新闻事件。《中国青年报》、《北京晚报》、《人民日报》、《中国妇女报》、《人民公安报》、《法制日报》等十多家大报相继刊登了报道,所有报道的口径如出一辙,无一例外地将事件定性为“烈女抗暴”,有“尊严无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烈女抗暴、铁骨铮铮”等鲜明的标题。社会上不少人士为唐胜利捐款,在社会伸张正义的呼声下,逼良为娼的犯罪分子被判五年有期徒刑。

事情很快过去,人们早就遗忘了那个受伤的女孩。2001年,《中国妇女》杂志记者对唐胜利进行了追踪采访,证实唐胜利并没有拿生命与健康孤注一掷的主观动机,这只是她自救过程中的一个意外。访谈中,唐胜利谈到“不后悔……我想我若真是受辱了,那我肯定一死了之。”唐胜利的胞姐从旁自豪地补充说:“我们这样的家庭从小就是这种观念。”面对这一切,我们需要反思的是20世纪末的中国传媒如何大篇幅地鼓吹“节烈”与“誓死抗暴”的老调?女性的贞操与其生死之间是什么关系?当女性受到身体污辱后是否只有自杀一条路呢?

记者张晓君在题为《一次灵魂的探险》的附记中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我深知对烈女的采访意味着对贞操观念的质疑——这是穿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狭地的探险。……在旁人的眼里，每一个女人在此种时刻面临的是泾渭分明的两种抉择：含垢忍辱苟且偷生与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选择前者意味着没有人格和尊严；选择后者就是三贞九烈，足以垂范后世。

然而，我要问的是，媒体在对“人格尊严”进行高谈阔论之时，是否忽略了对一个女孩生命个体的关注？

.....

在采访中，面对一位年轻女孩用青春和鲜血换来的精神层面的“贞节牌坊”，自认为受过现代教育的我突然迷惑了：“贞节”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以至于让包括唐胜利、洪招娣、童书君在内的几十个女孩毅然就死？难道一时失身会比终身残疾或者失去生命更加可怕？<sup>①</sup>

唐胜利一再强调“真是受辱了，那我肯定一死了之”，如果她自杀了，谁应当替她的死负责呢？这使人想起鲁迅所说“吃人”的话，难道不是社会在杀人吗？本章将分析各种“针对妇女的暴力”，即发生在两性之间的男性通过暴力手段对女性身体的控制，包括熟人强奸、虐待妻子、拐卖妇女、工作场所的性骚扰等问题。1995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对许多难题无法达成共识，但在针对妇女暴力的问题上却取得了一个跨国界、跨文化的共识，那就是针对妇女的暴力是一种迫切的、国际性的紧急社会问题，应当摆在首位加以关注。

## 第一节 针对妇女的暴力

### 一、被害人学和女性被害人

#### (一) 犯罪与被害人学的产生

犯罪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从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对立和纠纷中产生的。没有被害人，就没有罪犯。作为事物的两个方面，研究常常忽略了被害的一方，缺少对被害人的研究。当一个人的正当权利或合法利益受到侵犯的时候，便成为被害人，对于被害人的研究构成了一门新的学科——被害人学。对女性被害人及专门针对女性的犯罪的研究构成了女性被害人学研究的主要内

<sup>①</sup> 参见匡文立：《女性用生命反抗性暴力的精神追踪——从打工妹跳楼事件谈女性“贞节观”》，王红旗主编：《中国女性在行动》，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



容。

“被害人学”(victimology)一词是1947年由以色列的律师门德尔松首先提出来的,是对被害人及其相关领域的研究。被害人有两层含义,从广义上看,那些遭受到来自本身事物以外的力量损害的人都是被害人,如各种自然灾害和社会灾害为人类带来的损害都为广义上的被害,其受损者皆为被害人。从狭义上看,被害人是指由于犯罪行为而受到物质、身体和精神损害的人。被害人学是研究被害人特征、受害人补偿、分析被害产生的原因和预防被害的科学。它重点分析被害人共同的人格特性、产生被害人的社会原因和个人原因以及发现这些原因后进行治疗的策略等问题,由此寻找预防被害的有效途径,以唤醒人们的警戒心,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减少被害的发生率和受害程度,帮助受害人恢复正常的生活。目前国际社会成立了被害人学研究会,世界上已有许多学者对此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被害人学的发展在司法实践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能够为立法提供有效的服务。司法部门通过对被害人的统计可以更为准确地了解社会的刑事犯罪率。

### (二) 女性被害人

被害人学的研究强调“特定被害人”,是指某些犯罪活动是针对特殊人群的。研究表明,容易成为犯罪被害人的有年幼者、老人和妇女,其次是精神上或身体上有疾病的弱者。在犯罪行为中,有一类专门是针对女性的犯罪,如强奸、虐妻和拐卖妇女。从被害人的总体结构看,被害男性的数量大于女性,但是从犯罪类型看,女性遭受施暴、人身伤害、性蹂躏、拐卖的比例则大大高于男性。对女性被害人研究的主要内容有:第一,研究女性被害人的被害性,即在犯罪发生的各种条件中属于被害人的各种条件的总和,它能够反映女性被害人容易被害的一些规律性特征,受害的强弱程度、受损失的大小。第二,研究女性被害人的可预防性。对被害的预防是指通过对被害人及其受害原因的研究,唤醒人们对各种侵害的警惕,教会人们如何预防被害。第三,研究女性被害人的补偿性。被害人的补偿性是指对被害人所受损害的赔偿。它可以通过国家赔偿、罪犯赔偿、犯罪行为伤害保险的赔偿以及出于团结友爱的原因由社会各界、个人自愿对受害者给予接济和帮助,特别是社会工作的发展,有专门对强奸、家庭暴力等女性受害人的社会支持服务研究。

### (三) 针对女性犯罪的特点

女性作为被害人的种种犯罪有些共同特点:第一,这些针对女性的犯罪活动总是或多或少地与“性”有关系;第二,针对女性的犯罪活动常常在所谓的“私人领域”发生,还有很强的隐蔽性,很难在社会公共领域中得到揭示和讨论。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西方社会对隐案和至今尚未破案的犯罪行为的研究资料显示,被害男性的人数比女性多3倍,但女性青少年遭受性蹂躏的人数比男性青少年多10倍。从1972年起,美国司法部开始进行全国受害者调查,每6个月进行一次,每年大约有6万个家庭,136000名12岁以上的公民接受调查。通过这项调查可以推算出社会刑事犯罪率和犯罪总数。这一统计数据与警方的资料相比可以看出,警察只知道少于50%的犯罪,仅知道少于25%的强奸犯罪。所谓隐案率是指被害人受到犯罪伤害后不报案的数量占该类犯罪行为的比率。上述数据表明,在美国至少会存在大约75%的强奸犯罪的隐案率,强奸犯罪的“隐案”大约是官方正式统计的4倍。<sup>①</sup>这意味着女性作为被害人并不愿意报案,因此至今我们也很难估算社会到底存在多少针对女性的犯罪。

## 二、针对妇女暴力的类型

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并不会随着西方社会物质生产水平的提高而自行消失。以美国为例,它是迄今未批准加入《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国家之一。根据《2002年美国的人权纪录》,美国妇女常常是犯罪和暴力的牺牲品。美国妇女最容易遭到谋杀,被谋杀的可能性高出其他西方国家5倍。美国平均每天有3名以上的妇女遭配偶或男友杀害;旧金山凶杀案的死亡女性中,家庭暴力是第1位死亡原因。每年向旧金山警察局报案的家庭暴力案件多达8000至9000宗。1999年一年,美国针对12岁以上妇女的暴力犯罪达3.3百万起。<sup>②</sup>1993年,联合国发表了《消除针对妇女的暴力宣言》,第一次对“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进行了定义:不论发生在公共场所或私人生活中的任何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其结果对女性造成身心、性行为上的伤害或痛苦。这些暴力行为包括强奸、性骚扰、拐卖妇女、强迫卖淫、婚姻暴力等等。

### (一) 强奸罪

从法律的角度看,强奸罪是指违背妇女意志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强行与妇女性交的行为。强奸罪体现了男性对女性的性暴力、侵犯、仇视、侮辱等一系列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它是男性通过暴力对女性肉体和精神的控制和摧残。它涉及了性关系中最深的本质,即男性通过身体的强力来控制女性。美国联邦

<sup>①</sup> [德]汉斯·约阿希姆·施奈德:《犯罪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30—690页。

<sup>②</sup> 李少春:《美国军队大量雇佣女兵的原因分析》,《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第54—58页。

调查局估计每 6 分钟就有一位女性被强奸,每 4 位女性中就有一个可能在某个时候遭到强奸。与此相似,几个调查表明,有 1/4—1/3 的女大学生和没有上大学的年轻女性曾遭到过强奸或强奸未遂。<sup>①</sup>

20 世纪 60 年代后,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展开,强奸才逐渐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20 世纪 80—90 年代的许多研究表明,最常见的强奸形式并非是那种被视为典型的由陌生人发起的强奸事件。传统上人们习惯地认为,被陌生人强奸才算强奸。1982 年,美国《妇女》杂志讨论了一个没有被注意过的强奸形式,被定义为“约会强奸”(date rape),即犯罪者和受害者彼此熟悉的强奸,它常常发生在约会过程中。接下来的研究表明,在强奸犯罪中 80% 以上的犯罪者是受害人的熟人,其中许多是临时的或稳定的约会伙伴。在约会强奸中,多数被受害人将这种情况看作是正常的,虽然自己反对发生性关系,但是这样的事情是无法说清楚的,别人也会认为这是她默认的。因此她们也很少报案。<sup>②</sup> 伴随着约会强奸的讨论,强奸的议题得到了社会更大程度的重视。

## (二) 婚姻暴力

婚姻暴力是指配偶之间的暴力关系,即一方受另外一方的暴力行为的控制。根据有关资料显示,婚姻暴力的主要受害者是女性。婚姻暴力是家庭暴力的一种。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行为,如父母与孩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以及夫妻之间的暴力行为。“虐妻”或“打老婆”特指丈夫施加给妻子的暴力行为,这些行为包括三方面的内容:身体的暴力、精神的暴力和性的暴力——婚内强奸。一般来说,人们将对身体的暴力视为家庭暴力,对精神暴力和性暴力有较多争论。在此把对家庭暴力的讨论定位在丈夫对妻子的暴力上,这样有利于进行分析。

婚姻暴力现象由来已久,但由于这一现象发生在家庭内部,被视为家务纠纷,远离公众的视野,不被公众了解,具有极强的隐蔽性。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妇女人权意识的普及,婚姻暴力现象才得到公众的关注。研究表明,妇女遭受的最大暴力威胁并非来自外界的抢劫、强奸等,而是来自家庭内部丈夫的伤害。家庭暴力是妇女受到伤害的最主要原因,而且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现象。<sup>③</sup> 家庭暴力影响世界上不同国籍、文化、宗教、种族和经济地位的女性生

<sup>①</sup> 参见[美]埃托奥·布里奇斯著:《女性心理学》(苏彦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51 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 251—252 页。

<sup>③</sup> 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编:《家庭暴力与法律援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 页。

活。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世界暴力与卫生报告》，在世界范围内对 48 个人群的调查中发现，10%—69% 的女性在她们的生活当中曾被其男性伴侣施以暴力。

首先，婚姻暴力现象具有普遍性。美国受到虐待的妻子人数超过了强奸、抢劫及车祸受害妇女的总和。据《洛杉矶时报》1995 年 12 月 27 日的文章报道，美国每年有 600 多万妇女被打，4000 名妇女被杀，每隔 18 秒就有一起家庭暴力事件发生，每 3 名妇女中就有一人身受其害，平均每年约有 2000—4000 名妇女被殴打致死。第二，婚姻暴力现象的表现形式多样，一般包括身体暴力、性暴力和精神暴力。第三，由于婚姻暴力现象主要发生在家庭内部，具有极高的隐蔽性，难以防备。受害者长期处于危险环境中，而受害人常常以消极、容忍的态度对待。同时，婚姻暴力现象的私人性和隐蔽性给统计工作带来很大困难。第四，婚姻暴力现象会反复发生，呈现循环性特征。

婚姻暴力的过程常常表现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紧张状态阶段。双方出现语言攻击和敌对状态，虐待者通过控制受害者接近家人、朋友、金钱等方式将其孤立和隔离。第二阶段为暴力实施阶段。夫妻双方的紧张和压抑状态爆发为丈夫对妻子的暴力攻击。第三阶段为亲密阶段。随着暴力的出现，施暴者的紧张情绪得到缓解，丈夫可能会表现出对妻子的内疚和后悔之意。反复攻击的施暴者常表现出深深的良心谴责、悔恨和不再有类似行为发生的誓言，受害者常满怀希望，认为施暴者会改变，但是绝大多数情况是，暴力会延续。

### （三）拐卖妇女

拐卖妇女现象是个历史的问题，是典型的将女性视为性商品的表现。被拐卖的妇女有两种命运，一是被拐卖去做妻子，二是被拐卖、被迫卖淫。在全球化的形式下，全球性贩卖妇女儿童案件呈上升趋势，成为继毒品和武器贩运之后，跨国犯罪集团的第三大收入来源。据有关资料显示，全球每年有超过一百万妇女和儿童被贩卖，而亚洲每年至少有 25 万。

有些国家存在“邮寄新娘”的情形，它主要是通过报纸刊登广告的方式，将发展中国家的年轻女性卖到需要她们的国家；或者是欧洲国家的报纸刊登广告，保证欧洲的男性交一定的费用就可以到泰国等地旅游，并有机会选择新娘。1993 年，办理邮寄新娘业务的机构遍布欧洲、澳大利亚、日本、美国。1989 年有 7759 名妇女通过邮寄新娘的方式离开菲律宾。1990 年，菲律宾颁布了一条新法律，宣布以邮购的形式把妇女配给外国人为妻以及其他类似的行为非法，包括用以促进这种行为的广告、出版物、印刷品和散发有关的小册子、传单和其他

宣传材料,违者将被处以罚款。<sup>①</sup>

#### (四) 性骚扰

性骚扰(sexual harassment)是外来词,20世纪60年代首先出现在美国。1975年,美国联邦法院第一次将性骚扰定义为“被迫和不受欢迎的与性有关的行为”,并将其作为一种“性歧视”加以禁止。它不仅与人们的性差异有关,还与其社会角色有关。不论性别、年龄、婚姻状况、长相或职业地位,都可能成为受害人。然而,女性由于在劳动力市场所处的弱势地位,较男性更容易受到骚扰。

1980年,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对性骚扰行为制定了专门的法规。美国已经有很多起因为性骚扰而获得赔偿的判例。例如,曾经有4名加利福尼亚妇女因为工作时遭遇到性骚扰提出赔偿要求,她们得到了220万美元的赔偿金。此外,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比利时、西班牙等国在法律中都明文规定性骚扰属于被禁止的非法行为。

### 三、反思针对妇女的暴力

性关系应当是两性亲密关系中重要的一部分,但是这其中却充满了暴力,令人不得其解。对此吉登斯指出:“男人对女人的性控制远不止是现代社会的偶然特征,当那种控制开始失效时,我们看到男性的性强制性更明显地表现出来。这种衰退的控制也产生了一种增长着的男性对待妇女的暴力潮流。此时,一种感情深渊出现在两性之间,人们无法确切地说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取得沟通。”<sup>②</sup>

针对各种对妇女的暴力需要更多的性别视角,应当对此做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法学和文化研究,揭示该问题广泛、持久存在的社会本质,分析那些针对妇女的暴力不被察觉和受到宽容的原因。以婚姻暴力来看,人们常常会认为,男性本身具有攻击性、男人喜欢酗酒、夫妻感情不和等,这不仅是表层原因,更是掩盖问题的说辞。我们要反思的是:文化对男性气质的建构中有哪些因素促成了男性的攻击性行为?而哪些因素促进了女性气质对男性暴力的容忍?针对妇女暴力的根源是社会性的、深层次的,其中至少有三种必不可少的制度建构,一是一以贯之的“男性统治”制造了“男性暴力文化”;二是双重标准的性道德;三是公私领域分化的身份关系将女性限定在私人领域,使公共领域中的

<sup>①</sup> [美]凯瑟琳·巴里:《被奴役的性》(晓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9、152页。

<sup>②</sup> [英]吉登斯:《亲密关系的变革——现代社会中的性、爱和爱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法律规范无法起作用。

### (一) 暴力——男性统治的方式

男性气质的建构表达了对男性的统治欲望、强悍等的强调,它是促成男性对女性暴力的重要因素。

表 7-1 跨文化研究中与性暴力有关的因素<sup>①</sup>

与高暴力程度有关的因素	与低暴力程度有关的因素
人际关系冲突的暴力解决方式	女性家外权力
男女两性间的经济不平等	社区对暴力的积极干预
以男性统治/强悍/光荣为男性气质理想	存在纯女性群体(工作或社交)
男性在家内的经济和决策权威	存在避难处(庇护所/朋友/家庭的帮助)

米利特在《性的政治》一书中谈到,针对女性的暴力既有公开的,也有隐秘的。父权制的暴力已被制度化,内在于法制实践和日常生活的实践中,导致了非法堕胎和持续不断的强奸发生的可能性。暴力这种永远存在的可能性是不平等权力关系得以维持的机制。

以民族间的争战为例,它总会出现以占有敌对民族的妇女作为征服对方民族象征的事件,于是争战中妇女受到异族摧残的情形也最为惨烈。例如,前南斯拉夫民族冲突中妇女遭受的残酷奸淫迫害。1947年印、巴分治,回教徒和锡克教徒的民族冲突中,落到敌对民族手中的妇女受到种种性折磨,身体、特别是性器官被切割残害,甚至乳房和阴部被纹刻上“印度万岁”、“巴基斯坦万岁”的口号等。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排华”浪潮中,华人妇女首当其冲遭到强奸以至被奸杀。为什么在民族争战中是女性的身体被如此的摧残呢?这就是父权制社会的性政治,女人是男性家长的、民族的私有财产,占有女人身体的符号意义在于对女人身体的摧残是胜利者的荣耀。有学者指出:“历史上种族、民族、部落间的冲突本质上都是男人之间的冲突,可是各民族的男人们,都不约而同地把妇女绑在战车的最前端。看待历史有多种角度,……但从性别角度看历史,全世界男人对全世界妇女犯下的累累罪行,却已积攒得比山更高,比海更深。男人禁锢女性的利器,不仅有屠刀,还有道德,女性受过异族的蹂躏之后,也自认为成了对不起父老兄弟、对不起丈夫儿子的罪人、肮脏之人,假如不选择贞节烈女式的死来取得赞誉,就只有在冰冷的同胞中忍辱偷生,得不到任何同情与关怀,更不用说补偿。……这是性别、民族双重迫害问题。”<sup>②</sup> 有学者明确

<sup>①</sup> 李银河:《性的问题》,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188页。

<sup>②</sup> 陆可光:《风潮下的暗流》,《读书》2001年第7期,第68—71页。

指出：“一个强奸犯能够与女性搭话，要求她注意，甚至进行身体侵犯，更大程度上仰仗的是他如何看待自己相对女性而言的社会位置，而不是所谓的体力上的优越感。他坚信自己比女性更有力量，并能用这种力量去强奸她——这种信念比公认的那种力量的事实更值得人们去研究，因为这种信念的效果往往造就一种男性权力，它成为强奸的缘由。”<sup>①</sup>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明确指出“男性特权也是一个陷阱而且它的对立面是永久的压力和紧张，这种压力和紧张是男人在一切场合展示其男子气概的义务强加给每个男人的，有时甚至发展至荒谬的地步。……男子气概既被理解为生殖的、性欲的和社会的权力，也被理解为斗争或施暴的才能，但男子气概首先是一种责任。……对男性价值的颂扬，其黑暗的对立面是女性特征引起的恐惧和焦虑。……因此，在不可能实现的男性气概的典型中很容易发现一种巨大的脆弱性原则。这种巨大的脆弱性，自相矛盾地导致人们有时疯狂地投入到男性的暴力活动中。”<sup>②</sup> 当男人要显示其男子气概时，暴力就不可避免了。

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性关系常常会以紧张的方式表现出来，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等一系列的变化会把一些男性淘汰下来，在效率原则下，阶级的差距更大，人们经历的焦虑和挫折感也更大，贫富差距拉大等，加剧了性别关系的紧张，这种紧张会以暴力的形式表现出来。通过对女性的控制来解除社会焦虑，用以宣泄社会压力，这种以强凌弱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政治学模式。在女权主义者看来，针对妇女的各种暴力，强奸、家庭暴力等是男性支配女性的一种主要形式。“男权制强权还在于男性能够诉诸一种性的成分特别明显，在强奸中体现得最为充分的暴力。男权制社会很独特地将残忍的情感与性欲联系起来，并往往将后者与邪恶和强力等同起来。”<sup>③</sup>

## （二）双重标准的性道德

没有任何一种犯罪的受害者会像强奸犯罪的受害者那样被打上“耻辱”的烙印，人们似乎相信那些受害者是有问题的女人。在美国得克萨斯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位遭受了强奸的妇女被警察拒之门外，警察的理由是她长得太性感了，足以让男人们激动不已，难以把持。<sup>④</sup> 种种社会偏见导致了“强奸受害者有罪论”的普遍存在。人们会认为“一个身体健康的女性完全有可能抵抗一个

① 莎伦·马库斯：《战斗的身体，战斗的文字：强奸防范的一种理论和政治》（朱荣杰译），《性别政治》，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43页。

② 同上书，第69—70页。

③ [美]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66—67页。

④ [美]丽菲：《情调：文明等级与性情趣味》（周静、程潜译），时代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81页。

强奸者”，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如果一个身体健康的女性被强奸那是她没有反抗的结果；或者“谁让她过于相信一个人！”或者“如果一个女孩不约束自己，与伴侣过分亲热，那么这个女孩子也应当为她的行为负责任”。一方面，人们相信只有陌生人之间的强迫性性行为才构成强奸；另一方面，人们又相信女性应当洁身自好，不要晚上去歌厅、不要穿得过于暴露、不要行为不检点等等，因此，一个强奸犯罪的受害人也就至少背上“随意的”、“不小心”等坏名声。

一项对国外大学的研究表明，有 27% 的男性同意“女性激发了强奸的发生”。当社会强调加强女性的防范意识时，其潜台词就是那些受害者没有足够的防范意识，受害人要为自己被强奸的事情负责任。事实上，强奸受害人可以是一切人，而不单单是某一类人；同样，罪犯也可以是一切人，而不是某类人。强奸犯罪是一种罪行，从来没有一项犯罪行为像强奸犯罪一样，受害者要承担如此之多的不名誉。不可理喻的是，强奸犯罪的受害人不仅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还要为犯罪者的行为负责！

男性统治通过两种机制创造了一种“强奸文化”，即纵容强奸犯罪的一种文化传统。首先，社会化使人们学习了强奸文化，例如各种媒体中的暴力、各种淫秽物品中的性暴力情景，与性暴力联系在一起的男性气质以及对男性征服欲望的歌颂。性别社会化使男人和女人在性期望上产生差距。这并不是因为两性在爱情关系上的观点不同，而是男性通过社会化学习，用与男性气质相关的征服逻辑看待性关系，性行为被男性看作是统治、强占，是“占有女性”的一种形式；女性接受的社会化和性规范是把性爱看作内心的经验和体会，强调感性。这使两性性关系模式变成主动的男性与被动的女性之间的对立。当这一状况被正常化、合法化时，男性对女性实施暴力就变得顺理成章了，甚至男性认定这是女性喜欢的方式。正是这种性社会化过程中的性别逻辑使熟人之间的强奸较为普遍，在熟人之间，强奸被看作是一时“冲动”的行为，而不是一种犯罪。美国女权主义学者麦金农(MacKinnon)曾在旧金山进行了一项以 930 位女性为对象的调查，有 44% 的女性在其一生中至少有一次成为强奸或未遂奸的受害人。38% 的少女受到有权力者或家庭成员的某种形式的性虐待或性侵犯。如果将性骚扰、性侵犯、性虐待、在街上被开下流玩笑、接到淫秽电话等都包括进来，只有 7.5% 的女性报告说从未有过此类经历。对此，麦金农指出，这是男权对女性的压迫。<sup>①</sup>

从性行为的双重标准看，父权制为两性设置了不同的性道德标准，许多女

① 转引自李银河：《性的问题》，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8—49 页。



性被害人在诉诸法律的过程中会受到二次伤害。所谓二次伤害是指以贞洁为内核的女性性道德观和不完善的案件审理程序,使得受害人诉诸法律的行为对其造成更多伤害,二次伤害可能比犯罪行为本身带来的伤害更深刻、更全面、更长久。在强奸案件中被害女性受到二次伤害的可能性最大。强奸犯罪的受害人在报案后往往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怀疑、指责和鄙视。女权主义的法学家们关注法律诉讼中的男性。在强奸案的审判中,诉讼程序把女性的控告置于严格的质疑之下,隐晦地将这种控告性感化,以此来终止女性原告的叙述。受害人成为男性眼光的客体,被迫重新体验自己的痛苦经历。<sup>①</sup>

### (三) 公私领域的社会建构

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有多种界定,杰夫·温特(Jeff Weinturb)做了一个概要性分类。一是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型,它视国家管理为公共领域,将市场经济视为私人领域。二是共和政体的道德模型,主要是以哈贝马斯理论为主的分类,公共领域主要是以社区共同体为主,私人领域主要以公民权利为主,强调国家自主性和市场经济下个人权利的区别。三是社会交往的模型,公共领域是集体决策与国家权力,私人领域是象征展现和自我叙述。四是女性主义的劳动分工模型,公共领域是指有酬劳动领域,家庭事务是私人领域。<sup>②</sup>

从女权主义的立场出发,私人领域的概念是指以家庭网络形成的人际关系,而公共领域是指由法律等国家力量干预的生活领域。面对针对妇女的暴力问题,法律的运用常常显得无能为力,各种可能适用法律解决的问题常常会被推向私人领域进行“私了”,这种公私领域的社会建构在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犯罪中产生了消极影响。以婚姻暴力为例,它主要发生在家庭这样的私人场所,不被人所知,受害妻子常常会以“家丑不可外扬”默默忍受丈夫的暴力。即使有人目睹了丈夫打妻子的事件发生,也会视其为“私人之事”,漠视暴力的发生。父权制鼓励了男性对女性身体的权利,妻子作为丈夫的私有财产,丈夫有权力管教妻子。父权制掩盖了丈夫对妻子暴力的性质,施行暴力的人不能得到法律制裁,也缺乏舆论谴责,文化默许、纵容和助长暴力发生。

在预防家庭暴力的目标上也有尖锐的争论,即防止家庭暴力的目标是什么?是为了家庭的和睦?还是为了维护遭受暴力的妇女权利?台湾的一些调查表明,台湾家庭暴力防治法中将家庭和谐置于立法目的的第一位,该法第一

<sup>①</sup> 参见[英]韦恩·莫里森:《法理学》(李桂林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十七章“解读女性主义法理学”,第519—523页。

<sup>②</sup> 转引自夏铸久:《(重)建构公共空间——理论的反省》,《台湾社会研究季刊》,1994年3月。

条是“为促进家庭和谐,防治家庭暴力行为及保护被害人权益,特制定本法”。这对司法实践产生了消极的影响。<sup>①</sup>

法律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手段常常是以原则性的规定体现权利关系,其结果是,当法律以公共权力的方法干预和调整私人领域的权利关系时,传统私人领域的规则会替代法律规则而起作用。以强奸犯罪为例,法律上规定强奸罪是指违背妇女意志,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强行与妇女性交的行为。“违背妇女意志”是强奸罪的本质特征,即性交是在妇女不愿意的情况下强行发生的。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是违背妇女意志的客观标志,但不是惟一表现。所谓胁迫手段是指犯罪分子对被害妇女进行威胁、恫吓,达到精神上控制的手段,如扬言行凶报复、欺骗、利用教养关系、从属关系、职权进行威胁、迫害等,迫使妇女忍辱屈从、不敢抗拒。有学者指出法律规定的权利与性别之间的矛盾。“因为法定权利只能将涉案的男女当作敌对双方。当然在很多情况下它也是适用的,但它排除了其他可能的关系元素。……在这种情况下,权利并不能赋权弱者。这提醒我们法定权利不能解决问题,这里的权利可能不是个人所要请求的权利,而且这个解决办法可能对已有的权力关系无所作为。”<sup>②</sup>与现代法律假设的个体相反,妇女总是生活在与他人的关系当中,社会的习俗和利益比那些法律条文更能够在女性生活中发挥作用。因此,我们必须从女性与他人的关系中界定其权利和正义。

公私两分法理论认为法律在妇女生活中缺席,因而未能保护妇女的正当权利,而未看到权利宣称本身忽略了妇女生活的特殊性,忽略了在相互关系、利益纠缠中,对立决不是个体间权利关系仅有的表现形式。事实上,公私领域的建构并没有界限,女性无论在家、在街头、在办公室、在酒吧都可能面临伤害。

## 第二节 中国反对针对妇女暴力的行动

### 一、建立健全法律

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已经成为国际性的议题。联合国通过了《消除对妇女的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简称为《消歧公约》),明确反对并积极干预基于性别的

<sup>①</sup> 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编:《家庭暴力与法律援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页。

<sup>②</sup> Carol Smart, *Feminism and the Power of Law*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p. 144.

种种歧视,成为联合国维护妇女权益方面的国际法律文件。中国在1979年就加入了该公约,成为这一最重要的妇女国际人权公约的最早缔约国之一。

1985年,第三次世界妇女大会制定了提高妇女地位的内罗毕前瞻性战略,突出强调了针对妇女的暴力问题,强调:第一,针对妇女的暴力具有普遍性和危害性。第二,应当给予受害妇女特别关注和综合性援助。第三,政府在预防暴力及帮助受害妇女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这份文件为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采取反暴力行动提供了初步的框架。1992年4月3日,我国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该法在总则中明确规定:“为了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促进男女平等,充分发挥妇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根据宪法和我国实际情况,制定本法。”就妇女享有的基本权利而言,法律强调的是男女平等,即“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同时还规定“国家保护妇女享有的特殊权益,逐步完善对妇女的社会保障制度。禁止歧视、虐待、残害妇女。”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通过的《行动纲领》规定各国政府应承担采取综合行动提高妇女地位的义务。1999年的三八妇女节,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召开了“给妇女一个没有暴力的世界”的全球电视会议。1999年11月25日被定为“国际消除对妇女的暴力日”。

按照中国刑法,有受害人的违法性行为一共有三项,第一项是强奸罪;第二项是奸淫幼女罪;第三项是猥亵、侮辱妇女罪。这三项罪行与一些西方国家关于有受害人的性行为的认定相似。美国一般将其定义为强奸罪、儿童性虐待罪和性骚扰罪。在奸淫幼女罪中规定了一个“自愿年龄线”,即儿童被法律认为有决定自己行为能力的年龄,低于这个年龄,即使儿童自己承认是自愿的行为,法律也不认为它是出于儿童的意愿,因为低于这一年龄线的儿童被法律认定尚无决定自己行为的能力。与低于自愿年龄线的少儿发生的性关系,无论当事人是否自愿,都被视为“奸淫”。各国的自愿年龄线不同,有的16岁,甚至21岁,我国是14岁。中国对强奸罪和奸淫幼女罪采取重判的态度,上至死刑,这是中国政府保护妇女、重视妇女权利的重要标志。

在中国的司法领域应当更多地纳入性别视角的法律分析,促进妇女组织和女性代表更多地参与到法律的建设中。

## 二、非政府组织的行动——反家庭暴力

“反家庭暴力”一词,大约是在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时才进入中国。但这并不意味着此前家庭暴力不存在,只说明它在中国是“不可

见”的。2000年,全国妇女地位调查表明,三成家庭存在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90%的受害人是女性。但这只是冰山一角。陕西省妇联2001年接待家庭暴力投诉114件,占婚姻家庭类投诉的19%。2002年1—6月份有150件,占婚姻家庭类投诉的36%,是2001年同期的5倍多。对2001年家庭暴力的类型调查显示:丈夫打骂妻子的占86%,父母打骂子女的占10%,子女虐待老人的占3%。在这264件家庭暴力的投诉中,导致重伤害的5人,约占2%,构成轻伤害的19人,约占8%。<sup>①</sup>目前,中国人对家庭暴力的认识基本上是强调身体暴力。有调查表明,对妻子视若无人、经济上限制妻子、向妻子说粗话、辱骂和羞辱妻子,不属于家庭暴力的范围。<sup>②</sup>新《婚姻法》将“反家庭暴力”一词正式写入法律,标志着中国反家庭暴力的社会行动进入到新的阶段,这一成绩是社会各方面努力的结果,其中非政府组织起到重要的作用。

#### (一) 白丝带运动

1991年,加拿大兴起白丝带运动。“白丝带”运动由以考夫曼为代表的一群加拿大男士发起,他们认为有责任敦促男性就对妇女的暴力出来发言,并决定以佩戴白丝带作为男性反对男性对妇女施行暴力的象征。经过6个星期的筹备之后,全加拿大有10万男性佩戴白丝带。佩戴白丝带意味着:作为个人,宣誓绝不施暴,面对对妇女的暴力不宽容、不沉默。1993年,加拿大实行了一项行之有效的政策:容忍度为零。只要是家庭暴力,无论轻重,一经发现,必须立案。公民有报案的义务,警察有权入室制止。

1999年,中国开始了白丝带活动,此项活动鼓励男性加入消除对妇女的暴力的行列中。2001年,中国已有8个省、市、自治区和20多个地方市出台了地方性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法规和政策性文件。新《婚姻法》也明确表明反对家庭暴力。2002年11月,中国民间自发组织的第一个反对家庭暴力的男性志愿小组正式宣告成立,并宣读了“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促进社会性别平等”的倡议书。他们倡议“决不参与对妇女施暴,决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保持缄默”。

#### (二) 反对家庭暴力网络

反对家庭暴力网络是在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项目(也简称为反家暴)”的一部分,它首先在北京,然后在全国建立起反对家庭暴力的网络,它的成员主要是从事反家庭暴力理论研究及实际工作的团体和个人组成的,一个组织松散的、非政府的、资源信息共享的网络组织。网络组织的活动目标在于开展

① 《华商报》2002年11月26日。

② 《中国妇女报》2000年10月12日。

对家庭暴力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建立国内外反家庭暴力干预的经验交流,提高公众反对家庭暴力的意识,推动国家和地方出台反对家庭暴力的立法,建立全社会干预家庭暴力的多机构合作模式,完善对受害妇女的社会救助机制,探讨对施暴者的教育、矫治模式。全国各地有妇联组织、公安部门、社区民警、医疗机构、高校研究机构、科研机构等一百多个网络单位,还有许多志愿者等网络个人成员。

### (三) 法律援助行动

法律援助制度也称为法律救助、法律扶助制度,是国家、非政府组织等为了保证法律赋予公民的各项权利在现实生活中切实得到实现,对需要采用法律救济手段捍卫自己的法定权利不受非法侵害,但又因经济困难无力支付诉讼费用和法律服务费用的当事人提供免费、减费法律服务或减免诉讼费用,以保障其合法权益得以实现的一项法律制度。1995年12月,北京大学法学院成立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面向全国妇女提供法律咨询,为经济贫困的女性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并进行有关妇女权益保护方面的理论研究。<sup>①</sup>一些非政府组织建立了一系列专门的法律援助机构和心理咨询机构,既无偿为受害妇女提供法律援助,还从事有关反对针对妇女暴力的法律宣传与心理咨询工作。

### (四) 《阴道的独白》在中国的上演和V日行动

《阴道的独白》(Vagina Monologues)是美国女剧作家伊芙·恩斯勒(Eve Ensler)的代表作,曾在1997年获得Obie Award奖,并被翻译成22种文字在世界各地的大小剧场上演。恩斯勒写这部剧作的冲动在于,她的女性朋友们谈起自己的性器官时的轻蔑态度令她大为震惊。她采访了200多名各种职业的女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所以她决定用整部的话剧来说出阴道。阴道被这样叙述:

当更多女性说出这个词时,说它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了;它就是融入我们的语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阴道就会变得完整、神圣、受人尊敬。阴道就真正成为了我们身体的一部分,与我们的思想相连,激发着我们的精神。这样,羞耻感就会离我们而去,暴力也因而停止,因为阴道是看得见的,是真实存在的;与之联系在一起的是有智慧、有魄力、有能力谈论阴道的女性们。

<sup>①</sup> 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编:《家庭暴力与法律援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在《阴道的独白》里有一幕专门谈到强奸。作者曾经专门去了克罗地亚和巴基斯坦,采访那些波斯尼亚的难民妇女。她了解到,1993年在中欧,七万妇女就有两万被强奸。她说:“他们侵犯了它,屠杀了它,烧毁了它。我再也不拜访它了。”<sup>①</sup>《阴道的独白》在国外的上演,促成了一个反对暴力的运动,即V日(V-day)运动。V日运动是在2月14日的情人节(Valentine's day)上演《阴道的独白》(Vagina意思是阴道),以此宣传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Violence),表明女性权利的胜利(Victory)。

2002年是中国反对家庭暴力年,《阴道的独白》也来到中国。这年的早春该剧在上海美国俱乐部上演,因为是英语演出,观众主要是外国人。这次演出是为了向中国《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对策与干预项目》捐款的义演,演员们表示,今年他们将在世界各地上演800场,既是为了反对针对妇女暴力的宣传,也是为了筹款<sup>②</sup>。近几年,中山大学比较文学系的研究生们,在艾晓明教授的指导下,在自己的课堂上上演了这部话剧。2004年12月18日,由艾晓明导演的这一话剧又在深圳物质生活书吧放映,导演和观众对话。2004年2月14日—3月13日北京举办了“V日艺术行动”,这次艺术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妇女儿童慈善艺术行动展览,唤起民众对妇女儿童问题的注意,反对家庭暴力,凝聚所有反抗暴力行为的力量。在这次“V日艺术行动”中演出了《阴道的独白》,用艺术手法表现反对家庭暴力的内容。同时中国美术馆还将“V日艺术行动”展览开幕当天的门票收入捐献给中国反家庭暴力的非政府组织。

### 三、政府组织的行动——打击拐卖妇女

政府是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的重要力量。中国政府曾在1991年、1993年和1995年分别进行过三次大规模的“打拐”行动。1998年,中国拐卖人口的立案数出现反弹。有资料表明,1996年至1999年,中国破获的拐卖人口案件有2.7万多起,解救被拐卖妇女30209人,儿童5914人。1999年有6800名妇女和1600多名儿童被报告失踪。犯罪活动日益向着组织化、集团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从80年代主要以卖给人做“媳妇”为主的拐卖妇女的犯罪活动,发展成为强迫妇女卖淫的拐卖妇女的犯罪活动。

1991年、1993年和1995年三次大规模“打拐”行动严厉打击了拐卖妇女儿童

<sup>①</sup> 参见吴莎、吴琳娜:《倾听阴道的声音》,王红旗主编:《中国女性在行动》,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第142—179页。

<sup>②</sup> 卜卫:《倾听“V”的独白》,荒林主编:《两性视野》,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107页。

童的犯罪分子,解救了一大批被拐卖人员。此后各地拐卖案件数据又有上升。2000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和全国妇联联合下发了《关于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开展专项“打拐”斗争,对这一犯罪依法严厉打击。2000年以来,中国公安机关建立了一整套高效、快速、准确的打击、解救被拐卖人员的日常工作机制,以减少和逐步根除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相关政府部门指出,中国目前正值大变革、大发展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中的消极因素,令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有所滋长,此外,法制观念淡薄,社会防范、管理工作存在漏洞,加上暴利的诱惑和刺激,使得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在全国呈发展蔓延之势。因而公安部将建立一整套责任落实、奖惩分明、能够调动广大民警积极性的新的长效运行机制,使公安机关能够及时发现和打击人贩子,解救妇女儿童。新的机制充分发挥了公安信息网络作用,随时掌握对人贩子、被拐卖妇女儿童的监控信息;对买主从严打击,铲除“买方市场”,使人贩子无利可图,从根本上消除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多发地区进行综合治理。

国家司法机关和相关组织一再提醒社会联合起来,共同防拐打拐。要做到:一是提高警惕,增强自我保护意识;二是提防以招工为诱饵的拐卖活动;三是不要轻信他人,尤其是“老乡”或“熟人”;四是不要吃、喝陌生人的食品、饮料,避免被迷昏后拐卖;五是注意看管好自己的小孩,不要让小孩离开亲人身边,更不能将小孩交给不认识的人看管;六是若发现被人拐骗或人身自由受限制时要镇静,并寻找机会向当地公安机关或拨打“110”报警。向公安机关或妇联写求救信时,请在信上写明你所在的市、县、管理区、村及买主的姓名和基本情况。

#### 四、相关问题的争论

在中国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行动已经取得很大的成绩,但也存在问题,重点表现在反婚内强奸、性骚扰等问题上。

##### (一) 有关强奸和婚内强奸问题

时至今日,中国仍然很难在公共领域展开大规模的对强奸问题的讨论,有许多相关议题需要讨论,这些相关议题包括:如何通过教育加强宣传;如何通过司法制度对强奸受害人进行补偿;如何建立强奸受害人的报案制度等。

首先是加强制度建设。以建立强奸受害人的报案制度为例,强奸受害人的及时报案和相关部门的及时立案是反强奸犯罪重要的一环,要建立相关的制度。这些制度应当包括:由专门的女干警向强奸受害人询问具体案情的制度;询问案情实行一次定格制度,避免反复询问细节而给受害人带来更大痛苦;在

实地取证过程中穿便服,从各个方面最大限度内保护受害人的隐私;在案件审理阶段由女律师和女法官来进行审理的制度。

第二,完善受害人的法律援助制度。例如强奸受害人的医学和心理学咨询。这种服务在西方社会已经发展得比较完善,2002年柏林地区有400家妇女庇护所和妇女之家,政府每年用在此项的费用达24亿美元。中国有以妇联为中心的维护妇女权益的工作网络和以司法部人民调解制度为基础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制度,这一工作网络遍布中国的各个城市和乡村,城市的各居民委员会和农村的各乡村都有专门的妇女工作委员会负责维护妇女的权利。

在学术界和法律界,有关家庭暴力引发的最大争论是“婚内强奸”问题,1990年河南省的《妇女生活》杂志开展了长达一年多的讨论,至今仍悬而未决。一种观点认为,婚内不存在强奸问题,因为配偶权的内容包括同居义务,这种义务是夫妻间的本质性,是婚姻关系得以维持的基本条件。同居义务的内容首先是性生活的义务,夫妻的性生活是配偶共同生活的基础,任何一方均有义务与对方性交,无正当理由而拒绝与对方性交,违反法定义务。<sup>①</sup>对此,有学者提出完全不同的观点。李楯认为,法律界主流把夫妻间性行为既说成是权利,又说成是义务是错误的。权利是一种自主选择行为方式的或能,而义务则是对必须为或不准为某种行为的要求。把一种行为既说成是权利又说成是义务,不仅在逻辑上讲不通,在实际上往往用“必须为”或“不准为”的强制要求去抵消根植于现代法律基本原则上的有关“选择可能”的许诺。<sup>②</sup>这里的矛盾在于,强奸是违背妇女意志、使用暴力或胁迫手段的性交行为,那么在婚姻内同样会存在丈夫以暴力或胁迫手段违背妻子意志进行的性交行为,难道这时妻子也要做到配偶的义务吗?但法律有自己的规则,目前中国还“不存在”婚内强奸。

## (二) 反对性骚扰

20世纪90年代性骚扰一词被介绍到中国,今天人们对这一词汇已是耳熟能详了,但这一问题还是没有被纳入到法律范畴。有中国学者根据中国文化将性骚扰定义为:相对的强势者针对相对的弱势者实施的,不以正常性欲关系为目的,导致弱势者反感或抗拒的性意涵行为。<sup>③</sup>但这并非是一个可以操作的法律概念。中国目前没有反性骚扰的法律规定。1997年在新刑法中“流氓罪”被取消,侮辱妇女罪被改列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中。诸如,追逐、

<sup>①</sup> 杨立:《人身权法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

<sup>②</sup> 李楯:《婚内强奸在中国:对个体权利与整体利益关系的法律社会学分析》,《反对家庭中对妇女的暴力:社会、伦理和法律问题专家研讨会》(未公开发行),1997年。

<sup>③</sup> 沈奕斐:《性骚扰概念的泛化、窄化及应对措施》,《妇女研究论丛》2004年第1期。



堵截妇女、在公共场所调戏妇女等行为可以被当作流氓罪处理。

2001年6月,西安市一位国有企业女职员向西安市莲湖区法院提起诉讼,指控其上司对她进行了性骚扰,侵犯了她的人身权利,要求上司对其赔礼道歉。这是中国第一次进入法律程序的“性骚扰”案件。法院在无相应法律条文规定的情况下,以《民法通则》的一些条款,如人身权利的伤害等来对这一案件进行审判。2001年12月22日,法院以缺乏证据为由驳回原告的起诉。这使得性骚扰问题无论是在行为界定上还是法律制裁上都困难重重。有学者对中国工作环境中出现性骚扰的特点进行研究,指出:第一,新兴的经济类型中的性骚扰较为突出。第二,管理规范化程度较低的企业容易发生性骚扰。第三,服务业是性骚扰高发的行业。在同一性别中,从农村流入当地的女民工比当地人更容易受到性骚扰,当地的小流氓“专拣打工妹欺负”<sup>①</sup>。也就是说,在性骚扰问题上存在着性别与权力的双重结构。性骚扰的发生往往是与特定的权力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包括职位高低、辈分大小、力量强弱等权力关系。性骚扰问题之所以成为隐性问题也在于权力施加的影响,拒绝和反抗意味着付出代价。如果说性暴力更多的是一种对身体伤害的话,那么性骚扰更多的是对当事人心灵的伤害,这会与当事人的心理感受能力和对性关系的观念等因素联系在一起。性骚扰与权力紧密相关,它存在的基础是“我可以……”,反映了骚扰者拥有权力而自觉拥有特权要求他人的付出。

## 小 结

本章分析了各种针对妇女的暴力的状况、产生的原因和可能采取的反暴力的行动。男性通过各种暴力手段对女性身体控制的暴力活动有强奸罪、婚姻暴力、拐卖妇女、工作场所的性骚扰等。这些针对妇女的暴力不仅给被害人造成巨大的身心伤害,更由于这些暴力活动具有不可见性,使犯罪活动不能得到公开的讨论和惩罚。针对妇女的暴力活动具有深刻的社会原因,父权制文化塑造的男性气质成为男性暴力的文化基础;双重标准的性道德使女性的权利无法得到伸张;公私领域分化的性别身份将女性限定在私人领域,使公共领域中的法律规范无法起作用。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是每个公民的责任,中国政府在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行动中起着主导作用,同时各类非政府组织也加入到了行动当中。

<sup>①</sup> 唐灿:《工作环境中的性骚扰及其控制措施》,《妇女研究论丛》2001年第5期。

## ❖ 关键概念

被害人 被害人学 隐案率 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约会强奸  
婚姻暴力 二次伤害 白丝带运动

## ❖ 思考题

1. 简述女性被害人研究的主要内容。
2. 试分析强奸案件隐案率高的原因,并就解决办法提出自己的观点。
3. 试分析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划分的几种界定。
4. 白丝带运动的宗旨是什么?对我们有什么启示?

## ❖ 进一步阅读文献

[英]安东尼·吉登斯:《亲密关系的变革——现代社会中的性、爱和爱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

[美]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1992 年 4 月 3 日,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通过。

李银河:《性的问题》,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9 年版。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男性统治》(刘晖译),海天出版社 2002 年版。

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编:《家庭暴力与法律援助》,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刘梦:《中国婚姻暴力》,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

周月清:《婚姻暴力——理论分析与社会工作处置》,台湾远流图书公司 1995 年版。



## 婚姻制度下的性别关系

### 引 子

翻阅今日的各种报纸和婚姻指南,常常能够看到各种指导妻子如何拴住老公的指南。在男权社会中,各种文化所传递的信息是:女人可以透过男性之爱获得幸福,通过爱情捕获一个好男人是女人的第一要义。对于男人则不然,男人通过获得女人的青睐证明自己的能力,男人更重要的是发展一番事业。2004年,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间热播了一部名为《中国式离婚》的电视连续剧。播放后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反响。它从日常生活层面反映了当代男女在婚姻、事业、爱情上走不出来的困境,人们似乎总在寻找自己在事业上、在家庭中的位置,但好像总是出错。明明是相爱的人,却是不断地相互伤害。真的是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而相互无法理解和沟通吗?有位男性朋友在网站上发表议论,表达了对女性的理解,他说:

中年的女人除了在思想和心态方面有很大压力外,还存在其自身性别差异的原因。我以为作为女人,尤其是21世纪的知识女性,其“夫贵妻荣”思想的存在是造成婚姻悲剧的原因之一。假如真正以“夫贵妻荣”为自己的生活目标的话,也许亦不会到达为了证明自己在丈夫心中的位置而近乎声嘶力竭直至快要发疯的地步,更不会使彼此的心都到了疲惫不堪的地

步。说实在话,我觉得剧中的林小枫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一个受过多年教育的知识女性她不可能完全地去放弃自我,真正做到以“夫贵妻荣”而怡然自得。既然无法做到,就不应该完全放弃自己的事业。当夫妻双方经济不能对等时,其自我又如何能做到对等?当在经济上过分地去依赖一个人时,在内心已经舍弃了自尊与自信的成本。可怜而可悲的林小枫那些无理取闹或恶毒的话语,不就是来源于她的不自信么?所以作为一个知识女性,在讲求自我、讲求平等的同时,自己首先应该在经济上独立。当拥有了经济的独立,拥有了自我之时,生活也会变得多姿多彩起来。犹如剧中离异后的肖莉,坚强是一方面,但独立与自我对她来说更是不可或缺的。

这说明,两性之间是可以理解的,他看到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两性之间和其自身皆对自我和他人有所期望,只是矛盾着的期望与行为选择导致人们身处困境。所谓的“夫贵妻荣”或“男主外、女主内”的中国古训为日常生活中的父亲和丈夫、母亲和妻子的身份命名,家庭非世外桃源,夫妻关系折射出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本章我们将分析爱情关系中的两性关系,分析影响夫妻之间平等相处的因素。

## 第一节 婚姻制度与性别关系

从人类文明的发展史看,人类总是制定了某种制度来规定两性关系以便实现人口的繁衍。从传统社会强调经济功能的婚姻到现代强调爱情功能的婚姻,人类社会赋予了性关系以特殊的制度内涵,本节将分析婚姻制度如何变迁,以及在这种变迁中妇女地位如何从从属男性的关系逐渐向平等关系演变。

### 一、婚姻制度和家庭制度

从人类历史进程看,人类的性关系制度经历了多种形式。史前社会主要以杂婚为主,旧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时代(公元前300万年—公元前1万年)主要是群婚,新石器时代(大约公元前1万年—公元前5000年)开始出现多偶婚,奴隶社会以来(公元前5000年—现代)出现了以一夫一妻制为主要形式的对偶婚<sup>①</sup>。性关系制度的演变与社会物质生产水平的发展相关,即使在多偶婚阶段,婚姻

<sup>①</sup> 高奇:《文明的进程》,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

形式也是复杂的。

婚姻制度是指规定男女两个成年人如何结合在一起的制度。它是限制两性性自由的制度,是为了保障安全的、稳定的、有利于生育的性关系的规则。无论是不成文的还是当代成文的婚姻制度,都规定了两性相结合生活在一起的经济关系和性关系的规则,既制定了婚姻内部夫妻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性关系,也确定了婚姻之外的亲属关系。传统婚姻制度主要依靠宗教或宗法以及禁忌的力量来约束婚姻,是一整套与性道德和经济道德联系在一起的文化规则。现代婚姻制度中虽然文化因素依然起作用,但主要是依靠法律来约束婚姻,各个国家都有相关的《婚姻法》来保护和约束婚姻内的人。

婚姻制度总和家庭制度联系在一起,常常被统称为婚姻家庭制度或家庭制度。家庭制度既规定了两性如何结合,还规定在婚姻关系和相关的亲属关系中如何安全、稳定、可持续的生育、抚育和养老。家庭是由亲属关系联结起来的一群人,家庭中的成年成员负责照料孩子,下一代抚养老一代。亲属制度规定了个体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可以通过婚姻形成,也可以通过连接血亲(母亲、父亲、同胞、子嗣等)的亲缘关系而确立。婚姻是两个成年个体之间为社会所承认与许可的性的结合。当两个人结婚时,他们彼此便成为对方的亲属。同时,婚姻纽带还把更大范围内的亲属连接起来,通过婚姻,父母、兄弟、姐妹以及其他血亲便成为配偶的亲戚。家庭关系总是在更宽泛的亲属制度的群体中得到确认的。

费孝通先生明确地指出,婚姻制度是“生育制度”的一部分。他说:“我们到处可以看见男女们互相结合成夫妇,生出孩子来,共同把孩子抚育成人。这一套活动我将称之为生育制度。……婚姻的意义,依我以上的说法,是在确立双系抚育。”<sup>①</sup>由此可以这样理解,婚姻制度主要是关于两性结合的制度,家庭制度是与婚姻制度相关的、亲属关系网络下以抚育下一代为主要任务的一种人类组织生活的方式。

家庭类型是多样的。几乎在所有的社会里,都能够识别出社会学家称之为核心家庭的群体组织:两个成年人与他们自己的或领养的孩子一起生活在一个居所中。当然还存在着各种扩大家庭,它可能包括了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称为直系家庭;还有可能有兄弟及其妻子等,称为联合家庭等。

<sup>①</sup>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9、129页。

## 二、爱情中的男女

现代人相信两性走向婚姻的圣坛需要有一个相识、相知、相爱的过程,只有因爱而结合的爱情才是好的婚姻。社会史学者们一致认为,前工业社会中的婚姻并不是简单的两个相爱男女的结合,而是家庭、家族或氏族间的结合。莎士比亚的名剧《罗密欧和朱丽叶》,告诉人们在传统秩序面前爱情只有走向死亡。因此传统社会的婚姻并没有个人选择的自由,以家庭或家族利益为基础的择偶与婚配是在一定的社会地位、财富、族群、宗教等标准限制下进行的,择偶——选择配偶的过程——表现为家庭、亲属和当地文化的制度安排。只是随着现代文明的出现,当个人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时,择偶、婚姻才与爱情发生关联。追求自由恋爱和自主婚姻也成为现代性的一部分。

### (一) 择偶

人们真的能够自由恋爱和自主婚姻吗?中国有句俗话说叫“门当户对”,这意味着人们在择偶时受到社会阶层、文化背景等因素的限制。即使是在现代社会,人们的择偶也不可能做到绝对自由,社会阶层和人们的成长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的择偶范围。多数情况下,人们是在本阶层内相对自由地选择配偶,由此“灰姑娘”的故事才能成为永久的童话。有学者将择偶原则进行分类:一是历史惯例论,是指历史上普遍存在过的由父母包办或由父母做主的择偶方式。二是性心理理论,以弗洛伊德的理论为基础,以满足生理需要为主的择偶方式。三是互补理论,是指以双方性格上的相辅相成为主要条件的择偶方式。四是价值理论或社会化理论,是指以人在社会化过程中接受的价值观成为个人择偶的依据。五是过程筛选论,是指择偶是一个过程,双方在互动过程中产生好感、相互了解和信赖,最终得以结合的择偶,双方互动的各个环节都很重要,不存在什么特别的决定性因素。<sup>①</sup>

美国社会学家默顿等人把择偶标准分为两大类,一是工具性的标准,包括经济、社会地位等标准;二是情感性的标准,包括感情和谐等因素。他们较早做的一项关于黑人与白人大学生的择偶标准的调查表明:第一,黑人比白人更重视工具性标准;第二,在情感性标准上没有种的区别;第三,男性黑人比男性白人更重视工具性标准;第四,人们对物质性标准的重视程度与社会经济地位

<sup>①</sup> B. I. Murstein, *Who Will Marry Whom? Theories and Research in Marital Choice* (New York, Spr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1976).

成反比,即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的人越重视物质性标准<sup>①</sup>。那么这种状况是否可以运用于男性和女性的择偶标准呢?作为社会经济地位比较低的女性来说是否更加倾向物质性标准呢?

有研究表明,男性比女性更强调外表。从男女所写的征婚或征友广告可以看出性别的彼此互补。女性更可能凭借自己的外表追求经济稳定性;男性更可能追求身体吸引力,包括具体的面部和身体特征。看中女性的外表对女性来说会带来很不幸的后果。它不仅会引起对身体的控制和节食,还会误导女性更重视外在特征而忽视了行为和成就。强调人不能控制的特点,而非那些可以实现的品质会降低自尊。<sup>②</sup>

择偶方式可能存在两种原则,一是优先次序原则,二是舍弃原则。所谓优先次序原则是指择偶时偏好于重视个人特质,如出身、学历、品行、容貌等,就是将自己认为最重要的品质作为择偶的标准。所谓舍弃原则是指在择偶时确定摈弃的条件,列出一定不考虑或最不愿接受的条件,除此以外都可以考虑接受。优先次序原则被视为一种积极的行动原则,在社会上处于较高地位、具有较多社会资源的人多倾向于积极的行动原则。舍弃原则是一种消极的行动原则,那些没有多少社会资源的人多倾向于消极的行动原则。女性是否会由于缺少资源更多地采用舍弃原则呢?对此需要更多的研究。

## (二) 爱情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句话表达了爱情与婚姻的内在紧张。以生育为取向的婚姻并没有为爱情预设保障,而是相反,婚内爱情的消失和婚外爱情的诱惑成为威胁婚姻的重要因素。“爱情是宗教消失后的宗教,所有信仰尽头的终极信仰。”<sup>③</sup>

事实上,以爱情为核心的两性关系的历史并不长久,以爱情为婚姻基础也是近现代的事情。传统社会,婚姻中几乎没有爱情的位置,只有在近现代社会中,爱情才获得了空前的位置,被当作人生最美好的事情加以歌颂,甚至出现了人们对爱情的迷恋。在这种意义上,爱情是现代神话,是现代性的一部分。

社会在建构性别气质的同时,也建构了两性对爱情的期望和信仰。回忆一

① W. Melton & D.L. Thomas, "Instrumental and Expressive Values in Mate Selection of Black and White College Student," *J.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Aug 1976.

② [美]埃托奥、布里奇斯著:《女性心理学》(苏彦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6—237页。

③ Ulrich Beck & Elisabeth Beck-Gernsheim:《爱情的正常性混乱》,台湾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21页。

下个人的成长历程,女孩们总会梦想英俊的白马王子,并被教导要学会温柔、体贴;男孩们梦想美丽善良的姑娘,被教导要做一个负责任的男性。被建构起来的爱情有着各种形式,但如果注意到其中的两性关系就会发现这样几个特点:第一,爱情对女性比对男性显得更重要。因为爱情是相对于事业而言,当男性被推向事业时,女性则被推向情感。对女性而言,爱情有特殊的文化含义。西蒙娜·波伏娃说过一段很精彩的话:“恋爱中的女人觉得自己拥有无可否认的高价值;她至少可以借着所激发的爱将自己偶像化。她为了能够让爱人目睹……她是神坛底部的神奇供品而狂喜。”<sup>①</sup> 爱情成了女性的宗教。对爱情的过分关注使女性的生活出现两种悖论:一是女性越是看重爱情,越希望通过爱情获得圆满和快乐,越是容易在现实生活中遭受情感的伤痛。二是对男性来说,爱情是其事业成功、地位有成的一部分;对于女人来说,看守住一位事业成功、地位有成的丈夫是她们生活的重要内容。两性的社会化过程中,女性领悟到爱情总是与她们对男性的顺从联系在一起,而男性的爱情则与他们为女性提供了什么样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因此,在社会意义上看,爱情带有极强的工具性。此时的悖论是:爱情可以成为女性受到关注、得到名声和自尊的工具;同时,为了获得所谓的关注、名声和自尊,女性又可以牺牲真正的爱情。在爱情的神话里,两性的相爱就像一场战争,永远会有“征服者与顺从者”。男人因他的男性魄力而“征服或赢得”女人;女人总是被男性的成功、社会地位所“征服”;女人则是因她们的美丽外表和顺从温柔赢得男人。

### (三) 亲密关系

亲密关系是指人与人之间以性关系为基础的相爱关系。现代生活中,有不少年轻人开始发生婚前性行为或开始同居生活,人们对亲密关系的渴望已经成为其现代生活的一部分,人们渴望通过与他人的关系,更好地发现自我和发展自我。现代亲密关系的理想状况是:打破传统的、以父权制为基础的、指向生育目标的夫妻不平等关系,建立平等的、和睦的、民主的、双方共同发展的关系。

理想的亲密关系是以民主为基础的,这与整个社会的民主化进程联系在一起,民主是现代社会的根本的理念和重要的意识形态。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女性解放运动自然地提出了性别平等问题。英国哲学家罗素说:“我们可以断定,妇女想要的是一个能给予两性自由的制度,而不是一个让女性去束缚男性的制度,尽管在过去,被束缚的从来只是女人。”<sup>②</sup> 妇女所要的权利是作为一个“人”

① [法]西蒙娜·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

② [英]罗素:《婚姻革命》,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



应该拥有的基本权利。妇女解放运动自然地指向性解放的主要原因在于：性压迫和性束缚是对妇女的压迫和束缚中核心的内容。

亲密关系是一种双重解放，当双方以平等方式对待他人并受到尊重时，新型的关系便打破了男尊女卑的传统关系模式，这种关系将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实现两性在社会上的平等。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详细论述过亲密关系与婚姻之间的关系，“婚姻越来越成为一种长久维系的亲密关系，以使情感在与另一人的亲密联系中获得满足。而某些似乎是基本的因素（比如孩子）就不再是关系的固定特征，反而可能在分离时成为‘惯性累赘’”<sup>①</sup>。可以说，现代婚姻关系本身发生了一些本质变化。第一，关系“纯粹化”或在关系动机中“情感或爱情”成为最基本的要素。第二，由于对“纯粹化”关系的追求，婚姻变得并非是惟一的选择，因此一些人开始选择独身，并把独身视为一种生活方式，这是另一种婚姻选择理性化的标志。选择独身的人常常认为婚姻是对自己的一种限制，独身比起婚姻来更有利可图。第三，更为普遍的趋势是晚婚。吉登斯区别传统的两性之爱与现代亲密关系的差别。现代两性亲密关系力求建立平等的、民主的和相互分享的两性关系，提高亲密关系和婚姻关系的质量和生活的价值，使个人获得完美的情感满足和温馨的生活空间。

吉登斯指出现代亲密关系不同于传统关系的主要特征。亲密关系要求：第一，优先发展自我，而不是为了“找个人去爱”；第二，逐步发展关系，以求得长时间的满足，不仅仅是当下的满足。第三，有选择自由，不是强迫对方做爱或献身。第四，关系具有平衡性和相互性，是和谐和协商的关系，分享需求和情感的关系，而不是通过权力的控制。第五，直接坦白，适度信任，接受彼此的个性，而不是缺乏信任、操纵，试图改变伴侣以适应自己的需要。第六，性源自于友谊和关爱，在给对方自由的同时，积极关注对方的幸福和成长，共同解决问题，舒适感和满足感循环出现；而不是回避不快之事，或激情与恐惧混杂，痛苦与失望循环出现。<sup>②</sup> 亲密关系是通过在私人领域建立起对平等和独立能力的尊敬，由此实现性别平等。

### 三、婚姻中的男女

从恋爱到结婚，每个人都希望婚姻家庭美满幸福。一项对 17 个工业化国

<sup>①</sup>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105 页。

<sup>②</sup> 参见〔英〕吉登斯：《亲密关系的变革——现代社会中的性、爱和爱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25 页。

家的研究表明,有14个国家的情况表明已婚男女比未婚男女更幸福,而且已婚个体更少体验到心理抑郁症状,总体上对生活更满意。其原因有三个。第一,人们可以从配偶身上获得情感支持。尽管女性提供的情感支持比她们得到的多。第二,已婚夫妻在经济上受益,一般情况下是有两份收入,他们联合起来对家庭负责任。第三,已婚个体的身体比未婚的更健康,因为夫妻双方通常能够彼此督促从事对健康有益的活动,身体健康反过来又提高了总体的幸福感。<sup>①</sup>

婚姻满意度是指夫妻对婚姻的满意感和幸福感,它是个体的心理感受。人们希望通过婚姻满意度来了解婚姻质量。所谓婚姻质量是“夫妻的感情生活、物质生活、余暇生活、性生活及其双方的凝聚力在某一时期的综合状况”,并以当事人的主观尺度,以夫妻调适方式和结果的事实来描述<sup>②</sup>。这意味着婚姻关系的好坏是在特定情境下的定义,个体的主观认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婚姻质量。研究认为,情感表达对婚姻满意度非常重要。向配偶公开个人的信息以及愿意表达对配偶的积极感受会使婚姻美满幸福。当丈夫表现出对彼此关系的理解时,妻子感到更幸福和满意,可能因为这表示了对她的关注和为美满婚姻做出努力的愿望。与社会对女性情感表达和关心他人感受的塑造相一致,女性比男性更多地维持家庭的情感交流。她们可能更多地思考婚姻互动的形式和关系。

传统社会,高质量的婚姻很少对男性提出要求,好妻子的标准是相夫教子、孝顺公婆。现代社会,夫妻共同工作,都有各自的事业,女性既是妻子,同时也像丈夫一样可能在事业上获得成功。夫妻间以爱情为基础的平等关系正成为现代高质量婚姻的追求目标。

离婚是婚姻的解体。传统社会,离婚是单方面的,男人由于种种原因休妻,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不生育。现代社会,离婚成为男女双方自主选择的结果。导致离婚的原因很多,有关系不协调、沟通有障碍、感情不忠实、虐待等等。同时,离婚也与社会变迁相关,经济压力和人际问题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会变得复杂,因此情绪化的行为会影响到夫妻关系的质量。

离婚后的女性比男性担起更大的情感和经济负担。许多女性离婚后家庭收入急剧下降,如果再抚养孩子,就有可能落入贫困家庭的行列。但是也应当看到,无论离婚会产生什么问题,它是解决夫妻关系中存在的冷战、高度冲突或

<sup>①</sup> 转引自〔美〕埃托奥·布里奇斯著:《女性心理学》(苏彦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0页。

<sup>②</sup> 徐安琪、叶文振:《中国婚姻质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侮辱、虐待等问题的一种积极方式。有研究表明,离婚女性并不比处在严重冲突婚姻中的女性更难过。尽管开始会体验到抑郁和痛苦,在离婚两年后女性要比她们婚姻的最后一年过得幸福。她们可能会获得更强的独立和自由感,迎接没有配偶的生活挑战的能力和担当单身母亲的能力会产生新的自信。尽管她们会感到痛苦,但和那些从未结过婚的女性相比,她们会有更高的生活满意度。同时工作可以有效地帮助女性应付离婚带来的问题,提高自尊和降低对痛苦的感受。<sup>①</sup>

## 第二节 中国的婚姻制度

认识中国社会的两性关系秩序必须要理解中国的婚姻家庭制度。一方面,中国社会以家庭为中心来组织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在这一理念下,中国社会的组织对“人”是视而不见的,它是以家庭来组织的。另一方面,以父权制为中心的封建“君臣、父子、夫妻”的等级秩序文化导致了家庭内部男性优先的性别等级秩序,并将这一秩序从家庭引向社会。1949年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革命,以及1979年以后的中国式的市场社会主义冲击了传统家庭制度,引发了中国多元的婚姻家庭制度的出现,在这一过程中,男性与女性作为个体而存在,其权利与义务关系也日渐明显。

### 一、传统婚姻制度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家庭一直都被视为社会的最小组成单位。家国同构是儒家文化在政治上的核心观点,家庭制度是社会制度的核心部分,男性家长权力是最高统治权力。即使历史发展到今天,家庭依然被看作是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基本单元。人类学家许烺光指出:

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以家庭为基础,家庭中成员关系是以父与子的关系为“主轴”,其他种种关系也都以这一主轴为中心。父子的关系不但发生于家庭之中,而且扩及于宗族,乃至国家。中国古代的君臣关系,实是父子关系的投射。由于中国社会的背景所孕育,中国人的性格因素首先是服从权威和长子上(父子关系的扩大)。<sup>②</sup>

<sup>①</sup> 转引自(美)埃托奥·布里奇斯著:《女性心理学》(苏彦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4页。

<sup>②</sup> 转引自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页。

封建社会,家庭之于国家是至关重要的,为了巩固婚姻家庭制度社会建立了一整套以男性利益为中心的生活规则,包括父系继嗣、包办婚姻、从夫居、从父姓、生育中的男性偏好等等。

所谓的父系继嗣,是指封建宗法制度规定只有儿子有权享有对本家庭、家族的政治地位、经济财产的继承权,例如世袭官爵、继承财产等等。在封建社会里,人们认为女孩将要嫁到别人家里去,因而不被当作是父亲家的人,不会被记入父亲家的族谱,更没有继承家产的权力。“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是传统社会“约定俗成”的择偶方式。在这种婚姻下,男女青年都没有选择配偶的权利,只有服从于家庭或家族的需要。在“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观念下,男性家长在家庭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们为了家庭和家族的利益,在“门当户对”的条件下为自己的儿女决定终身大事。从夫居是指女方嫁到男方的规则,男女结婚之时并不另立新家,而是由男方家长将女方娶进家门。虽然存在“倒插门”的夫入娘家的情形,但在这种情况下,入赘女婿的社会地位很低。对于女性来说,从夫居意味着自结婚之日起她要离开娘家,脱离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进入到夫家的生活环境中。同时,只有丈夫有休弃妻子的权利。丈夫休妻,无须征得女方同意,只需写一纸“休书”即可将妻子驱之于门外。《大戴礼记·本命》有言“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盗窃去”。社会也制定出保护婚姻中妇女的规则,其前提是保障封建的家庭关系。禁止丈夫休妻的理由是“三不出”:妻子同守三年丧;娶妻时丈夫家贫贱,结婚后富贵;妻子无可归之处;在这三种情况下不能休妻。从父姓是指夫妻生育孩子后,出生的孩子取夫姓。生育中的男性偏好是指强调婚姻的生育功能。传宗接代是结婚的主要目标,生养男孩具有重要意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意味着亲子关系优于夫妻关系。如果一位女性不能替丈夫生育男孩,有义务为丈夫另娶妻子,完成生育男孩的义务,这样的女性是有“德”性的人。

## 二、从中国的《婚姻法》看两性关系

《婚姻法》是以法律的方式调整两性在婚姻中的权利和义务关系。通过对中国《婚姻法》变迁的分析可以透视两性关系的变迁。

从世界范围看,法律的形式有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之分。渊源于罗马法的大陆法系以法典化的法律为主要特色,英美法系则以判例法为主要法源。中国清朝末年的法制改革,使传统中华法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几千年来“诸法合体,以刑为主”的法典编纂形式被打破,代之以独立的部门法编纂形式和体制。在民事立法方面,选择、移植了大陆法系的德国法模式。德国民法由总则、

物权、债权、亲属、继承五编组成,1911年起草完成的中国近代第一部民法《大清民律草案》专设亲属一编。

“五四”时提出了科学、民主的思潮,这为中华法系纳入大陆法系行列奠定了思想基础。陈独秀、胡适、鲁迅、陶孟和和刘半农等人在知识界流行的《新青年》等杂志上公开讨论妇女权利,直接倡导自由恋爱和自由婚姻,并把批判的主题指向封建婚姻制度。国民党在1930年公布了至今仍施行于台湾地区的《中华民国民法》,它采用编制体例,设亲属一编。其《中华民国民法·亲属编》是中国第一部与婚姻有关的法规,它明确禁止重婚,主张婚姻自由。该法规定,离婚应由男女双方同意决定,任何一方都可根据一定理由向法院申请离婚,离婚后孩子的监护权属于男方。但国民政府司法院在1931年院字第647号解释中声称:“娶妾并非婚姻,自无所谓重婚。”<sup>①</sup>只禁多妻,不禁纳妾。但无论怎样,这是中国走向现代法律的开端,它体现了主张妇女独立的思想价值,坚决反对包办婚姻,容许寡妇再嫁。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宣布废除旧法统。在亲属立法方面,基于革命根据地时期形成的立法传统,加之受前苏联立法体例的影响,将调整人类自身生产和再生产领域内平等主体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亲属法从民法中分离出来,作为了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其基本的立法思想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家庭已经丧失了经济职能,与社会经济生活无关,婚姻家庭关系不是商品关系,不能划归民法的调整范畴,因此亲属法被人为地从民法范畴中割裂出去,改称婚姻法。1950年颁布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该法第一次明令禁止重婚、纳妾,结束了中国历史上一夫多妻的习俗;反对包办婚姻,提倡和保护自由恋爱、择偶的权利。其中有关离婚和再婚的主要观点是:禁止干预寡妇婚姻自由(第二条)。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经由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调解无效时,亦准予离婚(第十七条)。离婚后,哺乳期内的子女,以随哺乳的母亲为原则。哺乳期后的子女,如双方因均愿抚养而发生争执且不能达成协议时,由人民法院根据子女的利益判决(第二十条)。离婚时,除女方婚前财产归女方所有外,其余家庭财产如何处理由双方协商决定,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政府根据家庭财产具体情况,照顾女方及子女利益和有利发展生产的原则做出判决(第二十三条)。这些法律条款保障了人们有权利选择结婚和离婚,即婚姻的自主权。

从法律的制定、出台到法律的实施需要社会认可的过程。1953年3月,人

<sup>①</sup> 参见姜涛:《历史与人口》,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8页。

民政府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的“贯彻婚姻法运动月”的宣传活动。在宣传活动中，政府承担了重要的角色：各级政府要求成立负责这个运动的委员会，任务是实施婚姻法，断绝封建婚姻制度的根源。此时，有超过 2400 个工厂、村庄、街道被选为运动中心的“试验地”，所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积极分子响应号召参加宣传队，仅河北省就有“一支百万人的宣传大军”。在婚姻法颁布一年后，上海人民法院受理了 13349 件家庭纠纷案，比前一年增长 228%。在这些案件中有 10000 件或 75% 是妇女要求的离婚案。<sup>①</sup>

1980 年 9 月 10 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该法在第一章总则中规定：第一条，本法是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准则。第二条，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实行计划生育。第三条，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禁止重婚。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

1995 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16 次会议通过修改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此法出台后，依然存在各种类型的无效婚姻和非法婚姻。从法律的角度看，婚姻成立的有效要件有两个方面，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从实质要件看，分为两个，一是必备要件，二是禁止要件。必备要件是结婚合意、达法定婚龄。禁止要件是重婚、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和禁止结婚的疾病。形式要件是男女结婚须办理结婚登记。由于经济、文化、法律意识等因素的影响，事实上存在着各种形式的无效婚姻，即事实婚姻以及违法婚姻。从 1997 年山东省民政部门的工作看，当年共清理违法婚姻 2098 对，其中违法登记成婚 27 对，未办理登记手续而成婚的 2071 对，其中主要为不到法定婚龄的<sup>②</sup>。在新的《婚姻法》出台以前，社会上对修改《婚姻法》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2001 年 4 月 28 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修改的《婚姻法》。新《婚姻法》将社会上出现的新问题纳入到法治范围，与旧婚姻法相比，在保障婚姻自由、妇女权利上向前跨进了一大步。新婚姻法对旧的婚姻法作了较大的修改。新婚姻法的“新”主要表现在：第一，明确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第二，增设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新制度。第三，离婚时夫妻财产分割更明晰。第四，追究家庭暴力犯罪者的刑事责任。第五，过错赔偿原则。中国《婚姻法》

<sup>①</sup> 转引自乔健：《性别不平等的内衍和革命：中国的经验》，第 250—253 页。

<sup>②</sup> 王丽萍：《婚姻无效和妇女财产权的保障研究》，载刘伯红主编：《女性权利——聚集婚姻法》，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2 年版。

的变化是朝向促进两性更加平等的方向,并要求两性在享受权利的同时承担共同的责任和义务。

## 二、当代中国婚姻家庭中的性别关系

### (一) 婚姻是人们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

几乎所有的社会学家都会关注中国的家文化,因为它是构成中国社会的重要制度。美国社会学家福山认为,1949年后的中国政府一直决心打破中国社会固有的家庭主义,虽然实施了各种政策和法律,但却太过低估了儒教文化和中国家庭构造难以撼动的力量。经过半个世纪的政治运动之后,家庭势力再度复苏,且影响力甚至比以前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至于要了解中国经济社会的本质,先决条件是须了解家庭在中国所扮演的角色。<sup>①</sup> 社会宏观结构经由家庭把个人行动者进行了最基本的联结,经过家庭组织的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成为中国社会最有效的制度安排,它有效地解决了稀缺资源的分配。

第一,婚姻在中国具有某种强制性,或者说婚姻受到了国人的重视。在中国人的眼中,结婚是每个人生命中重要的事件。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的资料统计,年龄到30岁的中国妇女有99%已经结婚,某些队列的已婚率甚至高达100%<sup>②</sup>。这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中国社会的婚姻制度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虽然年轻人出现了晚婚的迹象,但绝大多数人都会进入婚姻。对多数中国人来说,结婚既是文化压力使然,也是经济压力使然。中国妇女的生存压力更大,因为娘家很难容忍大龄未婚的女孩子,人们通过婚姻组建家庭的生活方式成为资源相对紧缺下的生存策略。

第二,婚姻自主。1990年,在农村完全由父母决定婚姻的情况女性占到36.5%,男性占到26.5%;10年后的2000年,只有16.1%的农村女性和9.9%农村男性婚姻是完全由父母决定的。城市中接近95%的婚姻是自主的。<sup>③</sup>

从择偶看,一项对20世纪80年代末大陆征婚广告的分析表明,中国人择偶标准最受重视的因素依次为:1. 年龄;2. 身高;3. 受教育程度;4. 性格;5. 职业;6. 婚姻状况与经历;7. 容貌;8. 健康。性别之间择偶的分化明显。男性在择偶过程中比较倾向于实际,更注重收入、户口一类关系到家庭实际生活的因素;女性在择偶过程中比较倾向于浪漫情调,更注重性格、身高和受教育程度

① [美] 弗兰西斯·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00页。

② [瑞典] 斯坦·约翰逊:《论现代中国的收养》,《人口研究》1995年6期。

③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编:《中国社会中的女人和男人——事实和数据(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版,第33页。

这些更偏重于人本身的因素。如果将这一研究进行跨文化分析,那么中国人看重而其他文化类型不太看重的择偶标准有:年龄、身高和婚姻状况。一般来说,男性多强调女性的温柔体贴和外貌;女性多强调男性的责任感与工作能力。即女性倾向于寻求物质安定,男性更追求女性的温柔体贴,性别气质的分化比较明显。

第三,生育是婚姻的重要目的。随着社会逐渐开放,婚前性行为和同居成为人们可以理解的事,因此满足性的需求并非是婚姻的主要目的。因此晚婚也成为必然的趋势。但是由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是一项较为严格的社会政策,只有在婚姻成立的前提下生育才具有合法性,因此,婚姻成为生育的必要条件。

### (二) 互助型的夫妻关系

夫妻之间的互助互爱是中国人婚姻关系的重要特征之一。这种状况主要取决于中国人的生存状况,因为无论城市还是农村,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人们结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好的生存和养育后代,这构成了婚姻重要的物质基础。互助型的夫妻关系表现为夫妻高度的家庭义务感、责任感和相对明确的分工配合,妻子在工作的同时担负起生育和抚养子女的劳动,丈夫在以挣钱和发展事业为己任的同时也尽可能的帮助妻子完成家务劳动,其共同的目标是使家庭成员得以更好的生存与发展。

互助型的夫妻关系突出了妻子在家庭中的重要性。因为在资源紧缺的条件下,女性在家庭内外的劳动是维持家庭生存必需的。如一些学者看到的,穷苦农家的女性对家庭的贡献远超过富有人家的妇女,因此她们对男性的牵制力也比较大。<sup>①</sup>与西方社会学家习惯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相分割来解释女性低下的社会地位不同,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的女性都是家庭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经济支柱和情感支柱。夫妻精致的劳动分工与其说它使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相分隔,不如说它使夫妻之间更加相互依赖,家庭成为有效地实现其成员生存与发展的共同体。

互助型的夫妻关系内的劳动性别分工的形成是与中国的经济政策相关。新中国建立之后,政府实施了一整套“低工资、高就业”的劳动政策。城市中出现的“同质婚配”成为最主要的婚姻形式,双职工家庭成为社会最基本的组织单位,1982年的调查表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已婚夫妻中,近99%是双职工;同时,夫妻职业相同的占38.7%。<sup>②</sup>1998年对中国五城市的调查表明,虽然妻

① 参见〔美〕弗兰西斯·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第109页。

② 五城市家庭研究项目组:《中国城市婚姻与家庭》,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9—120页。



子下岗的比例有所增加,占到 7.11%,但正常工作的双职工家庭仍然占了 66%,真正妻子在家从事家务的只占 3%,离退休的占 15%,其他的皆可以理解为双职工家庭<sup>①</sup>。在这一意义上,是家庭在应对国家和市场的变化,互助型的夫妻关系成为家庭应对国家和市场经济变化的必然产物。

同时,互助型的夫妻关系也是建立在 1949 年以来女性对独立人格追求的基础上。20 世纪 80 年代女诗人舒婷写出“致橡树”的诗歌,这首诗代表了转型期女性对自身地位的自觉。正如她所说:“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必须是和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致意,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言语。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的红硕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脚下的土地。”

### (三) 家庭利益掩护性别利益

当国家和公共政策将家庭视为基本生存单位时,每个家庭都会面对社会的资源紧缺和各种结构限制,这迫使家庭在外力的限定下成为利益共同体,性别差异和性别利益消失在家庭利益之中。

为了应对社会经济的变化,夫妻可能发展出各种实现家庭利益的行动策略,如“一国两制”或“两保一”。所谓“一国两制”是指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夫妻俩各自在不同的经济所有制单位,以此来减少风险或增加成功的几率。所谓“两保一”是指在一个核心家庭中,牺牲某一方的利益使另一方成功的情形,主要表现为妻子主要承担家务劳动,并照顾孩子,孩子也尽量减少对父亲的服务要求,由此保证丈夫能够在社会上安心和稳定的发展。在这种生存策略之下,是妇女为家庭进行自我牺牲。也就是说,男女共同参与有酬劳动并不能够直接导致家庭内部夫妻在社会上的平等发展;在家庭机制的作用下,妻子自主地选择放弃事业发展,以保证丈夫能够在社会上有更有效的发展,其结果是家庭机制进一步强化了家庭内部等级化的性别分工,并扩大至社会上的性别不平等。

首先,夫妻共同参加有酬劳动的同时,妇女依然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1998 年的调查表明,夫妻共同承担家务的占了 40%;由丈夫主要做家务的占 10%;由妻子主要做家务的占 50%,与 1993 年比,由夫妻共同承担家务的比例

<sup>①</sup> 沈崇麟、杨善华、李东山主编:《世纪之交的城乡家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28 页。

有所增加<sup>①</sup>。在农村,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仍为女性<sup>②</sup>。这就形成了妇女双重负担,妇女既要参与社会劳动,又要生育、抚养、赡养老人和照顾丈夫。家务劳动沉重导致妇女闲暇时间大大低于男性。<sup>③</sup> 家务劳动被看作是妻子“必然”要承担的责任,女性家务劳动的好坏象征着她是否是一个好妻子或好母亲。家庭在妇女心中的分量比男性大得多,耗费的脑力和体力也得多。

其次,夫妻之间男性利益优先的原则未变。男性利益优先原则是指父权制的性别关系等级秩序在资源分配上的延续,即在资源紧缺的情况下,女性放弃某些资源,以使男性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家庭中的男性利益优先原则是指妻子在考虑到家庭共同利益的前提下,自愿、自觉地牺牲个体利益以保障丈夫的发展。之所以会出现男性利益优先的状况,主要是因为妻子们相信与自己相比,男性能够更多的在社会上占有资源,他们具有更高的受教育程度、更多的工作经验;加之丈夫在事业发展上获得的好处是属于整个家庭的,“舍己保夫”的行动策略能够使全家获益。妻子出于家庭利益考虑的自我牺牲巩固了丈夫在社会和家庭中的优势地位,使男性在社会分工中优势地位得以再生产。

再次,人们习惯用家庭中男性收入和职业地位来衡量其家庭的社会地位,在这种意义上,妇女不被看成“家长”,家庭地位的高低成为男人之间的竞争。妇女虽然参与有酬劳动,获得了经济收入,而家庭依然是妇女获得社会地位的中介。

在互助型夫妻关系中,妇女家庭角色的价值得到充分肯定,“贤妻良母”和表面上的“妻管严”成为阻碍妇女进入职业领域发展的温柔陷阱。20世纪90年代初对妇女地位的大规模的抽样调查涉及到妇女的家庭地位,使用的指标主要包括:家庭中妇女的自主权、自决权;对家庭事务的决定与参与;家庭资源分配中的性别倾向;夫妻及家庭义务的承担状况。<sup>④</sup> 调查认为,妇女对自己的家庭地位比较满意,男性与其看法一致。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妇女的家庭地位不仅较过去,而且相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要高。有学者认为,在世界各国中,包括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中国城市妇女的家庭地位实际上是最高的。<sup>⑤</sup> 妇女通过在家庭内部分工的自我牺牲,获得了丈夫在社会上的发展,并由此提高了家庭的社会地位和丈夫的尊重。可以说,妇女较高的家庭地位是由等级化劳动性

① 根据沈崇麟、杨善华、李东山主编:《世纪之交的城乡家庭》,第91页计算。

② 戴可景:《中国十四省市农村妇女基本状况及其生活简析》,《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4期。

③ 《当代中国妇女状况的分析与预测》,《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3期。

④ 陶春芳、蒋永萍:《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概观》,中国妇女出版社1993年版。

⑤ 徐安琪:《中外妇女家庭地位比较》,《社会》1992年第2期。

别分工得到的补偿,妇女为她们在家庭中享受到的权利付出了很高的社会代价,她们由此失去了在社会领域内发展的机会和应有的社会地位。

## 小 结

婚姻制度和家庭制度是与经济制度同等重要的一项社会制度,作为规定男女两个成年人如何结合在一起的现代婚姻制度明确了夫妻双方的权利与义务。追求恋爱自由和自主婚姻是现代性的一部分,性别气质的建构和两性掌握社会资源的差异同样形塑两性的择偶标准和婚姻质量。中国是一个十分重视婚姻和家庭的社会,从中国《婚姻法》的不断修改可以看到封建社会倡导的男尊女卑的婚姻关系寿终正寝,倡导两性平等的新型婚姻关系正在形成。互助型夫妻关系是中国婚姻家庭的主要特征,它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经济发展条件、社会政策的影响,但互助型的夫妻关系常常会掩盖了性别利益,男性利益优先原则并没有改变。

### ✧关键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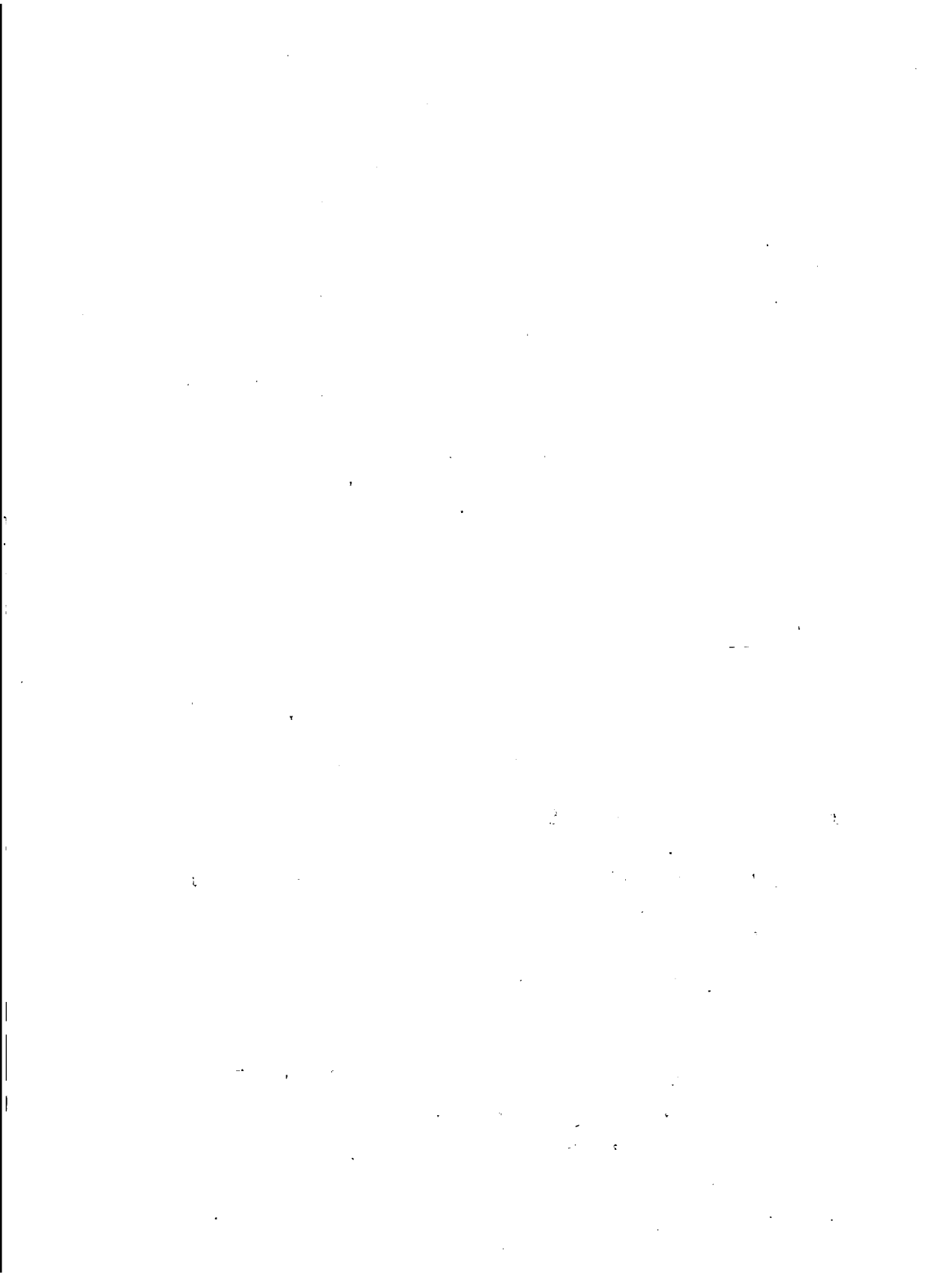
婚姻制度 家庭制度 家庭 亲属制度 生育制度 亲密关系  
婚姻满意度 婚姻质量 父系继嗣 互助型夫妻关系 男性利益优先原则

### ✧思考题

1. 试分析择偶的两类标准,以及可能存在的性别差异。
2. 论述理想的亲密关系。
3. 简述中国夫妻关系的主要状况,分析这一状况对两性社会地位的影响。

### ✧进一步阅读文献

- [英]吉登斯:《亲密关系的变革——现代社会中的性、爱和爱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
- [英]罗素:《婚姻革命》,东方出版社 1988 年版。
- 徐安琪、叶文振:《中国婚姻质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 [法]托尼·阿纳特勒拉:《被遗忘的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 刘伯红主编:《女性权利》,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2 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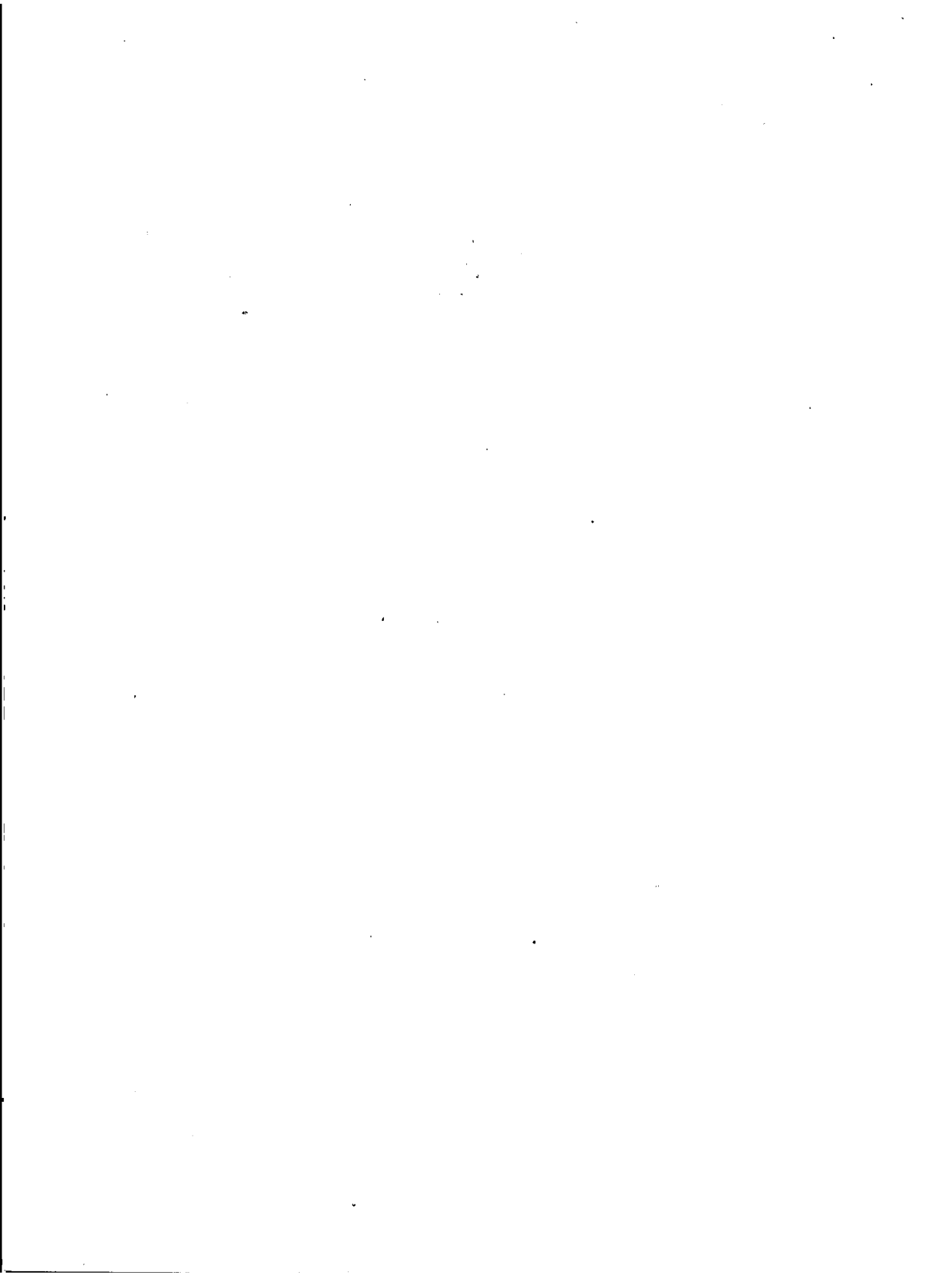


### 第三编

## 劳动分工、经济发展和性别

本编进入社会经济领域,分析劳动性别分工如何在家庭和社会中塑造两性生活,并对传统公私领域的两分法进行反思。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互动将劳动性别分工与公共政策、经济结构调整等宏观因素相结合,并通过劳动性别分工有机地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中使两性不平等不断被再生产出来。本编认为劳动性别分工的意识形态是产生和再生产两性不平等关系的重要机制。

第九章分析劳动性别分工的意识形态掩盖了两性合作劳动的历史、低估了女性的家务劳动的价值和女性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对社会的贡献。等级化劳动性别分工的社会动力机制包括父权制、资本主义、家庭分工和情感劳动等诸多因素。现代中国的劳动性别分工已经打破了传统的内外格局,呈现出男女共同参加社会生产劳动的现实。中国农村劳动性别分工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发生了复杂变化,女性在成为农业重要劳动力的同时也加入到工业化的进程中,对其家庭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第十章分析影响两性职业发展的因素。分析职业领域中的性别歧视现象,如职业的性别隔离、女性大量从事非正规劳动和兼职劳动、两性收入之间的显著差距等,并重新定义了职业发展的概念。父权制是导致性别歧视的主要因素。特定的职业期望、劳动力市场结构、组织文化、家庭角色等因素作用于两性职业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实践虽然为两性职业发展提供了空间,但是女性在受教育机会、制度和社会支持等方面依然无法与男性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机会不平等导致了两性职业发展上的差距。第十一章分析消费社会如何进行性别化消费和性消费,说明不平等的性别关系如何在消费社会被再生产出来。广告、对美女的塑造以及各类整容术,在把女性从性压抑和生育的苦恼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又使女性的身体屈从于具有强制性的美的诉求之下。第十二章分析社会发展以及相关的公共政策是如何作用于两性社会地位的,强调如果女性的社会角色依然被定位为母亲、妻子,而不是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女性在社会发展中必然处于边缘地位。用性别发展指数和性别权能测量可以比较好地分析发展与性别的关系。将性别发展的实用性和战略性需求纳入发展项目是一项重要工作。





## 劳动性别分工

### 引 子

有一首广为传唱的歌曲,叫《常回家看看》,耳熟能详的歌词是:

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和爸爸谈谈……

在歌词里面,男女在家庭内外的社会角色鲜明,呈现出劳动性别分工的固化模式。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主要差异之一是劳动分工的高度复杂化。一方面,现代性正在系统地瓦解父权制,其实质性的变化正发生在劳动性别分工上,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女性进入了传统的男性工作领域,充当了传统男性的各类社会角色。另一方面,人们在观念形态上依然坚信,男性应负责养家糊口,女性应负责家务劳动,很少有人去思考劳动性别分工的意识形态的真相。因此,本章将分析劳动性别分工的状况,对劳动性别分工的意识形态展开反思,说明其可能导致的社会后果。

## 第一节 劳动和劳动性别分工

### 一、劳动分工

人类自诞生之日起就离不开劳动,劳动是人类围绕着食品、衣服、住所等各种日常生活必需品进行的生产活动。劳动至少可分为两种,一是物质产品的生产劳动,二是人及人自身的生产劳动,即人的再生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强调自然界为劳动提供对象与材料,劳动与自然界的结合是人类财富的泉源。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劳动是人们对创造财富进行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劳动在整个人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劳动创造了人,没有劳动就没有人类社会。人类劳动的特点是:第一,人类劳动使用劳动技术,发展出更大规模的处理物质的办法,这些方法越来越多样化、复杂化、技术化和理性化,导致生产模式的变化。第二,人类劳动具有分工,人们依据不同的劳动任务分配工作,因为分工与合作能够提高人类的劳动效率。人类具有选择和创造劳动组织制度的能力和行动潜力。第三,人们对劳动有不同的价值判断,并通过劳动回报表现出来。在不同的社会阶段,人们依据劳动中包含的体力成分或智慧多寡回报不同的劳动。

在现代社会,劳动概念与工作、就业、有酬劳动等概念相混杂。工作是指能够生产某种产品或从事某种服务,当工作与现代生产方式相联系时,有组织、有固定报酬、有时间秩序的工作成为工作的主流,被称为“有酬劳动”。工作概念有别于传统农业生产或手工作坊式的劳动。职业是指人们从事工作的专业类型,它与工作的专门化和劳动分工有关,具有社会统计学的意义。

有劳动就会有劳动分工,即社会依据个人、群体或组织间的差异分配劳动的方式,它将人类的劳动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古典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用大量笔墨关注劳动分工和社会公正。在他看来,社会财富源于劳动分工的发展。第一,劳动是生产的第一要素,劳动是价值的标准与源泉。第二,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人类发展出劳动分工,核心是专业化的劳动发展。第三,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劳动分工的发展。劳动分工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们在劳动分工中表现为高水平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一方面劳动分工促成了复杂的经济结构的产生,提高了效率;另一方面,劳动分工又成为把全社会整合起来的组织力量,限制了个人的利己之心。

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从劳动分工入手认识社会。他认



为,社会学关心的核心问题是一个社会如何被组织在一起?具有差异的个人如何被团结在一起?社会如何得以整合并得以维持?他区分了人类历史上存在过的两种社会秩序,一是机械团结,二是有机团结,决定这两种团结的力量是劳动分工的发展。机械团结是劳动分工最小化的一种状况,社会中所有成员具有相通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有机团结是劳动分工最大化的社会,这种团结源自个人的自主地位和人们对各种权利的共同理解,源自人们对由各种差异组成的社会持有的道德认同;角色的专门化加强了社区团结。

## 二、劳动性别分工

劳动性别分工是指社会依据性别差异分配劳动的方式。依性别分配劳动是人类最早的劳动分工形式之一,是人类有效的组织社会生活的重要方法。

传统社会,由于社会生产力不够发达,以性别为依据的劳动分工成为社会最基本的分工。劳动性别分工的基本形态表现为:女性负责与人类的生产与再生产相关的劳动,如生育、抚育和照顾老人的劳动;男性负责与生存有关的劳动,如打猎、养殖、农耕等。人类学家乔治·默多克对 200 多个社会群体的跨文化研究表明:所有文化中都存在劳动性别分工,女性多专注于家务和家庭责任,而男性在外工作,这既是现实的,也是最便利的。<sup>①</sup>

人类依据性别分配劳动显示出人类有效组织劳动的智慧。现代社会,劳动性别分工依然存在,我们面对的事实是:女性的生育能力或男性的不能生育,使人们相信劳动性别分工是“自然的”、“合适的”人类分配劳动的方式。本质上,劳动性别分工并非是简单的组织劳动的方式,它早已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劳动性别分工的意识形态并不是指社会按照性别来分配工作,而是指社会将性别不同的人分配到不同的生活经验、机会和工作场所等社会位置上的社会机制。劳动性别分工的意识形态将两性劳动赋予了不同的价值;它是将男性置于更多机会和更具优势的岗位上的社会机制。这是父权制的意识形态,它导致了等级化的劳动性别分工,即女性从事的劳动价值永远会低于男性从事的劳动价值,或男性劳动永远比女性劳动更有价值,它使人们相信男性劳动是社会生产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女性劳动只是辅助性的,是维护文明。

社会通过三种主要方式建构等级化的劳动性别分工。一是建构有关劳动性别分工的信仰,它使人们相信“女性以家庭为主,男性以社会为主”的生物性分工是天经地义、合情、合理、合法的。二是建构性别角色意识,即对与性别分

<sup>①</sup> George Murdock,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Macmillan, 1949).

工相关的性别角色的看法,包括三个方面:1. 对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的看法;2. 有关女性就业对家庭及孩子影响的看法;3. 有关妇女工作在经济上的重要性的看法。三是将女性劳动视为情感劳动的信仰,相信女性的劳动付出是她们心甘情愿的,是她们关怀情绪的自然表达。由此,等级化的劳动性别分工成为看不见的、制度化的、合法化的产生两性不平等的社会机制,它使女性自觉地付出无报酬的劳动,因为她们相信,相夫教子、做贤妻良母,默默无闻地从事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是她们的“本分”;男性自觉地把取得社会地位和名誉视为自己的“天职”,不断给自己加码,不仅要有份职业,养家糊口,还要负起光宗耀祖的家庭责任。

等级化劳动性别分工不仅是指将两性分配到不同的劳动和工作岗位上,还意味着这些工作岗位有着高低之差。现代社会,公私领域的分化纳入了两性劳动分工的意识形态,它将女性劳动在观念形态上归于家庭等私人领域,要求其完成与人类再生产相关的劳动活动,即家务劳动。因此即使女性参加生产领域的劳动,但依然被视为次要的和辅助性的社会角色。而男性劳动是社会性的,政治、军事、经济活动是理所当然的男性活动,即使男性负担起家务劳动,他也可能被社会嘲笑或被视作个人行为。工业革命之后,女性已经越来越多地进入到生产领域,但父权制的意识形态则被保留下来,等级化的劳动性别分工也在延续。据统计,1990年世界经合组织国家男性就业/人口比为78.2%,女性就业/人口比为52.2%;1999年,男性就业/人口比为76.6%,女性就业/人口比为55.4%。<sup>①</sup>但传统劳动性别分工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以工业化程度最高的美国为例,美国人大部分的家务是由女性来完成的。1965年,男女承担家务的时间比例是1:6;1975年该比例是1:3;到1988年这一比例是1:2,即美国男人每做一小时的家务——做饭、洗衣服和打扫房间,妇女就要做两个小时<sup>②</sup>。男人参与家务劳动的时间的确有所增加,但等级化的劳动性别分工格局依旧。

### 三、等级化劳动性别分工的社会后果

等级化的劳动性别分工在社会变迁中发生着变化,特别是近现代以来,随着女性教育程度的提高、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女性已经像男性一样进入到有酬劳动的领域,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两性平等发展的美景,但事与

<sup>①</sup> 国际劳工局:《世界就业报告(2001)》,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

<sup>②</sup> Hunter学院妇女学集体:《改变现状,展望未来》,余宁平、杜芳琴主编:《不守规矩的知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26页。

愿违,劳动性别分工更多地以公私领域分化的意识形态表现出来,并使等级化的劳动性别分工得以延续。它的社会后果是既掩盖或降低了妇女劳动的价值,又使父权制经由生产领域不断地延续。

#### (一) 掩盖了两性合作劳动的历史

妇女史研究一直努力重新书写女性劳动的历史,以期能够给人类劳动性别分工的历史一个更为符合真实的面貌,这种历史的真实是两性劳动分工导致的相互依赖和不可分割,正是两性的合作劳动使人类得以延续和发展。

一些西方的研究表明,在农业社会、前工业社会和早期工业社会里,女性是家庭经济 and 公共领域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早在1919年英国历史学家克拉克(Alice Clark)就开始探讨妇女在家庭经济中的作用。她指出,工业革命早期,妻子和丈夫共同工作,形成了一种合作式的家庭经济,夫妻是相互补偿式的关系。妻子控制生产和销售,例如妻子管理整个农场,负责挤奶和出售奶酪。但女性同时还要做家务、抚养子女。<sup>①</sup>妇女劳动史学者梯利和斯格特(Tilly & Scott)的研究展示了前工业社会女性对工作和家庭的贡献。她们利用新近开发出来的家庭和人口资料,说明在前工业社会家庭劳动分工主要依据性别和年龄,女性参与家庭经济的程度有赖于她们的年龄和生命周期中的经验,已婚女性和未婚女性在参与家庭经济方面有很大差别,已婚女性是家庭经济和社会活动的主要参加者<sup>②</sup>。

有学者指出,从有酬劳动出现以来,女性的劳动逐渐被视为次要的,报酬远低于男性。布茨(Christine Bose)通过对人口统计资料进行追踪研究来说明在资本主义早期妇女劳动的价值。她指出,1940年以前的美国各种统计不把以家庭为基础的各种工作列入统计之列,它掩盖了妇女对于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贡献。布茨对那些早期以寄宿制的方式参与劳动的妇女进行调查发现,1892年在全美的城市工作中,已婚妇女中有27%的人是以寄宿制的方式工作,但她们的收入只是其伙伴收入的43%。<sup>③</sup>

历史社会学和妇女史的研究皆表明,在前工业社会和早期工业社会中女性并非像通常理解的那样是完全呆在家中的,女性一直在工作。有学者对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女性工作做了如下的描述:

① A. Clark, *The Working Life of Wome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1919).

② Louise A. Tilly and Joan W. Scott, *Women, Work, and Family*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8).

③ Christine Bose, "Dual spheres," in M. M. Feree and B. Hess, eds., *Analyzing Gender* (New York: Sage, 1987), p. 268.

所有的家庭成员都要按性别和年龄分担不同的养家工作。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年轻的姑娘不是在自己家中,就是在别人家中做女佣、农场女仆或是学徒。农场里结了婚的女人则要照料牲畜、掌管菜园、播种收割、出售农产品甚至还要套牲口驾车;城市里,那些工匠的妻子们从产品的起始到完工都要为丈夫打下手,而且还要平息家庭纠纷和管理财务。那个时候似乎只有丈夫的工作才能挣钱,而女性在家庭经济中的作用则被忽视了。……从19世纪开始……工作就意味着以工人或佣人的身份去赚得一份薪水。1851年英国40%的女性工作是佣人。<sup>①</sup>

中国有关董永和七仙女的历史故事,为人们描述了一幅男耕女织的田园图画,两性间的分工完美无缺。但传统上一家一户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劳动,并不可能真的将妇女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有研究表明,中国农业的始祖是妇女,最初的男女分工是“男猎女耕”。还有研究表明,16世纪、17世纪的江南地区,“夫妇并作”是许多农家的劳动安排方式,因为当时“人耕十亩”,农户经营标准模式需要大量的耕作能力,农家妇女难以脱离大田农作。直到清中期,“男耕女织”才成为江南农家劳动安排的支配性模式。<sup>②</sup>

在中国早期工业化过程中,贫苦女性并没有福气躲在丈夫的庇护下生活,她们必须为养家糊口出力。中国早期重要工业之一的纺织印染业中,女工人数超过男工,她们是因为其廉价而受到资本家的欢迎。1914年,中国的纺织印染业中男工为122978名,女工有165234名,女工数量超过男工。与此同时,中国早期女工工资普遍低于男工。19世纪末,一般男工的日工资在一角五分至一角六分之间,而纱厂和火柴厂女工的日工资一般在五分钱左右。<sup>③④</sup>

两性合作劳动的历史延续至今。根据一份联合国1980年的报告:“女性占世界人口的一半,完成了总劳动工时的近2/3,得到的收入是世界总收入的1/10,拥有的财产少于世界财产的1/100。”<sup>⑤</sup>

## (二) 被严重低估了的女性家务劳动的价值

有一项研究推测,与男性相比,英国女性因为在家育儿的持续责任而损失

① [法]吉尔·里波韦兹基:《第三类女性:女性地位的不变性与可变性》,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82页。

② 李伯重:《从“夫妇并作”到“男耕女织”》,《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3期。

③ 郑永福:《中国近代产业女工的历史考察》,《郑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第7—15页。

④ 佟新:《异化与抗争——中国女工工作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一、第二章。

⑤ Valerie Bryson, *Feminist Politic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2).

了其一生可能收入的一半左右。<sup>①</sup>时至今日,我们根本无法统计出女性家务劳动到底创造了多大的价值。

对前工业社会的大多数人来说,生产活动和家务活动是连在一起的。生产活动是在家里或附近进行的,家庭所有成员都参加各种形式的农活或手工业。即使女性被排除在政治和战争领域之外,她们对于家庭经济活动的重要作用还是众所周知的。现代工业生产使用的各类机器导致了工作场所与家庭的分离,工厂制度要求雇佣专门的人进行生产,此时,雇主开始与个人而不是家庭签订劳动合同。家庭与工作场所的分离越来越明显。借助家庭与工作场所的分离,父权制意识形态开始以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离确立现代的等级化劳动性别分工。这种意识形态划分了男人的活动空间为工作场所,女人的活动空间为家庭。因此,男人们将更多的时间花在工作场所,并有更多的机会参与政治与市场;而女性则承担照顾孩子、做饭等各类与“家庭”相关的工作。对于富裕家庭来说,他们可以雇佣女佣人来帮忙家务;而对大多数女性来说,她们为了维持一个相当的生活水平,必须在家务劳动之外从事有酬劳动以补充家用。

家务劳动的内容也在变化。一方面,农业社会的家庭劳动非常艰辛,用水、用柴等日常杂务随着工业化而变得越来越方便;另一方面,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生活质量发生了变化,更高的生活质量要求人们要有更多的付出,如清洁的要求,地毯的清洁、衣服的熨烫、孩子的智力开发和营养保健等要求人们花更多的时间在生活细节上。这形成了一件令人奇怪的事情,即采用了像吸尘器和洗衣机这样的节省劳力的现代设备后,女性的劳动强度下降了,但她们用于家务劳动上的平均时间并没有明显地下降。现代社会一些新型的家务劳动是随着家庭与工作场所的分离出现的,也是随着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机器化程度的提高出现的。

有酬劳动使我们了解到了劳动的价值,那么家务劳动的价值是怎样的呢?据估计,家务劳动占工业化国家所创造财富的25%—40%<sup>②</sup>,家务劳动对全部经济的贡献显而易见。如何测量家务劳动的价值呢?目前有两种方法计算家务劳动的价值。第一是机会成本法。它是用单位时间内外出工作时,人们在劳动力市场上得到的工资回报来估计同时间内家务劳动的价值,即8小时家务劳动时间的价值等同于同样时间内社会平均劳动的价值。第二是家庭食品法。以家庭不开伙做饭而是吃饭馆和方便食品的方法解决一日三餐,以消费价格计

① [英]约翰·麦克因斯:《男性的终结》(黄茜、周丽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0页。

② [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04页。

算家务劳动的价值。如市场上速冻饺子的价格与女性在家里包一顿饺子的价格相等,由此计算女性家务劳动的价值。

如果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加入女性家务劳动的价值,事情可能会更加值得关注。所谓国民生产总值代表着一国国民在一定时期内进行生产活动创造的价值总和。在减去折旧与间接税之后则得到国民收入(national income),再将国民所得除以“国民”数目,就得到了人均国民所得。事实上,没有一个国家在计算国民收入时把家务劳动计入其中的。因为经济学家认为,家务劳动没有通过市场交易,不能算是商品生产活动。更深刻的原因是家庭制度作为基本的社会制度安排,把家务劳动混淆为私人事务,不仅使妇女成为“间接的国民”,还无偿占有了她们的劳动。有研究认为,近20年来国民收入的增加主要是来自服务业的发展,而服务业的增长只是把原来无偿的家务劳动市场化而已,这些增长正是以往妇女家务劳动的贡献。

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也在变化。有学者提出“延迟的适应”的概念,指男性在家务劳动的重新协调中比女性进入要慢得多。有研究表明,较高社会阶层的夫妇往往分工更加平等,年轻一代的家庭分工比老一代更加平等。似乎可以乐观地想像,随着时间的推移,家庭分工的性别模式正在减弱。成长在父母共同承担家务劳动的家庭中的年轻人,在自己的生活中更可能采纳这种方式<sup>①</sup>。

### (三) 农业女性化

当男性越来越多地进入到工作场所的时候,世界主要农业国家都出现了农业劳动女性化的特点,女性农业生产劳动的社会贡献被严重忽视。从世界范围内看,精耕细作的农业耕种方法一直延续到今天,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越来越具有女性化的特点。在两个人口最多的地区,撒哈拉南部非洲和南亚地区,绝大部分妇女从事农业劳动。农村妇女往往很贫穷,绝大多数从事养家糊口的粮食生产,而不是卖粮获利。她们掌握的生产资料有限。与男性相比,她们得不到平等的机会参加培训和信息项目以及相关技术。由于法律和社会因素,她们通常不占有土地。

## 四、等级化劳动性别分工的动力机制

面对劳动性别分工,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两性劳动会产生价值的分化?为什么男性养家糊口的劳动比女性料理家务的劳动更有价值?为什么女性的角色总是被有意识地、历史性地划归为“辅助性的”?是谁或哪些利益群体在这

<sup>①</sup> 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06页。

种劳动性别分工中获益?下面将介绍一些基本的理论。

### (一) 二元理论

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经济学家海迪·哈特曼提出“二元制理论”,所谓二元制理论是论述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她看来,资本主义制度利用了父权制,父权制也借助资本主义存在,并使劳动性别分工得以产生不平等的两性关系。

海迪·哈特曼(Heidi Lo Hartmann)认为,父权制作为一种独立的、先于资本主义存在的支配体系,一直影响着家庭内以及工薪劳动中的性别分工。这表明家庭是如何作为控制之地,男性是如何从女性在有酬劳动和无酬劳作中获得好处。现代资本主义的性别分工是父权制和资本主义体制之间长期互动的结果,它们既是具体的关系制度又是意识形态和心理结构。女性迈向平等之路要求既要反对父权制又要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依照性别的劳动分工是人类历史上的普遍现象,但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性别分工具具有等级制的特点,在等级制中,男性在社会上层,女性在社会底层。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共同控制女性的劳动,阻止女性接近生产资料。<sup>①</sup>

哈特曼认为,按性别分工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机制,它维护男性对女性的优势,资本主义利用父权制从四个方面使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第一,资本主义的劳动力市场。按照经济学的解释,资本主义制度建立起自由劳动力市场的新制度,在市场上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女性同男性一样具有同等的市场地位。但事实并非如此,父权制使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劣势地位,劳动过程存在明显的性别分化。第二,劳动报酬制度。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劣势地位直接表现为低工资,低工资使妇女依赖男人。因为低薪迫使女性结婚,女性通过婚姻得到自己无力承担的物品和生活方式。第三,商品交换。为了生存,妻子要为丈夫料理家务。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劣势地位加剧了她们在家庭中的从属地位,男性从工资和家庭分工中得到好处。第四,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结合不断产生女性的从属地位。女性的家务劳动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合法化,使女性只能从事半日工作或不工作,这加剧了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不利地位,由此等级制家庭分工被劳动力市场永久化。这一过程是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两种制度长期互相影响的结果,它使女性的从属地位不断被再生产出来。

<sup>①</sup> 海迪·哈特曼:《资本主义、家长制与性别分工》,载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6—75页。

## (二) 父权制资本主义的理论

父权制资本主义的理论非常尖锐地指出,资本主义本身就是父权制。美国学者杨(Iris Young)认为,对女性的从属地位的认识,关键问题是要清楚地说明父权制的运作规律及其内在动力,以及它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

该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导致女性边缘化的重要原因,资本主义压迫女性是它的一个基本属性。应当把劳动的性别分工范畴提高到与阶级范畴同样重要的地位。劳动的性别分工作为分析范畴比阶级范畴更具体、更宽泛,是分析劳动活动以及从这些活动中产生出来的社会关系必不可少的工具。在杨看来,重点应当分析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是怎样依赖性别原则确立起来的。把女性推向边缘并使其起次要劳动力作用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基本特征。在整个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女性起了马克思所描述的劳动力后备军的阶级作用。资本主义并不是利用父权制来产生等级关系,而是从一开始就建立在规定男性主要、女性次要的性别等级关系之上。<sup>①</sup>

爱森斯坦认为,资本主义支持了父权制或男性霸权的意识形态,强化了对妇女的压迫。这种压迫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方面,父权制意识形态强调男女在生育功能上的差异,以此迫使妇女从事无报酬的家务劳动。另一方面,妇女对家庭的责任又进一步导致了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不平等。<sup>②</sup>男性工人阶级既从女性的家务劳动中受益,获得妻子为丈夫提供免费的家庭服务和顺从;还从劳动力市场受益,因为女性没有加入到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而使男性获得高报酬的工作。妻子对丈夫经济收入的依赖加强了男人对工作的联系,弱化了男性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体系的反抗意识。

资本主义建构出将女人封闭在日常性劳动中的办法,使她们无法进入更高的层次,由此形成了一个限制妇女流动的“缓冲区”,这种缓冲区的作用还在于它防止了男人继续向下流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质上规定了劳动力在市场中是非均等的,并不是所有潜在的生产者都可能被雇用。依照性别划分主次劳动成为“最自然”的标准。当然,资本主义也同样利用了种族标准。性别劳动分工使女性成为资本主义的储备劳动力,女性普遍的低工资为资本家提供了额外的剩余价值,女性作为家庭消费管理人员的角色适合于资本主义消费主义的目的。

<sup>①</sup> 艾里斯·扬:《超越不幸的婚姻——对二元理论的批判》,载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6—105页。

<sup>②</sup> Z. Eisenstein, "Introduction," in Z. Eisenstein, ed.,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1979), pp. 5—55.



### (三) “社会性成人”的统治技术

在恩格斯 1891 年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阐述了私有制如何产生,并促成了作为经济单位出现的家庭,从而导致了财产权的不平等,出现了阶级压迫的社会。美国女权主义学者萨克斯进一步论述了现代社会随着女性工作性质的改变,导致家庭这个主要经济单位的发展遭受破坏。她看到阶级社会在家庭和公众领域间造成了鲜明的对立,家庭中的权力不会演变成社会的权力或地位。由此她提出了“社会性成人”(social adults)的概念,强调阶级社会中女性的从属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家庭财产关系造成的,而是女性没有社会性成人的地位造成的。公众性劳动是社会性成人的物质基础。社会必须把女性排斥在社会劳动以外,或者千方百计贬低女性所做出的社会劳动的价值,从而达到否定她们是社会性成人的目的。

萨克斯指出,第一,阶级社会的性质是剥削,就是多数人为少数人的利益工作。剥削阶级喜欢把剥削强度高的社会生产作为男性的工作,把女性的工作家庭化。因此就产生了否认女性的社会性成人的物质基础,统治阶级把女性限定为男性的被监护人。统治阶级乐于选择男性为其生产,因为男性的工作流动性强,他们不哺养子女。这样的性别划分成为统治阶级分而治之的性别统治政策的组织基础。国家法律系统和统治阶级的目的是把男女之间在生产中的分工转变成不同价值,男性通过劳动成为社会性成人,女性则成为家庭里受赡养者。统治者为了补偿男性已经失去的经济自主性,给予男性以社会性成人的地位和对女性的占有权。因此,即使女性拥有财产,国家也要限制她们的财产在公众领域内的作用,同时把家庭作为社会的附属物。第三,国家把贫困的无产阶级女性纳入社会生产,用制度化的同工不同酬维持男女不平等。这些女性虽然与同阶级的男性一样都是社会性成人,可是经济政策决定了他们事实上是不平等的。家庭中的权力被社会性成人的身份所限定。同时,这种状况阻碍了工人阶级意识的发展,加强了资本家的统治。<sup>①</sup>

### (四) 资源交换理论

资源交换理论是将社会交换理论应用于对家庭劳动性别分工的分析。这一理论从霍曼斯的交换理论出发,强调人是理性行动者,个体间的交往以利益最大化为原则。因此,夫妻关系是一种交换关系,各自占有一定的资源以满足对方的需求。丈夫因为掌握着更多的经济资源,妻子不得不承担较多家务以补

<sup>①</sup> 凯琳·萨克斯:《重新解读恩格斯——妇女、生产组织和私有制》,载王政、杜芳琴:《社会性别研究选译》,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1—20 页。

偿丈夫提供的经济利益,并认为这样的分工公平合理<sup>①</sup>。该理论认为,在一个既定的性别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下,男性能够从家庭之外获得更多的资源,而女性只能从家庭内部或通过婚姻或家庭获得资源。那么妻子的交换方式只能是通过丈夫的顺从和尊重获得经济支持和外部资源,其结果就是丈夫获得了一个可观的、自我强化的、优于妻子的权力;妻子对丈夫的义务是扩散型的、无限有效的。

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用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指出,家庭在满足社会的基本需要和维持社会秩序方面有重要功能。核心家庭内的劳动分工或角色的专门化有利于工业社会需求,丈夫承担养家糊口的工具性角色,妻子在家承担情感性的角色。帕森斯的理论假设之一是:母亲与孩子的关系是第一位的;理论假设之二是:男人无须承担生物功能,因此承担工具性功能。家庭形式是重要的社会组织的方式,父亲充当工具性角色,母亲充当表达性角色,完成人的社会化和社会的延续。<sup>②</sup>美国学者弗里丹在《女性的奥秘》一书中指出,家庭事务与公共事务的分离和妇女被局限于家庭的现象是妇女经济边缘化和社会依附化的根源。功能主义理论将两性的家庭内部劳动分工看作是正常的、没有问题的,这种看法是值得批判的。因为这意味着非核心家庭模式是不正常的、有问题的,那些由单亲组成的家庭,无论男女皆承担起工具性角色和情感性角色。事实上,家庭成员的工具性角色和情感性角色常常不可分割。有意地将家庭劳动分工延续到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导致人们相信两性的社会不平等是合情合理的。弗里丹对美国白人中产阶级家庭主妇进行访谈,描写那些觉得陷入抚养孩子和做家务等无休止劳动的家庭主妇的孤寂与枯燥生活。在第一节中,她以“无名的问题”为主题展示出这样的声音:“除了我的丈夫、我的孩子和我的家庭之外,我还有所企求,对妇女们发自内心的这种呼声,我们再也漠然不顾了。”<sup>③</sup>她揭示了看似安适、充满爱的家,对于女性来说常常是充满了焦虑的,甚至是“令人窒息的”。这表明,如果夫妻之间是一种资源交换关系的话,女性对家庭、孩子和丈夫的关爱是她们的付出,她们要忍受生活的枯燥和无休止的家务劳动。

女权主义学者米切尔 1971 年出版了《妇女的财产》一书,用结构主义的观

<sup>①</sup> M. C. Lennon, & S. Rosenfield, "Relative Fairness and the Division of Housework: The Importance of Op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4, 100, pp.506—531.

<sup>②</sup> Talcott Parsons & Rober F. Bales, *Family, Socialization and Interaction Process* (London: Routledge, 1956).

<sup>③</sup> 贝蒂·弗里丹:《女性的奥秘》,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5 页。

点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在生产、生育、性和子女社会化四个因素作用下的境况和从属地位的由来。她认为,家庭是妇女从属地位的核心领域,“妇女被排除出生产,……她们被局限在家庭这个统一体中,这个由各项功能凝聚而成的单一整体里。并且这统一体恰恰是在每种功能的自然部分统一起来的,这就是当代的社会界定视妇女为自然存在的根本原因。”<sup>①</sup>

家庭并不是一个基于共同利益和相互扶持的合作单位,其夫妻间的交换关系也是不平等交换,家庭中的男性成员要比女性成员获益更多。夫妻交换上的不平等导致了他们在家庭权力上的不平等。有学者认为,只有妻子有了经济实力时,她们“讨价还价”的能力才会提高,才可以通过与丈夫谈判获得平等。因此,随着女性参与社会生产劳动,她们获得有酬劳动的机会增加,男性的资源优势 and 配偶间的交换关系也会发生变化。但是女性作为一个男性“服务者”的社会角色似乎没有本质变化,或者说这种改变还是太过缓慢。

#### (五) 符号化的情感劳动理论

传统理性选择理论强调人们的理性行为,其核心概念是制度性约束、机会成本以及个人的偏好。有学者用“制度性约束、机会成本和偏好”三个变量来思考两性劳动分工、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制度性约束、机会成本以及偏好的概念框架下,女性对初婚年龄、生育年龄、生育数量和是否参与有酬劳动都成了选择问题。传统理性选择理论在“偏好”的概念下,女性劳动被简化为“情感劳动”。所谓情感劳动(emotion labor)是指那些含有取悦他人目的的劳动。在传统理性选择理论的分析下,女性的“情感劳动”是其爱好或利他性偏好。而一些女权主义者将理性选择理论和符号互动理论相结合,指出正是女性被赋予了一个自愿付出的形象,才使女性“理性地”选择了其低下的客体化地位,而“情感劳动”并非是女性自然的、不求回报的自愿付出。

这种情感劳动还有向社会蔓延的趋势。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阿丽·霍赫希尔德在《可控心灵》一书中讨论了情感劳动。她指出情感劳动是一种需要人们设法调动自己的情绪、创造一种大家能够察觉并被接受的面部表情和身体语言的劳动。也就是说,人们的服务对象或公司不仅有权要求一个人付出体力劳动,同时还有权力要求你付出情感。即在工作期间,他们拥有你的微笑。她参与了亚特兰大 Delta 航空公司的空姐培训,这些训练就包括“微笑服务”。当前,社会经济越来越强调第三产业或服务型经济,这些经济主要以女性为主,

<sup>①</sup> 参见〔澳〕马尔科姆·沃特斯著:《现代社会学理论》,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89—290页;米切尔:《妇女:最漫长的革命》,载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45页。

工作的情感风格成为工作中的一部分。她发现,服务业的工人,像体力劳动者一样,常常对他们自己在工作中出卖的一些东西存在异化。体力劳动者可能会觉得自己的手臂像是机器的一部分或某个零件,而服务业工人则觉得自己与自己的情况有异化。这意味着我们通常认为情感是发自内心的,是我们个人私有的东西也成为要求被贡献出来的东西。<sup>①</sup>对此进行更为广泛的研究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

## 第二节 当代中国劳动性别分工

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使人们相信,妇女解放的关键是走出家门从事有酬劳动,以实现经济独立。这场深入到两性个体、家庭和社会诸多层面的革命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劳动性别分工。

### 一、两性共同参加劳动

在就业方面,社会主义制度体现在男女共同参与社会劳动上,女性成为各行各业中重要的劳动力。1949年,中国女性从业人员占职工队伍的比例仅为7.5%。1978年全国全民、集体所有制企业事业中的女职工达3128多万人,占职工总数32.7%,其中占国有经济单位职工总数的28.5%,占集体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职工总数的48.9%,比1953年增长了14.66倍。1979年以后,虽然经历了社会转型,女性高水平就业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态势,1997年,女性从业人员约3.3亿人,占从业人员总数的47%,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11%。1990年的统计数据表明,从世界范围内看,中国15岁以上的劳动人口中女性就业率为70%,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sup>②</sup>

<sup>①</sup> Arlie Hochschild, *The Managed Heart: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sup>②</sup> Nancy E. Riley, "Gender, Power, and Population Change," *Population Bulletin*, 1997, Vol. 52, No. 1, p. 10.

表 9-1 1980 年、1990 年、2000 年就业人口的行业性别构成(女性)<sup>①</sup>

(单位: %)

国民经济各部门	1980 年	1990 年	2000 年
工业(2000 年为制造业)	39.5	37.7	45.6
建筑业、地质普查和勘探业(2000 年为建筑业)	23.7	21.6	11.1
农、林、牧、渔、水利业	35.0	36.2	48.5
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业	22.0	24.1	18.1
商业、公共饮食业、物资供销和仓储业	40.7	44.5	49.6
城市公用事业(1990 年为房地产管理、公用事业、居民服务和咨询服务业/2000 年为社会服务业)	38.0	46.5	42.8
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事业	34.1	34.2	36.2
文教卫生和社会福利(1990 年为卫生、体育、社会福利事业、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视事业)	38.0	41.1	49.5
金融保险	29.0	35.9	46.8
国家机关、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	16.0	20.6	27.8
全国总计	35.0	37.7	45.3

从上表可以看出,中国女性已成为国民经济各部门的重要劳动力资源,在工业领域、服务行业、城市公用事业、文教卫生和社会福利事业中占有重要位置。市场经济条件下,女性就业率并没有减少。

## 二、双重角色与双重压力

双重角色是指中国劳动力既承担有酬劳动中的职业角色,又承担家务劳动中的角色。现代中国社会,无论男女皆承担着双重角色,也就具有了双重压力。对女性来说,她们家务劳动的负担较重;对男性来说,他们职业角色的负担较重。

2000 年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表明,与 1990 年相比,城乡男女两性每天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但由女性为主承担家务劳动的格局仍未改变。有 85% 以上的家庭做饭、洗碗、洗衣、打扫卫生等日常家务劳动主要由妻子承担。女性平均每天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达 4.01 小时,比男性多 2.7 小时,两性家务劳动时间的差距仅比 1990 年缩短了 6 分钟。城镇在业女性每

<sup>①</sup> 1980 年的数据取自于《中国统计年鉴 1981》,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22 页。1990 年的数据是根据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研究所和国家统计局社会与科技统计司编:《中国性别统计资料(1990—1995)》,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32 页计算。

天的家务劳动时间平均为 2.9 小时, 仍比男性多 1.6 小时。<sup>①</sup>

表 9-2 2000 年调查的洗衣劳动在家庭中的分配

家庭成员	总体			城镇			农村		
	合计	男	女	合计	男	女	合计	男	女
丈夫	3.5	4.2	2.8	8.5	9.3	7.6	1.9	2.6	1.3
妻子	92.2	91.6	92.8	87	86.1	88	93.8	93.3	94.4
家中老人(男)	0.1	0	0.1	0.1	0.1	0.1	0	0	0.1
家中老人(女)	1.5	1.8	1.1	2	2.3	1.6	1.3	1.6	1
子女(男)	0.1	0.1	0.2	0.2	0.1	0.2	0.1	0.1	0.2
子女(女)	2.3	2.1	2.5	1.3	1.4	1.2	2.6	2.3	2.9
其他人	0.4	0.3	0.5	0.9	0.6	1.2	0.2	0.2	0.3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表 9-3 辅导孩子的劳动分配

家庭成员	总体			城镇			农村		
	合计	男	女	合计	男	女	合计	男	女
丈夫	49.1	51.7	46.4	41	42.9	39.1	51.6	54.6	48.7
妻子	43.5	40.9	46	54	52.3	55.7	40.1	37.3	42.9
家中老人(男)	0.9	0.8	0.9	0.9	1.1	0.7	0.8	0.7	1
家中老人(女)	0.3	0.3	0.2	0.6	0.6	0.5	0.2	0.2	0.1
子女(男)	1.1	0.9	1.3	0.6	0.5	0.8	1.3	1.1	1.5
子女(女)	0.9	0.8	1	0.7	0.8	0.6	1	0.8	1.2
其他人	4.4	4.6	4.1	2.2	1.9	2.5	5	5.4	4.6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从上面两个表可以看出, 男性也开始承担家务劳动, 男性承担辅导孩子任务的比例接近 50%。家庭内部劳动性别分工依然是传统的, 男性负责价值较高的劳动, 女性主要承担洗衣服这类工作, 其比例高达 92%。

### 三、变化着的劳动性别分工

从观念形态上看, 两性平等的观念正在成为中国社会公民的主流意识。

第一, 女性的就业动机发生比较大的变化。1990 年的研究表明, 经济性动

<sup>①</sup> 参见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主要数据报告》, 全国妇联内部报告, 2001 年 9 月。

机是中国女性就业的主要动机,就业女性中持“为了维持家庭和自己的生活”和“为了赚更多的钱”观点的人占了99.4%。<sup>①</sup>这说明,构成中国女性就业的强制性因素是家庭经济因素、医疗生育养老保障因素和工作成本因素,其次才是政治动机和社会性动机,即主体意识、自我实现的成分。但到2000年,有88%的女性认为,如果配偶的收入足够高,或者家里有大量的钱财,自己仍然要工作劳动,持这一观点的城镇女性占84.9%,农村女性占89.1%。<sup>②</sup>

第二,女性自立意识增强。2000年中国妇女社会地位的调查表明,对于“男性能力天生比女性强”的说明,有66%的人表示不同意。过去社会上流行的“女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观点,有57.2%的女性表示“不太同意”和“很不同意”,其中城镇为62.5%,农村为55.4%。多数人不同意“女性应尽量避免在社会地位上超过她的丈夫”,城市女性表示同意的比例为14.4%。在自我价值和能力的评价上,女性也体现出了较强的独立意识,有79.9%的女性认为“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城市女性表现了更强的主体意识。

第三,渴望两性共同分担家务劳动。2000年中国妇女社会地位的调查表明,对于“男人应当承担一半家务”的提法,有82.3%的被调查者表示“同意”和“非常同意”,女性赞同比例比男性高10.6个百分点。<sup>③</sup>

第四,传统劳动性别分工的意识形态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2000年中国妇女社会地位的调查的一项数据值得关注,有30.1%的女性认为“没有孩子的女人不是一个完整的女人”,赞同此说法的比例高过男性的27.1%。有53.9%的男性和50.4%的女性同意或非常同意“男人以社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的说法。<sup>④</sup>有学者专门将调查样本中18—34岁的青年女性抽出来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在某一群体中,赞同这一观念的比例较高,意味着该群体传统性别角色意识较强,反之则较弱。在18—34岁的青年女性中,认同“男人以社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的比例为42%,虽然比总体低了约8个百分点,但是其比例依然较高。研究对导致这一现象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指出婚育状况、工作状况、受教育状况、主体性、居住地、活动半径等对青年女性的观念有影响。其中未婚者中只有20%的女性认同这一观念,而已婚者达48%,而且初婚年龄越低、生育孩子的数量越多,认同率越高。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女性对此的认同率为

① 《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概观》(全国卷一),中国妇女出版社1993年版,第66页。

②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编:《中国社会中的女人和男人——事实和数据(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版,第104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

21.8%；小学及小学以下毕业的青年女性对此认同率达到60.5%。在性别平等观念较强的城市，青年女性对传统性别角色规范的认同率较低，而农村性别不平等的文化氛围较浓，青年女性认同率较高。因此，改变传统等级化的劳动性别分工的关键是要构建两性平等的文化价值观。<sup>①</sup>

#### 四、农业劳动力的性别分化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农村经济的工业化得到持续的发展，这也带来了农村劳动力的变化，这种变化既发生在农业劳动上，也发生在非农就业上，出现了一系列的性别分化。

第一，从农业劳动看。有研究认为，由于男性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农村形成了新的劳动分工，妇女构成了主要的农业劳动力，即出现了农业女性化。<sup>②</sup>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女性在农村家庭内经济自主增加，但是农村家庭原来的性别关系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甚至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农村家庭的总收入提高了，但农村妇女在家庭中的处境却恶化了。因为家庭中的男性劳动力更多获得了非农工作，而更多的女性被留在了农业生产之中。在中国现有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情况下，通过非农就业所获取的收入，尤其是现金收入，比务农所获取的相对更高。因此两性之间的收入差距也不断拉大，她们在家庭中的权力和影响也不断被削弱。

第二，农村工业化的道路之一是以乡镇企业形式发展起来的“离土不离乡”的工业化。有研究认为，在农村工业化的过程中，非农就业机会实施的是“户平等”的分配。但在每个家庭中的分配是“先男后女，先长后幼，先内后外”，男性取得了更多非农就业的机会。1983年到1988年期间有6300万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乡镇企业中，所谓的“户平均”规则是指在家庭内部分配这种稀缺资源时，往往是男性更优先地获得，只有在男性已经占据了比从事非农工种更好的位置时，这种机会才会转让给女性。也就是说在分配稀缺的就业资源时，总是存在一个这样的梯级格局：男性总是首先占据最好的位置，而女性只能永远处于男性的后面。以对苏南地区非农化的研究为例，性别分工的变化是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而进行性别调整的。性别分工的弹性后面是利益调整的弹性，是比较利

<sup>①</sup> 陈方：《青年女性对于“男主外女主内”的态度及其相关因素》，蒋永萍主编：《世纪之交的中国妇女社会地位》，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第469—487页。

<sup>②</sup> 黄平：《未完成的叙说》，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益驱动后男性在调整与女性的分工。<sup>①</sup> 家庭性别分工的比较利益总是使男性获益大于女性,这成为调整性别分工的准则,无论两性在分工过程中承担什么样的劳动内容,利益总是向着男性倾斜。总之,乡村工业化的发展为农村劳动力提供了非农就业的机会,但用性别视角看,女性总是处在更加不利的地位。

第三,农村工业化的道路之二是以外出打工为主的非农就业。有研究表明,这种情形的非农就业收入对农村家庭具有重要意义。更为引人注意的是,在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出口加工区”中,存在着大量对女工的需求。有研究认为,农村男性劳动力外出打工的比例为 23.6%,而女性仅为 3.9%。<sup>②</sup> 也有的调查将婚姻状况加入进来,认为总体上农村男性外出的比例比女性高,但是在 18 岁以下年龄组中,女性外出的比例是男性的 2 倍。<sup>③</sup>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中国经济改革逐渐被纳入到全球化的发展轨道中。大批跨国公司在沿海地区设厂,中国劳动力在全球资本主义劳动分工链条中占有了重要的位置。2002 年中国吸引的国际直接投资超过 500 亿美元,成为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以广东省为例,一些发达的市镇,外来劳动力已经超过甚至数倍于本地人口,这其中六成以上是年轻的打工妹。深圳 1996 年总人口 345 万,其中户籍人口 88 万,外来农村人口 129 万,其中女性 83.6 万,占 64.8%。外来女工主要在制造业,特别是在宝安、龙岗区的“三来一补”工厂工作,她们的平均年龄只有 23 岁<sup>④</sup>。一方面,全球化的经济发展使穷乡僻壤中的姐妹们有机会走出乡村,进入城市,成为一名大机器生产线上的劳动者。但是她们经历的劳动颇像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常常是无偿加班,收入比城市劳动力低得多,还有恶劣的生产条件。另一方面,全球资本、各省市经济以及其家乡经济因女工劳动而获得了高额益处。这种种矛盾现象的核心就是性别与发展问题,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女性以其廉价的劳动,为其家庭、家乡还有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却常常被视作没有文化、不懂得保护自身利益的“打工妹”。

有学者对 211 名外出务工女性进行调查,其中 61.6% 的女性是家中第一个外出打工的,不少人家里有哥哥或有丈夫。这项研究表明,在不需要员工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和培训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大量吸纳农村劳动力的情况下,农村女性劳动力有可能改变原来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序列或性别序列,比男性更早

① 金一虹:《“男人生活”和“女人生活”——苏南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的性别分工变化》,李小江、朱虹、董秀玉主编:《主流与边缘》,三联书店 1998 年版。

② 李实:《中国农村女劳动力流动行为的经验分析》,《上海经济研究》2001 年第 1 期。

③ 杜鹰、白南生:《走出乡村: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实证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④ 谭深:《打工妹的内部话题》,《社会学研究》1998 年第 6 期。

更优先地获得非农就业这种稀缺资源。即使在婚后,她也可以通过某种安排,摆脱原来女性角色模式中要照顾孩子和家庭对于她们就业的束缚。与此同时,农村女性外出务工获得现金收入对家庭经济的贡献是巨大的。研究表明,外出务工女性收入对于人均收入的提高,特别是缩小两性收入差异是有明显作用的。未婚农村女性给家庭提供收入的最小值为 1738.5 元,其贡献也是明显的。外出务工的已婚农村男性给家庭经济的贡献均值为 4969.68 元,已婚女性给家庭的经济贡献均值为 2411.6 元。这种差距主要源于两性收入本身的差距,但依然可以看到,农村女性的务工收入是家庭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发现,“是否曾经外出务工”这个变量对于女性的主观权力感受和丈夫的决策比率有明显的相关性。可以说,中国农村家庭中,女性外出务工事件已经对农村家庭原有的性别关系产生了影响。<sup>①</sup>

总之,农村工业化过程和城市化过程已经改变了性别关系,这种改变的主要方向是积极的。

## 小 结

依性别对劳动进行分配产生了人类的劳动性别分工。当劳动性别分工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时,等级化的劳动性别分工,即男性劳动价值远大于女性劳动价值的状况就出现了。现代社会,等级化的劳动性别分工是以公私领域分化的意识形态为基础的,由此掩盖了两性合作劳动的历史、低估了女性家务劳动的价值和女性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对社会的贡献。产生等级化劳动性别分工的社会动力机制是复杂的。二元制理论认为,劳动性别分工是父权制和资本主义体制之间长期互动的结果,它们既是具体的关系制度又是意识形态和心理结构。父权制资本主义的理论认为,资本主义本身就是父权制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导致妇女边缘化的重要原因,资本主义压迫妇女是它的一个基本属性。交换理论和情感劳动理论皆揭示出性别气质对劳动分工的影响。

现代中国的劳动性别分工已经打破了传统的内外格局,呈现出男女共同参加社会生产劳动这一不可逆转的现实。两性都承担着社会劳动和家务劳动的重担,男性社会角色的负担和压力更重些,女性家庭角色的负担和压力更重些。从观念层面看,传统劳动性别分工的意识形态正在向着平等性别观念转变。中

<sup>①</sup> 马春华:《市场化和中国农村家庭的性别关系》,蒋永萍主编:《世纪之交的中国妇女社会地位》,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15—542 页。

国农村劳动性别分工在转型过程中发生了复杂的变化,两性劳动发生了多元的变化,女性在成为农业重要劳动力的同时,也加入到工业化的进程中,对其家庭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 ✧关键概念

劳动 劳动分工 劳动性别分工 劳动性别分工的意识形态  
等级化的劳动性别分工 延迟的适应 二元制理论 父权制的资本主义  
情感劳动 双重角色

### ✧思考题

1. 论述等级化劳动性别分工的社会后果。
2. 论述父权制资本主义的理论。
3. 论述当代中国农村劳动性别分工的主要特点。

### ✧进一步阅读文献

- [美]贝蒂·弗里丹:《女性的奥秘》(程锡麟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 金一虹:《“男人生活”和“女人生活”——苏南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的性别分工变化》,载李小江、朱虹、董秀玉主编:《主流与边缘》,三联书店1998年版。
- 海迪·哈特曼:《资本主义、家长制与性别分工》,载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三联书店1997年版。
- 凯琳·萨克斯:《重新解读恩格斯——妇女、生产组织和私有制》,载王政、杜芳琴:《社会性别研究选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
- 艾里斯·扬:《超越不幸的婚姻——对二元理论的批判》,载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三联书店1997年版。

## 第十章

# 两性职业发展

### 引 子

对两性职业发展的思考,实际上是关注现代社会组织中的性别关系。现代社会,“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是国际劳工组织倡导的社会目标,无论男女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都是一个人过上独立生活的先决条件。因此,在社会组织结构中两性的地位成为人们参与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

一名已经做了祖母的美国职业女性写了一本名为《玩似男人赢似女人》的书,她写道:

我被邀请到哈佛商学院给女学生做报告。我认为这里应该是一个女人占统治地位的工作场所。

实际证明我错了。哈佛的女学生确实学到了许多科学知识和本领,毕业后也都得到了相当高的地位,但她们却感到孤立。她们还是抱怨在以男性定位的工作场上的失落感,而且对如何应对感到茫然。

.....

我的最大愿望是有一天我们将不再进行有关男女在工作方面不平等的对话。到了那时,我们就会以平等的身份走上工作岗位,而工作的优劣

完全取决于自身,完全排除了性别的差异。<sup>①</sup>

从书名《玩似男人赢似女人》可以看出,职业场所犹如游戏场,要以玩的心态进行竞争;但是“玩似男人”说明在职业场上的游戏规则是男人制定的,因此“赢似女人”并非易事。

中国 20 世纪 50 年代后进行的社会主义的实践,实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提倡的妇女参与社会生产劳动的理想,“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而要达到这一点,又要求消除个体家庭作为社会的经济单位的属性。”<sup>②</sup> 本章事业以组织为背景,讨论影响两性职业发展的因素和工作场所存在的性别不平等状况,探求改变组织中性别不平等的可能途径。

## 第一节 职业发展与性别

### 一、传统职业发展理论

职业是现代社会个人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传统职业发展包括个人工作的全程,是职业进入、职业升迁、技术等级的晋升等过程。职业发展与职业期望、职业晋升等环节相关,是人们通过职业获得的社会位置。传统职业发展理论认为,人们沿着职业阶梯的路径发展,其职业发展分为两部分,一是通过职业获得地位,二是职业生生涯的全程。

#### (一) 职业地位获得理论

职业地位获得理论具有结构主义的特点,重点分析是什么因素影响了人们职业地位的取得。该理论强调阶级状况等先赋性因素和受教育程度等自致性因素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起作用。

1967 年,美国社会学家布劳和邓肯在《美国职业结构》一书中分析了“职业地位获得”的社会机制。其基本理论假设是:第一,职业地位的获得意味着社会地位的获得。第二,美国社会作为一个开放社会,个人所受教育和最初的职业

<sup>①</sup> [美] 盖尔·埃文斯:《玩似男人赢似女人》,中信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1 页。

<sup>②</sup>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62、72 页。

等自致性因素对个人社会地位的影响远比父亲的职业和其家庭出身等先赋性因素要大得多。<sup>①</sup>

特瑞曼(Donald Treiman)发展了布劳和邓肯的研究,他把目光从美国一个国家转向了具有不同现代化程度的国家,将“工业化程度”作为变量,分析不同工业化程度的国家影响人们职业地位获得的因素。他的理论假设是:第一,存在两种类型的职业地位获得模式,一种是经由先赋性因素(ascribed factor)获得职业地位;另一种是经由成就性因素(achieved factor)获得职业地位。第二,传统社会是一种先赋性因素起作用的社会,现代社会是成就性因素起主要作用的社会。第三,从传统职业地位获得模式向现代职业地位获得模式的转化依赖于工业化程度。在传统社会,工业化程度较低,职业分化的程度不高,父子的职业知识、技能、机会的传递比较容易,人们职业地位的获得主要依赖家庭背景。现代社会,工业化程度较高,职业出现分化,父子间在职业知识、技能和机会的传递上较为困难,教育水平和前期职业培训的作用突出出来,教育成为职业地位获得的重要中介。他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证资料证明了这一理论的有效性。<sup>②</sup>这一分析框架被称为“现代性”模式,它预言随着工业化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职业地位的获得将依赖于个人成就性因素,且这种状况具有普遍性,为认识现代社会职业地位获得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框架。

20世纪70年代后的人力资本理论强调教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职业地位获得的重要性。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们的受教育程度、工作经验的积累等因素与个人的职业发展有强相关。舒尔茨等人指出,在现代社会,个人的才干、知识、技能和资历等等都是稀缺资源,它们具有经济价值,是一种可以获得回报的资本,在劳动力市场上可以增值。那些具有人力资本的劳动力能够在劳动力市场中获得优势地位,获得更好的职业发展。人力资本理论从经济理性的角度解释了现代社会个人才干、知识、技能和资历的形成、发展、积累过程以及对其职业发展的作用<sup>③</sup>。

## (二) 职业生涯理论

职业生涯研究也称为工作史研究,是对人们占有的、具有一系列社会位置

<sup>①</sup> Peter M. Blau & Otis Dudley Duncan,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New York: Wiley, 1967).

<sup>②</sup> Donald Treiman, "Industrialization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Edward O. Laumann, ed., *Social Stratific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for the 1970s*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70), pp.207—234.

<sup>③</sup> Theodore W. Schultz, *The Economic Value of Educ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3).

的职业的连续考察,是个人职业生命周期的全程。职业生涯研究的视角突出了生命全程的意义,显示出社会宏观诸因素与微观行动者之间的联系。社会学家戈夫曼认为:“职业生涯研究的价值在于它的双重性。一方面,它紧密联系人们的内在状态,如对自我的想像、自我认同等;另一方面,又涉及社会地位、法定关系、生活方式等方面的问题。它是一个有着广泛影响和现实意义的制度综合体的一部分。职业生涯的概念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个人与公众、自我和强大的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sup>①</sup>

传统职业生涯理论的基本假设是:第一,一系列的职位代表某种“进步”,是沿着科层制组织的职业阶梯升迁,是工资增长、自尊增加以及个人职业自由度的扩大等。第二,职业生涯的进步意味着成功。社会成功人士成为重点研究对象,律师、教师、医生和会计等专业人员的职业生涯研究丰富起来。社会学通过对这些专业的研究发展了职业社会化、职业发展、职业中的权威关系等研究。例如,阿兰·凯克赫夫(Kerckhoff)基于对挪威、德国和美国的比较研究发现了这样几个命题:1. 作为分层机制的高等教育强化了人们以社会经济地位为基础的出身和受教育水平之间的联系,教育分化开始得越早,职业生涯受出身的影响越大。2. 来自不同系统的教育具有分化个人职业发展的能力。地方控制的教育系统和非地方控制的教育系统的差异是对人们职业发展有意义的变量。3. 具有特殊职业教育文凭的学生比具有一般文凭的学生具有更加明显的工作机会和更稳定的较早就业的经验。4. 在不同的社会,那些兼具学校教育和工作经历的人都有更稳定的就业机会和更有秩序的早期职业生涯经历。5. 在内部劳动力市场中,具有一般教育文凭的人比具有特殊职业教育文凭的人有更好的发展机会。6. 在不同的社会,具有特殊职业教育文凭的人比具有一般教育文凭的人显示出教育和职业生涯之间的显著关系。<sup>②</sup>职业生涯理论强调教育的作用。

## 二、重新定义职业发展

### (一) 反思传统职业发展理论

传统职业发展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影响人们职业地位获得的因素,但是这一理论的致命弱点是,它没有包括女性工作的经验。当我们把不同性别的

<sup>①</sup> E. Goffman, "The Moral Career of the Mental Patient," in *Asylums* (New York: Doubleday Anchor, 1961), p. 127.

<sup>②</sup> Alan C. Kerckhoff, 1995.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Stratification Processes in Industrial Societies," *Annual Review Sociology* 1995, 15, pp. 323—347.

人纳入这一理论时就会发现,它难以解释女性职业发展的经验,因为当女性获得了高等教育之后,她们在职业场所的发展依然困难重重,单凭其自身的努力是很难出人头地的。传统职业发展理论的致命弱点在于,它只视工作为男人的领域,忽视了女性的职业经验,以至于无法解释两性职业发展上的差异。因此有必要在反思传统职业发展理论的同时进行有助于解释两性职业发展的研究。

认识两性职业发展的前提是承认在工作组织中女性受到的歧视。工作的性别歧视是指在工作进入、晋升和收入上因性别而进行的区别对待。在职业发展上,人们常常认为女性没有男性那样有发展潜力,应当给男性更大的发展空间;女性常常要证明自己比男性做得更多、更好、更完美才有可能得到晋升。这样两种状况都可称为性别歧视。一项对美国职业女性进行的大规模调查表明,约有五分之一的人承认她们在晋升时遭到歧视。美国最有声望的科学和工程院院士——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分院进行的一项关于性别歧视的研究揭示了令整个大学社区震惊的歧视行为。女性不仅在晋升、薪酬方面具有劣势,并且从来没有一位女性担任过系主任的职务。<sup>①</sup>

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女性在寻找工作时都遭遇过歧视,这些歧视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职业隔离;二是女性大量从事非正规就业和兼职工作,三是两性工资差距。

### 1. 职业的性别隔离

各国家都存在某些性别化的工作,那些“女人的工作”包括了办公室秘书、护士、幼儿园阿姨等,这就是职业的性别隔离。职业的性别隔离是指根据对“适合于”男性与女性工作的普遍理解,将男性和女性分配于不同的职业,由此导致两性在不同职业中的集中状况。女性更多的是从事那些职业地位低、服务性或辅助性的工作;男性则更多地从事具有技术要求和有职业等级的工作。

职业的性别隔离表现为垂直隔离和水平隔离两个方面。水平隔离是指女性从业人员中超过50%及其以上的工作类型,这些工作类型以简单工作为主。垂直隔离是指女性的工作集中在没有多少权力与提升机会的工作上,男性则集中于拥有更多权力和影响力的工作岗位。

<sup>①</sup> [美]埃托奥、布里奇斯著:《女性心理学》(苏彦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0页。



表 10-1 1990 年中国 10 种“女性”职业<sup>①</sup>

职业类别	性别比例	职业类别	性别比例
幼儿保育员	99.75	图书资料业务人员	77.91
家庭服务员	98.77	档案业务人员	74.64
护理人员	95.66	电信业务人员	72.77
旅店、饭店服务人员	85.19	环境清洁卫生人员	67.26
纺织、针织、印染人员	78.42	财会和审计人员	59.18

## 2. 妇女从事大量的非正规就业和兼职工作

随着全球劳动力市场越来越具有弹性和鼓励灵活就业的政策,女性越来越多地从事非正规就业或兼职工作。非正规就业也称为灵活就业,是一种不稳定的就业,包括非全日制、临时性和弹性工作。非全日制工作也称为半日工作,即人们半工半读或半工半家务劳动的状况,一般是以小时计酬。英国是女性非全日制工作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80 年代,女性经济活动的发展,绝大部分都是靠兼职工作促成的。到 1994 年,女性承担了英国全部兼职工作的 78%。<sup>②</sup> 改革开放后,中国出现了女性实际失业率比男性高 1 个百分点的状况,<sup>③</sup> 许多女性采取灵活就业的方式,其特点就是以临时性工作为主,不享受国家规定的各类社会保障。

## 3. 两性的收入差距

世界各国两性收入之间的差距(income gap)普遍存在。联合国的调查表明,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女性劳动者都比男性挣得少,女性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大约是男性劳动者平均收入的四分之三。其主要原因是结构性的,即地位低和薪水低的双低工作是女性的主要工作,导致了女性收入普遍较低。

中国 1990 年的全国妇女地位调查表明,城市男女职工平均月收入分别为 193.15 元和 149.60 元,女性的平均收入是男性收入的 77.4%;农村男女年平均收入分别为 1518 元和 1235 元,女性年均收入是男性的 81.4%<sup>④</sup>。2000 年的全国妇女地位调查表明,城镇在业女性包括各种收入在内的年均收入为 7409.7 元,是男性收入的 70.1%,男女两性的收入差异比 1990 年扩大了 7.4 个百分点;以农林牧渔业为主的女性前一年的年均收入为 2368.7 元,仅是男性收入的

① 刘德中、牛变秀:《中国的职业性别隔离与女性就业》,《妇女研究论丛》2000 年第 4 期。

② [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97 页。

③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编:《中国社会中的女人和男人——事实和数据(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4 年版。

④ 陶春芳、蒋水萍:《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概观》,中国妇女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84—89 页。

59.6%，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19.4个百分点。<sup>①</sup>

在美国，男女两性即使从事同样的职业并具有同样的资格，女性收入的中位数仍远低于男性，女性的平均收入不到男子平均收入的五分之三。<sup>②</sup> 有学者指出，“低薪职业和低薪行业的双重成长是女性受雇人数成长的主要原因。至少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是如此。这种状况深深地影响女性生活，较低的劳动报酬使她们必须依赖男性。”<sup>③</sup> 由于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不平等的处境，在家庭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妇女的贫困化日益加剧，女性贫困人口占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有贫穷人口的70%，且比例仍在增加。

两性收入差距是职业结构因素决定的，还是存在性别歧视呢？有研究表明，在那些以女性为主的领域，女性薪酬仍然比男性低。1998年的美国，女护士的收入为男护士的95%；女出纳员的工资是男出纳员的86%；在餐厅服务员中，女性收入是男性的82%。<sup>④</sup> 可以说，职业结构因素部分地说明性别收入之差，但性别因素依然在起作用。有学者认为，两性收入差距主要源于最初工资和工资增长率的差别。女性最初工资并不比男人低，但她们在某一职业中工作的时间不足，如生育等，没有获得应有的补偿；而男性由于在同一领域工作的时间较长，很快会增加经验并超过女性工资的增长率。<sup>⑤</sup> 两性就业连续性的差异导致了两性工资增长率的差别。

总之，传统职业发展理论不仅以男性职业经验为基础，还有意或无意地掩盖了劳动力市场和组织结构中的性别歧视。

## （二）重新定义职业发展

如果只把职业位置或职业技能上的晋升定义为职业发展的话，多数女性从事的服务性工作或非正规工作就无职业发展可言。同时，许多女性出于家庭生计的考虑进入到各类职业结构中，特别是在从农业向工业化转变的过程中，打工妹们常常处于“用完即抛弃”的被剥削境地，应当从性别与工作的不平等状况中重建职业发展理论，以容纳两性在职场上发展的经验，这种职业发展可称为

① 全国妇联、国家统计局：《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主要数据报告》，全国妇联内部刊物，2001年。

② [美]伊恩·罗伯逊著：《社会学》上册，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426页。

③ Natalei Sokoloff, "What's Happening to Women's Employment: Issues for Women Labor Struggles in the 1980s—1990s," in C. Bose, R. Feldberg, and N. Sokoloff, eds., *Hidden Aspects of Women's work* (New York: Praeger, 1987), pp. 14—45.

④ [美]埃托奥·布里奇斯著：《女性心理学》（苏彦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3页。

⑤ H. Zellner, "The Determinants of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in Cynthia Lloyd, ed., *Sex, Discrimination,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新型职业发展,即通过与职业相关的活动个体取得的获得资源能力的增长,它包括获得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能力的增长,这些能力具有可交换性或可替代性。

获取政治资源能力的增长是指人们通过有酬劳动不断参与政治生活和其政治生活意识、能力和地位的提高,如在工作岗位上加入中国共产党、工会组织和成为职工代表等。获取经济资源能力的增长是指人们通过有酬劳动经济收入和获取收入能力的提高,获得社会经济地位。获取社会资源能力的增长是指通过职业活动获得的与个人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社会关系量的增长。社会资源是嵌入在个人通过其社会网络连接起来的可以共享的资源。通过有酬劳动可能获得的社会关系网络是职业发展的一部分。社会关系网络深深地影响着职业进入和职业晋升,中国是个具有明显“差序格局”和依靠“特殊主义”原则行事的国家,社会关系网络的占有状况表明人们职业发展的潜力。从新型职业发展理论出发无论男女皆可以通过职业经验的获得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

这一新型职业发展的定义可以有效地发展出两性职业发展的策略,以改变职业场所两性不平等的状况。女性通过职业经历增加获取资源的能力,而不是简单地追求职位的提升。工作不仅可以带来社会地位,工作还带来满足感。通常来说,男性通过在事业上金钱、权力和威望的获得来实现成就感。而女性不同,她们更倾向于通过职业发展自由和独立的感觉。

### 三、影响两性职业发展的因素

影响两性职业发展的因素很多,由于宏观上存在性别歧视,本节首先介绍各种微观层面影响两性职业的因素,以寻找突破阻碍女性职业发展的力量,其次分析影响中国两性职业的因素。

#### (一) 职业期望

职业期望是人们对自我的职业兴趣、职业计划、职业的可能发展做出的展望。职业期望和职业发展之间是个双向作用的过程。职业期望会直接影响人们对自我职业发展的定位,同时职业发展的状况又会作用于人们的职业期望。职业期望包括对事业与家庭间关系的选择、成就目标、工作价值等问题的看法。

地位期待理论强调社会性别、地位期待和权力——影响间的关系,认为当男女同时进入某个团体时,是以性别为基础的职业期待影响了两性的职业发展,男性比女性更有竞争力是因为人们对男性的绩效有更高期待,而女性则相反。对两性职位期望的差异自动地降低妇女的自信、职业声望、权力和在团体互动中的影响力。也就是说,群体互动的过程强化了男性成员的地位和权力,

这些期待是性别间分配奖励性的社会权力、地位和尊重的基础,也就是性别分层的基础。

首先,从事业与家庭的关系看,事业与家庭孰轻孰重是个可以商榷的问题,但不同的行为取向将影响两性在职业发展道路上的分野。人们普遍期待男性在事业上发展,因为男性毕竟是一家之主;也普遍期待女性应当更多地对家庭承担责任。一项对美国大学生的调查表明,虽然男女大学生都谈到了事业和家庭,但没有任何一位女性提到要将事业放在家庭的前面;相反,有些男性承认他们的事业永远是第一位<sup>①</sup>。

其次,成就目标的大小影响人们在未来职业中的努力程度。心理学的研究认为,女性成就之所以比男性低,主要原因是两性间的成就动机存在差异。传统观点认为,女性的成就动机,即她们欲求杰出的需要比男性低。对此的批评是这种传统观点是建立在传统的成就—唤醒的模式基础上的,这一理论是以男性为本的研究,其研究程序并不适用于女性;当使用不同的成就—唤醒指标时,女性会表现出比男性更高水平的成就动机。

人们普遍相信,两性具有相同的成就动机,但由于社会化过程中两性接受了不同的固定化的性别气质,以至于男女形成了不同的家庭理念和工作理念,也就塑造了他们不同的成就目标,男性更多地期望事业成功,女性更多地期待家庭的完美。在社会化过程中,两性从家庭、同辈群体、教师等处获得与性别相关的期望,他们不仅获得了对成功的理解,也学到与性别相关的成功方向,女性很有可能调整自身的成就目标以满足社会的期望。有研究表明,即使是高学历的大学女生,大多数依然倾向于寻找事业上比自己更出色的男性为配偶,婚后会比丈夫更多地操持家务;而男大学生的择偶意向正相反。<sup>②</sup> 有研究认为,女性的职业抱负不仅受社会化的影响,还受到男孩和女孩身处的网络位置的长期影响。对同性儿童网络的分析表明,同性网络在人们的生命周期中不断累积起来,这一网络延续了内在的职业目标,这种职业目标的性别差异在成人网络中更为明显,它促进了两性在职业抱负、工作机会和职业行为上的分野。

现代社会的变化是巨大的,目前更多的女性将事业作为自己的成就目标,也有不少女性追求事业和家庭的双成功,一项研究显示,和认为婚姻是妇女最重要的快乐源泉的传统观念相反,最能带给职业女性幸福感的是一个具有威望

<sup>①</sup> Julia M. Klein, "Is There a Child in Their Future?" *Radcliffe Quarterly*, March 1977.

<sup>②</sup> 仇雨临、潘锦棠:《男女大学生就业竞争力差异之比较》,《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2年第6期。

的工作,而不是丈夫。<sup>①</sup>

## (二) 劳动力市场

劳动力市场并非是一个简单的统一市场而是分化的市场,性别因素作用于分化的劳动力市场而使女性处于弱势地位。

首先,劳动力市场可以分化为内部劳动力市场(internal labor markets)和外部劳动力市场。内部劳动力市场是指某一职业领域、行业或组织内部的劳动力供求。这是个相对的概念,它可以指某一组织中的劳动力市场状况或工作阶梯;也可以指一个职业领域或行业中的劳动力市场供求。对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揭示可以使人们看出,职业发展事实上是被限定在一定范围中的,组织内部的运作机制与个人职业发展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因为任何工作发展的阶梯以及阶梯间的移动都内涵在组织内部的规则中。在内部劳动力市场中,不仅是个人能力的差异,更主要是老板可能提供的发展机会的差异使个人工作技能和知识有着不同的发展轨迹。这些机会变化伴随着先前的状况,是一个累积的模式,较早的提升为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机会。

内部劳动力市场存在着工作队列的性别化(the gendering of job queues)。内部劳动力市场的“空缺链”,即当某一职位出现空缺时,它首先对内部劳动力市场的人打开。那么这个“空缺链”会对谁打开呢?一方面,个人要想晋升到较高位置必须首先占有那个接近这一位置的较低位置。某一位置的空缺(如退休)对于那些不在这个等级链中的外部劳动力市场的人来说,其升迁的机会是完全“封闭”的。另一方面,人们进入某一职业位置的可能性是不同的,机会链条是结构性的。女性处于双重缺失发展机会的境地,其一,在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中多数女性根本无法进入具有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单位,只能在中小企业寻求工作,这一结构决定了妇女不具有内部升迁的机会。其二,女性即使进入了内部劳动市场,她们依然缺少发展链条,在职业升迁的等级链中许多位置对妇女是“封闭”的。

其次,劳动力市场是一个等级化的劳动力市场,它至少可以分为高级劳动力市场和次级劳动力市场。高级劳动力市场是由具有较高文化程度、技术专长的人组成的。次级劳动力市场是由没有什么技术专长的人组成的。劳动力市场的等级化是指不同的劳动力市场之间是相互排斥的,即从次级到高级劳动力市场具有不可进入性或高级劳动力市场排斥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性别

<sup>①</sup> Hunter 学院妇女学集体:《改变现状,展望未来》,余宁平、杜芳琴主编:《不守规矩的知识》,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25—226 页。

是劳动力市场分隔的标志之一。劳动力市场分隔的概念首先应用于种族研究,众所周知作为劳动力的黑奴从来没有获得过应有的权利和地位,其种族分隔的传统一直延续到自由资本主义以及全球资本主义的时代。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分隔(sex segregation)是指因性别差异而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不同的价值,男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优势地位和女性的弱势地位构成了两性制度化的社会距离,甚至出现了男性劳动力市场和女性劳动力市场之分。

女性劳动力多被局限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中,高级劳动力市场对女性是隔绝的,她们无力改变处于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地位。那些没有能力进入大学的女性根本无法进入到高级劳动力市场中,其升迁机会对她们来说是完全封闭的。女性由于承担生育及养育功能,无法与具有同样教育背景的男性进行竞争,因为在时间成本和未来发展预期上两性失去了可比性。劳动力市场性别分割的基础是两性不同的生理功能和其背后的社会价值。女性生育的显功能在劳动力市场中产生了某种制度安排,它使女性处于缺少发展机会的境地。

依照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次级劳动力市场是个信息不完全的市场,一方面,市场本身并不要求对求职者未来的工作表现进行估计,只是按照种族、性别、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经验等决定是否雇用,这时其群体的结构特征、习惯的价值观念直接影响人们的判断力。人们习惯地认为,女性群体较男性受教育水平低,职业生涯短,不需要职业发展。雇主进行雇用决策时,利用群体信息修正个人资料,结果是出现系统歧视。另一方面,处于次级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动,也不能获得完全信息,她/他们总是处于被挑选的位置。劳动力市场的等级化包括了因性别、种族、阶级分化,劳动力市场的分隔最终以人们在职业进入、工作内容、工资收入和工作评价等的差别显示出来。劳动力市场的分隔并非是无形的,而是有形的区隔,女性被制度化地隔离在某些工作之外。

### (三) 母爱的建构

“伟大母爱”的赞誉是对母爱牺牲精神的歌颂,它强调了操持家务、照顾孩子是母亲的天职。歌颂背后的潜台词是一旦家庭事务或子女养育出现了差错就是女人的责任。“伟大母爱”的角色让女人身陷温柔之乡,在无私奉献的赞美声中失去社会发展的空间。

女权主义理论认为,“伟大母爱”之赞誉是一种社会建构,大约是在19世纪西方社会才开始将母爱神化和系统化,并不断强调母亲作为天生教育家的作用,相关的论著和书籍也大量涌现,母亲的形象成了自我牺牲、善良、恬静、温柔

的代名词。<sup>①</sup> 中国传统社会强调的是“子不教、父之过”，但近现代以来也开始强调母亲在教育中的作用。但是，除了为人父母所带来的人生意义和快乐之外，照顾和教育孩子是一项充满挫折和烦恼的人生经验，孤独、负担过重与焦虑不安是大多数母亲的真实感受，这些负面的经验与那种赞誉之声的对比更会增加母亲的焦虑和不安，并促使其放弃或减弱在职业场所的追求。当各种媒体不断强调“伟大母爱”时，各种报告也常常以科学代言人的身份强调母亲对子女成长的重要作用，以及母亲“失职”带来的社会问题。

现代社会，女性仍然选择作母亲的原因可能有很多原因，既有天性也有社会建构，因为“强烈的母性行为最可能增加社会性回报”<sup>②</sup>。也就是说，社会以各种“社会性回报”鼓励女性选择将行为固定在那些以服务他人、特别是服务亲人的行为上，这样就使女性行为具有了结构性。沃尔斯通认为，两性权力关系对比的结果是将女性固定在家庭中，当婚姻中的一方认为自己居于弱势地位、能力较差、付出较多时，就会努力认同对方。这并不是爱情本身的错，而是政治的，是性别权力不平等的结果。<sup>③</sup>

#### （四）组织的性别策略

从社会性别角度出发，不仅需要讨论工作组织中两性角色的不平衡状况，更要探索现代组织是如何以一套特殊的性别分工的方式发展起来。现代组织依靠科层制组织形态建立了一系列的职业位置的性别结构，使两性在这一结构中被组织进职业场所。这主要表现为职业的性别隔离，即把女性置于低报酬、没有发展机会的工作岗位上。女性在职场上被视为廉价的、可靠的、好管理的劳动力资源，根本就没有被赋予与男性相同的事业发展机会。职业场所中发展出来的性别歧视依靠组织策略实现了组织中的父权制。

第一，在观念层面上，固定化的性别气质导致雇主们习惯性地认为，女性是缺乏能力的、没有男人那样有抱负、果断和自信。在观念偏见之下，女性根本无法进入竞争晋升的行列。一项研究表明，女大学生认为女性管理者具有高水平的管理能力，而男大学生则不同意这一看法。男生们用非常消极的眼光看待女性管理者，认为她们痛苦、容易受影响、急躁、紧张、被动、害羞。研究认为，由于一半以上的管理者和行政人员为男性，他们主宰了高级主管的职位，他们对

<sup>①</sup> [法]吉尔·里波韦兹基：《第三类女性：女性地位的不变性与可变性》，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92页。

<sup>②</sup> Judith Lorber, "On 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 A Methodological Debate", *Signs*, 1981, 6, p. 484.

<sup>③</sup> Shulamith Firestone, *The Dialectic of Sex* (New York: Bantam, 1971), p. 132.

女性做出了不公正的评定。<sup>①</sup>这种职场上的性别价值观形成的男性支配方式使女性总是处于从属地位,在这种组织观念下,即使个别女性到达了某些权力位置也会依从于传统的组织原则。

第二,在实际工作层面上,随着层级升高,管理部门女性的逐渐减少,使男性管理者面对女性职业发展产生紧张,管理者会有意回避女性下属的发展。同时,男性管理者多认为与男性群体更容易沟通和达到一致,也理解他们的职业发展要求,因此会更多地注重男性的发展。有学者认为,这种状况是职业发展中的“男性同质社会性”(male homosociability)。男性通过这种方式成功地将权力保持在一个男性圈子内,并且只允许同一个“圈内”的成员接近权力。因此,女性的晋升机会被有效地剥夺了,女性缺失了对提升而言至关重要的社会关系网络。<sup>②</sup>

一些尖锐的观点认为,女性在高层管理集团中占有如此微弱的比例,丝毫不是由她们本身的特性决定的,而是由于公司集团为了保持性别一致而拒绝和排斥女性。因为就一个组织来说,保持成员的一致性对于评估职责和完成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他们任用和升迁那些在性别、思维、言行甚至在外表上与他们近似的人员,而排斥那些“异己”。借口女性工作不积极而牺牲其工作发展机会似乎成为顺理成章的事。而女性在高层领导集团中的微弱力量也导致了大型现代组织中单一性别循环的不合理结构。

第三,美国社会学家坎特(R. Kanter)提出了“玻璃封顶”(a glass ceiling)的概念。所谓玻璃封顶是指在女性职业发展的途径上,存在着一种看似存在、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发展路径,即女性的职业发展被一层酷似玻璃般的组织结构和文化封闭了。坎特假设:其一,工作组织是个广泛的环境,这个环境独立于个体而存在。其二,在工作组织中,个人能够采取灵活的策略以求最大可能地扩展工作意义和自主性。也就是说,个体在决定如何从事自己的工作方面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度”;但是这种自由的权限无法超出组织设立的正式限制。其三,个人能否胜任工作是职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其四,展示个人能否胜任工作的机会不是平均分配的,特别是它不是在性别间平等分配的,因此,女性尽管已经进入职业领域,但她们依然处于从属地位。坎特从机会、权力和比例关系三个维度分析工作组织对个人职业发展的影响。首先是机会,对机会较少的人来说,如秘书,她/他们往往比较缺乏自尊和职业期望,倾向于获得直接的报酬,寻求

① [美]埃托奥、布里奇斯著:《女性心理学》(苏彦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1页。

② Rosabeth Moss Kanter, *Men and Women of the Corpor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7).



同伴群体的内部保护;对机会较多的人来说,如管理者,她/他们多乐于竞争,倾向于追逐权力,认同整个组织,自尊感更强。二是权力,所谓权力是动员资源以实现个人利益的能力。权力较少的人,如监工,往往对上惟命是从,对下独裁强制;而权力大的人,如总经理,往往不轻易发号施令,而是激励下属,乐于助人。三是人员比例,是在组织中不同种族、性别人员的混合状况,某一类别的人如果占的比例较少,他们往往惹人注目,倍感压力,循规蹈矩;而比例较多的人,则与群体水乳交融,可以更为直接地建立关系网络,充满自信地展示自我。

坎特的结论是,首先要根据两性在工作组织中的位置,而不是人们的性别来说明其在组织中的行为。男人不是必然地、主动地歧视女性。相反,是妇女自己表现得似乎没有很好的从事管理工作的潜力,因为她们从事的工作助长消极、被动的工作情绪,缺乏对组织的认同,无法从容地展示自我。第二,工作组织中的性别发展模式是自我再生产的。有些组织“装点门面”般地雇用女性只会使妇女处于被动状态,因为缺乏表现机会,妇女不太可能表现出能够胜任重要工作的样子。这种装点门面的位置使妇女处于进退两难的矛盾处境。一方面她们作为少数、具有象征意义的成功女性与其他职业女性分割开;另一方面她们要保持这种象征性的地位,必须付出两倍于同等职位男性的努力,承受紧张、压力和孤独。在社会组织结构中,这种使人又爱又怕的处境在男女两性身上都会发生,但它的象征性意义是不同的。就男性而言,他在女性集聚的女性化职业里成为一种门面,却往往掌握着这些职业领域中的技术、管理和权力的大量资源。而女性在男性为主的职业领域里成为门面的话,却必须付出双倍的努力,压力大于收益。<sup>①</sup>女性在数量上的劣势往往令她们退出潜在的发展,这并不是她们害怕成功,而是害怕成为人们的焦点。第三,性别歧视的组织策略使组织能够通过歧视女性获得好处。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男人们在工作当中感受到来自女性工作竞争的压力,女性的职业发展对男性职业发展构成了威胁,因此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有意识的歧视女性不仅可以减少威胁,还能够给雇主带来直接的好处。用理性选择理论对中国就业上的性别歧视进行解释会发现,性别歧视是一个没有成本的歧视,招工广告的性别歧视不仅排斥了女性劳动力,还使男性劳动力处于较低的工资水平。

① M. Millman & Rosabeth Moss Kanter, *Another Voice, Gender City* (New York: Doubleday-Author, 1975).

② R. Kanter, *Men and Women of the Corporation* (New York: Basic, 1977), pp. 250—253.

#### 四、两性职业发展的未来

反性别歧视的斗争是一项长期的抗争。近一个世纪以来,国际劳工组织一直在进行有组织的反性别歧视。1919年的《国际劳工组织章程》中明确了男女同工同酬的概念,它要求保证“同等价值工作”获得同等报酬,而不是简单的同样劳动获得同样报酬,这关联到反对劳动力市场中结构性的性别偏见。1975年,国际劳工组织通过了《国际劳工组织女工机会和待遇平等宣言》,以促进性别平等。1979年《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CEDAW)中采纳了男女同工同酬的概念。虽然在法律层面上各国都制定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的各种法规,但是在实践层面进步微弱。

对女性未来的职业发展有两种基本的观点:观点之一认为,在组织中女性之所以处于不利地位,不是因为她们是女性,而是因为她们没有掌握充分的权力。当大批女性开始扮演有权力的角色时,这种不平衡就会被打破。即两性首先要机会平等,保证女性能够获得与男性相当的位置。观点之二认为,把女性提升到权力职位上并不能解决组织中的性别不平衡问题,因为现代组织是男性的价值观和支配方式。真正的解决之道是创建女性自己的组织,女性有能力比男性更民主、更富于参与性和合作精神。

那么是否存在“女性管理风格”?近年来女性到达中层管理位置上的数量大幅增加,但她们达到权力高层的数量非常有限。即使女性到达高层管理职位的时候,她们经常“像男性一样进行管理”。一项对跨国公司324名高层管理者的研究表明前途并不乐观,因为管理技巧更多地由整个组织文化决定,而不是管理者个人的风格。对女性来说,为了接近权力或保持其影响力,她们必须适应通行的管理风格,就是强调具有挑战性的领域风格,强硬的策略和自上而下的决策。社会网络和非正式关系依然是工作升迁背后的关键因素。女性很难打破组织传统的控制模式,女性要比男性更可能因为缺乏职业指导的各种关系而无法晋升。传统的权威主义的管理风格稳定存在,虽然某些组织的表面特征可能已经转变,但是组织的性别特征和其中的男性霸权并没有受到挑战。<sup>①</sup>

<sup>①</sup> Judy Wajcman, *Managing Like a Man: Women and Men in Corporate Management* (Cambridge: Polity, 1998).

## 第二节 中国的两性职业发展

新型职业发展理论认为,所谓的职业发展是通过与职业相关的活动个体取得的获得资源能力的增长,它包括获得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能力的增长,这些能力具有可交换性或可替代性。因此,对影响中国两性职业发展因素的认识主要围绕着影响发展资源的条件展开。

### 一、教育投入与回报的性别分化

如果存在职业发展的劳动力市场理论的话,那么两性职业发展的可能性在前劳动力市场就已经决定了,人们受教育程度的分化已经将人分为高级劳动力市场与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了,这种分化具有性别特征。

目前,中国的公务员劳动力市场和各类高级劳动力市场皆以是否受过大学本科教育为标准,以教育水平为基础,进入高级劳动力市场的门槛越来越高。受教育程度成为进入哪级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因素。有研究认为,导致男女受教育程度和结构差异的最直接因素是教育投入方面的性别差异和偏好,即在教育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对男性教育投入的偏好限制了女性获得教育资源的平等机会。同时教育回报上也存在性别差异。

第一,存在教育回报的性别分化。从2000年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出教育与收入的影响。

表 10-1 2000 年依受教育年数的平均年收入的性别差异

上学年数分组(年)	平均收入(元)	
	男	女
6 年及 6 年以下	5213.62	2681.87
6 年—9 年及 9 年以下	6469.28	4554.23
9 年—12 年及 12 年以下	9019.94	6585.00
12—16 年及 16 年以下	13237.24	9430.32
16 年以上	12948.34	10455.61

从上表可以看出,两性所受教育相同,但其受教育所获得的回报是不同的,男性明显高于女性。男性收入水平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收入不断增加,但上研究生对其收入的改变是不升反降的。而女性则不同,女性是正相关的,即女性接受研究生教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收入水平,但与相同学历男性的收入

水平相差较大。

第二,更为显著的事实是两性受教育机会不平等。根据2000年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资料的分析表明,两性受教育年数存在差异。

表 10-2 2000 年分年龄、城乡、性别的受教育年数 (年)

年龄分组	城市		农村	
	男	女	男	女
30 岁以下	11.00	10.96	8.14	7.32
30—49 岁	10.30	9.36	7.25	5.52
50 岁及以上	9.02	6.82	5.45	3.11

分析发现,家庭教育投入偏好与孩子受教育年限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而且女性的相关程度高于男性,相关系数分别 0.400 和 0.313。成年男女的婚姻、生育状况等家庭责任也成为是否投入继续教育的重要决策因素。当问到近三年为什么没有参加培训或进修时,在所有回答因为家务负担重的调查对象中,男性占 35.8%,女性占 64.2%。在继续教育阶段,家庭需要支付的不仅包括物质投入,而且包括时间投入,尤其对已婚者来说,夫妻间的时间配置模式会直接影响双方接受继续教育的机会。对此,有学者提出,不仅应增加旨在增进女性受教育的投入,保障女性利用教育资源的平等机会和权利,而且要采取相应的政策和措施,为女性人力资本的充分发挥提供平等的空间,提高女性教育的回报率,缩小教育回报方面的男女差异,促使各教育投入主体更主动地投入女性教育。由此使男女两性有平等的机会通过教育积累人力资本并充分发挥所积累的人力资本实现自身价值。<sup>①</sup>

第三,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歧视普遍存在。近年来,就业市场上的性别歧视越来越明显。2003 年 4 月一项对北京市 14 所大学本科应届毕业生的问卷调查表明,女生在校学习成绩略好于男生,但在择业过程中比男生有更多的挫折。在择业过程中,女生对个人先赋特征,如性别、身高相貌和户籍对于择业重要性的感受强于男性。而男性对自致性特征,如:学习成绩或专业对口对于择业重要性的感受强于女性。<sup>②</sup>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两性大学生在就业市场上被差别对待,同时其感受表明,大学男生的择业过程是以现代的市场与个人双向选

<sup>①</sup> 谭琳、李军峰、王静:《教育的投入与回报:性别差异及产生差异的原因》,蒋永萍主编:《世纪之交的中国妇女社会地位》,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76—193 页。

<sup>②</sup> 潘锦棠:《大学生就业市场上的性别歧视与性别正视》,载孟宪范主编:《转型社会中的中国妇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80 页。

择的过程,而大学女性的择业过程更多是传统类型的。

## 二、就业政策的性别歧视

尽管中国的劳动法禁止雇佣中的性别歧视,但在组织和人际权力中的性别歧视、年龄歧视和户籍歧视一直存在。在两性职业发展上,中国的就业制度以制度形式决定了两性的劳动权利。最典型的差异就是两性退休年龄的不同。1993年《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以行政法规形式规定了现行公务员男60岁、女55岁退休的政策,沿袭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关于城市男女职工退休年龄差异的政策传统。半个多世纪以来,女公务员的发展环境、自身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她们越来越感受到传统政策的不公平,迫切要求与男性同龄退休,实现平等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

回顾这一政策产生的原因还需要回到20世纪50年代的历史条件,它无论是为了照顾女性,还是为了缓解就业压力,但前提都是将女性定位为家务劳动者,女性要在家庭中承担生儿育女、家务劳动、照顾老人等工作,因此让女性提前退休是对女性的照顾,可以从双重负担中解放出来。当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家务劳动社会化后,退休政策依然未变,它直接导致了女公务员在发展机会上的弱势。第一,女性政治权利受到损害。女性提前退休的政策,大大减少了女公务员进入领导岗位和高层就职的机会。一些地方据此把女干部的选用年龄限定为县处级不超过40岁,市厅级不超过45岁,许多优秀女干部被排除在外。在机构调整中,许多地方在定员定岗时规定女公务员不得超过50岁,男公务员不得超过55岁。这些在年龄上的依顺序的提前,使女干部提拔政策在执行中缺乏连续性,既浪费了女性人才资源,也直接造成了高学历女干部工龄短,接受培训、深造的机会少等待遇低的不平等现象。第二,女性经济权利受到损害。目前在职的女公务员具有本科以上学历者,到55岁退休年龄时,工龄大都不满35年,而男性60岁退休工龄基本上可以超过35年,这就造成了公务员退休后,女性退休金只有基本工资的82%,男性退休金则达到基本工资的88%。加之,工作期间可能的工资增长,两性退休金的差距会拉得更大。<sup>①</sup>这一政策不仅损害了公务员个人和群体的利益,更重要的是打破了公平竞争的原则,造成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性别歧视,有损社会公平。

<sup>①</sup> 龚务平:《现行退休政策与女公务员的利益诉求》,孟宪范主编:《转型社会中的中国妇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72页。

### 三、社会支持的性别分化

处于职业领域中的个体受到组织力量和人际力量的影响,它可能会提供社会支持。组织力量(organizational power)是指使用有价值的资源影响他人的能力;人际力量(interpersonal power)是指在特定的关系内影响对方的能力。这两者都是人们在职业领域内重要的社会支持的来源。社会支持是个体与群体生存与发展的关系网络,是一种社会资本,它有利于获取和转换资源、降低信息成本等。社会支持与人们的社会交往相关,是由血缘、地缘和业缘的关系网络带来的社会资本。在中国,传统家庭制度中公公婆婆对第三代的照顾成为女性进入社会的重要社会支持。总之,社会支持是人们意识到的或实际的由社区、社会网络和亲密伙伴提供的工具性和情感性的资源。

使用 2000 年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资料,从求职、职业发展、经济帮助、情感和婚姻家庭需求四个方面来看两性的社会支持状况,研究表明,第一,男女得到社会支持的比例都较高,但女性得到的帮助仍少于男性。第二,在以同事、同学、单位、社会机构以及朋友支持为主的强关系上男性具有一定优势,女性在依靠邻里老乡为基本对象的弱关系上则有更多的依赖。在求职模型中,女性相对男性获得支持的发生比率要少 20%,其他方面基于性别的影响并不显著。第三,社会结构急速变化。两性在社会支持上出现了年龄差异,年轻人群获得社会支持的总体发生比例较大,性别差异总体较小,且表现出获取社会支持的多样性和自主性。年轻一代的女性通过她们拥有的教育、个人权利和社会活动资源,较快地缩小了与同龄男性的差距,预示市场化机制下新的性别关系有可能发生多样的、自身资源更加起作用的变化。<sup>①</sup>

### 小 结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女性普遍加入到社会劳动的行列中。但职业领域中的性别歧视依然存在,表现为职业的性别隔离、女性大量从事非正规劳动和兼职劳动、两性收入之间的显著差距等。新型的职业发展概念强调人们通过与职业相关的活动取得的获得资源能力的增长,它包括获得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能力的增长,这些能力具有可交换性或可替代性。

<sup>①</sup> 王思梅:《社会支持资源的年龄及性别差异》,蒋永萍主编:《世纪之交的中国妇女社会地位》,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87—409 页。

父权制是导致性别歧视的主要因素。特定的职业期望、劳动力市场结构、组织文化、家庭角色等因素作用于两性职业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为两性职业发展提供了空间,但是女性在受教育机会、制度和社会支持等方面依然无法与男性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机会不平等导致了两性职业发展上的差距。

### ❖ 关键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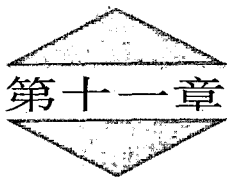
传统职业发展 职业生涯研究 性别歧视 职业的性别隔离 非正规就业  
新型职业发展 男女同工同酬 职业期望 玻璃封顶 社会支持

### ❖ 思考题

1. 试分析导致两性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
2. 简述劳动力市场理论是如何说明两性职业发展的。
3. 试分析坎特“玻璃封顶”的概念,用其说明工作组织对女性职业发展的影响。

### ❖ 进一步阅读文献

- 李小江主编:《让女人自己说话——独立的历程》,三联书店 2003 年版。
- 阮曾媛琪:《中国就业妇女社会支持网络研究——“扎根理论”研究方法的应用》(熊跃根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 [法]吉尔·里波韦兹基:《第三类女性:女性地位的不变性与可变性》,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0 年版。
- 佟新:《异化与抗争——中国女工工作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 消费社会与性别

### 引 子

现代社会是一个消费社会,性、性别气质以及与性相关的一切皆可能成为消费品。娼妓、各种名目动听的“选美”活动、现代整容术和“伟哥”皆成为现代的消费品。

2003年像是中国的“选美年”,名目繁多的选美活动合法地、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2003年4月20日决出“环球小姐”中国赛区的“中国小姐”。2003年11月8日由凤凰卫视主办首届“中华小姐环球大赛”。2003年第53届“世界小姐”总决赛在三亚举行,“美女”经济蓬勃发展。本章将分析性及性别气质如何被人们消费,并成为消费社会的特性之一,由此揭示性、性别气质与社会经济活动的互动关系。

### 第一节 符号消费与性别气质

#### 一、消费社会

消费社会被用来描绘现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即在商品生产极大丰富的前提下,人类社会生活的组织越来越围绕着对商品、服务和休闲



的消费,消费及符号化消费创造的需求推动社会的发展。用华勒斯坦的历史资本主义理论看,这是一个“万物商品化”的社会。<sup>①</sup>

消费社会的基本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消费社会产生的前提是产品的极大丰富,整个社会充斥着不断增长的商品、服务和财富,商场里的商品琳琅满目。第二,在物质产品和服务极大丰富的情况下,有效需求不足成为常态。第三,消费的重要性替代生产的重要性。人类社会生活的组织越来越围绕着对商品、服务和休闲的消费,而不再是围绕着对商品、服务和休闲的生产,即消费社会组织生产的内在机制发生变化,从生产创造需求,转变为消费创造需求和生产。消费成为组织社会生活的核心内容,一个社会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特点成为影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商品和服务的消费对经济繁荣、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明显超过商品生产的重要性。社会发展的内驱力主要来自于产品的消费。第四,为了消除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社会不断创造出符号化消费,以鼓励人们的消费欲望,促进资本主义的商品和服务的生产。符号化消费是指人们消费的不仅是商品和服务本身,而且是商品和服务背后内涵的文化意义和其代表的价值。符号化消费成为消费社会中重要的文化现象,磨破的牛仔裤和一条全新牛仔裤之间巨大的价格差别就在于打磨过的、膝盖带破洞的牛仔裤是一种符号,它代表着新潮和反叛。由此,对物质产品和服务的消费就成为对文化和价值的消费。符号化消费是人为地将文化价值观加入到商品里,以激发人们的消费欲望和对消费背后身份的想像,以此左右人们的消费行为。在符号化消费之下,“消费”的意义已经被彻底异化,它再不是简单的经济行为,而是为了获得消费品背后看不见的符号意义,消费成为直接关乎个人的身份、地位、价值观的社会文化事件。

鲍曼指出,为了使自己最终成为公众注意的焦点,商品、服务和标志都必须能激起人们的欲望,它们必须引诱那些可能的消费者,并使其竞争对手失去诱惑力,它们一旦做到了这一点就必须立即为其他的欲望目标腾出地盘,以免全球性的利润追逐和更高利润的追逐会逐渐停顿下来。<sup>②</sup>

消费社会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资本主义从萌芽到当代的发展大约经历了五个世纪,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形态逐渐发生一些质的变化。曼德尔在《晚期资本主义》一书中认为,资本主义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每

<sup>①</sup> [美]伊曼努尔·华勒斯坦:《历史资本主义》(路受国、丁浩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sup>②</sup> 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郭国良、徐建华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75—76页。

一阶段都是对前一个阶段的辩证开拓。第一阶段是市场资本主义,第二阶段是帝国主义下的垄断资本主义,第三阶段是后工业阶段/跨国资本主义阶段,也称晚期资本主义。今天的后工业社会就是消费社会,是资本主义最彻底的实现,是资本主义最彻底的形式。<sup>①</sup> 詹明信认同曼德尔对资本主义三个阶段的划分,并把相对应的资本主义文化分为三个时期,即对应于市场资本主义的现实主义、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现代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的后现代主义。在他看来,文化变迁是晚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同时资本主义的转型又促进了文化变迁。

消费社会背后的文化理念是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从20世纪初开始萌芽到60年代形成,表现为要求打破现实主义、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理论建构起来的关于“理性”的神话,主张“去中心”、“去历史”、“去本质”,试图解构知识和道德,宣扬个体之间的平等和个人权力。詹明信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对高等现代性(high modernism)的既有形式,诸如大学、博物馆、画廊和基金会等的有意反动,它抹掉了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界限。后现代主义不只是一种特定风格的话语,而是一个时期,它出现了以新型的社会生活核心为基础的经济秩序,即跨国资本主义。<sup>②</sup>

## 二、符号消费的内在动力

晚期资本主义的符号化消费有着其内在的规定性,这种规定与资本主义主流社会的消费观、消费心理、消费知识以及消费模式联系在一起。个人主义、大众文化和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成为实现符号化消费的重要工具。

消费社会的社会结构性原则是个人主义的。20世纪60年代的消费社会形成后,与之相适应的个体化的社会结构性原则也建立起来。所谓的社会结构性原则是指社会制度和社会组织建设的基本原则。从人类发展的历史看,人类社会有两种基本的组织方式,即两种社会结构性原则:个体主义原则和集体主义原则,或称为个体化原则与集体化原则。传统中国是一个典型的集体主义原则的国家,主张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这里的集体利益可能是家庭、群体或国家,但总而言之传统社会是以非个人的组织原则来建构社会中的基本制度的。而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以

<sup>①</sup> 转引自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桥等译),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84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396—419页。

鼓励个人欲望或利益为原则建立一套完整的制度,以确保个人利益经由努力得以实现。个体化一直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性原则。个体化至少指两个方面,一是个人的主客体兼性,一方面人是处于空间结构上的客体;另一方面人是有意志和行动能力的经验主体;二是人具备特定的价值观,其基本特质是理性、承受制度规范,并追求自由、平等、独立和自主。消费社会以个体化为基础,并进一步推动了社会向个体化方向转变。社会的个体化并不是指社会的个人化、个性化或个人的解放,而是指社会的结构性原则,是人类文明的关注点朝向个体,由此各种制度安排便以个人为基础。

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 or mass culture)的流行是后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所谓大众文化是相对于精英文化而言的,精英文化包括诗歌、古典音乐等所谓高尚艺术,它为少数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服务。大众文化更加宽泛,更具有弹性,是人们娱乐的方式,通常包括电视、电影、运动和各種流行音乐,也常常被理解是通俗艺术。大众文化的特点是:第一,大众文化表达了公众的品味,具有市民化特征。第二,大众文化具有娱乐性,表达了公众对快乐的需求。第三,现代科学技术运用于大众文化,如计算机和网络的使用,使大众文化更加普及,流通速度加快。第四,大众文化越来越具有市场运作的特点,产业化特征日益显现化。值得注意的是,大众文化并不是指从群众中自然生成的文化,而是以市场为指向,以鼓励大众消费为目的的文化。第四,大众文化越来越具有意识形态的特性,在文化的名义下实现其商品性、控制性以及非艺术性。第五,大众文化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它打破了文化中特有的阶层状况,将普通民众纳入文化视野中,实现文化的民主化。这种状况与电视等大众传媒的普及有重要的关系。

消费社会是建立在大众文化基础上的,表现为文化成为消费品。潮流与时尚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还不断创新出新的生活方式,由此形成了文化工业。文化工业是指利用大众文化与符号化消费之间的联系将大众文化转化为商品生产,如电影、电视、DVD、广告等等商品的生产具有丰厚的剩余价值,并成为消费社会国民生产总值中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工业一方面表明大众文化的商业性,公众被当成物品来计算,是文化工业机器的附加物。文化工业与传统汽车工业、钢铁工业一样以经济利益为首要动力,其主宰力量是商品的交换价值,而不是文化本身的特定结构和内涵。文化工业将其经济利益赤裸裸地强加在各种文化艺术形式之上,这与创作者为挣钱谋生而将文化作品当成货品在市场贩卖、作品总是或多或少地具有经济利益取向的性质不同,文化工业毫不掩饰其主要的、甚至惟一目的就是追求经济利益,文化工业使作品失去了自主性。另一方面,文化工业表明为了促进大众消费,新的方式与技术不断为古老

和熟悉的事物赋予新的特质和内容,由此产生新的文化消费品。这些消费品的生产是有计划制造的,并在政治、经济和科技手段的作用下形成一整套相互配合的系统。文化工业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整合消费者,将数千年来泾渭分明的高尚艺术和通俗艺术相结合。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西方发达国家中产阶级队伍的人数激增,处于上层和下层的人数相对减少,中产阶级享受的物质产品和文化产品成为普遍大众可以追求和有能力消费的产品,并被大众社会追求与效仿。即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被社会普遍认同与接受,并成为消费社会得以延续的动力。

### 三、性别化消费与性消费

消费社会,两性生活处于多元、多变且矛盾重重的状况。一方面,传统社会的性别关系原则依然在左右着人们的生活;另一方面,现代社会赋予了人们更多的自主性,两性在商品面前有了各自的选择权。

性别化消费是指消费社会将某种商品与某一性别建立起内在关联,赋予了商品性别气质,人们购买商品不仅是购买其商品的实用功能,还在购买其性别化的符号意义。例如,剃须刀、雪茄烟、领带、汽车、打火机等为男性专用品,其名牌商品价值之高足以显示使用者的社会地位。香水、手镯、项链、高跟鞋等为女性专用品。越是奢侈的商品越具有性别化特征。看一看现代的广告:小汽车、烟、酒的广告总与男性的力量、速度和独立形象联系在一起。虽然近20年来年轻女性的收入并不太低,但汽车广告针对的消费群体仍然是男性。

性别化消费从多方面建构性别气质。第一,性别气质被消费品符号化后,通过消费品的生产和消费不断再生产出两性气质。第二,性别化消费通过对女性美的不断建构,将女性客体化。第三,现代社会中随着女性越来越在经济上独立,职业女性亦成为市场营销人员最感兴趣的人群。各大服装柜台会明确标示“职业女装”。一方面,职业女装有别于“家庭妇女”形象,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表达;另一方面,职业女性的队伍之大使厂家们看好这一消费品市场。经济独立的女性成为消费品市场上重要的消费人群,她们对消费品市场的影响力和消费品市场对其生活的建构同时存在。

狭义的性消费则是直接将性与性相关的活动商品化、产业化。它是一整套与性相关的市场需求和消费,典型的性消费是卖淫业、淫秽品和增加性能力的保健品的消费。伴随着消费社会对革命的、集体主义叙事的消解,生活化的、个人身体的叙事带来了性消费市场的繁荣。

以卖淫业为例,可以看出性消费在全球化下的变化。卖淫被视为以获得金

钱为目的给他人提供性服务的行业。娼妓制度是一项有历史的性消费。但它并没有随着工业文明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而消失,而是借着全球化的力量更加繁荣,交易手段也借助了互联网等高科技的手段。对此吉登斯认为卖淫之所以能够存在的最有说服力的结论是:卖淫表达了(也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男人把女人当成了其性目的的“使用”对象这种趋势。在特定的关系中,卖淫表达了男人和女人之间权力的不平等。1951年联合国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那些组织卖淫或从妓女活动中获取利益的人,但并没有禁止卖淫。有些国家禁止卖淫,有些国家则在当地政府的批准、管理和监督下可以卖淫。1999年10月,荷兰议会把卖淫定为正式职业。据估计荷兰有3万名妇女从事性产业。<sup>①</sup>卖淫是对女性身体的直接消费,是将女性客体化的表现。所谓女性客体化是指将女性与她们的身体分开,使其身体成为可供交易的商品,并产生了一系列的卖淫规范。大多数从事卖淫工作的女性受到性剥削却保持沉默。这意味着女性一旦用性行为来换取金钱,就会把自己看作是一个被家庭、朋友、社会遗弃的人,她们以此种生存策略来完成角色转换。当女性失去社会身份,并切断与他人的情感联结时,性变得可以交易。

有研究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起,卖淫业最惊人的变化在于它的产业化、规范化和在全球的广泛蔓延。对卖淫业的有关统计数字为:泰国200万人,韩国100万至150万人,菲律宾50万人,这些皆是发展中国家。从国内、到国外,从组织严密的交易到松散的非正式交易,性的产业化在全球市场创造了数十亿美元的收入。这种产业化重要的背景在于:第一,在战争或外国侵占期间大量的妇女被提供到部队卖淫。第二,旅游业的发展带来性的国际交易。第三,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通过对妇女劳动的剥削将她们置于极不重要的位置,在出口加工业工资十分低廉的情况下,性产业的高收入与其形成对比。第四,与性产业相关的旅游业、饭店业、酒吧、按摩院等等,一起成为当今世界的主要经济力量。第五,从事组织卖淫活动的地下经济依靠跨国操纵的饭店业、旅游业和性产业获得巨额利润。第六,全球化的、大规模的人员流动,更大范围地满足了顾客对性服务的需求,特别是跨国贸易的迅速增加。总之,在工业化的早期,与性产业相关联的诸多经济与性产业一道成为一些国家的重要经济来源。<sup>②</sup>

国际劳工组织1998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经过最近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东南亚的卖淫活动和性产业已经完全具备了商业部门的规模。尽管亚洲许多

① [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0页。

② 参见[美]凯瑟琳·巴里:《被奴役的性》(晓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9—123页。

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但对性贸易的需求似乎并未减少。这部分是由于其国际化的特征——亚洲和国际货币之间汇率差不断扩大,使得性旅游对外国人而言更便宜并且更具有吸引力。另外,性产业还与当地的失业率有关。在经济困难时期,妇女和孩子经常被视为“剩余”人口。一些家庭陷入绝境,被迫逼自己的孩子去卖淫。从农村到城市地区的迁移模式是导致性产业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许多妇女渴望能抓住一切机会离开传统和压抑的家乡。<sup>①</sup>

以各种裸体图片、影片、DVD等为卖点的色情工业正在使用新的技术形式,并成为文化工业的一部分。有关淫秽品的问题充满争议。它面临着这样几个问题:如何定义淫秽品?它到底会有怎样的社会影响?应不应该对其进行控制?如果需要控制,控制方式应当是怎样的?但无论争论的结果如何,淫秽品本身——业已成为现代视听文化工业的滚滚财源。

消费社会利用现代医学的“知识”来生产各种保健品,以更年期为例可以看出性别与消费的社会建构。更年期是男女正常的生命周期现象。女性的更年期是指女性自生育期逐渐到达无生育能力的一段过程的生命周期。女性更年期多在45—55岁之间。此时一些妇女会出现诸如潮红、出汗、心悸、眩晕以及激动、忧虑、失眠、抑郁等生理和精神上的不适现象,被称为“更年期综合症”。医学上认为,这是一种缺少雌激素状态群,类似其他内分泌疾病。另外,并不是每个妇女都会出现更年期综合症,只有少数妇女才需要大量雌激素来加以症状控制。更年期是一种正常的生理过程,不会影响其工作和生活。但是社会上却不断建构女性更年期的“刻板印象”,诸如这一年龄段的女性易怒、记忆力减退、工作能力下降等特殊现象。这种社会建构反过来影响了更年期女性对自己的预期,造成心理、精神压力,加重生理和精神的症状。这种建构不仅有社会学的意义,更有消费意义。“女人三十要静心”的广告,将女性的更年期提前到30岁,这二十多年的提前,将三十岁以上的女性皆纳入到购买各类保健品的行列;同时它也将女性更早地塑造为有身体问题的人。

## 第二节 性别的商品化

### 一、广告:传统性别观念的再生产

消费社会里的每个人都处在一个强迫性广告世界中。所谓强迫性广告是

<sup>①</sup> [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172页。

指消费社会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广告宣传,人们没有选择的可能,也没有逃避的空间,在消费时不自觉地受到广告的影响。每个广告虽然都是转瞬即逝,但同样的广告被无数次重复。每天人们大约看到的广告在 400—600 种,这样的人活到 60 岁的时候,所看到的广告信息将达到 4000—6000 万种。如此高强度的广告,观众无处逃遁,其影响力正是广告制作者们希望达到的目标,产品生产者由此获得潜在的消费需求。奥斯卡颁奖仪式上插播的广告,费用高达 200 万美元/分钟。许多国际跨国公司的广告费 1 年会高达 2000 亿美元。

广告的社会功能不仅在于吸引人们消费,还塑造有关这些商品和服务的符号价值意义。广告不同于产品说明书,它广泛地采用生动的图像、画面和语言进行叙述。就视频广告而言,它一般由文字、图像和声音三套符号系统构成。图像和声音的联合使用能够清晰、直观地展示商品,营造一种真实的生活气氛,强化表达的艺术性和愉悦性。广告通过精心设计一些能够引起受众的好奇心、虚荣心、亲切感或者成就感的场景、台词、人物和事件来激起观众对商品、服务、标志的普遍关注,由此引导观众的消费欲望。

广告的性别化是其典型特征之一。从性别视角出发,会发现绝大部分广告中的人物和事件都与性别形象和性别意识相联系。广告总是被看作介绍商品和服务的,展示的场景和事件多贴近日常生活,它背后承载的性别信息很难引起观众的重视。这种忽视并不说明广告对观众的性别观点没有影响,相反却使广告中的性别信息不予质疑、不加反思地照单全收。国内一则广为人知的洗衣粉广告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观点表现得淋漓尽致:广告的画面展示了一群年轻女子,她们成排站立,每人面前摆着一个洗衣盆,每人都喜笑颜开地举着一袋同一品牌的洗衣粉,接着一边唱着关于“某某牌洗衣粉”的广告词,一边麻利地做出揉搓衣物的动作,此后每个人很有成就感似的欢快地举起所洗之物——无一例外都是男士衬衣。该广告里的性别观点昭然若揭,广告在复制传统的性别气质。

一项对休闲杂志中的广告分析发现,女性在广告中通常被描绘成性感的、美丽的、依从的样子,最有趣的现象是男性主要突出头像,而女性则主要突出躯体。研究者将这一现象称为“感官主义”(face-ism),以此术语来描述这种强调男性面孔和女性身体的倾向性。面部更多地反映着个人的精神生活和社会角色,而身体的其他部分则很少有象征意义。研究者对 11 个国家的多种出版物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在其他国家同样存在这种倾向。在广告中女模特的臀部、腿、腹部、肩膀和后背出现的频率是男模特的 4 倍。女性比男性更经常地穿泳衣,因此身体被拍摄下来的可能性也更大。感官主义可能是由于文化强调男性

的智力和女性的外表吸引力造成的。<sup>①</sup>另外,80年代对广告的市场研究发现,广告中反映出四种关于女性的刻板印象:1.女性的位置是在家里;2.女性不作重要决定,也不做重要的事;3.女性依靠男人,需要男人的保护;4.男人首先把女性看作性对象,他们对作为人的女性不感兴趣。<sup>②</sup>广告在不断生产和再生产传统的性别气质:女性是美丽的、性感的、顺从的、依赖的、主内的;男性则是独立的、能干的、强健的、支配的。广告常常将女性的身体特征与其价值联系起来,“挺不起胸,怎能抬得起头?”女性乳房的形态成为决定女性价值的因素。媒体通过强调男性的面孔和女性的身体,巧妙地强化了男性是思考者而女性是性目标的刻板印象。

## 二、漂亮的性别

近现代社会,女性越来越被赋予“漂亮的性别”的特征,即漂亮成为女性的特质。对于女性而言,漂亮的面容和动人的身材意味着成就与财富,意味着浪漫与激情。2003年11月28日《上海青年报》以“上海51名‘灰姑娘’竞丑”为题,讲述了“灰姑娘”变“天鹅”的故事。

上海51名自认为“丑女”的女子在大庭广众之下展示容颜,竞争惟一一名“灰姑娘”,以得到主办单位赞助的价值10万元的整形手术,并借此圆自己的“天鹅”梦想。5天时间内共有51位女性公开报名。主办方定下的标准是:首先突出的是“灰”,即容貌较丑但不存在严重畸形;经济困难,无力支付高昂的整形费用;心理素质好,对整形的后果要有足够的承受能力。26岁刚刚大学毕业的外事翻译张迪成为“最合适”的入选者。专家们对怎样整容作了初步计划,算起来张迪脸上要“修整”的地方大约有十来处,主办人说:“两周以后,我们将把张迪变成一个漂亮的女孩。”

美女不仅可能被人们“选择”出来,甚至可以被制造出来。“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有研究认为,社会只是在进入工业文明之后,才逐渐产生了对“女性之美”的崇拜。审美是通过感官的知觉,是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人在实践中与外部世界发生双重关系:一方面,作为追求自我需要满足的主体,人是目的;另一方面,作为满足他人需要的客体,人是手段。<sup>③</sup>男女两性的美可

① [美]泰勒等著:《社会心理学》(第十版)(谢晓非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8页。

② 艾晓明:《广告故事和性别——中外广告中的妇女形象》,《妇女研究论丛》2002年第2期。

③ 荣维毅:《社会性别与审美》,载李秋芳主编:《半个世纪的妇女发展——中国妇女五十年理论研讨会论文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版,第529页。



分为两类,一是作为主体的女性审美和男性审美;二是作为客体的女性美和男性美。对美的争论证明不存在先验的、本质主义的和绝对的美。在所有的社会形态中,两性美都是由不同的审美标准来评判和认可的。审美是历史性和阶级性的。唐朝美女杨贵妃在今天就显得过胖。从文献上看,原始社会里的艺术,有关女性的图像和符号是丰乳肥臀的维纳斯,突出的部分是与人类繁衍有关的女性身体部位,夸张及变形的图案和雕刻表达了人类早期对女性生殖力的崇拜。女神并不是因为她的美貌受到赞颂,而是因为她有控制生死的神圣能力。法国学者里波韦兹基将历史塑造的女性美称为“美丽性别”,她明确指出:

要使得对美丽性别的崇拜现象发生,必须有个必要但非充分的条件——出现贫富阶级的分化,出现贵族阶级和平民阶级,只有这样才能使得一定范围内的妇女免于工作。这些新的社会条件才能更紧密地将女性与美的社会风俗结合起来:只有这些上流社会妇女拥有了更多无所事事的时间,她们才能将其用于化妆、打扮、让自己更美以自娱并取悦于她的丈夫。……美丽性别的文化需要社会的不平等、奢侈及悠闲阶级对生产工作的蔑视。

……直到19世纪末,对女性的崇拜还只是小范围的社会圈子里发展,艺术家对女性的赞美和美的习俗还未超越有钱人和有教养人的活动范围。在二十世纪,女性报刊、广告、电影、时装摄影等第一次推广了为大多数人服务的女性审美原则和理想的女性形象。随着那些明星、模特和美女的诞生,女性形象的最佳代表已走出了原来封闭的王国而进入到日常生活中。女性杂志和广告煽动女性使用化妆品。一场难以避免的美容产品的工业化和民主化运动就这样爆发了。一个世纪以来,对美的崇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地位,它已进入平民化时代。<sup>①</sup>

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审美体现了高度的阶级性,资产阶级弱不禁风的花朵(娇小姐)与无产阶级暴风雨中的海燕(女性工农兵)无法相提并论。

两性审美上的平等是指男女同为审美主体,又同为审美客体。但现实生活中,两性审美的不平等比比皆是,最典型的就是各种“选美(女)”活动。为什么在动物界雄性比雌性有更加美丽的外观,而人类社会是女性向男性展示自己的美丽呢?对此,葛理斯认为,带着雄性动物打扮的意味,什么时候女性才打扮

<sup>①</sup> [法]吉尔·里波韦兹基:《第三类女性:女性地位的不变性与可变性》,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92、112页。

呢？是女性失去了地位、需要哀求男人和让男人看自己时。因此，两性中谁去打扮，关键在于两性的社会地位，即谁处在下风。<sup>①</sup>

20世纪70年代，英国文化批评家约翰·伯格(John Berger)在《观看的方式》一书中提出审美传统中的“男性凝视”概念。他认为，就图像语言的运用，广告和油画同样有性别和凝视的问题。在欧洲几百年绘画的传统中，观赏者是男性，被观赏和描绘的是女性人体，这在油画的特殊种类——裸体画中尤其明显。而从选美看，它同样反映了这种观看方式。劳拉·穆尔维指出，在“由性的不平衡所安排的世界中”，“女性作为形象，男人作为看的承担者”，“看的快感分裂为主动的/男性和被动的/女性。起决定作用的是男人的眼光，它塑造女性的形体。”“她们的外貌被编码成强烈的视觉和色情感染力，从而能够把她们说成是具有被看性的内涵。”<sup>②</sup>

“选美(女)”正是女性被客体化、被欣赏、被选择和被创造的集中表现形式。女性在“被选”的过程中，她们作为个体人的内涵已经消失，她们不再是完整的，她们被客体化了。在当代的“选美(女)”的标准中，不仅要求有美丽的外表，还要有温柔、贤惠、聪颖等内涵。在选美的过程中不仅塑造了美女也塑造了选美的标准。美女的标准是通过传媒、服装款式、美容用品的生产和销售共同完成的。同时这种美女越来越带有盎格鲁撒克逊人特色的理想美女形象，因此各种整容术是向着双眼皮、大眼睛、高鼻梁、翘下巴的形象，失去了自己民族独特的外表和带有民族特色的美丽。

值得注意的是，实际上男性美容用品的销量也有很大的增长。1995年，在法国总销量为73亿的护肤产品中，男性用品占1.10亿。女人们是美的对象，是美容和化妆品的最大消费者。同时也是她们，经常在心理上承受着对容貌缺陷的种种担忧。<sup>③</sup>

### 三、对身体的消费

消费社会，塑造“女性美”的各类广告呈现愈演愈烈之势。

女人的美，三分在面孔，七分在身材！

男人天生对苗条的女性有好感！

① [英] 葛理斯：《生命之舞》，三联书店1995年版。

② 劳拉·穆尔维：《视觉快感与叙事性电影》，载张红军编：《电影与新方法》，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212页。

③ [法] 吉尔·里波韦斯基：《第三类女性：女性地位的不变性与可变性》，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74页。

不管这公不公平,漂亮女人就是好办事!

×××(产品名)——让女人更美丽的武器!

在这个减肥用品的广告中,商品消费的对象直接面对女人,并直接告知产品效果是“减肥不减胸,纤体又嫩肤”。商品化消费女性身体的一种主要渠道就是通过广告,在时间和空间上宣传女性正常的身体和身体功能是有问题的,是需要改造的,以此重塑女性对身体的认识,并不惜花费大量的金钱和时间来重新做出一个符合男性标准的女性身体。

研究表明,女性比男性更注重与体重相关的外表,更在意别人如何看她们。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女性的社会地位、职业地位、收入水平等相关。当女性逐渐进入劳动力市场,体重在她们所向往的工作类型、婚姻生活中起了一定的作用,苗条的女性更容易取悦男人。社会角色与其外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项有关理想体重的研究表明,女性的理想体重与实际健康之间的体重之差比男性要大得多。这项研究是用体重与身高之比得出一个健康的体重值,将这一数值与人们期望的身高与体重之比的值进行比较,由此得出的“文化”型体重是:男性差5磅,女性差20磅,女性比男性更期望有苗条的体形。怀有这种“文化”情节的女性,更容易体验焦虑、沮丧的心情。女性花比男性多得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实现其对美的理想的追求,而这种理想夺走了她们可能用于政治、教育和事业成就方面的投资。

女性被动的审美客体地位是通过女性追求美的能动性和主体性实现的。有人说,女性所受的压迫不是男性造成的,而是美女对丑女的压迫造成的。这样就有了争当“丑女”以获得免费整容的女人们,有了无数与自己合适的身材过不去的“减肥大军”。这里的内在逻辑不是简单的女人之间为了争夺男人的战争,而是消费社会通过对“女性美”的塑造,消费女性身体的过程。消费社会通过对两性之美价值的塑造,塑造了一批批永不会过时的追求身体“美”的文化,美丽与苗条不仅是女性之美的身体状态,同时它还是符号象征,标志着一位女性是否在意自己的容貌,是否能够为自己的身材和容貌投资、是否具有讨得男性喜欢的资本。与“选美(女)”相关的一系列消费文化的建构最终演化为消费品市场上昂贵、名目繁多的减肥药、各种健身与形体俱乐部以及充满风险的隆胸术。

美貌对于男女两性有不同的价值,消费社会传导的信息就是:聪明的男人征服世界,美丽的女人征服男人。正如引子里引用的广告词:“男人天生对苗条的女性有好感! 不管这公不公平,漂亮女人就是好办事! ×××——让女人更

美丽的武器!”。消费社会的文化不断提醒人们,美丽在女性身上具有特殊意义,美貌是女性的专利,是战无不胜的利器,借此女性可以控制男性,并由此控制世界。为此,女性付出金钱与风险是值得的。《白雪公主》里的咒语:“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最漂亮的女人。”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在,男性形象与美貌无关,而两性对于女性美的渴望,在不断创造出美女的同时,还为此付出各自不同的代价。

以“减肥”为例,在全球范畴内有一股声势越来越大的“苗条文化”在流行,与此相配套的是各种消费品,并促使那些身材正常的女性加入到减肥行列。伴随而来的是减肥用品市场在大众消费市场的成功。有资料显示,1989年美国的节食工业获得了330亿美元的营业额,减肥门诊收入高达100亿美元。有近1亿的美国人服用减肥食品。法国每年大约有5000种减肥食品面市。<sup>①</sup>美容外科以可怕的速度增长:美国1981年到1989年中,外科整形手术的数量增加了80%。有推测估计,每年有150万人,即1/60的美国女性进行了隆胸手术。还有抽脂肪手术,在法国每年有5万例,在美国每年有40万例。外科整形手术成为战胜无情岁月和自然之力而“重塑自我”的良方。在“苗条文化”和“美丽文化”的背后则是滚滚财源。

从“选美(女)”到“减肥与瘦身”,美的问题在女性身上比男性显得更为重要,其结果是令人担忧的。首先,在一个追求女性外在美的社会里,女性是否能够更好地接受自己就成为复杂的心理问题。在美国,75%的女性自认为太胖,这个数目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翻了一番。“苗条文化”加剧了女性对自己身体的不满。第二,对女性美的追求,使女性的价值更加集中于年轻时段,女性们越来越恐惧无情的岁月,时间能够引发女性的自卑和对身体的不满。第三,当人们为了苗条必须进行饮食节制时,会出现各种身体功能性紊乱,如厌食症、肠道问题、神经系统疾病等。而减肥的失败又会加剧负面情绪。对此,有学者认为,女性美的规则具有政治功能。它使女性满足于无足轻重的工作,远离社会和政治斗争,热衷于自己的外形而不是公共事务。女性美的神话成为阻碍女性登上社会秩序巅峰的永久障碍,使女性的从属地位不断延续。法国学者里波韦兹基指出:

(女性美)根本就不是通过摧毁自信或自尊使得美的规范像一部政治机器一样的运作,而是美的规范通过指导女性的追求、渴望及热情朝着私

<sup>①</sup> [法]吉尔·里波韦兹基:《第三类女性:女性地位的不变性与可变性》,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16—117页。

人的成功发展而不是朝着公众成就发展,朝着非官方的权力发展而不是朝着官方的权力发展,朝着交际能力而不是朝着对机构控制权力的发展使其像一台政治机器一样运作。女性现在工作和政治上有了越来越大的野心,但女性对美的重视仍不停地对其生活产生影响,使她更多取得个人的成功而不是集体的成功,对两性吸引力的影响大于与男性竞争的影响。<sup>①</sup>

消费社会,一方面将女性从性压抑和生育的苦恼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女性的身体更屈从于具有强制性的美的诉求之下,这种诉求的背后是消费社会的生产逻辑,因此也是生产对女性身体的绝对控制。

#### 四、反思

面对日益被建构的生活,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女性在消费社会的自我解放之路在哪里?对此女权主义理论提供了三种解决方案。

第一种方案是坚决反对将女性身体客体化,倡导女性不要过多地关注外在美,而是要关注内在美和精神美,充分承认和肯定美的复杂性,将美丽的要素扩展到外貌与体形之外。但问题是,反抗的力量在哪里。在强大的消费力量下,女性自身如何能够抵制消费品的诱惑,以妇联为代表的各类妇女组织的抵制活动总是显得苍白无力。在强大的广告攻势面前,我们如何接受自己被定义为“太胖了”的体形而抵制各类减肥产品呢?

第二种方案是反对单方面对女性进行“选美”,而是男女都要选美。就是用两性身体的客体化取代女性身体单方面的客体化。这一方案反映了人们对于消费社会一切皆商品化态势的无奈适应,各种影视作品中出现了以男性为对象的审美活动。

第三种方案是将美个体化、多元化和民主化。在后现代的女权主义者们看来每个人都有权利进行美的选择。一个人可以选择骨感美,也可以选择丰腴美,既可以选择社会公众尺度的“美”,也可以选择公众认为“丑”的形象。这是最自由、最少压抑的做法。社会允许多元化的选择,此时个人做出的个体化的选择成为对符号消费的“随时随地的抵抗”(福柯)。

有学者提出“第三类女性”的概念,即女性自我理想的形象,这类女性形象同历史上其他女性形象有着重大差别,是不可否认的历史性断裂,男女同时不加区分地自由发展自我。但是这种自由发展总是受一定条件限制,受不同标准

<sup>①</sup> [法]吉尔·里波韦兹基:《第三类女性:女性地位的不变性与可变性》,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36—137页。

和社会影响制约,并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不同的社会标准和影响会消失。<sup>①</sup>

## 小 结

现代社会正在进入消费社会,这是指人类社会生活的组织越来越围绕着对商品、服务和休闲的消费而进行,消费及符号化消费创造的需求推动社会的发展。消费社会的基础是以个体性为社会结构性原则,大众文化既刺激了文化工业的发展,也在不断激励人们的享乐主义。性别化消费和性消费成为消费社会的特征之一,在人们对性别气质和性进行消费时,不平等的性别关系被再生产出来。在消费社会中,性别被消费着,大量的广告在传播着刻板化的两性气质,各种选美活动塑造出一代又一代的美女,并由此控制女性对化妆品、服装以及减肥药品的消费,当女性作为“漂亮性别”被渲染时,她们的身体与容貌也就被消费社会所控制。消费社会一方面将女性从性压抑和生育的苦恼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使女性的身体更屈从于具有强制性的美的诉求之下,这种诉求的背后是消费社会的生产逻辑。

### ❖ 关键概念

消费社会 符号化消费 后现代主义 社会结构性原则 消费文化  
 大众文化 性别化消费 性消费 强迫性广告 感官主义 漂亮的性别  
 第三类女性

### ❖ 思考题

1. 试分析性别化消费的种种表现。
2. 任意描述一个视频广告,对其进行性别分析。
3. 试论选美的社会功能。

### ❖ 进一步阅读文献

[法]吉尔·里波韦兹基:《第三类女性:女性地位的不变性与可变性》,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sup>①</sup> [法]吉尔·里波韦兹基:《第三类女性:女性地位的不变性与可变性》,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12页。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桥等译),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

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郭国良、徐建华译),商务印书馆  
2001年版。

[美]凯瑟琳·巴里:《被奴役的性》(晓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 第十二章

# 社会发展与性别

### 引子

社会总是在不断发展的,人们普遍相信发展会促进社会进步,并促进妇女地位的提高。相信发展带来的社会进步仿佛成为一种信仰,由此推动社会不断追求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但事实是这样吗?有学者指出,“虽然妇女参与的经济增长在某些方面对妇女有利,但整个经济发展体系却是为了强化男性主导地位、有利于资本积累,以及将妇女置于阶级、种族、社会性别和文化等级中的从属地位而构建的。”<sup>①</sup> 1993年正是中国新兴的城市深圳经济迅速发展的年代,这一年的11月19日葵涌镇致丽玩具厂发生了一场大火。在这场大火中有84人死亡(女82人,男2人),20人重伤,25人轻伤<sup>②</sup>。

致丽工艺玩具厂是港商租用葵涌镇厂房进行独资经营的“三来一补”独资企业。生产、经营皆由港方负责,利润由港方独享。葵涌镇派一名厂长协助港方经营管理企业。厂房是一幢三层钢筋混凝土建筑物,于1988

<sup>①</sup> 周颜玲、凯瑟琳·伯海德主编:《全球视角:妇女、家庭与公共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sup>②</sup> 有关大火的情况,参见《工人日报》1993年11月30日、1993年12月26日、1994年12月14日和《光明日报》1993年11月23日的报道。



年5月建成并投入使用,建筑面积2166平方米。第一层是裁衣车间和仓库,第二层是手缝和包装车间,第三层是衣车车间。该厂注册员工418人,事故当天在厂工人404人。

11月19日13时25分,该厂一层东北角仓库起火,火势顺风向厂房东南和西侧迅速蔓延。经全部调查组确认这起事故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港商违反我国法律法规,无视工人生命安全,强制工人冒险作业。厂仓合一,安全通道堵塞。该厂窗户全部用铁条焊死,大部分窗户还用铁丝网罩闭;厂房内东西侧各有一个疏散楼梯,但港商将东西疏散楼梯用拉闸门上锁封死,只留西面一个疏散楼梯,而且这个楼梯通道上堆放了货物;一层有四个安全出口,有三个出口被锁死或焊死,只留西南面一个出口,并在仅留出的西南面出口中间处装上铁栏,形成一条长约8米,宽仅0.8米的窄长通道。在疏散通道少且不畅通的情况下,近300名工人根本无法迅速逃生,再加上燃烧的化纤物散发出的毒气,许多工人窒息在楼梯口处。这是火灾事故造成严重后果的原因。雇用无证电工,违章接线。中方厂长负责消防等监督职责,然而对港商的违法行为不加制止,盲目服从。<sup>①</sup>

事件发生后,中华全国总工会等机构非常重视,成立专门的调查组,并很快对事故的责任人进行处理。

20世纪90年代,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年代。人们想像和期待着现代化带来的农业城市化和工业化,想像着每个人都应当享有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但80多位女工死于恶劣劳动条件的事实告诉我们,发展并没有解决性别问题,经济增长同样可能会加剧和再生产两性不平等的性别关系。本章将分析经济增长的内涵,批判经济增长忽略的性别不平等以及分析各类发展项目如何将女性更多地纳入社会发展的轨道。

## 第一节 经济增长与性别

### 一、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

#### (一) 全球化与现代化

全球化是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又一阶段,是全球资本主义化。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和生产方式通过核心国家向边缘国家渗透,并实现了全

<sup>①</sup> 《工人日报》1993年11月26日。

球范围的劳动分工。如果我们把地球视为一个共同体的话,当代世界是由发达的、欠发达的和发达国家组成,这一世界图景源起于17世纪到20世纪初期,西方国家运用其优势的军事力量,在众多传统社会建立起殖民地。虽然这些殖民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先后独立,但是殖民主义进程形成了今日全球性的社会地图:一是发达国家或第一世界,他们的工业化水平很高,如欧洲、北美洲、澳大利亚和日本等,这些国家基本上都实行多党制和议会制。二是欠发达国家,工业发展水平较低,从政治体制上讲,主要是指前苏联、东欧等共产主义国家,他们曾实行计划经济,只有少数的私有财产或竞争性的经济企业,曾经是一党制的国家。三是不发达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发展水平低,以农业生产为主,如中国、印度和非洲的主要国家,他们大多有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历史。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第二世界国家消失,出现了转型国家,即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国家。

在上述全球性的社会地图面前,发达国家成为欠发达和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效仿的榜样,追求以经济增长为主的社会发展成为人类追求更好生活的重要内容。因此,发展成为各个国家不可避免的追求。如何使欠发达国家进入到高速增长行列中,如何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增长成为国际问题,由于经济增长孕育着改变社会诸方面的力量,经济不断增长也就成为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著名人类学家斯科特将国家对于现代化的追求定义为极端现代化意识形态,这一定义带有很强的反思与批判色彩,批判国家权力在现代化过程中对微观秩序的控制。极端现代化意识形态是一种强烈而固执的信仰,相信科学和技术进步、生产能力的扩大、需求不断的满足,以及对自然的控制,相信随着科学地掌握自然规律,人们可以理性地设计社会秩序。这种意识形态产生于西方,是科学和工业进步的副产品。<sup>①</sup>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下,全球化资本主义似乎成为可以期待的未来。

## (二) 经济增长隐藏的社会问题

进入工业社会,人类渐渐脱离了几千年来熟悉的农业社会的秩序与文明。以经济快速增长为核心的社会发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和各种关系结构。因此,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与发展相关的社会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1961年—1970年是联合国第一个发展十年,发展成为全球性的核心问题。发展被定义为:以促进经济增长为核心的社会发展。这一发展理论的假设是:第一,只要经济发展了,国民生产总值提高了,就会自然地带动社会进步。第

<sup>①</sup> [美]詹姆斯·斯科特:《国家的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二,社会进步是普惠众生的,它包括了妇女、贫困人口等。因此,在十年里以促进工业发展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成为重要的工作。

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回首前十年的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时,人们发现,所谓发展只是发展中国家走西方工业化道路。这样一种发展观引发了发展中国家的诸多问题。因为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初始条件、历史背景、外部压力、政治制度、国内利益集团的相互关系、社会中的经济思想传统和文化传统等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有着很大的差异<sup>①</sup>。事实表明,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技术成长的道路和经济增长并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走西方工业化道路在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带来社会和政治进步,一些国家甚至出现了比以往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如贫困、失业、社会不公平等现象。因此,对发展中国家发展道路的反思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定义发展的概念。

到 21 世纪初,发展被看作是“改善生活质量,提高人民构建自己未来生活的能力。这涉及到提高人均收入,更平等地享有受教育和工作的机会,更高水平的性别平等,更好的健康和营养状况,更清洁和可持续程度更高的自然环境,更公正的司法体系,更广泛的公民和政治自由,以及更丰富的文化生活”<sup>②</sup>。也就是说,发展与经济增长不同,它不仅包括更多的产出,还包括产品生产和分配所依赖的技术和体制的变革,包含社会状况的改善和政治行政体制的进步。发展就是使经济增长的益处能够公平地达到每一个人,使每个人获得能够使自己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能力。

## 二、经济增长中的性别问题

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一直把男性劳动力作为重要力量,女性并没有在经济增长理论的视野中。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鲍斯亚布(Ester Boserup)以《妇女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一书第一次从量化的角度分析了妇女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她指出,第一,妇女是粮食生产的主体力量,非洲和亚洲 60%—80% 的农业劳动力是妇女;在拉丁美洲 40% 的农业劳动力是妇女。第二,妇女在生产中的作用表现为她们的劳动是大多数家庭得以生存的基础。第三,女性在生产中的作用没有体现在官方统计中,且被政策制订者所忽略。第四,在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妇女工作的性质、性别角色与社会现代化存在着微妙的关系,发展中国

<sup>①</sup> 杰里菲:《工业发展战略和类型的解析》,载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三联书店 2002 年版,第 774 页。

<sup>②</sup> (世界银行)托马斯等:《增长的质量》,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XXI 页。

家妇女的劳动更多地集中在家庭和非正式就业部门,经济现代化的过程加剧妇女在经济活动中的边缘化。也就是说,现金收入和农业技术的应用是更有利于男性而不是女性。第五,女性的边缘化是欧洲殖民主义在殖民初期将技术、技能、教育优先给予男性的结果,它迫使女性不得不从事低生产率的、对技能要求低的活动。第六,现代化模式不能保证妇女最终从经济增长中受益。<sup>①</sup>

鲍斯亚布的论述明确提出了发展中的性别问题,要求政府部门和学术界重新审视发展对女性的影响。以下的问题需要得到回答:第一,无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到底为两性带来了什么?第二,国家在制定发展政策时,应当如何考虑性别利益?第三,社会性别概念如何纳入到国家决策的主流?可以明确地说,两性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并没有获得同样的步伐和相同的利益。传统劳动性别分工使男性更多地进入技术先进的生产领域,而将那些劳动密集型的低收入工作留给了女性。如果女性的社会角色依然被定位为母亲、妻子,而不是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时,那么女性在社会发展中必然处于边缘的或辅助的地位。

在论及国家与妇女的关系时,有学者明确论述父权制、生产方式和国家如何建构了对妇女生活经验的控制,将国家的存在比喻为“公共”家长制。<sup>②</sup>发展给两性带来了什么呢?结果是复杂的。

第一,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不能无视女性在全球化中的直接作用和她们对正规劳动力市场、非正规劳动力市场、家庭经济和国家的贡献。同时,任何形式的有酬劳动都会增强女性个人生活的能力,使她们有可能实现经济独立。

第二,全球化背景下的女性就业是个复杂的系统。从就业领域看,全球化在容纳了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妇女就业的同时,也加剧了女性地位的边缘化、女性贫困等问题。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中出口行业的女工至少占就业总数的50%左右,在出口加工区中则占到75%以上。女性在跨国公司子公司或出口订单企业中的就业成为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出口加工区的制造业主要以成衣、制鞋、电子产品组装为主,有些地区女工比例高达90%。跨国公司越来越多地在海外建厂,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为发展中国家的妇女带来了就业机会的同时,也使这些女性劳动力作为廉价的劳动力处于被剥削的地位。女性劳动力在

<sup>①</sup> Ester Boserup, *Women's Rol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70).

<sup>②</sup> Nancy Folbre, "The Pauperization of Motherhood: Patriarchy and Public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Naomi Gerstel and Harriet Engel Gross, eds., *Families and Work*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1987).

对全球资本积累、工业重组和新型国际劳动分工做出贡献的同时,被严重地剥夺了充分休息、体面的工作、适当的工资等基本的人权。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国际直接投资导致了东南亚各国第二产业中女性就业的大幅度增加,东南亚各国大量的女性被吸引进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中。到 20 世纪 80 年代,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增加值较低的生产活动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的国家,以维持和提高其在世界市场上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竞争力。但在全球范围内,就业岗位是有限的,全球化并没有给全球女性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只是增加了就业岗位的跨地区、跨国家的流动。一些地区的女性有了新的就业机会,往往意味着另一些地区的女性正面临失业压力。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吸纳就业方面,全球化给有实力的跨国公司获得了更廉价的女性劳动力。

第三,大量关于全球化与性别的文献证实,发展对男女有不同的影响。一种悲观的观点认为,相比男性劳动力而言,女性更能忍耐、更顺从、能够忍受较低的工资、较差的工作环境和较长的工作时间,因此对妇女加入全球化过程的理解必须放入已经存在的“父权制关系”中,这种关系包括意识形态,男性霸权的体制化。发展中国家男女间新资源和新机会的分布状况深受父权制和跨国资本有关性别预设的影响。发展中国家接受外国投资和对核心国家国际贸易的依赖程度与性别不平等水平相关。另一种乐观的观点认为,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工厂中普遍存在的工作条件,跨国公司或其子公司的工作条件比较优越,女性受雇跨国公司子公司的事实对东道国企业施加了某些压力,迫使东道国企业改善工作条件以达到跨国公司的劳工标准。

第四,人们曾经相信随着科技时代的来临,以知识见长的工作内容的增加将有利于女性的发展。但事实是,女性在信息通信技术教育领域和信息通信技术职业方面处于劣势。英国数学和计算机专业招收的女大学生约占 20%;女性在信息通信技术劳动力中占三分之一。<sup>①</sup>可以说,通过以脑力劳动替代体力劳动来显示女性就业优势的想法只是空想,因为职业场所中的逻辑并不简单的是以脑体劳动相区分的边界,而是与利益分配相关联。

第五,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妇女组织也具有了全球化的趋势。目前国际社会存在着一些重要的妇女研究或性别研究的组织,并针对世界贸易组织进行有关与妇女发展相关的活动。如丹麦的 KULU 组织,它是在哥本哈根第二届世界妇女大会之后成立的,还有 SEDO、DOWN(以南方国家,尤其是印度为

<sup>1</sup> ① 国际劳工局:《妇女在信息通信技术劳动力中的比例为何如此低?》,《世界就业报告(2001年)》,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63 页。

主)的妇女组织,这些组织皆追求更加公平公正的全球化理念。当世界贸易组织有活动时,这些妇女组织就对其议题进行讨论,促使世界贸易组织的活动与决议更加透明,促使非政府组织有更多的机会把发展中国家的声音传达到发达国家和地区。女性重塑全球化的努力集中于对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的诉求上。女性对重塑全球化的努力是要求未雨绸缪地将性别的诉求进入到WTO的议题中,以此减弱全球化的负面效应。在北京+5(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后五年的评估)的特别的成果文件中,对全球化问题的关注集中于如何让全球化具有一张人性化的面孔。

### 三、性别发展指数和性别权能指数

如何衡量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呢?这主要依赖于对女性社会角色的考察。因此性别发展指数、性别权能指数等成为测量性别发展的重要指标。

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VNDP)首次在“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了一套全面地衡量发展质量的指标体系,即“人类发展指数”(HDI)。人类发展指数是通过测量预期寿命、教育程度和人均收入对一个国家的发展状况进行评估。为了更好地测量两性在发展中的获益状况,1995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人类发展报告》中设立了两项测量两性平等的指标,一是性别发展指数(GDI),二是性别权能测量。以此对人类发展指标进行调整。

性别发展指数是通过测定两性在预期寿命、受教育程度和实际收入上的状况和差异说明一个国家的性别发展状况。人类发展指数对每一个分指标都设立最高点和最低点,分别用“0”和“1”表示。从性别发展指数看,性别发展指数越接近1,男女平等程度就越接近,反之两性平等程度的差距越大。

表 12-1 1994 年三国性别发展指标状况

		瑞典	中国	日本
收入比例	女	41.6	31.2	33.5
	男	58.4	78.8	66.5
预期寿命	女	81.1	70.4	82.5
	男	75.4	66.9	76.4
成人识字率	女	99	70	99
	男	99	88.2	99
小学中学大学总入学率	女	79.3	70	87.5
	男	76.6	88.2	83.5
性别发展指数		0.919	0.578	0.896

性别权能指数(GEM)是分性别地测量两性在就业、专业和管理岗位上的份额以及议会席位上的份额。

表 12-2 性别权能指数

	女市长比例 (1994年)	女议员比例 (1994年)	女部长级比例 (1994年)	女行政人员比例 (1990年)
瑞典	—	34%	30%	64%
中国	8.8%	21%	6.9%	30%
日本	0	7%	6%	9%

可以看出,第一,发达国家在性别发展指数上明显优于发展中国家;第二,经济增长和发展并不一定能够改善性别权能指数,日本虽然有很高的经济增长,但是性别权能指数远低于中国,妇女并没有因为经济增长而改变其社会地位。

表 12-3 2000 年根据 ISCO-88 国家中女性管理人员比例数据

地区	管理人员占全部劳动力的%	女性在管理人员中的%
发达国家	8.1	27.6
转型经济国家	6.7	32.9
亚太国家	5.6	15.3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5.0	32.8
中东地区和北非	5.9	28.1

可以看出,职业的纵向隔离依然存在。特别是亚太地区,女性在管理人员中的比例最低。

为了提高妇女参政水平,各国广泛采用了“最低比例制”。所谓“最低比例制”是指,女性在政治机构中必须构成一定的比例数,这些机构包括议会及议会内的各种委员会、政府、政党的内部机构等。广泛意义上的“最低比例制”不仅用于女性而且用于少数民族或特殊职业人员的参政。法国在1999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规定,政党提交的议员候选人名单中,女性必须占50%;如果不执行,该提名名单无效或政党受罚款处理。联合国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的《行动纲领》要求,女性代表参政议政的比例应该不低于30%。北欧各国在此方面做出了典范。2002年世界女性议员的平均比例是14.3%,北欧国家的比例数高达38.8%。其中,瑞典议会中女性代表占了42%。这是强调两性政治参与从“机会平等”迈向“结果平等”的努力。

中国也规定了女性在各级政治机构、部门、各领导层面的基本比例。自

1978年第五届全国人大女代表的比例数一直徘徊在20%左右,与世妇会要求的数字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中国妇女参政有三高三少现象,即高层领导少、正职少、国家权力的核心部门少;多数是在基层、副职、传统属于女性活动范围的部门,如教育、文化、卫生等。

## 第二节 发展项目与性别

伴随着发展出现的各类问题,国际机构和相关组织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开始致力于改变这种状况,其主要做法是通过各种发展项目来缓解发展中的问题。

### 一、发展项目与性别计划

发展项目是指各种国际组织和发展机构的援助项目,其目的是改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平等、贫困、健康、环境和暴力等方面的问题。在发展项目中,有些是专门提供给女性的,如:对女性的小额信贷、社区综合发展、扶贫项目、生殖健康项目等。

性别计划(gender planning)是把社会性别概念和理论纳入到各项与发展相关工作中的一系列努力。因为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是:女性不仅是一个单纯的利益群体,而且是一种关系的存在,是一种性别关系的存在。第一,性别计划的首要任务就是了解女性和男性在社会中充当的社会角色。有三重角色,即生育、生产和社区管理的角色。这三重角色是人类再生产的角色、生产中的角色和在社区活动中的角色。生产角色是指承担有报酬的劳动,包括那些有实用价值和潜在交换价值的产品和劳务的劳动。再生产角色是指承担劳动力生存和发展的劳动,不仅包括生育,还包括保证现有的劳动力的生存和发展,如子女教育、成年人和老年人的休息。社区活动中承担的角色是指在社区活动中承担的各种角色,这与人们的社会关系网络有关,人们在社区活动中获取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建立起关系网络。承担社区活动的角色有两个方面,一是社区的管理角色,二是社区的政治角色,社区的管理角色主要是提供和保证社区居民的共同需要,比如卫生、保健及服务性活动等,这些工作多是没有报酬的;社区的政治角色主要涉及到社区活动安排和相关事务的处理,乡规民约的实施等。这些工作可能会获得名声。男性和女性都承担着三种角色,再生产角色确实女性比男性承担多,但男性也承担了,生产角色男性承担了,女性也承担了,社区活动的角色事实上男性和女性都在共同承担。第二,了解性别需求。需求有两



种,一是实用性的性别需求,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女性就其社会承认的角色而确定的需要,一般是女性对直接感受的需要所作的反应,这些需要是很实际的,涉及到供水、保健、就业等基本的生活条件。二是战略性的性别需要,是指由于女性在社会中的从属地位而产生的需要,这类需要依据不同具体情况有所不同,具体情况涉及社会性别、劳动分工、权利和控制权,也包括合法权益、家庭暴力、同工同酬、妇女对其身体的控制权等等问题,目的是改善妇女的从属地位。第三,政策分析。分析各种发展的路线对性别作用。<sup>①</sup>

针对两种性别需要,存在着两种性别与发展的概念和策略。一是“妇女参与发展策略”(WID),是为了使妇女摆脱长期被排斥在社会发展进程之外的状况,以提高女性劳动生产率、提高收入、提高管理社会和家务的能力等方法将女性纳入发展过程的发展战略。二是“性别与发展策略”(GAD),其目的是针对不平等的性别权力关系,实现妇女在发展中的充分参与,注重的是两性发展的长期需求与利益,以实现女性与男性共同决策、分享权力的平等和可持续的发展。无论是采用何种发展策略,是否能够满足妇女在发展中的需求依然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对此,联合国相关组织的策略大约有三种:第一,建立或指定一个妇女参与发展的单位,在现有组织机构内实现妇女参与的机制化。如中国的妇联组织。第二,依靠妇女参与发展的专业社会性别专家,使性别视角纳入到一般工作中。第三,更多的性别专家参与到管理和监督工作中。这些做法都需要大量的培训工作,加强社会性别意识。

为了实现两性在发展中获得同等的机会,性别发展战略要求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对社会政策进行性别诊断。对出台的各类社会政策、法规等进行性别分析。(1) 确定性别需求,如劳动分工、家务分工、住房、土地等政策方面两性有怎样的需求,其需求实现的程度。(2) 在需求调查的过程中,发现主导问题,并对主导问题进行因果关系的分析。性别诊断的主要方法是利用统计资料。目前,如何实现有效的性别分类统计是联合国敦促各国政府努力从事的一项工作。

第二,确定性别目标。确定性别目标应当是一个系统目标,有最初目标和最终目标,还要有具体目标。(1) 进行性别监测,建立指标体系。(2) 在整个目标确定的过程中,性别化的磋商与参与应当贯穿始终。(3) 性别导入战略。从

<sup>①</sup> 卡罗琳·摩塞:《社会性别计划,资源财力易招损害性和反暴力的理论分析框架》,徐午、许平、鲍晓兰、高小贤主编:《社会性别分析:贫困与农村发展》,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41页。

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来理解性别问题的因果关系,进行全社会的战略改革。

在性别发展战略的实施过程中,核心概念是“性别意识纳入决策的主流”,其基本的特点是:(1) 在分析发展战略时,重点不是谈女性问题,而是谈性别关系,两性关系不是对立的,而是协调发展的。(2) 女性应当被视为发展的积极参与者。(3) 建立整体的理论观,对生产领域性别关系的认识必然建立在对家庭的认识基础上。(4) 把发展理解为社会及其成员在一定历史背景下满足其物质、情感和创造的需求能力的提高。(5) 平等、福利和反贫困的政策并不是相互对立的的不同选择,可以通过激进式的改革来影响历史进程。(6) 战略选择要求女性要有自己的组织,这样可以增加谈判能力,增强政治权力。

## 二、公共政策中的性别模式

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性别的概念在联合国和世界许多国家被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行动目标,影响着联合国和各国政府的公共政策的制定、发展项目的实施和评估。各国的公共政策的实践是一个历史过程和实践过程,具有不同的性别发展模式。

### (一) 福利政策模式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福利政策模式是一种普遍实行的社会政策,强调救济式援助。有关性别发展的理论假设是:(1) 妇女是发展的受益者,她们被动地接受发展带来的好处;(2) 妇女的主要角色是母亲和妻子,活动范围主要在家庭,她们的活动不能构成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3) 抚养孩子是妇女支持经济发展的最有效的贡献。在这些理论基础上制定的政策和实践模式是:通过福利途径为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和贫困妇女提供帮助,如各种粮食救济项目、提供免费药品、计划生育项目、支持妇女从事缝纫等经济收入的活动。这一福利政策的主要问题在于对妇女角色定位的偏差,其发展政策是治标不治本的,它可能增大妇女的依赖性。

### (二) 效率政策模式

效率政策模式是针对20世纪70年代拉丁美洲和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状况提出来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了减少这些国家的债务危机和民族保护出台了一系列的“结构调整政策”,这些政策相信提高了效率和生产力,两性的不平等状况会有所改善。其基本的理论假设是:(1) 相信妇女的经济参与可以最终实现性别公平;(2) 妇女劳动对经济的贡献之所以低效率是因为她们缺乏教育和无法掌握先进的生产技术。这一政策模式是以公平为始,不顾及结果的,对此讨论依然存在,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至今莫衷一是。但效率

政策可能有害公平,削弱妇女发展的可能性。

### (三) 公平政策模式

联合国第一个妇女 10 年(1976—1985)提出了公平政策模式,强调将妇女整合到发展进程中。它从两性不平等的根源出发提出政策和措施,其基本的理论假设是:(1) 承认妇女在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和贡献,特别在生产和生育方面具有多重作用;(2) 妇女在社会中的不平等地位是由于她们没有获得正式就业和参与市场活动的机会;(3) 重点是减少性别劳动分工中的不平等,改变传统的性别角色模式;(4) 妇女能公平地受益于发展效益;(5) 通过立法保障妇女平等地位。

1975 年,墨西哥举办的第一届联合国妇女与发展大会使人们注意到官方缺乏对妇女生活与妇女利益的关注。因此,当时提出应将“平等与发展”作为全世界提高妇女地位的目标。与此相关的一项“世界行动计划”列出 14 条有关“提高妇女受教育机会、改善就业前景、增加平等参与政治与社会生活和提高福利”的最低目标。世界行动计划(World Plan of Action, 简称 WPA)还要求建立一个世界性的机构以提高妇女的地位、承认妇女所做的未得到报酬的工作并且重估传统性别角色。联合国将 1976—1985 年称作联合国“妇女十年”。1979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消除一切形式的歧视妇女公约》,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签字。这一公平政策模式公正地为妇女在社会中定位,但如何使这一战略目标具体化则是个难题。

### (四) 反贫困政策模式

1985 年的内罗毕论坛是对“妇女十年”的总结,非政府论坛的 13000 名参与者一致对过去十年中妇女取得的每个进步感到乐观,但也看到随之出现的新问题,贫困问题成为关键性议题,因为全球 13 亿贫困人口中有 70% 是女性。为此,应当看发展的结果,要争取妇女受教育的机会,要建立妇女组织,为偏远地区未受过教育的妇女建立银行,推动教育与住房合作项目,议题由“发展中的妇女”(Women in Development, WID)转移为“性别与发展”(Gender and Development, GAD)。由此提出了反贫困政策模式。

反贫困政策模式是从两性不平等的结果出发来制定发展政策模式,强调“低调”或“低水平”的公平,其基本的理论假设是:(1) 导致妇女贫困的原因是妇女在获得土地、资金等基本生产资料时与男性不平等,在就业中受到歧视,因此她们比男性更贫困。(2) 干预性政策在于促进和发展贫困妇女在创收上的项目,如通过养殖、食品加工、小企业发展等方式,以增加妇女收入。也就是说,是通过改善妇女的实际收入来达到性别平等的结果。

反贫困政策常常被视为西方殖民主义的一种延续,因为在贫困发展项目中,发展中国家的妇女常常被描述为受害者,她们被鼓励通过家务活动如缝纫、烧饭、在农村地区还包括喂鸡、养猪等来参与“妇女的工作”。发展专家们可能用“代表”妇女的工作方式再生产出第三世界妇女是被动受害者的刻板印象。反贫困政策的问题在于,如果妇女在家务劳动之外又要通过有酬劳动来增加收入,将加重她们的劳动负担,可能会对妇女更不公平。

#### (五) 赋权政策模式

赋权政策模式是发展中国家的本土模式,它强调妇女所受压迫具有多元化的特性,民族、阶级、家庭和社会地位等多方面的因素限制妇女的发展,赋权就是妇女增强自身的能力,自力更生,自我组织,最终拥有改变现状的能力与力量。加拿大国际开发署在《性别平等政策》(1999)中对赋权的界定是:

赋权是指人——女性和男性——能支配自己的生活:制定自己的生活议程,获得技能,建立信心,解决问题,能够自立。它不仅是集体的、社会的、政治的过程,而且还是个人的过程。它不仅是一种过程,也是一种结果。其他人不能给妇女赋权,只有妇女才能给自己赋权来代表自己进行选择或发言。但是机构包括国际合作机构可以推动这一过程。<sup>①</sup>

满足妇女的物质需要只是发展的手段而非目的,真正的发展是对妇女的赋权,使妇女参与到那些控制她们生活的各种活动和制度结构中。赋权(empowerment)也被称为“意识唤起模式”(consciousness-raising model),其基本的理论假设是:传统文化是阻碍妇女发展的根源,因此唤起人们的觉悟,改变传统的价值观、态度和行为就是使妇女获得权力的过程,其结果最终会促进妇女发展。在“性别与发展”的认识框架下,要求从全球背景理解妇女的从属地位,这包括对性别不平等生产与再生产的关系、性别与阶级的关系以及劳动力的性别分化三个重要机制的认识。

赋权政策模式存在的困境是:政策运行的关键是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即促进政府改变传统文化观念,把性别利益放在首位。这需要多种力量的作用。一方面,为了改善在发展过程中两性非同步发展的状况,联合国要求社会政策要符合性别发展的需求;另一方面,也需要各种非政府的妇女组织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宣传,使性别意识能够纳入决策的主流。

<sup>①</sup> 李小云、林志斌:《性别与发展导论》,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页。

### 三、对中国发展项目的性别分析

近年来,中国在发展方面获得了重要的成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2年人类发展报告》透露,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HDI)目前位于世界第96位,比1990年上升了14位,比1997年上升了7位。在过去的10年中,是所有被测173个国家中上升最快的。报告显示,中国在饥饿人口减半、所有儿童完成初级教育、在各级教育中消除性别歧视3个具体目标都处于“正实施”或“已实现”的状态。<sup>①</sup>

但是,两性并没有获得相同的发展。从表12-1可以看出:中国的性别发展指数,除预期寿命之外,中国女性的发展水平大大低于男性的发展水平,特别是在收入比例上,女性平均收入不及男性的一半。各种资料表示,在中国逐年以8%左右的比率实现GDP增长时,中国的女性在收入获取、政治经济参与、教育培训等方面和男性依然存在较大差距,中国女职工在妇女劳动保护、培训和参与管理方面仍处于较低水平,女性的生育保险普及率也不高。

在各类发展项目评估中,特别是在生殖健康、教育、扶贫、环境等进行测量的项目中,性别评估是核心工作。下面我们以中国的一些发展项目为例,看性别与发展的策略如何成功地改善性别关系以及存在的各种问题。

#### (一) 生殖健康项目

1994年9月召开的开罗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上通过的《行动纲领》对生殖健康进行了明确的阐述,表达了人们在生殖健康的定义上达成的共识:“生殖健康是指于生殖系统及其功能和过程所涉一切事宜上身体、精神和社会等方面的健康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不虚弱。因此,生殖健康表示人们能够进行满意且安全的性生活,有生育能力,可以自由决定何时生育和生育多少……(它意味着)人们有权获得适当的信息和服务以使妇女安全地通过怀孕和分娩……它还包括性健康,其目的不仅在于提供必要的,与生育和性传播疾病相关的咨询及服务,还在于对生活质量和个人关系的增强。”<sup>②</sup>

那么,是否存在女性的生殖健康或男性的生殖健康呢?对此有不同的观点。有学者专门提出“以妇女为中心的生殖健康模式”,是要增加女性权利,使她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自身的生育健康需求,并能在家庭、社区和政策上明确表

<sup>①</sup> 《北京青年报》2002年7月25日。

<sup>②</sup> 世界卫生组织1995年8月为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准备的世界卫生组织立场报告第三部分,顾宝昌主编:《生殖健康与计划生育的国际观点与动向》,中国人口出版社1996年版,第86—87页。

达自己的需求。以妇女为中心的生殖健康模式有助于将女性从生殖的客体变为主体。在生殖问题上,女性比男性面临更多的风险。据世界银行统计,生殖系统疾病占女性患病和残疾总数的30%,占男性患病和残疾总数的12%。因此,即使没有生育意愿或者不育的女性,由于其一生要经历经期、更年期,妇女健康在整个生殖健康领域占有突出地位,应以妇女为中心。<sup>①</sup>

1994年在开罗举行的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提出男性生殖健康问题,其目标是推动在生活领域内的各个方面的性别平等,并鼓励和使男性对其性和生殖行为,以及对社会家庭所承担的角色负责。近年来,许多生殖健康项目对男性生殖健康议题感兴趣,它有时被称为“男性参与”或“男性伙伴”。这些项目认识到男性对女性和儿童的健康具有重要影响,且男性也对生殖健康有明显的需求。许多男性关心并愿意对其伴侣的生殖健康和家庭福祉做出积极的贡献。尽管男性参与生殖健康好处巨大,但在什么是男性参与生殖健康项目这一问题上还缺乏共识,并且对这种参与如何影响女性健康和地位的作用也存有疑问。

从中国的情况,在计划生育方面男女的责任不平衡。因此在宣传和工作上重点强调女性生殖健康。女性是避孕责任的主要承担者,女性采取避孕措施的占80%以上。计划生育宣传工作也有所欠缺,据调查,有80%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女性应承担避孕的主要责任。由于未采取避孕措施或避孕措施失败,我国每年人工流产的数量相当大。最高年份的1990年,人工流产数达到1349万例,2002年仍有681万例。<sup>②</sup>

在一些国际组织的援助之下,在中国云南等地自20世纪90年代之初开始了有关农村妇女生殖健康的项目。一位参加了云南省罗平县两个乡妇女生育健康项目的学者指出,以社会性别与发展(GAD)为指导思想的参与性项目使妇女在其活动中有新的身份认同和新的角色。这是一个“贫困妇女发展经济与健康促进相结合的”试验性项目,项目有三个相互关联的环节:妇女发展→←经济改善→←健康促进,项目宗旨是参与性的。具体的手段是:使用村基金进行。这个过程是促使妇女自愿组成小组,在共同产生小组规则的前提下可拥有一笔信贷资金和健康基金,资金和基金如何使用、收取多少利息、利息的比率以及在三个月内具体的还息时间等,均由本小组成员共同商量决定,利息归小组集体所有。该信贷活动的设计是想把经济发展的权杖尽可能地交给农妇自己。在

① 萧扬:《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妇女生殖健康》,《浙江学刊》2001年第5期。

②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编:《中国社会中的女人和男人——事实和数据(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版,第29页。

这期间进行基础的社会性别意识培训,使社区中的农妇清楚她们在社区及家庭中的传统角色和身份的形成,使其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其角色和身份是可以改变的,即通过相关活动增强其能力。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有的农村妇女小组三五成群地自发为社区做好事,如清理水井、打扫寨内卫生,有的还跑到村小学现身说法,谈不识字的苦处,以教育孩子认真学习。农妇们对发展有着不完全等同于主流社会的界定,她们以自己的方式履行发展中的责任。<sup>①</sup>

另一项在云南澄江县和陆良县为项目点进行的“中国云南妇女生育健康与发展项目”,以“照片呼唤”的方法反映农村妇女“实用性的性别需求”。因为如何发现农村妇女的需求是解决其发展问题的核心,鉴于语言的关系,研究者对农村妇女进行了简单的拍摄培训,这些照片以无声的语言诉说了农村妇女的需求,她们对水、燃料这些日常生活所需资源的需求远大于她们对自身生殖健康的关心。因此,项目以改善农村水及燃料资源入手,最终提高女性的生育健康水平。<sup>②</sup>

## (二) 母婴平安项目

在中国孕产妇死亡率大幅度降低的情况下,流动人口中的孕产妇死亡率却在升高。据广州市卫生局的一项统计,2000年广州市的流动人口孕产妇死亡人数比1999年增加了一倍,是1996年的4.6倍。这主要是由于经济原因,流动妇女没有进行正常的产前检查,不愿住院分娩。宁愿冒生命危险接受非法接生,由此造成的死亡占到一半左右。<sup>③</sup>

中国扶贫基金会从2000年起开始了“母婴平安120行动”。在偏远的山区,因贫困导致的孕产妇和新生儿死亡现象还是比较严重的,该行动就是为她们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和生命保障。通过建立母婴综合保障系统;提高贫困社区母婴生命保障水平和健康水平,促进乡村人口素质的提升,避免因母婴生命出现问题而返贫的情况,促进爱心的奉献和人类文明和谐发展。母婴综合保障体系的基本框架是:1. 建立母婴安全分娩救助系统,通过项目储备金,对贫困母亲分娩实施分类补贴救助;2. 建立母婴物资捐助系统,对贫困产后母婴实施援助;3. 建立设备援助系统,为项目区医疗机构筹集和捐赠急需的医疗设备,提升贫困地区服务机构的母婴救助装备水平;4. 建立基层妇幼保健培训系统,提升

<sup>①</sup> 参见赵捷:《赋权妇女的途径》,载杜芳琴、王向贤主编:《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在中国(1987—2003)》,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4—173页。

<sup>②</sup> 李滇、王绍贤主编:《合作与参与——中国云南妇女生育健康与发展》,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1998年版。

<sup>③</sup> 曾文琼:《广州:流动人口母婴安全问题亟待解决》,《南方都市报》2001年3月9日。

项目执行机构、人员的项目管理能力和业务水平;5. 建立项目信息管理系统,为受援者及援助者提供双向信息服务。到2002年已经有25万人获得帮助。<sup>①</sup>

### (三) 扶贫项目

对于贫困有不同的解释,中国多以收入为标准划分贫困人口。在中国政府的积极努力下,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近2.6亿下降到1998年的4200万,或者说从占农村总数的三分之一下降到二十分之一。但与此同时,中国城市出现了新的贫困人口。

以世界银行的定义,贫困不仅是指物质的匮乏,而且还包括低水平的教育和健康、包括风险和面临风险时的脆弱性,以及不能表达自身的需求和缺乏影响力。贫困制约着一个人所拥有的能力,即他或她享受自己所珍视生活的基本自由的能力。<sup>②</sup>

有学者认为,在中国的扶贫开发领域,早期的扶贫项目中性别平等与发展并未取得十分明显的成效,这与政府的宏观扶贫政策及其发展阶段有关。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扶贫以单纯的生活救济和财政补贴为主要特征。这一阶段,中国的贫困地区主要是原材料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的主要分布地带,且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其扶贫政策是“钱—粮—棉”式的援助。此阶段的扶贫没有引入性别视角。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的扶贫工作主要以区域经济增长为主。通过各地区扶贫办提出项目报告书,农业发展银行审批,然后交到相关部门及单位具体执行。其操作办法是借助下属地方政府和扶贫办公室实现扶贫目标。关注的是区域经济增长。家庭经济没有在其扶助的视野中,同时性别问题也没有被提出来。各级政府财政对区域经济增长和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功不可没,但是这种扶贫方式对于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的根本改变收效甚微。甚至出现了贫困户获贷难、贷款回收率低和资金渗漏等问题。为此有关组织将国外成功的小额信贷扶贫经验引入中国,建立了一批形式多样的“妇女参与发展”的扶贫项目。

随着对贫困妇女社会经济状况和地位的了解,“妇女贫困化”的主题和认识得到深化。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培训和锻炼了一批具有社会性别意识的专家。但是小额信贷扶贫项目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对妇女发展起作用却是一个难以简单回答的问题。

<sup>①</sup> 参见 [www.cfpa.org.cn](http://www.cfpa.org.cn)。

<sup>②</sup> 世界银行:《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与贫困作斗争》,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



## 小 结

经济增长不等于发展,发展是一个综合概念,包括经济以及政治、法制、文化、社会生活的全面发展,意味着经济增长的好处能够达到每个人。如果女性的社会角色依然被定位为母亲、妻子,而不是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时,那么女性在社会发展中必然处于边缘的或辅助的地位。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性别发展指数和性别权能测量两项指标来衡量,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的总体发展虽然取得巨大成就,但是在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就业机会、参政议政机会等决定个人发展潜力的重要问题上,两性之间还是存在较大的差异。面对发展中的各类问题,国际机构、政府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开始致力于具体的发展项目,有些项目希望通过努力将两性同样地纳入到发展的进程中,以实现实用性的和战略性的性别发展需求。对一些发展项目进行性别分析发现,有些项目比较好地改善了妇女在发展中的不利地位,而有些项目则对妇女地位的改善作用不够明显。

### ◆ 关键概念

全球化 极端现代化意识形态 发展 性别发展指数 最低比例制  
 发展项目 性别计划 实用性的性别需求 战略性的性别需求  
 妇女参与发展 性别与发展 赋权 生殖健康 贫困

### ◆ 思考题

1. 简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指标体系中用来测量性别状况的两项主要的指标。
2. 试分析在发展项目中如何协调实用性的性别需求和战略性的性别需求。

### ◆ 进一步阅读文献

- 徐午、许平、鲍晓兰、高小贤主编:《社会性别分析:贫困与农村发展》,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 李小红、林志斌:《性别与发展导论》,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 李慧英主编:《社会性别与公共政策》,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2 年版。

伊娃·拉斯格博:《妇女参与发展、妇女与发展、社会性别与发展》,见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

佟新:《社会结构与历史事件的契合——中国女工的历史命运》,《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5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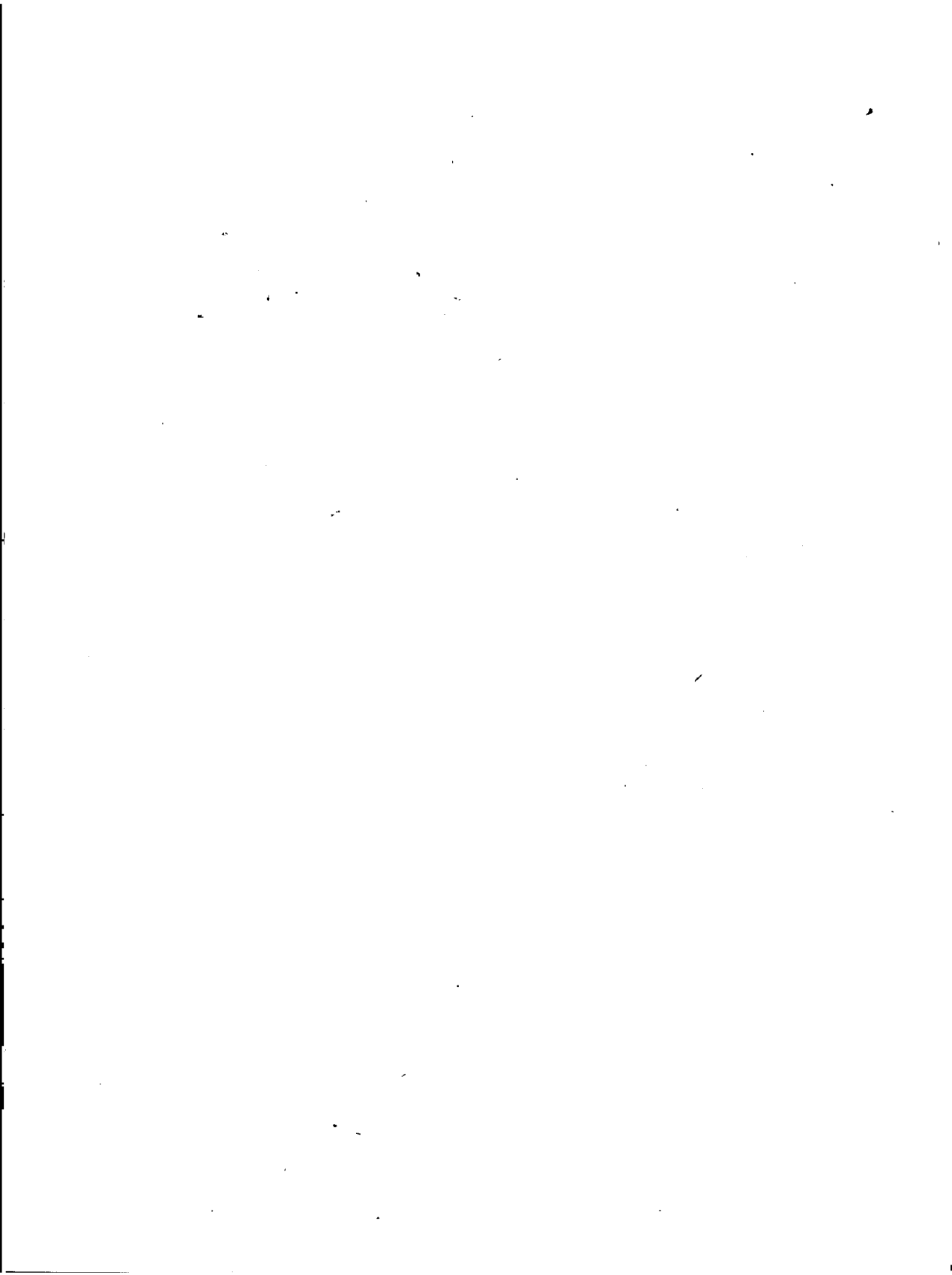
[加]宝森:《中国妇女与农村发展——云南禄村六十年的变迁》(胡玉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 第四编

# 挑战传统知识

本编作为全书的最后一部分专门介绍社会性别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为今后从事相关研究奠定理论和认识论的基础。

第十三章介绍社会性别研究的基本理论。这些理论主要源于女权运动和女权主义理论,女权运动发展不同阶段遇到的核心问题构成了女权主义理论各个派别的思想渊源,社会性别研究的主要思想与女权运动在后现代阶段的发展相呼应。第十四章介绍性别研究的基本方法。社会性别研究从认识论层面挑战了传统实证主义认识论,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它将批判性、经验性、行动性和创新性带进社会科学领域。具体研究方法的应用将有助于倾听两性的声音、为理解和解释中国社会的性别关系提供基础。



## 第十三章

# 社会性别研究的基本理论

性别研究的理论困境使我们必须从跨学科研究中获得理论滋养。总体来说,性别研究的基本理论受到女权运动和女权主义理论的影响,因此首先介绍不同流派的女权主义理论。当我们理解理论时应当问这样几个问题:第一,该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第二,该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第三,该理论的基本假设;它的解释力怎样。第四,该理论的主要倡导者和行动者。她/他们的性别、种族、阶级、国籍和性倾向是怎样的。第五,对该理论的批评有哪些,这些批评的基础是什么。

### 第一节 女权运动和女权主义 理论的互动发展

早期的女权主义理论是应女权运动的需求而产生并在女权运动的推动下日臻成熟和多元化。女权运动离不开人类追求解放和平等的人权运动,而人权运动对女性作为平等的人的权利的忽视,促使女性发起自己的运动,并形成独立的知识体系,从要求妇女解放和两性平等,逐渐发展到要求变革不平等的法律、文化和社会制度,并从社会制度、文化和结构等方面分析父权制的生产与再生产。

## 一、女权运动的历史分期

女权运动的历史是一部人类追求平等与解放的历史。因此,它应当是人权运动历史的一部分,但正是在人权运动史上忽视了女性的权利才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女性展开运动,要求平等权利。许多著作在论述女权运动史时常常只谈西方,事实上,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女性都为争取自身的权利进行过斗争,她们都是女权运动史的一部分。中国的女权运动绝不是步西方后尘的学步活动,早在明中叶资本主义萌芽发生时,呼吁解放妇女的启蒙思潮就已经出现了。女权运动及女权主义思想是人类社会非常重要的文化力量,它出现在历史上女性认识到自身权利的时刻,早期的女权思想是以女性参与写作等方式来叙述其权利要求的。

有学者认为在西方社会,早期的女权主义浪潮发生在15世纪、16世纪、17世纪,今天女权主义者关注的问题,如强暴、性骚扰和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在那时就已引起妇女们的注意。那时的妇女就已提出,她们作为理性的、有尊严的主体应当得到合理的教育和他人的尊重。<sup>①</sup>

目前人们习惯把女权运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次浪潮是在18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第二次浪潮是19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期,第三次浪潮是20世纪末至当代。

每个阶段的女权运动和女权主义理论都有重要的传承,其历史脉络是:在行动上以争取权利的斗争为主线,在理论上以反思和批判传统主流理论为主线,并容纳更多的人进入到运动中来。女权运动直接促成了女权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学科化建立。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妇女解放运动创造了对妇女知识的需求,这种需求既来自于社会,也来自于校园,师生共同感兴趣于了解妇女自身、妇女的经验。20世纪60年代的大学改革的呼声和学生运动以及各种反抗运动使大学的教育制度变得灵活,并广泛接受了妇女研究、社会性别研究作为大学中的相关课程。一批女性学者从妇女运动中吸取能量,从政治热情转向学术热情。女权主义理论迎来了对她的巨大挑战——学科的制度化建设。一方面,当一种思想和理论被纳入制度化建设的轨道时,它原有的生命力和对传统的挑战能力将会被削弱;另一方面学科的制度化能够培养更多的人进入到该研究领域,实现新的知识变革和传递更多的声音。

<sup>①</sup> [美]约瑟芬·多诺万:《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赵育春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 (一) 人权理念和第一次浪潮的女权运动

女权主义理论源于女权运动,并与资本主义的人权运动和反奴隶制度的运动有内在联系。所谓女权运动就是争取妇女权利的运动,它一直要求女性与男性享有同等的权利。

18世纪是一个人类呼唤人权和平等的世纪。著名的《独立宣言》明确指出:“人人生而平等”。然而在这一争取平等的运动中,女性群体却很少受到关注。1792年,英国作家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以《妇女权利宣言》一文正式提出了妇女的行动宣言,要求女性享有那个时期的男性享有的所有权利和自由。这些权利包括妇女在婚姻中的合法地位、离婚的权利、财产继承权和子女监护权等,特别是获得同男人一样的政治权利——选举权。这一运动持续了几十年的时间,直到1920年美国妇女获得了选举权。而当妇女获得了选举权之后,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妇女运动有所削减。

19世纪的女权运动对男女平等的法律权利提出要求,其理论是明显的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思想。强调人人都有不可让渡的自然权利,两性不仅是自由的,还拥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特别是在政治、法律、军事、经济、职业和受教育方面,两性应当享有同等的权利和机会。倡导改革,希望通过改变对女性不公平的态度和法律,使两性在教育、就业和政治机会等方面享有同样的权利。然而,启蒙时期的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强调应当把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事情区分开,因为这两个领域有不同的统治规则,女权运动的重点是改变公共领域中的性别不平等的统治规则。

### (二) 文化运动和第二次浪潮的女权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妇女要求工作的权利提供了实现的契机,当男人不得不离开工作岗位上前线的时候,妇女填补了劳动力的空缺,女性成功地担负起过去被认为只适合男性的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已经成为社会劳动力的妇女再次被推回家庭,为男人让出工作岗位的时候,女性开始反思自己的权利。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运动,女权运动再次兴起高潮,形成了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的高峰。

这次女权运动主要是抵制不利于妇女的法律,如对妇女人工流产权的争论,并以群众游行、政治游说等行动为特征。这些行动深入到个人生活,出现了生活方式的改革,如出现了DINK家庭(自愿不生育家庭)、同性恋、公社制等行动。由此,女权运动直接改变了西方社会的日常生活。以法国哲学家波伏娃(Beauvoir)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从理论上建立起更为成熟的女权主义理论。

此时激进女权主义理论得以形成和发展。激进女权主义者主要是20世纪

60年代积极参与争取民权政治活动和反战运动的女性,她们从“新左派”运动中男性激进分子的傲慢态度中发现了她们自身真实的处境。她们意识到大男子主义和女性的屈从地位实际上是社会压迫的根源和原型,因此女权主义必须进行真正的变革。她们要求女性的性自由,选择使自己感到满意的、自由的生活方式,希望根除包办婚姻和要求对自己身体的自主权。

### (三) 后现代运动和第三次浪潮的女权运动

如果说前两次女权运动的浪潮主要发生在西方社会的话,第三次浪潮主要得益于有色人种、第三世界国家或殖民地国家的妇女要求发出自己的声音,她们要求不仅摆脱性别压迫,还要摆脱阶级和种族的压迫。“社会性别”一词首先由美国女权主义者提出来,其目的在于强调社会性别是区分人们社会地位的基础之一。<sup>①</sup>

1990年,全美妇女研究联合会(National Women's Studies Association,简称NWSA)的第13届年会上,一批有色人种的女权主义者宣布集体离场,由此宣告了女权主义理论统一性的解体。这次年会讨论的主题原本是“女权主义组织是否有权解雇黑人职员”的问题,最终导致有色人种的女权主义者们发表声明,抨击这个联合会是由白人女性把持的,只为白人女性说话。声明强调一个女人的身份不仅仅是女性,她们隶属于某个阶级、某个种族,并且具有自己独特的生活经验。以黑人妇女来看,她们在复杂的社会价值网上占有独一无二的位置,不会与任何其他女性相同。著名黑人女权主义者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她坚持用小写字母写自己的名字,以表示对白人文化的抗议。)指出,西方女权主义理论不是来自受性别压迫最深的黑人劳动女性,而是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的无病呻吟。<sup>②</sup>

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第三次浪潮的女权运动注意到女性内部的差异和多样性。两种关于“差异”的相互矛盾的理论观点出现:(1)一种是把“差异”当作社会性别的差别,把女性作为一个区别于男性的群体联合起来;(2)另一种是把“差异”当作女性内部由种族、阶级、族裔和性倾向等因素导致的不一致性。如美国有色人种妇女自发组织起来的运动、非洲裔美国妇女以及印第安妇女等。因此,这一阶段的女权主义理论开始向性别研究迈进,主张将种族、文化、国家、经济、政治、阶级等因素纳入对性别不平等的研究。

<sup>①</sup> 琼·斯科特:《性别:历史分析中一个有效范畴》,载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57—158页。

<sup>②</sup> Bell Hooks, *Feminist Theory, from Margin to Center*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4).



## 二、女权主义理论派别

伴随着女权运动的发展,各种相关的思想非常活跃,并形成了态度鲜明的女权主义理论派别,成为20世纪以来一个具有张力和发展潜力的理论范畴,对社会理论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们在产生的历史背景、基本的理论假设、核心问题等方面各持己见,但目标都是相对一致的,就是反对两性不平等的社会现实,要求实施社会变革,以实现女性的权利。女权主义理论的各种派别都在回应一些基本问题,只是答案不同。女权主义理论的共同点是:第一,对普遍接受的、充满男权观念的“常识”和“知识”提出质疑和挑战;第二,强调要持续不断地对女性受压迫的机制进行剖析;第三,要求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现实,释放两性的潜能。

### (一) 自由女权主义

自由女权主义(liberal feminism)产生于早期的女权运动,受到政治自由主义的影响,强调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在于两性不平等,因此两性要在政治、法律、军事、经济、职业和受教育方面享有同等的权利和机会。它倡导法律制度的变革,希望通过改变对女性不公平的法律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和政治制度,实现两性平等的权利。

这一理论的问题是没有将私人领域的事情与公共领域的事情区分开。尽管这两个领域相互之间互有影响,但它们由不同的规则、态度和行为所主宰。比如说,在家庭里,爱、关怀和情感是首要的。全美妇女组织(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就是自由女权主义实践的典型。

### (二) 激进女权主义

激进女权主义(radical feminist)认为,女性受到的压迫来源于父权制,也就是一种相对于女性的男性权威系统,该系统在性、个人关系和家庭方面尤为明显。性行为是父权制赖以存在的关键,性压迫自成一体,无所不在。男性控制女性的父权制是历史的必然现象,父权制在性、个人关系和家庭方面尤其明显,家庭成为性压迫的场所;同时父权制也渗透到工作、政府、宗教和法律领域。激进女权主义相信,父权制获得了性别分工的支持和强化,并无所不在。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的《性的辩证法》一书是最早系统地提出激进女权主义理论的著作。她认为,女人不仅在法律与雇佣制度等外显领域中受到控制,而且在私人领域中也是如此。因此,女权主义理论的任务是理解性别制度,并终结这一制度。激进女权主义强调实践与行动,希望通过积极的行动改善妇女的生活,削弱女性受到的压迫。因此她们创造“妇女的文化”,强调女人以真实的

女性特质为基础,重建被父权制所扭曲的女性特质。“妇女的文化”包括由妇女创造的音乐、艺术、表演、写作和舞蹈等;强调妇女间的友谊、妇女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方式以及妇女的历史。她们建立了妇女的新闻通讯、传媒系统、书店、音乐节等。这其中的一些人要求妇女应当彻底和男性分开生活,这些女权主义者被称为女性隔离主义者(separatists),她们中的有些人走向同性恋的实践。

激进女权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 G. 卢宾,使用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提出每个社会都有一整套机制来控制人类的性生活和人类的繁衍,由此产生了各种仪式和道德观,在这些社会活动中,人类生理的性变为了社会的性。女性被支配地位的出现是源于人类自身的再生产活动,与人类再生产各个方面相关的机制构成了一整套“性别制度”。卢宾进一步发展性别制度的理论,强调以生理性别为依据的社会分工是一种社会禁忌,最明显的是它只允许异性的结合关系。这一方面强化了两性之间的差异,为性别压迫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排斥男女两性关系之外的同性性关系,使异性联姻成为强制性的性关系和社会制度。<sup>①</sup>男性统治是以男性对女性人口再生产劳动的占有表现出来的。

### (三) 文化女权主义

文化女权主义以激进女权主义为基础,要求把妇女从“男性价值”的重压下解放出来,并根据“女性价值”创造一种替代“男性价值”的文化,因此文化女权主义运动也成为反主流的文化运动。具体表现为:第一,强调性暴力是男权文化的本质和目的,关注和抨击大众传媒和色情作品中的性暴力。第二,强调两性差异,女性有许多特殊和优秀的品质,比如养育、关心他人和具有合作精神等;而男性特质则是攻击和情绪表达方面的困境。因此,积极地发展女性特质,将会改变整个世界的公共机制和个人关系,应该进行一次社会结构的重组,使社会崇尚母性、彼此关怀、关心孩子,而不是以男性统治的竞争和战争等为标志。这一理论具有本质主义的特点,在学术界遭到了普遍怀疑,因为女性气质对男性气质的替代也就替代了性别平等的目标。

### (四) 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理论也被称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它源于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分析,在讨论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关系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理解女性受压迫的原因。它从“再生产”的概念中建立自己的理论,认为女性受压迫的原因与她们从事的那些维持人类再生产的无报酬劳动有关。

<sup>①</sup> Gayle Rubin, "The Traffic in Women," in Rayna Reiter, ed.,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Wome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5).

虽然无酬劳动与有酬劳动一样重要,但它却导致了父权制和阶级结构对妇女的压迫,因此只有重新界定妇女劳动的报酬和价值的衡量方式才能改变社会结构。资本主义制度对妇女的压迫并非是阶级关系的副产品,仅仅废除父权制是不够的,还应当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因为资本主义从父权制中受益,并在制度、意识形态和实践的支持下支持父权制。资本主义体制存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制度相互交织、相互支撑的特有机制。资本主义支持父权制的意识形态,强化了对妇女的压迫。这种压迫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方面,父权制意识形态强调男女在生育功能上的差异,迫使妇女从事无报酬的家务劳动;另一方面,妇女对家庭的责任又进一步导致了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低地位。男性工人阶级不仅从妇女的家务劳动中受益,同时还从劳动力市场受益。妇女由于没有足够的经济来源不得不依赖于有较好收入的丈夫,这反过来又抑制了她们获取较高收入的能力。资本主义社会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对男性服从于资本家的统治给予了补偿。这种状况阻碍了工人阶级意识的发展,加强了资本主义的统治。因为妻子对丈夫经济收入的依赖又加强了男人对饭碗的要求弱化了男性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体系的反抗意识。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认为,父权制理论并没有说明性别不平等与其他不平等之间的联系,性别不平等源于经济不平等和相关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态度,它是历史性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性别不平等在于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共同作用。

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者希望通过重新界定对妇女劳动报酬和价值的衡量方式,来改变社会结构。她们期望建立一个更为平等的社会,其中男性和女性、工人和管理者以及投资者之间的关系都有所改变,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价值都受到承认,人们的日常文化也不像现在一样,在经济体系下如此地被商业化和商品化。总之,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理论关注经济制度,强调经济是决定性别系统的原动力,两性关系的运转依赖并贯穿在社会经济结构、性与性别结构之中。

#### (五) 生态女权主义

生态女权主义一词是法国女权主义者德·欧本纳于1974年自造的一个新词,并非是简单的生态学和女权主义的结合,它受到激进女权主义和文化女权主义的影响,关注点是生态问题。这一理论认为存在着一种“男性世界观”,即人们相信男性对女性的支配就如同人对自然的支配一样,由此一系列相互对立的范畴表现为:文化/自然,观念/身体,男性/女性,文明的/原始的,神圣/亵渎,主体/客体,自我/他者,等等的相互对立。在每对范畴中总是一边比另一边更有价值,如文化、观念、男性、文明等总比自然、身体、女性、原始的更有价值。后

者处于“他者”(other)地位。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或军国主义等都是建立在这种逻辑上。生态女权主义关注种族主义、经济剥削和对女性及自然的控制。它对作为西方社会的自然和自然界之基础的主导哲学和文化观提出了批评,它认为人们将自然处于“他者”地位的态度是扎根于父权制统治原则的共同信仰体系,这种态度决定了现代人对妇女和自然的剥削态度。

“男性世界观”的等级思想和二元论思想正是生态女权主义者的主要攻击对象。生态女权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规划是,建构人类同自然以及动物之间新关系的思维方式,以取代西方科学特有的客体化模式。这一规划至今尚未完成。

#### (六) 后现代女权主义

后现代女权主义(postmodern feminist)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由有色人种妇女、工人阶级妇女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对西方女权主义展开的反思和批判组成的。它否定自由女权主义、激进女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理论的普适性,强调在特定文化和历史背景下女性经验的独特性,强调语言、妇女生活经验和主客体关系的性别研究是重要的发展理论的源泉,即关注主体性的构成、语言以及相关的意义系统在交流、解释和反映性别角色中的重要作用。

第一,后现代女权主义理论质疑了“妇女”的概念,即否定存在一个整体的、利益一致的“妇女”群体,因为在种族和阶级的作用下,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经验常常被当作了妇女整体的经验。妇女的经验是由阶级、种族、民族、文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阶级、种族等因素甚至比性别的作用更为明显。因此,后现代女权主义强调妇女间的差异,并要求对这种差异进行充分的认识。甚至有人认为“妇女”(women)的概念都应当摒弃,因为不存在一个具有共同经验和共同利益的妇女群体,应当着力说明阶级、种族和性别等诸多不平等体系之间的互动关系,改变长期以来人们仅关注阶级不平等、种族不平等的状况,而应关照种族、阶级和性别相互交叉重叠的不平等状况。这些议题强调三种形式的压迫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作用和相互强化的。人可以同时是被压迫者和压迫者、特权阶级和弱势阶级,多种压迫方式共存。第二,讨论有关全球与地方之间关系。特别是地方文化的张力。第三,强调反抗的力量,相信所有的控制都存在潜在的抵制力量,压迫的不同体系有赖于系统与个人之间控制机制的状况和变动程度。不同文化、地区、阶级和种族的妇女有自己的性别经验和斗争模式。

#### (七) 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

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也称为“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它反对霸权关系,从不同的维度剖析“西方”对“东方”的知识霸权。这里的东方不仅包括传统欧洲殖

民过的地缘政治上的“东方”，而且包括在发达国家中受压迫受剥削的各种人群。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有印度裔美国学者加亚特里·查克拉沃蒂·斯皮瓦克、美国黑人学者贝尔·胡克斯等。在她们看来，在西方人的视野中，东方被建构为“专制的”、“落后的”、“妻妾的”文化象征，东方的知识被贬为“幼稚的”、“处于低层的”知识。同样，西方女权主义是居于边缘反对西方的知识体系，但依然存在有帝国主义霸权的痕迹，她/他们按照自身的知识生产谱系来建构第三世界妇女的形象，并把它编辑为对第三世界妇女的系统知识，进而通过文化优势造成对第三世界妇女的规制和知识内化，抹杀第三世界妇女认识自身、表达自身的能力。西方女权主义在建构她们对第三世界妇女的知识和话语时，也在复制着帝国主义新的文化霸权。这种文化霸权包括：第一，将第三世界的妇女均质化，设想出妇女的普遍形象是“愚昧无知的、贫穷的、没有受教育、受传统束缚的、被禁锢在家庭的、能干的母亲、贞洁的处女、温顺的妻子”等，这与西方妇女受过教育、现代的、对自己的身体和性欲有控制权和能自由做出决定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叙述维护着第一和第三世界之间的差别。第二，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是多方面，应当看到父权制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等权力关系勾结在一起共同起作用。性别压迫之中也包含着阶级压迫，因此妇女反对性别压迫的斗争，必须和反对其他形式的压迫结合起来。第三，需要将历史和文化纳入到分析中，不能简单地使用一些基本概念，如“生育、性别分工、家庭、婚姻、家务、家长制”等。概念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西方女权主义预设了这些概念的普遍适用性，并简单地将第三世界妇女进行归纳和类推。<sup>①</sup>也有学者指出，第三世界内部同样存在着“东方主义”，即将少数民族的妇女想像为一种统一的模式。

总之，女权主义理论不仅是一项学术活动，也不仅是西方的现象，它是一个动态的国际现象，当今女权运动和女权主义理论的目标指向长期存在的性别不平等和女性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的新挑战。

### 三、中国的女权运动和女权主义理论

太平天国时期(1851—1864)曾经出现了一系列解放妇女的主张及政策，建立女营、女军、女馆，设女官、开女科，废除买卖婚姻、禁缠足、蓄妾等。这些做法具有反封建的意义，成为妇女运动的前奏。

1897年、1898年中国最早的女子社团——中国女学会，第一份妇女报刊

<sup>①</sup> 罗钢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女学报》，第一所中国人自己办的女学堂先后出现。据不完全统计，辛亥革命前，女性团体达40余个，女性报刊达30余份。

1902年，斯宾塞的《女权篇》被介绍到中国，这是中国近代第一部关于妇女问题的译作。作者运用“自然权利”学说和进化论观点，论证了女人和男人一样，应享有平等自由的权利。1903年金天翻以署名“爱自由者金一”发表《女界钟》，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妇女问题具有纲领性的全面论述。它批判了女性的封建伦理道德和缠足等恶俗，提倡女子教育，并提出了“女权”的呼吁，女子应当争得六种权利：入学之权利；交友之权利；营业之权利；掌握财产之权利；出入自由之权利；婚姻自由之权利。还专门论述了女子参政问题，认为女子参政应包括：“监督政府与组织政府两大职任”。号召女性“以爱国与救世”为公德，“爱自由、尊平权，男女共和”，为造就新国民，组织新政府而奋斗。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倡导男女平等，将男女平权的原则作为其三民主义的核心内容，是民权主义的组成部分。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兴起了思想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女权主义思潮，它受到西方女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到新文化运动时期，一批关注女权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以各种方式翻译或介绍西方女权主义著作，这些知识分子以男性为主。例如陈独秀、周作人、李达等一批人都翻译和介绍了西方女权主义的著作。这些介绍为中国了解西方女权主义开阔了视野。由于这一时期的主要参与者是男性，他们同女性一样深受封建婚姻的压迫，因此，主张婚姻自主权成为当时中国女权主义的主要呼声。宣传婚姻自由的文学作品很多，有些被编成戏剧上演，出现了接受新知识的男女青年以实际行动向封建婚姻制度挑战的行动。当时发生的著名社会事件是长沙女青年赵五贞为反抗包办婚姻，自刎于花轿中。借此反对封建婚姻成为妇女解放的主要议题。

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认识到女性解放的首要条件是获得与男性一样的受教育机会。争取受教育权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女权主义的主流。1919年5月，甘肃女青年邓春兰写信给当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要求大学开女禁。此信被称为“女子要求入学的第一声”。引发一场关于大学开女禁的讨论。《少年中国》特设《妇女号》专刊，辟出专栏讨论这一问题。第一篇是特约胡适写的《大学开女禁的问题》，表达了主张大学开女禁的观点。1920年1月，蔡元培在燕京大学男女两校联欢会上发表演讲说：“大学本来没有女禁，……要是招考期间，有女生来考，我们当然准考。考了程度适合，我们当然准入预科。从前没有禁，现在也没有开禁的事。”，巧妙地宣布了大学开女禁的决定。1920年春有9名女性到北大旁听，部分省市开始实行中学男女同校。女性教育

权的斗争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sup>①</sup>

在国民党统治区,1930年以《民法》的出台,开始改变传统婚姻。1934年,在江西南昌开始新生活运动,其中提倡妇女新生活运动,组织妇女劳动服务团。也有一批优秀的女性开办自己的产业,身体力行地实现女权,其团结妇女的口号是“女权”。

1919年,“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观也进入中国。同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也通过对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的把握发展自己的女权主义理论。李大钊指出,女权运动,仍是带有阶级的性质。英国的女性争得了选举权后的要求,不过“是与中产阶级的妇人最有直接紧要关系的问题,与那些没有财产、没有受教育的劳动阶级的妇人全不相干。那些中产阶级的妇人们是想在绅士们的社会内部有和男子同等的权力,无产阶级的妇人们天高地阔,只有一身,他们除要求改善生活以外,别无希望。”<sup>②</sup>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创办妇女运动讲习所,何香凝任所长,蔡畅任教务主任。妇女运动讲习所专为培养妇女运动骨干,不仅开中国历史之先河,而且为大革命时期妇女运动的深入发展播下了火种。此后,在解放区,共产党领导了一系列将女性纳入到革命进程中的运动,将妇女解放的历程与中国革命的历程相联结。

1949年以后,沿着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中国走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妇女解放之路。直到20世纪80年代,女权运动和女权主义理论皆被视为资产阶级的思想。改革开放后的思想解放和体制转型,在把人们推向市场的同时,权利的概念也再次被提出,女权主义理论也被人们谈起,虽然有不少的学术著作将女权主义译为女性主义,但要求两性平等权利的呼声和行动已经自下而上的传递开来。

#### 四、女权主义理论评述

女权主义理论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虽然观点不同,但几乎所有的女权主义理论都认同,妇女受压迫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对社会的诸多方面进行改革。

第一,女权主义具有多元性和巨大的发展潜力,但在一些基本理论上缺乏

<sup>①</sup> 参见尹且萍:《西方思想的传入与中国女性主义的崛起》,《武汉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第482—487页。

<sup>②</sup> 李大钊:《李大钊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0页。

共识,甚至存在明显分歧,因此理解各派理论的基本立场是十分重要的。第二,女权主义理论以大量的笔墨对传统男权主流学术思想进行批判,但缺少与主流学术领域心平气和的对话,这使其批评显得过于简单。第三,女权主义理论和女权运动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女权主义理论建立在强大的妇女解放运动基础上,对理论有某种程度的警惕,更强调运动和变革,强调解放与革命的政治行动。然而,21世纪的女权运动不再具有20世纪60年代的生命力,出现了女权运动与女权主义理论分离的现象,更加学科化和制度化。女性学研究中心或系所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学院体制认可的同时,女权运动却黯然失色。各地区、各阶层的女性联合成为被质疑的事情,全球化的女权运动,还有待时日。第四,女权主义理论的传承发生变化,特别是西方年轻一代的女性甚至开始怀疑女权运动和女权主义理论。自由女权主义比较易于被人们接受,因此日益被官僚化的政治、经济和教育体制所融合;而激进女权主义因为其过激的观点和做法常常遭到人们的排斥。第五,女权主义理论面临现代性的挑战。女权运动是否是现代化、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如果这样的话,社会现代化的实现就意味着性别平等的到来。这种观点无助于认识性别压迫的结构。

## 第二节 社会性别研究:超越二元论

社会性别研究在与女权运动与女权主义理论的深刻联系中处于各种理论派别争论的交叉点上,各个派别的理论深入地影响着性别研究的立场和选题。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立场。

### 一、性别本质主义

传统本质主义(essentialism)是生理决定论的,可以应用于对群体间一切差别和不平等的理论。如同一些人相信阶级的差异来自于人们的出身一样。性别本质主义认为人类的第一性征、第二性征和第三性征决定了两性的差异,并进而决定了两性的社会地位。男性对女性的统治是因为男性的生理结构更易于充当统治者,男性获得的统治地位是以牺牲情感、家庭生活、安全等为代价的;而女性因为缺少攻击性,又要生育和养育后代,因此要受到保护。父权制的社会秩序是一种自然的、合理的统治秩序。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有一些学者专门致力于研究男女的大脑构造,说明两性差异的科学基础,如男女的语言功能在大脑的不同部位,它影响语言的流利程度、联想的能力和交流的风格等。

现代性别本质主义走向了一种极端,强调女性接近自然的本性,认为女性



比男性更加具有直觉和创造性。即反传统本质主义的男性至上论,而走向女性至上论。1998年9/10月《外交》杂志推出了一篇名为“让女性统治世界会怎么样”的文章,该文章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讲,生物学是一种命运。但是女权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认为,一个真正的母系社会可能是很少发生冲突的,且比现在更倾向于合作。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国际政治不断的女性化。但是更广阔视野将依然被穆巴拉克、米洛舍维奇和萨达姆这样的男性来统治。如果未来的统治者是由核武器来武装的话,那么,由女性来领导这个世界似乎会更好些。<sup>①</sup>生育和养育子女对女性来说,并非全无意义。萨拉·拉迪克认为,做母亲的体验可能具有政治含义。女人因为做母亲而接受的训练和做母亲的经历决定她们倾向于使用和寻求非武力的方式解决冲突和矛盾。抚养子女的生活经历给予了女性反对战争的独特动机以及维护和平、以非暴力的形式抵抗压迫的独特实践。<sup>②</sup>

警惕性别本质主义的主要目的是警惕性别本质主义可能演化出来的观念和研究成果掩盖了社会中存在的种种性别不平等的实践。当人们承认女性生来偏重情感、非理性、温柔、母性和缺乏抽象思维能力的时候,就不得不把她们放回到家庭中,因为她们与生俱来需要男性的保护,不适合社会生活。这正是男权社会制造的“谎言”。

## 二、性别建构主义

性别建构主义与建构论(constructionalism)同条共贯,强调人在本质上没有同性恋、异性恋、双性恋的区别,是社会文化诸因素压抑了一些感觉,也表达了另一些感觉。即性别不是一个人特有的本质,而是一种具有动力机制的建构,其中充满社会行动者之间的策略行动。其基本的理论假设是:第一,社会性别不平等是人类有意图的产物。男性利用财产、技术、地位和各种象征符号等策略,排斥和剥削女性。例如,社会通过把公共领域划归为男性,把私人领域划归为女性,成功地将妇女限定在家庭事务中,女性即使进入公共领域也只是家庭角色的延伸,并只能获得较低的报酬。与此同时,女性作为受排斥群体,正不断运用政治、经济或符号等手段打破各种阻碍。第二,性别不平等具有结构化特点,被人类创造出来的社会结构给了人们各种各样的机会和限制,个体对这些

<sup>①</sup> Francis Fukuyama, "What if Women Ran the World?" *Foreign Affair*, Sep./Oct., 1998.

<sup>②</sup> Sara Ruddick, "Remarks on the Sexual Politics of Reason," in Eva Feder Kittay and Diana Meyers, eds., *Women and Moral Theory* (Totowa, N.J.: Rowman and Allanheld, 1987), p.252.

限制和机会做出反应的同时也在重新创造着结构。法国女权主义作家波伏娃在其名著《第二性》中鲜明地拒绝了某些理论“我绝对不接受心理生理学心身平行论的观点，……我也不接受任何比较体系，因为它假设存在一种自然的等级制度或价值尺度——例如进化的等级制度。”<sup>①</sup> 她拒绝弗洛伊德式的“阴茎嫉妒”的精神分析理论，也拒绝用阶级斗争来说明男性活动的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她的性别“存在主义”认为：第一，妇女拥有的身体和心理是被建构出来的。第二，妇女面临的社会和文化也是被建构出来的。第三，上述两方面相互作用共同强化了妇女的从属地位，女性遭受着强大的束缚甚至于失去人性。<sup>②</sup>

性别建构主义也分为多种视角，分别强调社会角色的建构、符号建构、情境建构和权力建构。

### （一）社会角色的建构理论

社会角色的建构理论认为，人们的生活受到不同角色的塑造，家庭角色、工作角色等对两性有不同的界定。家庭分工和职业角色的类型化构成了角色本身的不同地位、声望和权力。两性服从与某一性别有关的社会角色规范并以社会认为适当的方式行事。角色差异使两性有不同的兴趣、建立了不同的特长，并把时间花在不同的活动上。

一些跨文化研究致力于对社会角色影响行为的方式提供证据。有研究对单身父亲的角色进行研究发现，那些离婚或丧偶并带着 13 岁以下孩子的父亲们，由于处于照顾者的位置上，他们在照顾他人和做家长的技巧方面与母亲非常相似，并与那些很少照顾孩子的父亲有很大的不同。在肯尼亚的某一部落(Luo)中，男孩和女孩会分配完全不同的家务，男孩做重活，女孩照顾弟弟妹妹。但是对于那些没有女孩的家庭来说，稍大些的男孩也被分配照顾弟弟妹妹，这些被分配做女性工作的男孩会变得较少攻击性，并更依赖其他男孩。也就是说，社会角色本身塑造了从事这些工作的人的性情和行为。<sup>③</sup>

### （二）表演性别的建构理论

性别建构主义致力于分析男性支配的持续、稳定的增进过程，分析宗教体系、家庭制度、继承制度、法律、社会控制体系以及生产体系等看似结构性的制度如何被人为地维持与再生产，表演性别的建构理论强调社会化、历史文化以及现代传媒工具通过符号与意义世界再生产两性不平等的关系。由此，社会性

①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7 页。

② 同上书，第 827 页。

③ [美]泰勒等著：《社会心理学》（第十版）（谢晓非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64 页。

别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可变的、不确定的文化建构。男女的思维、行为和互动主要是由他们生于其中的文化决定的。

表演性别的建构理论受到符号互动理论、拟剧理论和常人方法学的影响,认为两性之间和同性之间的交流行动是一个互动过程,这些互动是一种正在进行的现实,在互动过程中人们不断地创造和表现出自己的性别,并以此界定他人的社会性别及其性别行为的意义,由此构成了一个“有性别”的社会。性别活动是一个表演,在具体的互动中,人们隶属于某一性别,并按照这一性别的社会规范去演出。男性气质和妇女气质的内容不断变化,但是男性和妇女存在基本差异的这种观念一直没有变化,两性间创造差异感觉的扮演决定了性别差异。有两个重要的互动条件是值得关注的:第一,话语研究。通过男女对话分析和用语分析把握两性的对话方式以及其中强化的不平等。因为“对什么是适宜的谈题的定义是由男性选择的。”男性主导着对话;妇女努力维持着对话的进行;妇女以削弱自身能力的方式使用词汇和形体语言,因此降低了她们在谈话中的权力。第二,对刻板化(scripting)性别气质的研究。因为固定化的性别意识形态会再生产出不平等。以家务劳动看,家务劳动为配偶双方提供了“表演性别”的机会,两性的活动强化了他们对自己和配偶劳动价值和角色分工的认同。

### (三) 情境模式的性别建构理论

情境模式的性别建构理论(gender-in-context model)以社会心理学为基础,从人际互动、人与环境互动的视角出发,认为性别的变化机制,与性别存在和活动的社会场域具有重要的联系,性别行为是高度被环境影响的,性别信念系统的形成、保持和改变是个体与他们相互作用的结果。情境模式的性别建构理论假设:男人和女人进行大多数社会行为的潜在可能性是一样的,但是行为受到个人选择、其他人的行为为情境的影响,因此可能会大相径庭。

情境可以分解为三个互动要素。第一,个体(自我、被知觉者):是具有自我概念和对情境的活动目的的人。第二,另一个个体(他人,知觉者):是具有性别信念系统和预期的人。第三,情境:可以使性别因素凸显或隐匿的宏观与微观的场域。性别信念系统包括性别刻板印象、性别角色态度、自我性别认同。这一信念系统是一个知觉的过滤器,个体正是透过它知觉他人。这一信念系统又反过来影响行动者,包括男性与女性、个体与群体。双方会将自我的性别信念系统带入互动过程当中。社会还会形成关于性别的社会信念系统,它成为个体、人际、群际性别行为及性别关系的宏观社会心理背景。因此,情境模式的性别建构理论中的“情境”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他人或社会再现的那些不断复制和强化着社会性别的制度以及与之相应的性别信念系统;二是特殊的、行为发生

的具体情境。情境中的“社会行动者”一方面被社会性别信念限制,另一方面又参与这些信念的保存和重新建构。<sup>①</sup>

#### (四) 福柯的权力建构理论

福柯作为 20 世纪伟大的哲学家,他的有关权力的思想也颠覆了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关系。在他看来,无论是生理性别还是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都是随历史演变而变化的,性别的结构与权力结构共存。性别的权力结构是话语的产物,是异性恋霸权的产物,是在性实践和性别实践中形成的。权力是生产性的,天经地义的性别差异是由权力生产出来的,它涉及国家的管理技术、医疗和快乐学的知识领域。在福柯看来,权力的技术是借着权力/知识共生的关系,因此特别关注知识建构对性别关系的作用。

### 三、二元模式的困境

性别本质主义和性别建构主义形成了一个二元论结构,这种状况在实践层面和学术发展上导致了种种困境,常常会使人处于无路可走的境地。

#### (一) 行动取向的差异

性别研究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是要无视性别差异的男女平等,还是要男女有别的平等?由此导致了两种不同的行动取向。

一种行动取向可称为“女性特殊论”,强调男女有别,女性应当保持和发扬自己的女性特性,在社会生活中起到更大的作用。两性差异的存在不是完全不利于女性的,而是一种有利的条件,因此应当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但是,这种论调会在行动上强调女性生育因素影响了性格,主张妇女应当在家庭内部争取女性的经济独立和地位。另一种行动取向可称为“绝对平等论”,主张男女平等,女性应当享有与男性平等的社会地位,不仅要求机会平等还要求结果平等。这特别出现在立法方面。以美国宪法的平等权利修正案为例,如果这一修正案得到通过的话,几乎所有的性别区分的法律都会变成违宪。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在一个被社会建构性别不平等的状况下,如果要求对两性的同等对待,其结果常常是对妇女的不平等。美国的一项研究表明,离婚判决中的夫妻财产平分制度的结果是使妻子处于比丈夫糟糕得多的经济状况中,一项研究表明,离婚一年后,男性的生活水平平均提高 42%,女性的生活水平却降低了 78%。也就是说,要求两性绝对平等的结果是造成了男女不平等。这使人想起亚里士多德

<sup>①</sup> 参见杨宜音、王甘、陈午晴、王俊秀:《性别认同与建构的心理空间:性别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的互联网》,孟宪范主编:《转型社会中的中国妇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有关公正的说法,公正不仅在于同类同等对待之,还在于不同类不同等对待之。现实的悖论也就在此了,因为“不同类不同等对待之”意味着首先要承认两性是不同的,要求对待两性不同的法律或保护妇女的法律,将意味着使两性不平等的状况永远制度性地存在。

例如,妇女在怀孕等期间得到安全的照顾是一个社会应当提供的最起码的条件。但在具体做法有许多种,例如,怀孕期间雇主不得终止其合同,人们有权享有带薪产假,等等。承认性别差异的确能够在体制上给女性带来好处,但它是代价的,这种代价包括为了保护妇女的特殊利益而设计的措施,其结果阻碍了她们获得同男人一样的发展机会。如妇女的“四期”保护政策的确保护了妇女的健康和安全;但也把她们从某些行业中排挤出去,或减少了升迁机会。因此,无论是“女性特殊论”还是“绝对平等论”都存在着悖论。

## (二) 研究上的困境

以本质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性别研究会出现各种陷阱。例如,在分析两性职业分隔上,本质主义的观点使人们相信两性间的职业差异是一种类别差异,会不自觉地把两性间在认识能力、情感、关系、行为特点上的差别绝对化,不仅夸大了性别间的差异,也暗含了依赖与独立之间的非连续关系,成为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因此,在研究中应当时刻小心,避免将两性在经验、机会、限制上所具有的差别绝对化,需要对性别之间和性别内部之间差异的详细分析。重点应当分析两性在经验、机会、限制等诸多方面的差异是如何被建构起来、并如何得以再生产的。

那么,妇女是否是一个整体?她们是否具有共同的利益?从本质主义的观点,由于性别之间存在着差异,那么就能够认同一个女性的共同利益,女权主义者可以为此而奋斗。但事实是,女权主义者常常在什么是妇女应当优先考虑的政治事项上因为种族、阶级、年龄和性取向的不同而充满争议。正是这种种差异意味着可能根本不存在一个妇女的整体利益。对于女权主义者来说,最大的一个困境是,知识精英的女权主义者提出的行动纲领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底层妇女的利益和要求。建构主义同样困难重重,它的确有力地批判了自启蒙运动以来男性主流话语建构起来的男性霸权,但是它却缺少建设妇女解放之路的力量。因为按照建构主义理论,“女性”或“妇女”只是一种社会现象,当人们相信社会角色是如此的多重和多样时,如何重建女性解放之路?当女性作为整体利益被消解掉后,还何谈解放的政治运动?

#### 四、超越二元论

面临上述种种困境,超越性别的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既是权宜之计又是十分必要和具有可能的。

《不同的声音》一书的作者 C. 吉利根在序言中说:“我发现性别差异是生物学决定还是社会建构的问题是最令人头痛的问题。这种提问题的方式暗示着人们——无论男女——都或者是由遗传因素决定的,或者是社会化的产物——这意味着没有人发出声音——而没有人发出声音的情况下,也没有进行抵抗和创造的可能性,或者来源于心理方面的一种变化可能性。”<sup>①</sup> 因此重要的是行动策略,本书希望借助于对两性不平等产生的社会机制的分析,走出简单的性别本质主义和性别建构主义,希望通过课堂,使人们具有社会性别意识,并具有自主行为的能力。超越性别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也就是超越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也就是超越一切有关性别的二元对立的观点。这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两分法代表了事物发展的非连续性关系,并不能真实描述事物发展的真实特点。社会性别研究对于二元对立的认识论的超越关键在于建立更加有效的研究策略和行动策略。

社会性别研究的策略是以行动来代替理论的争论。如果我们走出学术的殿堂,与社会上实际生活发生真实的联系时,我们会发现性别建构主义和性别本质主义的二元分割式的认识方式对行动毫无益处,甚至束缚了行动。任何做实际性别研究的人,最终都会面临着一个价值的选择,“你的研究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妇女的吗?”“是为了认识两性不平等的社会机制的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揭示和改变父权制的社会结构就会成为行动的动力。前挪威总理布兰特伦曾说:这不是将女性带入男性旧有角色的问题,而是要将女性带出女性之旧有角色的问题。

性别研究超越性别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契机在于:我们追求的不是建立权威的“真理”理论体系,而是关注对具体问题的探讨和解决,关注对产生不平等的社会机制的解释和批判。我们承认研究的局限性,尊重他人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不同的见解。这是近二十年来性别研究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它没有出现一家独尊的局面,而是充满个性和创新的见解。性别研究是一项具有政治意义的研究,它力求分析和改变现有的两性不平等状况。它的策略有三个步骤:第

<sup>①</sup> [美]吉利根:《不同的声音——心理学理论与妇女发展》(肖巍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23页。

一,解构社会科学中的男性中心的本质,分析两性不平等产生的社会机制;第二,发展出一种理解女性经验的理论,或者是将更多的性别经验上升为概念和理论,从而改变知识体系;第三,将男女皆纳入研究的视野,也将男女皆视为变革的动力。

## 小 结

社会性别研究是一个正在形成和发展中的学术范畴,其理论受到女权运动和女权主义理论的影响。女权运动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对理论的需求推动了各个派别的丰富和发展。自由女权主义、激进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后现代的女权主义等等为社会性别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正是在女权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性别研究得以发展,性别本质主义和性别建构主义成为性别研究中日益发展的理论,但应当警惕性别本质主义。通过行动策略力求超越性别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的二元论,以重构平等的性别秩序。

### ❖ 关键概念

女权运动 自由女权主义 激进女权主义 文化女权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 生态女权主义 后现代女权主义  
 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 传统本质主义 性别本质主义  
 现代性别本质主义 性别建构主义 社会角色的建构理论  
 表演性别的建构理论 情境模式的性别建构理论 女性特殊论  
 绝对平等论

### ❖ 思考题

1. 简述女权运动的历史分期。
2. 试述几种不同女权主义理论派别的主要观点。
3. 论述为什么要警惕性别本质主义。

### ❖ 进一步阅读文献

[美]约瑟芬·多诺万:《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赵育春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

王政：《女性的崛起——当代美国的女权运动》，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5 年版。

[美] 贝尔·胡克斯：《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吴小英：《‘他者’的经验和价值——西方女性主义社会学的尝试》，《中国社会科学》2002 年第 6 期。

李银河：《性别问题上的生理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孟宪范主编：《转型社会中的中国妇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刘宁元主编：《中国女性史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 第十四章

# 社会性别研究的认识论

### 引 子

日常生活中常常有些经验促使我们反思我们到底知道些什么,以及我们是如何获得这些知识的。

#### 故事之一

1998年前后,国有企业改革进入重要阶段,由于经济结构调整,大量女工下岗。有篇关于下岗女工再就业的报道,报道称,一些纺织女工因为转产被迫下岗,政府对这些下岗纺织女工进行了妥善安置。通过培训这些女工进入某星级宾馆做服务员。然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些女工纷纷要求换工作。可以看出,下岗女工对工作“挑肥拣瘦”,需要转变就业观念。

事实真的如此吗?为什么已经下岗的女工还不愿意做星级宾馆的服务员呢?带着这个问题,研究者专门走访了这些要求换工作的女工,女工说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她们说:“我们是纺织女工出身,挡车工的工作是不停地走,这个工作的职业病就是腰有病,很难弯腰。政府给我们安排了宾馆服务员的工作,我们很感激,但是我们真干不了。服务员的主要工作是换床单,这工作是有工作量要求的,我们根本完不成定额。因为弯不下

腰,我们都是跪在地上铺床单,但是这样做效率太低,总是完不成定额,而且腰还疼得直不起来。我们不能要求宾馆降低工作要求吧,不能给别人添乱,只好自己辞职不干了。”

对同一件事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并非来自当事人,它带着指责,要求“女工们改变就业观念”;另一种解释来自当事人,带着内疚,希望“不要给别人添乱”。这说明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可能了解到、倾听到不同的事实真相,这涉及到怎样收集资料和倾听声音,涉及到有关知识的文化相对主义和立场等问题。

## 故事之二

1996年,我在北京某妇女热线作志愿者。当时一场有关“如何解答处女膜问题”的讨论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

事情缘起于这样的一个电话:一名未婚女性来电话说她后天就要结婚,她现在的未婚夫认为她很纯洁,不知道她曾经有过男朋友并有过性关系。她不想破坏自己在未婚夫眼中的形象,想过一份安宁的生活。因此她求助于热线,希望帮她找到一个掩盖事实的方法。

咨询员怎样回答这一问题才好呢?为此,咨询员们专门开会讨论<sup>①</sup>。对此大致有两种意见:一是有少数咨询员认为应当实话实说,就是告诉来话者:如果你真的了解你的丈夫,并相信他真的爱你,就应当在婚前直言不讳。二是有多数咨询员认为,即使她觉得未婚夫是真的爱她,她也不应直言相告,因为中国仍然是男权社会,男人忍受不了自己不是妻子性经验中的第一人。最后咨询员们达成共识:不能直言相告。因为所有人都认为直言相告的后果是,她婚后将不会幸福。与其让真话带来不幸,还不如用不太美丽的谎话来构造一份安宁的生活。

“谎言”该怎样说呢?第一,可以去做处女膜修补术,但这一提议遭到了几乎所有人的反对,一方面反感社会上居然有对处女膜修补术的需求;另一方面又好笑这种自欺欺人的作法和男人这样容易受骗上当。第二,可以告诉她知识,即女性常常会在运动中无意损伤到处女膜,首次性交没有出血是正常的。甚至有人拿出美国人的数据,说有研究表明,大概至少有5%的人在第一次性交时不会出血。数据一经说出,大家都认为很有说服

<sup>①</sup> 当时妇女热线每两周一次研讨会,研讨的内容是在咨询过程遇到的难点问题。咨询员全部为受过大学本科以上教育的已婚妇女。

力。最后的方案,不仅令人满意,而且充满知识的说明力,有美国资料证明,虽然没有人要求验证一下美国人的资料。对于我来说,它成为我今后遇到同类问题时一个较为标准的答案。因为此后我真的使用过那“知识”,当我说出美国人研究的所谓5%时,我能感受到来话者如释重负。

这场讨论和相关知识的应用已经过去几年了。在处女膜问题上,商品化趋势演化得令人瞠目结舌,各种处女膜修补术流行于大街小巷,其功能五花八门。本章要讨论的不是处女问题,而是有关处女的“知识”。这是认识论的问题,也是对传统知识,特别是有关性别的传统知识的挑战。

面对传统的知识问题,我们要思考:第一,人们头脑中有怎样的性别知识?这些知识是先验的还是经验的?人们怎么断定新婚丈夫知道妻子不是处女后一定会做出负面反应?如果知识是先验的,它将表现为一种知识的历史形态,那么中国人有关性别的知识是怎样的历史形态呢?如果知识是经验的,那么,两性具有不同的生活经验,经验的差异会上升为怎样不同的知识呢?第二,知识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是符号化的,这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面对着意义世界,就像“处女”概念,它已经不是“真处女”或“假处女”的事实,而是与权力关系相连的象征符号。当我们面对意义世界时,有关事实的真相就变成了形而上的认识论问题。关涉到我们依据什么来使自己和别人弄清我们究竟在说些什么。<sup>①</sup>第三,如果说两性具有不同的生活经验,且这种经验会形成某种“知识”或“常识”的话,今天有关性别的知识到底是什么?它是如何得出来的?为什么我们相信一名女性“真实”地说出她的实际情况时,她就会真的不幸福呢?以谎言替代真实会给她的生活带来怎样的感受呢?有关性别的知识的社会功能是否也是一种知识的压迫?

事实上,性别问题的提出几乎挑战了人文科学的各种理论。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关注到有四个基本的理论困境是社会学者们必须面对的:第一种困境是人类活动与社会结构问题,即人类到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积极主动地控制自己的生活状况。第二种困境是共识与矛盾的问题,即一个社会的维系与变化,是依赖于不断的合作,还是依赖于各种矛盾与冲突?事实上的情形是,社会中既有共享的某些价值,也充斥着各种矛盾。第三个困境是性别问题,即如何对性别进行令人满意的理解与分析。第四个困境是现代社会的特征,是经济因素还是其他的因素决定社会发展的程度。吉登斯认为,性别困境是四个

<sup>①</sup> 施密茨(H. Schmitz):《新现象学》(庞学铨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理论困境中最难解决的问题。

在过去社会学理论的发展中,所有重要人物都是男性。实际上他们在著述中并没有注意到人类是有性别差异的。在他们的作品中,人类的个体仿佛是中性的,是抽象的“行动者”,而不是有区别的女性和男性。因为我们几乎无法把有关性别的问题与社会学中既有的理论思考形式进一步联系起来,所以这可能是目前这四个理论困境中最难解决的问题。<sup>①</sup>

挑战传统知识的工作要求我们反思知识建构与知识传递的本质,性别研究的核心内容就是对以往的知识做系统的、有批判性的反思。

## 第一节 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

认识论(epistemology)是有关知识获得和知识有效性的理论,与人们在什么条件下获得怎样的知识有关。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认识论指导人们形成具体的研究方法,即有关如何提问、如何收集资料 and 如何解释资料的知识体系。由于认识社会的态度和价值观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范式(paradigm)。

### 一、研究范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国学术界在方法论上不断创新。库恩(Thomas Kuhn)提出了“范式”(paradigm)的概念,把形成某种科学特色的基本观点称为这种科学的范式。他认为,任何研究和理论都是建立在特定价值观念和典范基础上的,因此方法论的变化是范式的革命,革命是世界观的转变。在自然科学史上,牛顿的力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等都是自然科学的范式。自然科学家相信一个范式取代另一个范式代表了从错误观念到正确观念的转变。社会学与自然科学不同,每个范式都有一定的解释力,都提供了不同的观点,并解释一些社会生活的维度。有学者建议把社会科学的每一种范式都当作理解社会的一扇窗户来看待,它为我们提供了各种不同的观察方式。<sup>②</sup>

波普(Karl Popper)提出证伪(falsification)与微型工程论(piece-meal engineering)。他指出,不能被证伪的理论根本违反科学之道,学者的责任不是证明

① [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45页。

② [美]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基础》(第八版)(邱泽奇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页。

自己找到了绝对真理,而是证伪理论,从而促使人类不断进步。根据波普的定义,证伪的步骤是P1—TT—EE—P2。其中P1(problem 1)为科学家原先遇到的问题;TT(tentative theory)为暂时性理论;EE(error elimination)是检测时排除错误;P2(problem 2)为排除旧有错误后建立的新问题。用同样试错的方式来批评、反证暂时性理论,不断减少错误,逐渐逼近真理。学者的责任是要证明自己的理论或他人的理论是错误的,通过不停的反证,人类知识得以提升和发展,这是从牛顿向爱因斯坦的研究类型的转变。“微型工程论”是指研究者没有能力做庞大的理论,因为现实社会中的差别太大、太多了,研究者只能做微观的观察和理论,以“解剖麻雀”的方法对微观进行研究。

社会科学的范式有许多,在此重点介绍实证主义、常人方法论和批判理论。

### (一) 实证主义

实证主义(positivism)起源于经验主义哲学,具有一整套有关认识社会和获得知识的具体原则和方法,强调客观性和研究结果的真实性。西方科学的传统是建立在实证主义认识论基础上的,强调社会科学应像自然科学一样,把经验世界看作是一个客观世界,客观世界的事物存在规律和自然法则,它们是可以观察到的,可以被实证的。实证主义是作为科学的认识论被引入社会学研究的,强调通过不带感情色彩观察到的实证数据,并由此揭示出社会的规律。社会学家涂尔干进一步发展了实证主义,他强调社会学就是用一种社会事实解释另一种社会事实。实证主义强调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实证主义认为社会现象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不受主观价值因素的影响,也不被知识和理论所建构。主体和客体是两个截然分开的实体,主体可以使用一整套科学的工具和方法程序获得对客体的认识。主体与客体是二元分离的。

第二,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应当保持价值中立。研究者必须而且可以摆脱自身的价值与道德观,中立地观察现实世界,在研究过程中绝不能有个人主观价值取向的介入。这一实证主义原则也被称为“价值无涉”(value-free)。研究者在研究时要把事实陈述和价值判断划分开,要保持中立,不然研究成果就不具有可信性。因为价值判断是主观的,而事实陈述是客观的,当把研究者的价值立场带入到社会研究时,必然会妨碍研究程序及影响研究结果的客观性。

第三,为了保证资料的客观性,实证主义主要使用实验的和量化的方法对假设进行证实。实证主义要求透过大量反复的观察、访谈、问卷调查和实验等,收集第一手资料,追求材料的客观真实性,对客观资料反复论证和综合分析可能得出社会规律和理论。客观性既被当作是理论研究过程的起点,也被看成是理论研究的结果。事物本身具有其内在固定性和规律性,其研究方法应当是可

观察的、可计算的、可测量的。因此,实证主义把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于社会科学现象,通过客观研究、观察、实验与循环论证发现影响社会进步的普遍规律。

第四,在对社会客观规律的寻找和求证的过程中,实证主义强调结构性因素的作用,因此组织、结构、系统等大规模的社会安排与社会群体特性,如阶级、性别、社区、受教育状况等受到更多的关注。同时把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于社会科学的问题,以求寻找到客观的规律,并由客观规律再引申出理论。

实证主义虽然面临各种挑战,但依然是社会科学的主流研究传统,无论是社会学、心理学还是政治学研究都强调客观性和测量。

## (二) 常人方法论

常人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强调对行动以及行动意义的研究,而不是强调社会结构本身。加芬克尔指出,人类不断地通过行动和互动创造了社会结构,事实上也创造了属于他们自己的现实。常人方法论受到符号互动理论的影响,韦伯、齐美尔、米德、库利等人的思想是其思想基础,舒茨、加芬克尔等完善了这一研究方法。

社会学大师韦伯的社会行动分析强调对意义的解释,一是了解行动者在其生活经验中实际上赋予的意义,二是观察者可能赋予假设类型的行动者的类型化意义。他认为存在着四种类型的社会行动,即工具理性行动、价值理性行动、情感行动和传统行动。

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对个人之间的互动感兴趣,强调社会过程是一个心理过程,社会是个认知的统一体,每个人在一整套共同知识中生活。在他看来,人们关于他人心理倾向的知识是不完整的;人们不仅把他人看作类型化的,同时还以相似的方式对待他人。因此研究者的任务是理解个体以及他们的境遇和行动;社会的本质产生于理念,永远无法把握。米德对齐美尔思想的继承使其发展出符号互动理论,米德强调人类扮演他人角色的能力,也就是想像在特定的情况下他人的感觉和行为能力。米德认为,社会是由代表心理过程的姿态和语言(符号)的交换构成的。

奥地利现象社会学家阿尔弗雷德·舒茨(Schutz, A.)在他的《社会世界的现象学》中论及“生活世界”的结构时谈到生活世界中的知识问题,他说:人们在面对外在世界、理解外在世界时,并不仅仅在进行感知的活动,他们和科学家一样,也运用了一套极为复杂的抽象构造来理解这些对象,这些构造物就是“手头的库存知识”,人们只有利用这些“库存知识”才能理解世界。科学世界(学习到的书本知识)为人们提供了一部分“库存知识”。另一部分“库存知识”是个人的生活历史提供的。在现象学的观点中,结构性因素固然重要,但现实生活中的

互动关系更重要。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社会背景,存在性别、阶级、年龄、种族、社区、组织等方面的差异,由此形成不同的象征符号间的互动关系。

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指出,人类赋予“真实”不确定的性质,使得人们不断地从自己的生活经历中寻求意义。似乎每个人都像个社会科学家,因此是“常人”的研究方法。常人方法论致力于对日常生活中的平凡活动进行直接的经验性研究,其研究技巧之一是打破常规,即使用违背人们期望的方法了解人们的解释,观察行为反应,由此可以观察到日常生活中有组织的社会安排和人们为这些社会安排提供的各种解释,这些解释就是对行为进行反思,就是人们沟通的逻辑,它使行为变得有意义。对意义的研究可以揭示行动者相互交谈时所掩盖的未曾言说、无法提及的潜在社会现实。

### (三) 批判理论

批判理论更多地继承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一方面认为存在着客观现实,另一方面强调现实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被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种族和性别等因素塑造而成,因此研究者不可能做到价值中立,研究者的价值观不仅影响到研究和研究策略,还是一种行动,是对传统偏见的挑战。批判理论强调研究目的是为了唤醒人们在历史过程中被压抑的真实意识,逐步解除那些给人们带来痛苦和挣扎的偏见,提出新的问题和看问题的角度。因此,以批判理论的观点看,一项研究好坏的标准是看它是否能够消除参与者的无知和增加其能力。批判的力量就是解放的力量。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批判理论强调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平等的交流和对话,在对话的过程中,协助研究对象发现和表达他们生活背后的规律和可能的解放之路。

从批判理论的角度看,许多已有的“知识”都是值得反思的。例如,我们常常会问,传统的父权制意识形态会影响到科学研究吗?科学是证实的,应当不会受到人们观念的影响。例如,以往的医学教科书这样说:卵子是被动的,精子是主动的。而新近的研究发现,卵子是主动的。对于这一发现的科学说法是:精子是在逃离卵子的捕捉。“主动”这类赞美的词汇在科学语言中也只适用于男性。也就是说,性别偏见影响到人们在显微镜下的观察和对观察结果的描述和解释。

## 二、女权主义的研究方法

女权主义研究方法是与其他研究范式同样重要的一种研究。它建立在批判理论的基础上,对人类知识只是用第三人称男性代名词(man)来通称“人类”提出了根本的质疑。它从关注社会对女性的压迫,进而关注所有的社会压迫现象。女权主义研究方法强调,在历史的进程中,男女两性有极为不同的社会经历,

两性之间看事情的方法也不尽相同,因此男性和女性从社会生活中得到的结论也有差异,特别是那些习以为常的共识。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信仰、价值观和规范都是由社会上的一部分人拟定的,事实上这只代表这一部分人的利益和感受。

女权主义研究方法首先是关注女性经验的现实以及这些经验的意义。因为传统研究方法对女性的分析是存在偏差的,这不仅在于女性很少受到学术研究的关注,还在于女性经验的被低估,导致将男性的经验不正确地推广到包括女性在内的整个人类群体。第二,研究是有价值和有立场的。无论是研究者还是研究对象都是生活在特定的文化、社会和人际关系中的,我们对于社会、两性的概念及其意义的理解都明显地受到文化和社会价值观的影响。因此,女权主义研究强调要将一整套价值观带入研究过程,这种价值观可能引导研究的性质和解释。第三,研究具有行动价值。女权主义的研究方法不仅在于揭示女性经验,还在于要改变不平等的两性关系。

#### (一) 女权主义的经验理论

女权主义的经验理论认为,对女性或其他弱势群体的研究应拒绝先验的假设,要赋予女性经验以主体性。这一认识论的逻辑是:作为被压迫群体,他(她)们经历了双重的地位,因此必须发展双重的研究视角:一是发展能够理解统治者观点的视角;二是发展能够展示被压迫群体自身经验的视角。因为被压迫群体在摆脱压迫的斗争中对社会的统治机制特别敏感,由此可以更好地了解权力关系。例如,女性家庭生活的经验与男性不同,对女性家庭生活经验的研究可以揭示出一种理解世界的新方法,这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社会结构与日常生活经验之间的微观互动关系,揭示个人是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在个人的生活世界中社会制度可以转化为个人能够利用的资源。

女性的健康议题、受虐女性的经验等研究是女权主义经验理论偏爱的题目,它展示出女性经验的多样性,不同阶级、种族、文化的女性的日常生活提供了认识世界的源泉。

#### (二) 女权主义的立场理论

女权主义的立场理论(feminist standpoint theory)是在批判主流社会科学中的“理性”、“客观性”、“价值中立”的学术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这一理论的基本假设是:所有人类的信仰和知识都是情境化的(situated),不同的社会情境会对知识进程产生不同的影响,因为我们所知道的和我们如何知道的完全依赖于认知者自身,依赖于认知者的生命轨迹和其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女权主义的立场理论认为,历史上种种对妇女的解释都存在一个共同缺陷就是这些理论建立在男性经验、父权结构和男性主流意识形态的分析框架上。妇女是“被适应”进



这些理论模式中的。哈丁指出,纵观各种理论框架对妇女和性别关系的研究就会发现,一方面我们一直能够使用这些学术话语阐述我们想要论述的问题;另一方面这些我们一直借用的分析妇女和性别关系的研究框架中从没有妇女的经验,当我们开始用妇女的经验去替代男性的经验时,我们立刻面临了这样一种现象:这些概念和范畴使妇女消失了。<sup>①</sup>史密斯发现社会学家使用的数字或资料都是被一些机构和其他专家(如医生、警察与法庭、社会工作者)包装过的,它表达和强化了统治关系。史密斯认为,女性常常根据男性的概念图式来描述自己的体验,使她们同自身的经验分离,使她们有一种“分化的意识”(bifurcated consciousness),日常生活基于女性经验,但她们却在使用男性概念范畴来解释她的体验,即女性生活经验与其可使用的概念和理论框架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离。因此,由屈从地位群体的经验出发进行研究,可能能够引导出新的概念和理论,并从整体上揭示男性中心主义的本质。

史密斯(Dorothy Smith)和科林斯(Patricia Hill Collins)是这一理论的主要倡导者。史密斯提出了“妇女立场理论”的认识论;科林斯发展了“美国黑人妇女的立场理论”。史密斯和科林斯的妇女立场理论直接受到马克思和曼海姆等人的影响。在马克思和曼海姆的观点中,认识者的立场受社会阶级的影响。史密斯强调,认识者的立场受性别的影响,科林斯强调认识者的立场受到种族和性别的影响。她们批评了社会学中广为接受的所谓“认识者具有共同立场”的观点,指出所谓的共同立场是白人中产阶级男性的立场。科林斯和史密斯强调认识论的逻辑起点是:假设两性有不同的立场,其结果是两性在思考对象和思维方式上存在深刻差别。虽然她们承认个人经历具有多样性,妇女的立场亦具有多样性;但她们更强调两性间立场的不同。妇女立场理论关注女性的经验还追求实现两性平等的可行道路。她们承认自己的理论是片面的,反映的是认识者的社会地位。<sup>②</sup>

科林斯描述了美国黑人妇女独特的文化,美国黑人妇女反抗统治秩序中的种族、阶级和性别的共同压迫,这使她拒绝白人男子“要么这样/要么那样”(either/or)的非此即彼的思维逻辑,而是在日常生活和知识建构上选择互动的(both/and)思维方式。科林斯认为美国黑人女权主义的认识论是用学者“自己的设身处地的具体经历才能表达黑人妇女的立场”。科林斯强调从生活经验开

<sup>①</sup> S. Harding, "The Instability of the Analytical Categories of Feminist Theories," *Signs*, 4, 1986, p. 646.

<sup>②</sup> D.E. Smith, *The Conceptual Practices of Power: A Feminist Sociology of Knowledge*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0).

始研究,以美国黑人女性的经验为基础,她提出:(1)知识应当来自对话和研究者作为主体的参与性活动;(2)个人的经验、情感和共情是求知过程的核心;(3)社会学家应当具有个人道德和责任感。<sup>①</sup>

### (三)后现代的女权主义认识论

后现代主义的女权主义认识论挑战了由男权社会建构出来的知识、权力关系、语言等社会秩序,并拒绝寻求普遍的女性立场。他们批判立场理论,认为立场理论所强调的共同的女性经验,不过是白人、中产阶级、异性恋的妇女们的经验,它忽视、否认或歪曲了更为边缘的女性或男性的经验。后现代的女权主义认识论认为,个人身份受多种因素影响,如民族、种族、性倾向、阶级等。知识不是中立的和客观的,根本不存在“事实真理”,它根植于社会关系和历史情境中,是被社会建构的,由此直指知识本身具有的权力关系。因此研究者的任务应当集中于意义的建构和权威者如何控制这些意义上。后现代主义的女权主义认为,科学批判只是提供了改造现实的可能性,并不追求新的科学范式的建构,因此很容易落入男性中心主义的圈套,树立新的权威和话语。因此,强调解构的方法,要重新解读各种有关性别的“科学”知识,从中发现隐含的男性偏见。

这些研究是庞杂而多元的,包括了多项具有潜力的研究方向,如叙述研究。这种研究视角认为,女性的故事不仅反映女性被压迫的事实,同时这些故事的“叙说”也被看作是整合权力和被压迫关系的建构力量。特别是在文化研究领域叙事分析成为重要的研究内容,并由此对权力进行分析。

## 第二节 社会性别研究的方法

社会性别研究在认识论上受到常人方法论、批判理论和女权主义方法论的影响,并在研究方法(method)上,即收集资料和信息的技术、获得知识的手段方面运用这些认识论的研究成果。

### 一、社会性别研究的原则

进行社会性别研究的原则是批判取向、经验取向、行动取向和创新取向。

第一,批判取向的性别研究是强调对两性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进行反思。现代生活和社会制度中存在多方面的父权制和男性至上的特性,这些特性导致了

<sup>①</sup> P.H. Collins, *Black Feminist Thought: Knowledge, Consciousness and the Politics of Empowerment* (Boston: Unwin Hyman, 1990).

许多负面结果,对此应当进行具有唤醒性别意识的批判性研究。因此提问的方式是:所谓知识的客观性是否是可取的?所谓的客观性知识可能是建立在以男性权力为基础的理论假设之上的,其研究结果可能就是父权意识形态的体现。因此批判取向的性别研究要求反思不断再生产出父权制性别关系的知识体系。

性别研究挑战的是父权式的意义世界。所谓父权式的意义世界是指由男性立场和经验建立起来的社会共识和符号意义。例如,社会的普遍共识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男主外与女主内”、“男强女弱”,这些共识似乎是无需检验的常识;这些“库存知识”是男性化的知识,服务于男性利益。父权式的意义世界是通过各种知识建构出来的,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里,每个人都是建构他人意义世界的能动者。父权式知识的传播者并不一定是男性,也包括女性,母女之间、夫妻之间,每天都在复制父权式的知识,女性的生活经验被包围着的男性化知识异化,并成为客体。因此,性别研究要挑战司空见惯的父权式的意义世界;同时命名女性的生活经验和知识。

第二,经验取向的性别研究要求把两性经验纳入研究视野,因为性别压迫不仅是对女性的压迫,同时也是对男性的压迫。对两性经验的研究可能提供知识来源的多样性,在研究方法上可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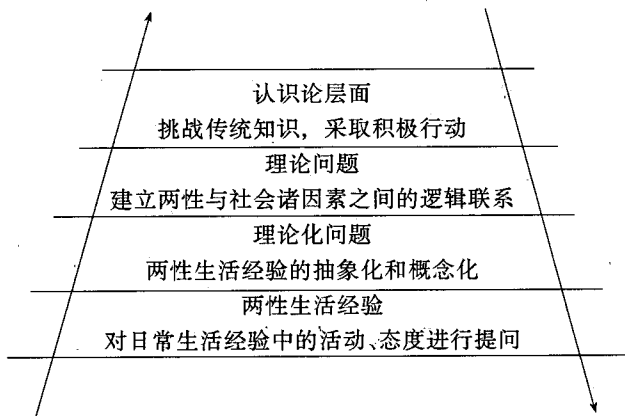
第三,行动取向的性别研究要求以行动改变不平等的性别关系。任何现存的性别关系都是在一定文化和历史情境中产生和变化的,每个人的行动都可能消除或减弱因性别、种族、阶级和其他社会分类而造成的不平等,促进人类整体的福祉。因此性别研究本身就是认识两性不平等关系的研究行动。在引子中当我们要求一名女性为了她婚姻的“幸福”去说假话的时候,这一答案本身就已经成为性别压迫的工具了,因为它暗示着传统性规范的通行标准,暗示着一名失身女性是不受欢迎的社会准则。因此,性别研究的行动意义不应当是将女性带入男性要求的传统角色,而是要将女性带出其旧有的角色,并给予新的角色知识的支持。

第四,创新取向的性别研究强调对女性经验命名的意义,因此话语成为重要的研究领域。语言不仅是思维与沟通的工具,也是以阶级、文化、性别、城乡等分化的群体用以叙述其价值观的工具,语言在其整理、编辑、生产的过程中重建生活的现实与意义。客观世界不是独立于语言而存在的,“客观”世界本身是语言建构的产物,因此将女性经验进行命名是一项创新工作。创新取向的性别研究面临巨大的挑战,因为无论男女在叙述层面上都不得不操着男性的话语。女性自身的经验被男性知识叙述,以至于根本不存在描述女性经验的话语,从“家庭暴力”或“婚姻暴力”一词在中国的出现,可以看到话语具有的创造知识的

潜力。直到 1995 年,“家庭暴力”一词在中国不存在。1995 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的前夕,人们不知道应当如何翻译 domestic violence(后翻译为“家庭暴力”)一词,因为中文里只有“打老婆”之说,没有“家庭暴力”一词。没有“家庭暴力”的词汇并不意味着没有家庭内男性对女性的暴力侵害,只是人们接受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婚姻观念,老婆挨打成为常态的家庭事务,不可能成为公共领域中公开讨论的社会问题。随着性别研究的深入,家庭暴力不仅公开被讨论,而且写进了新《婚姻法》。当各种媒体关注“家庭暴力”时,我们发现中国的家庭暴力事件不断“增加”,这表明在没有话语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概念时,即使事实一直存在,它也只能是混沌不清的、不可见的事实。以女性经验为主的命名将会呈现某些事情的“真相”,如“婚内强奸”、“约会强奸”等,随着女性经验的被揭示和新话语的产生,将有助于廓清原本存在但没有真正进入人们意识的事实。社会真实是被发现、被语言叙述的,性别研究的创造性就在于创造某些词语更好地表达两性经验,揭示社会现实中的性别权力关系。

## 二、社会性别研究的方法

为了使性别研究获得的知识能够具有批判性和创新性,应当从经验出发把握研究的全过程。下图是进行社会性别研究的整个过程。



理解两性生活经验的认识论阶梯

第一,建立从日常生活经验出发观察社会的态度,从经验到的两性生活出发进行提问。例如,当我们正在谈恋爱时,可以将人们对爱、对性关系以及性别权力关系的看法加以收集。我们可以去生活之中发现问题,例如,我们可以分别就厕所的空间进行测量,了解两性占有空间的状况。我们可以对母亲活动的

领域加以观察,我们问一问自己的母亲,她一生对于生育、养育以及工作的看法。也就是说,我们的提问是源自于现实的观察和资料的收集。

第二,把生活经验中的性别问题理论化和概念化。这是将研究的问题进行抽象的阶段。以两性占有的公共厕所空间为例,我们可以将问题抽象为两性对公共资源的拥有状况。首先,我们对两性使用公共厕所的时间进行测量,将会发现由于生理原因,女性使用厕所的时间要多于男性;其次是对男女公共厕所的空间进行调查,抽取一定数量的公共厕所后我们会发现男性公共厕所的面积普遍大于女性的。研究可以将公共厕所的性别占有状况抽象为两性公共空间的拥有率分析。

第三,把性别问题与社会诸因素,如社会制度因素、文化因素、社会结构因素等建立某种逻辑联系,进行基本的类型化研究,即把经验研究上升到系统化的理论。从两性公共厕所的分配至少可以引发出这样两个问题:一是公共资源性别分配的逻辑是什么?二是公共资源的分配主体是谁?以男性为主的设计方案如何掩盖了日常生活中的性别不平等。这样我们将性别问题与设计制度、权力关系、分配主体等因素联系起来。

第四,通过把性别问题理论化来挑战传统意识形态,创新理论。这一阶段是社会科学工作者努力达到的最高目标。如果能够把从公共厕所中看到的性别利益分配拓展至对公共空间的性别分配,这样的认识论将是十分有益的,在充分考察和了解城市公共空间的设计思想的基础上,分析公共空间设计的性别格局中内涵的父权制和等级制特征,并全面对公共空间设计体制提出建议将会使研究达到更高水平。

### 三、本土化的社会性别研究

社会性别研究的本土化是指建立在对中国文化、历史、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的理解基础上,分析和解释两性不平等的状况和内在机制。虽然西方的理论相对成熟且有一定的理论框架,但这仅仅是进行中国性别研究的重要借鉴资料,核心问题应当是对中国社会的性别关系状况进行分析,寻找这些状况在中国特定历史、文化、经济和政治条件下的理论解释力。对中国现实进行性别研究,已经表明了“立场”,这就是改变的开始。本土化的学术研究必须具备反思性。反思就是要向那些身陷严格的性别决定论铁笼中的人们提供一种解放和唤醒的意识。这些反思应集中于分析在中国的性别认同、性别角色、性别身份和性别关系是怎样的、是如何被创造和被再生产出来的,集中分析社会诸多结构中的性别等级关系和权力结构,以及知识问题。知识建构和传播的过程是权

力运作的过程。乐观地讲,社会性别研究是一种解放和唤醒群体意识的、大有潜力和大有希望的学术工具。

性别研究具有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的特性。跨学科的性别研究是指综合各学科的知识创造出一种对性别关系的新认识论,重建主要的知识结构,创造新概念、方法和研究策略。跨学科不等于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y),多学科主要是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的合作,很少是融合。跨学科并不是一个学科借用另一个学科的概念和方法,而是融合各学科的概念和方法,由此形成新的、更丰富的知识范畴。跨学科要求创造新的思想,是通过反思展示人类生活、社会结构、社会制度以及人们活动动机等诸多方面中的重要“疏漏环节”。<sup>①</sup> 知识不是密封舱,性别研究的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知识范畴为认识性别问题打下基础,提供了创造新思维和新方法的可能性。

社会性别研究在中国的发展还有许多困难,到目前为止它还处于学术的边缘地带,但这种边缘性也为其发展带来了更多的活力和空间。

## 小 结

挑战传统知识的工作要求我们反思知识建构与知识传递的本质,性别研究的核心内容就是对已往的知识做系统的、批判性的反思。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一直占据社会科学的霸主地位,其核心观点是强调价值中立,通过证实资料得出客观性知识。二战之后社会科学领域中的范式革命使常人方法论、批判理论和女权主义方法论为认识社会提供了新的视角。女权主义的经验理论、立场理论和后现代女权主义认识论对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主流认识论强调的“价值中立”、“理性”和“客观性”给予了针锋相对的批判,指出传统社会科学总是把男人的生活经验当作人类的经验来研究;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实质上是用貌似客观的、价值无涉的男性理性和逻辑进行思考和分析,其后果是性别偏见。性别研究的方法原则是批判取向、经验取向、行动取向和创新取向。其研究过程是从两性的实际经验出发,把性别问题的理论上升到对传统性别意识形态的挑战。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要加强本土化和跨学科的研究。

<sup>①</sup> 参见朱迪思·阿伦和萨莉·基思:《被学科学科化? 在妇女学中跨学科研究使命的需要》,载余宁平、杜芳琴主编:《不守规矩的知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22页。

### ❖ 关键概念

范式 证伪 微型工程 实证主义 常人方法论 批判理论  
 女权主义理论 女权主义的经验理论 女权主义的立场理论  
 父权式意义世界 本土化 跨学科的性别研究 反思

### ❖ 思考题

1. 试解释女权主义的研究方法及其主要的观点。
2. 论述性别研究的基本原则。
3. 说明性别研究的一般过程,并设计一个研究提纲。

### ❖ 进一步阅读文献

[美] 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基础》(第八版)(邱泽奇译),华夏出版社 2002 年版。

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施密茨:《新现象学》(庞学铨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7 年版。

波普:《猜想与反驳》(傅季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 年版。

胡塞尔:《现象学的方法》(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4 年版。

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车槿山译),三联书店 1997 年版。

[美]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 Introduction to the Gender Studies Analyses to Dynamics of Gender Inequalities

## ■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跨学科的大学本科教材，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分析影响两性不平等的社会机制。全书共分四编。第一编分析社会心理、社会文化、历史过程等文化因素，它们建构了男强女弱的性别气质。第二编分析社会通过对两性身体的控制建立不平等的性关系秩序，在亲密关系中，父权制以更为隐蔽的方式实施统治。借助这种方式，一方面男性统治的经验可以不断丰富；另一方面，它又隐藏了女性被统治的经历，使不平等的性别关系成为“看不见”的黑洞。第三编分析劳动性别分工作为生产和再生产性别不平等关系的重要机制，及经济因素影响两性的社会发展。第四编介绍了社会性别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 ■ 作者简介

佟新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性别研究及劳动社会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出版有《异化与抗争——中国女工工作史研究》、《人口社会学》等著作，有多篇相关论文发表，承担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以及多项部委级和国际合作项目。

责任编辑：陈宏 张盈盈

封面设计： 春天·书装工作室

ISBN 978-7-301-09267-5



9 787301 092675

定价：26.00元